

제9회 中國古中世史學會 國際學術大會

中國 古中世 歷史空間으로서의 都城

일시 2014년 9월 19일(금)~20일(토)

장소 서울대학교 인문대학 신양인문학술정보관

장소 국제회의실(4동 302호)

주관 중국고중세사학회

후원 동북아역사재단 · 중앙문화재연구원

中國古中世史學會

프로그램

9월 19일(금)

사회: 임병덕 (충북대)

- 13:00~13:20 • 개회사 정병준 (중국고중세사학회 회장)
- 13:20~14:00 漢-唐간 正殿의 위치변화-계승인가 파격인가
• 기조강연 박한제 (서울대)
- 14:00~15:00 漢 長安城의 研究 現況
• 발표 劉振東 (中國社會科學院 考古研究所)
• 토론 김경호 (성균관대)
- 15:00~16:00 魏晉南北朝시대 都城의 構造
• 발표 錢國祥 (中國社會科學院 考古研究所)
• 토론 신성곤 (한양대)
- 16:00~17:00 考古學적 관점에서 본 中國 中世 都城의 系統-長安城을 중심으로
• 발표 韓建華 (中國社會科學院 考古研究所)
• 토론 김종섭 (서울시립대)
- 17:00~ 종합토론
• 좌장 박순발 (충남대)

9월 20일(토)

오전 사회: 민후기 (연세대)

오후 사회: 박근철 (한성대)

- 10:00~11:00 殷墟 도읍의 구조-최근 고고학적 조사 성과를 통해 본
• 발표 김정렬 (송실대), 岳洪彬(中國社會科學院 考古研究所)
• 토론 심재훈 (단국대)
- 11:00~12:00 진동하는 中軸線-漢代 都城 건축 이념의 시간적 추이
• 발표 김병준 (서울대)
• 토론 윤재석 (경북대)
- 14:00~15:00 中國 古中世 都城設計와 祭天儀禮
• 발표 佐川英治 (東京大)
• 토론 조성우 (서울대)
- 15:00~16:00 隋唐 長安城과 市場의 위상
• 발표 최재영 (한림대)
• 토론 김 호 (고려대)
- 16:00~17:00 五代시기 都城 開封의 부상과 國家儀禮의 거행
• 발표 김상범 (한국외대)
• 토론 정순모 (충남대)
- 17:00~ 종합토론
• 좌장 김유철 (서강대)

목 차

【기조강연】

漢-唐간 正殿의 위치변화-계승인가 파괴인가 박한제(별첨)

【발표논문】

- 漢 長安城의 研究 現況 劉振東 1
토론문 金慶浩 17

- 魏晉南北朝시대 都城의 構造 錢國祥 21
토론문 신성곤 51

- 考古學적 觀點에서 본 中國 中世
都城의 系統-長安城을 중심으로 韓建華 55
토론문 김중섭(별첨)

- 殷墟 도읍의 구조
— 최근의 고고학적 조사 성과를 통해 본 — 김정열 / 岳洪彬 79
토론문 심재훈(별첨)

- 진동하는 중축선
— 한대 도성 건축 이념의 시간적 추이 — 김병준 105
토론문 윤재석(별첨)

- 中國 古中世 都城設計와 祭天儀禮 佐川英治 123
토론문 조성우(별첨)

- 隋唐長安城과 市場의 위상 최재영 143
토론문 김 호(별첨)

- 五代時期 都城 開封의 浮上과 國家儀禮의 거행 김상범 155
토론문 정순모(별첨)

汉长安城之研究现状

——汉都长安的结构

刘振东

长安城作为西汉皇朝的首都，由于其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很早就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早期的研究多是从文献史料入手，探讨城市的营建以及宫殿建筑等问题，随着田野考古调查的展开，城市布局和特征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得以拓展，汉长安城的研究达到了新的水平。

一、汉长安城遗址概况

汉长安城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北方（图一）。汉长安城的考古工作始于1956年。

汉长安城平面近方形，城墙夯筑。根据以前的测量，东城墙长6000米，南城墙长7600米，西城墙长4900米，北城墙长7200米，周长25700米，面积约36平方公里。其中东、西城墙较平直；北城墙因邻近渭河，呈西南—东北走向，有多处曲折；南城墙因迁就先筑的长乐宫、未央宫和高庙，中部呈外凸之状。城墙底部宽14~16米，一般城门附近的城墙有所加宽。经在城墙西南角内外试掘，证明城角之上有角楼一类的防御性设施，城角的内侧也有建筑。城墙外有壕沟环绕。

汉长安城每面墙上开3门，四面共有12座城门。东墙由北向南是宣平门、清明门和霸城门。北墙由东向西为洛城门、厨城门和横门。西墙由北向南是雍门、直城

门和章城门。南墙由西向东为西安门、安门和覆盎门。从已发掘的霸城门、西安门、直城门和宣平门等城门遗址看，每座城门都有 3 个门道，每个门道的实际宽度约为 6 米。由于城门之间的隔墙宽度不同，造成城门规模的差异，其中与未央宫、长乐宫宫门相对的西安门、霸城门门道隔墙宽 14 米，整座城门面阔 52 米，远较其他面阔 32 米的城门宏伟壮观。另外，东城墙上的宣平门、清明门和霸城门，城门南北的城墙外折，形成类似瓮城的设施，显示出与其他城门不同的特征。在霸城门以南和西安门以东城墙的内侧发现类似马道的遗存，在西安门以东、直城门以南的城墙内侧还有附属建筑，应是城门屯兵之所。

汉长安城 12 座城门中除与未央、长乐二宫相对的四座城门外，8 座城门均与城内的大街相连，形成八条或东西向、或南北向笔直的大街。大街宽达数十米，中间设有供皇帝专用的“驰道”。沿城墙内侧设有环城道路，其中东城墙南段路宽 10 余米，西城墙南段路宽约 10 米，西安门附近路宽约 6 米。此外，在城墙外侧还发现与城墙基本平行的道路。

汉长安城的街道将城内空间分割成 11 个区，中部、南部分布有未央宫(包括武库及其以南的“东第”住宅区)、长乐宫(包括太上皇庙、高庙、惠帝庙等)、桂宫、北宫和明光宫，约占 5 区；桂宫、北宫之间可能为包括“北阙甲第”在内的邸第住宅区；西北部手工业作坊和市场可能占有 3 区；东北部的 2 区可能为闾里(图二)。

未央宫是皇宫，是汉初在秦章台建筑群的基础上修建而成，位于长安城的西南隅，又称西宫。宫城平面近方形，边长 2150~2250 米，周长 8800 米，面积约 5 平方公里，约占长安城总面积的 1/7。宫墙夯筑，一般墙基宽 7~8 米。宫城四面各辟一门，其中北门和东门外立阙，称北阙和东阙，此外还有若干座“掖门”。南宫门和北墙上的一座掖门经过发掘，均为一个门道。在南宫门外侧之西设有附属建筑，或为宫门卫屯兵处。宫内有三条主要道路，两条为南北平行的东西路，一条为纵贯宫城中部的南北路。两条东西路将未央宫分成南部、中部和北部三区。作为大朝正殿的前殿位于中部，皇后之宫椒房殿位于北部，南部有以沧池、渐台为中心的皇家池

苑，明渠之水自沧池向北纵穿未央宫。此外，北部还分布着一些中央官署以及石渠阁、天禄阁等文化设施（图三）。作过考古发掘的有西南角楼、前殿、椒房殿、中央官署、少府（或所辖官署）等遗址。前殿是未央宫的中心建筑，位居宫城中央，坐北朝南，现存台基平面为长方形，东西约 200 米，南北近 400 米，台基南侧高约 0.6 米，北侧高约 15 米。椒房殿遗址位于前殿台基以北 350 米处，东西 130 米，南北 148.75 米，由正殿、配殿及附属建筑等组成。中央官署遗址出土了 6 万多枚骨签，大部分刻字，内容主要是一些中央官署和地方工官生产弩机兵器的记录。此遗址或被认为是一座仓库性质的建筑。

长乐宫是在秦兴乐宫的基础上改建而成，位于城的东南，又称东宫。西汉初年高祖刘邦在此视朝，惠帝以后为太后所居。宫墙走向不甚规整，总长万余米。宫城面积约 6 平方公里，约占长安城总面积的 1/6。宫墙基础一般宽 5~9 米，有的地方宽达 12 米。宫城四面有门，东、西门外立阙。宫内有东西向、南北向主路各一条。宫内建筑遗址比较集中分布在三个区域，即西北区、西南区和东南区，西北区是中心宫殿区。长乐宫的东北部为池苑区。考古发掘工作集中在西北区，已经试掘、发掘的建筑遗址共六座：1~4 号遗址均为大型宫殿建筑基址，5 号遗址为仓储类建筑基址，6 号遗址为特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图四）。据考证，6 号遗址为宫内最重要的前殿旧址，紧邻其北的 4 号遗址为临华殿旧址。6 号遗址以东的 5 号遗址推定为藏冰的凌室遗址。

桂宫修建于武帝时期，为后妃所居。遗址位于未央宫以北的雍门大街、横门大街、直城门大街、长安城西城墙围成的区域内。宫墙断续残存，墙基宽 4~5 米。宫城平面长方形，东西 900 米，南北 1840 米。宫内有南北向、东西向主路各一条，南北路南出南宫门通往直城门大街，由文献记载知南宫门名龙楼门。勘探到多处建筑遗址，对其中的 1 号、5~7 号建筑遗址进行了试掘，对 2~4 号建筑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图五）。1 号、2 号遗址作为一组建筑，在桂宫的地位最重要。3 号遗址位于宫城西北部，是一座仓储性建筑。4 号遗址位于 3 号遗址西北部，可能属宫内的

生活区。

北宫是西汉初年营建的一座宫城，汉武帝时进行了增修。北宫遗址位于厨城门大街以东、安门大街以西、雍门大街以南和直城门大街以北的区域内。宫墙断续残存，墙基宽 5~8 米。宫城平面长方形，南北长 1710、东西宽 620 米。已发现南宫门和北宫门遗址，出南宫门的道路通往直城门大街。

武库是汉初规划兴建的重要建筑之一，遗址位于长安城南未央宫和长乐宫之间的安门大街西侧。通过考古勘探、试掘和发掘工作，基本弄清了武库的建筑布局：外围设围墙，平面呈长方形，东西 710 米，南北 322 米，东墙和南墙东段上各有一门；围墙内一道南北隔墙分成东、西两个院落，七座建筑遗址中，东院的北、南、西三面分布着 1 至 4 号遗址，西院的东、西、南三面分布着 5 至 7 号遗址（图六）。7 号遗址规模最大，东西长 234 米，南北宽 45.7 米。遗址出土了大量铜、铁兵器，还有一些刻字骨签。

手工业作坊遗址主要分布在城的西北部，这里发现了夯土墙围成的一个区域，东西 550 米，南北 420~480 米，分布着制陶、铸铁和制币三种作坊遗址，或为“主作陵内器物”的少府属官东园匠所辖。此外，北宫以南还分布有砖瓦窑址。对上述遗址均进行了试掘或发掘，它们的性质应属官营。

关于长安城的市场，存在较大争议，有认为东市和西市位于城内西北部横门大街的东西两侧，有认为东市在洛城门外大道的东侧，西市在横门外大道的两侧，也有人认为东、西市分别位于覆盎门外大道的两侧和横门外大道的两侧。据文献记载，长安城的东、西二市应在城内，由于城西北部被各种手工业作坊遗址占据，并且这些作坊生产的物品大多不是用来流通的商品，所以不宜将这一区域定位成一个市。经勘探，在横门大街以东、厨城门大街以西发现一个夯土墙围成的区域，东西 780 米，南北 650~700 米，可能是西市的旧址。东市应在西市以东的区域里探寻。

建章宫位于长安城西，是汉武帝时兴建的新皇宫，规模颇大。宫城东门和北门外立阙，分别称凤阙和圆阙，凤阙的基址尚存。正殿为前殿，基址北高南低，南北

320 米，东西 200 米，北部现存高 10 余米。此外还有神明台等建筑。在前殿的西北有一片低洼地，即是太液池的旧址，池东北有渐台，基址犹存，池西现存一大型建筑遗址，作过部分发掘。

在长安城的南郊分布着众多礼制建筑，经过考古发掘的有辟雍、社稷和王莽九庙遗址（图七）。辟雍遗址位于安门正南稍偏东，创建于平帝时期。遗址平面外圆内方，主体建筑位于最中央的夯土台上，平面呈“亞”字形，边长 42 米。主体建筑的四周为平面呈方形的夯土围墙，边长 235 米，每面墙的中央辟有一门，围墙四隅各设一曲尺形配房。围墙外环绕一周水沟，直径东西 368 米，南北 349 米。

汉初，除秦社稷，立汉社稷，后来又立官社、官稷。利用秦社稷改造而成的汉社稷故址位于长安城西南部，向北正对未央宫前殿遗址，官社、官稷应与社稷在一处。遗址破坏严重，夯土台基东西残长 240 米，南北宽 60~70 米。主体建筑居中，周施廊庑，另有 8 座房间为附属建筑。

王莽曾立新社稷，其位置在汉社稷以南（包括已遭废弃的汉社稷）。新社稷有两重围墙，平面呈“回”字形，外围墙东西 600 米，南北 570 米，内围墙边长 273 米。内、外围墙四面中央各辟一门。围墙中央没有发现任何建筑的遗存。

宗庙遗址紧邻社稷遗址的西北，由 12 组建筑构成，其中 1~11 号建筑布置在一个方形围墙之中，东西南北四面围墙长度分别为 1635 米、1660 米、1490 米、1415 米，四面围墙上共设门 14 个。12 号建筑在围墙之南部正中，北距南墙 10 多米。12 组建筑的形式相同，都由中心建筑、围墙、四门和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组成。中心建筑平面呈方形，边长 55 米（12 号中心建筑边长约 100 米），四面对称；围墙平面也呈方形，边长 260~284 米。学术界一般认为该建筑群遗址是文献记载的“王莽九庙”。

虽然汉长安城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如明光宫的地望与形制、东西二市的地望与内涵、各阶层城市居民的生存空间、建章宫的结构布局等等，都有待今后的考古工作来解决。

汉代以后，十六国时期的前赵、前秦、后秦和北朝时期的西魏、北周也建都长安，这个时期长安城的情况如何，一直是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们正在积极探索的问题。

2003年4~5月，我们在汉长安城东北部宣平门大街与洛城门大街围成的区域内钻探发现了两个东西并列的小城遗址，二城的北墙和东小城的东墙是利用了汉长安城原有的城墙再加以修缮，二城的其他面墙为汉代以后新筑，墙宽8-10米。西小城东西长1214（北墙）~1236米（南墙），南北宽972（东墙）~974米（西墙），西墙西距洛城门大街14（北端）~56米（南端），南墙南距宣平门大街100米。东小城东西944（南墙）~988米（北墙），南北972（西墙）~990米（东墙）（图四）。经在西小城南墙处试掘，知道墙体建筑于西汉文化层上，墙体北侧有西汉、十六国、北朝各时期的地层堆积。从二小城的位置、初步试掘揭示的地层堆积等情况看，它们应是十六国时期前赵、前秦、后秦以及北朝时期西魏、北周长安城的东、西二宫城，东宫为太子宫，西宫为皇宫。二宫城到隋迁大兴城后废弃。

2008年11~12月，我们对东西宫城隔墙上的一座宫门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清理，揭露面积333平方米。发掘揭示出该宫门只有一个门道，门道东西进深13.2~13.3米，东口和西口南北宽4.4米，中间宽4.6米。

2004年11月，在西宫城西南约2公里处出土了一批青石佛教造像，共31件，有立佛14件、坐佛1件、立菩萨11件、残脚部2件，残莲花座3件。立佛大者仅佛身就高达1.6米，小者佛身高只有0.2米。造像表面大多施以彩绘、贴金。从造像的造型及装饰风格看，时代应为北周。另外，历年来还在宫城之西、之南的多个地点出土北周时期的石造像，说明当时城内分布着不少佛寺。

总之，十六国、北朝时期长安城的郭城虽然仍沿用西汉长安故城，但随着宫城转移到城的东北一隅，其他城市建筑也相应地分布在宫城的南面和西面。这个时期，长安城比较中心的范围大致在西汉厨城门大街与霸城门大街围成的区域内（图八）。

二、汉长安城的研究现状

（一）城市规划问题

关于汉长安城的营建有无系统、详备之规划，实则是一个无从考证的问题。多数研究者主张有此规划，也有研究者认为无此规划。

（二）外郭城问题

关于长安城是宫城还是郭城的问题，学术界曾有过争论。有学者认为长安城属于宫城，其北部和东部应有大郭存在，东市和西市在城外的北郭之中。就已有的考古工作和研究现状看，在长安城外并没有发现有关郭城的遗存，东西二市也不应在城外，因此，这种认识是难以成立的。就汉长安城的布局而言，可看作是将东周时期较为流行的宫城和郭城二城合一，使宫殿区与居民区同处一个大城之中。

在论证长安城有无外郭时，除了东、西二市的位置至关重要外，还涉及一个东郭门的问题。或认为宣平门以东另有一门，名东都门，亦即长安之东郭门。或认为宣平门又名都门，门外有瓮城，当另设一门，因其在都门之东，故称东都门，此门又被解释为东郭门。

都门与东都门当相距不远，二者互为表里，均属城门性质。

（三）城市结构问题

- 1、宫殿与礼制建筑
- 2、武库
- 3、手工业
- 4、市场

长安城主要有两个市，即东市和西市，且二市均应在城内。

据研究，高祖时于城内“立大市”，惠帝时于大市之西立“西市”，所以，大市

又称“东市”。

可能因为东市之繁华，故称为“长安市”。《庙记》有关“长安市”的记载，一直备受争议，其文如下：“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如何理解此文？其一，所谓“长安市”，非指长安城所有的市，而是指长安东市；其二，后段文字可将标点改为：“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

5、居住空间

官寺、宗庙与庐舍

屯卫（城墙、城门、宫墙、宫门、殿、殿门）

邸第（郡邸、蛮夷邸；北第、东第）

闾里（160）

《三辅黄图》：“长安闾里一百六十，室居栉比，门巷修直。”

《汉书·平帝纪》：“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平民。”

《庙记》：“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

1 里=2123.8 m²（33984.9 m²）

6、户口

《汉书·地理志》：“长安，高帝五年置。惠帝元年初城，六年成。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王莽曰常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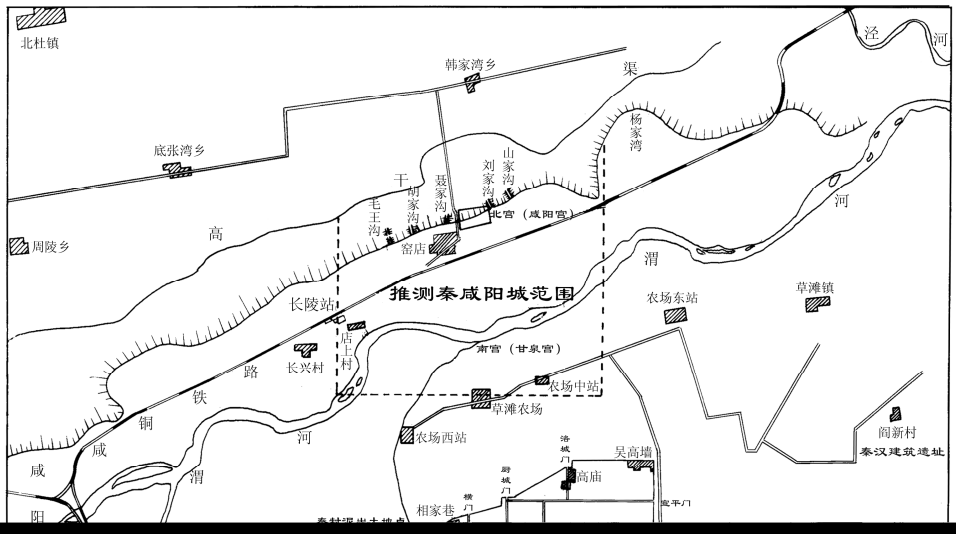
长安城内、外（乡、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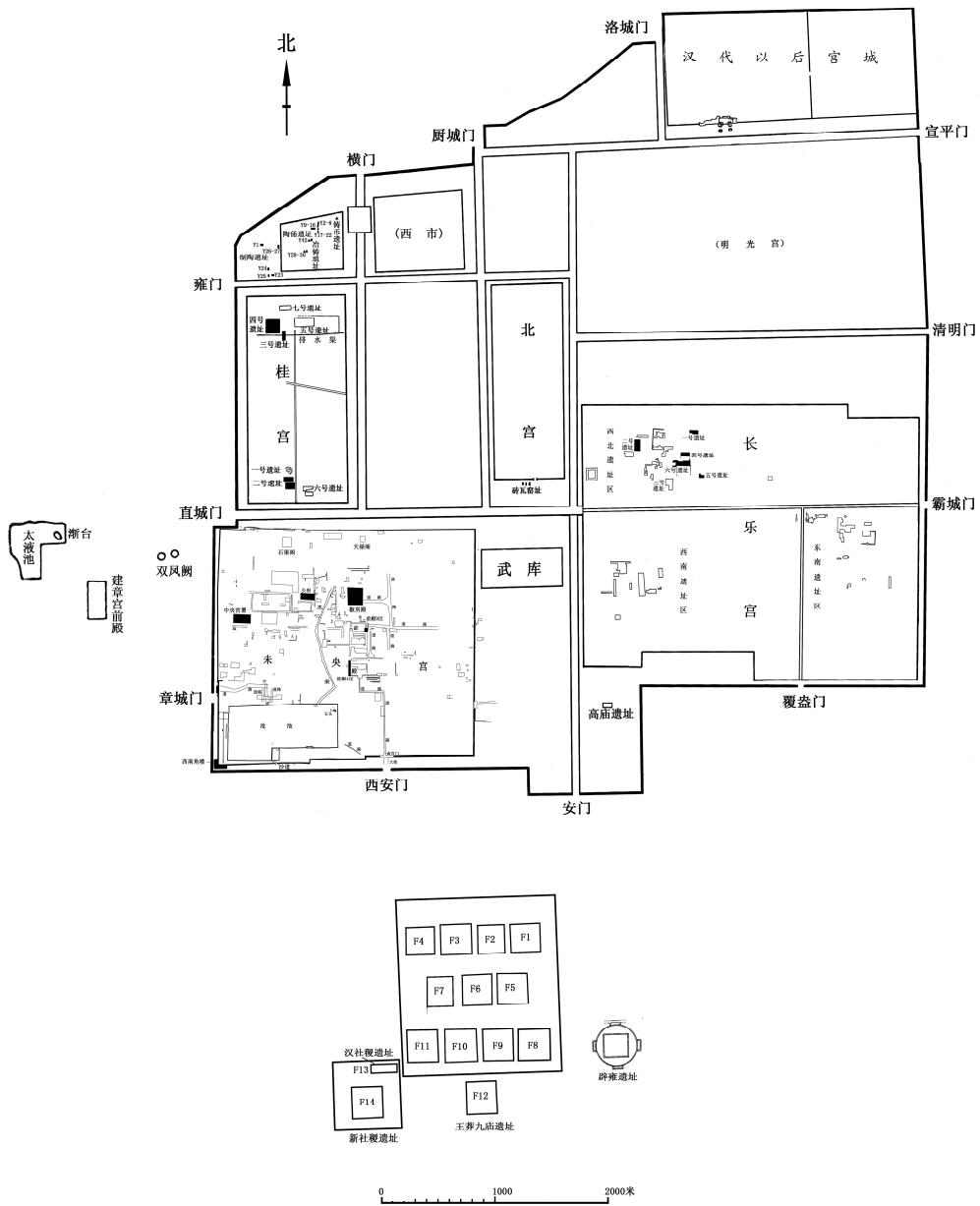
闾里内（160×40×3=19200 人；0.34 kg²=36 kg²的 1 / 105）、外

一里几户（40）

1 户=53.1 m²（849.6 m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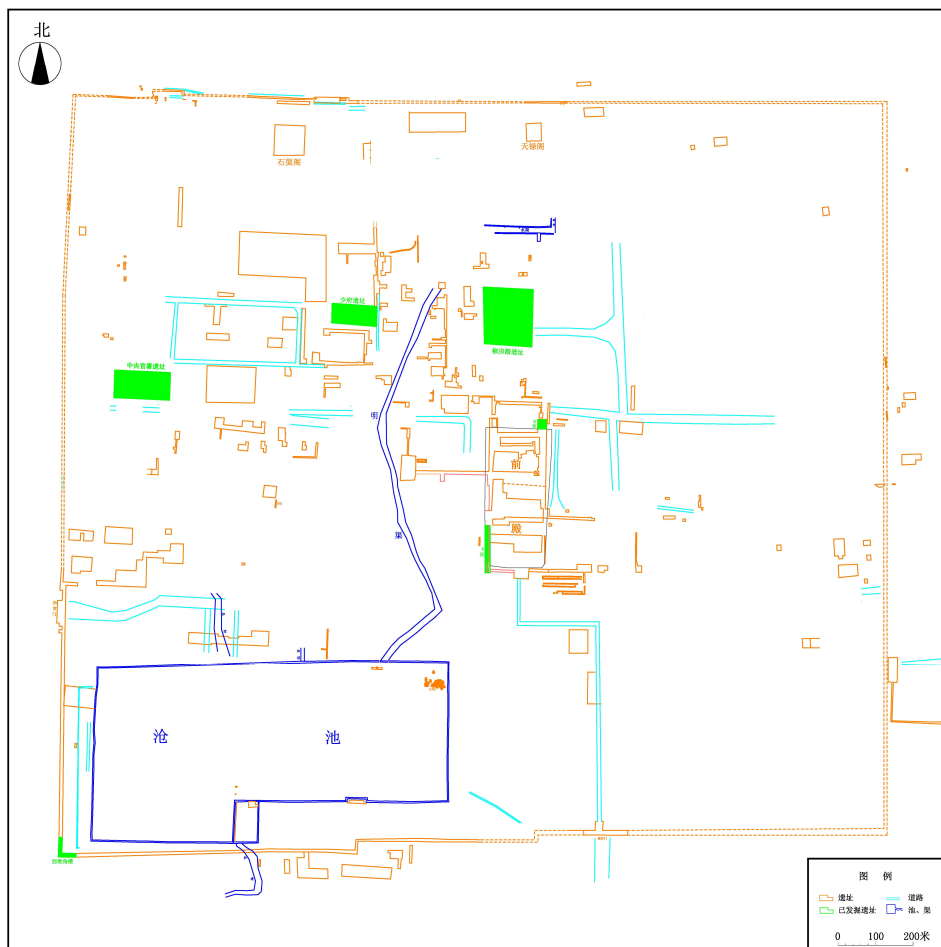
一户几人（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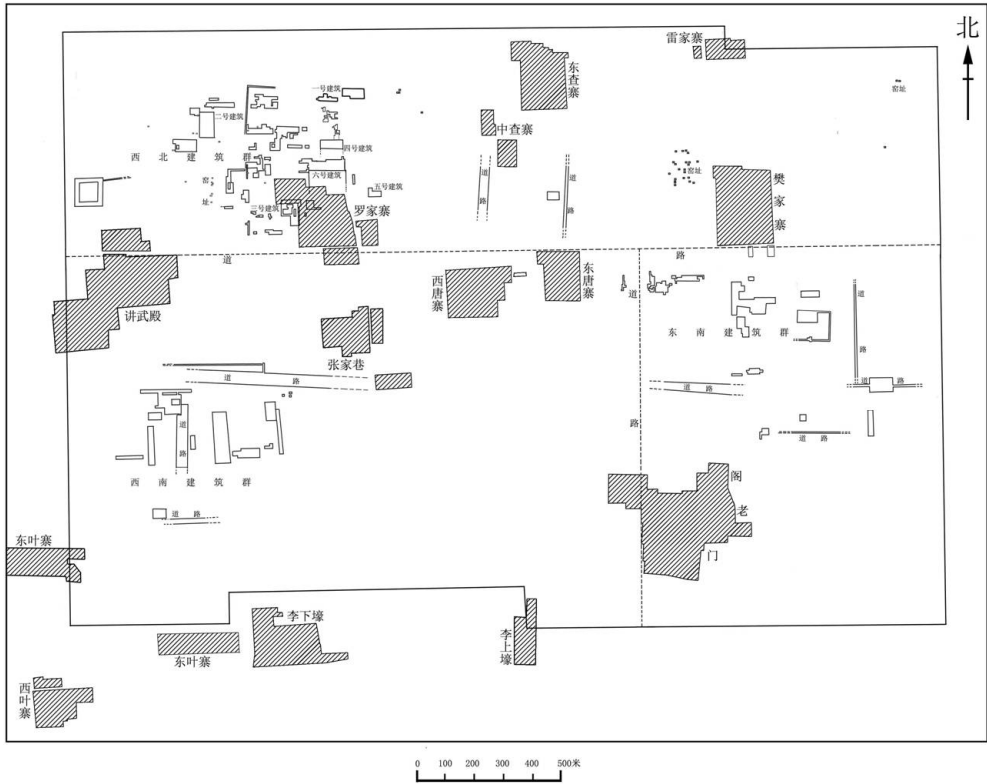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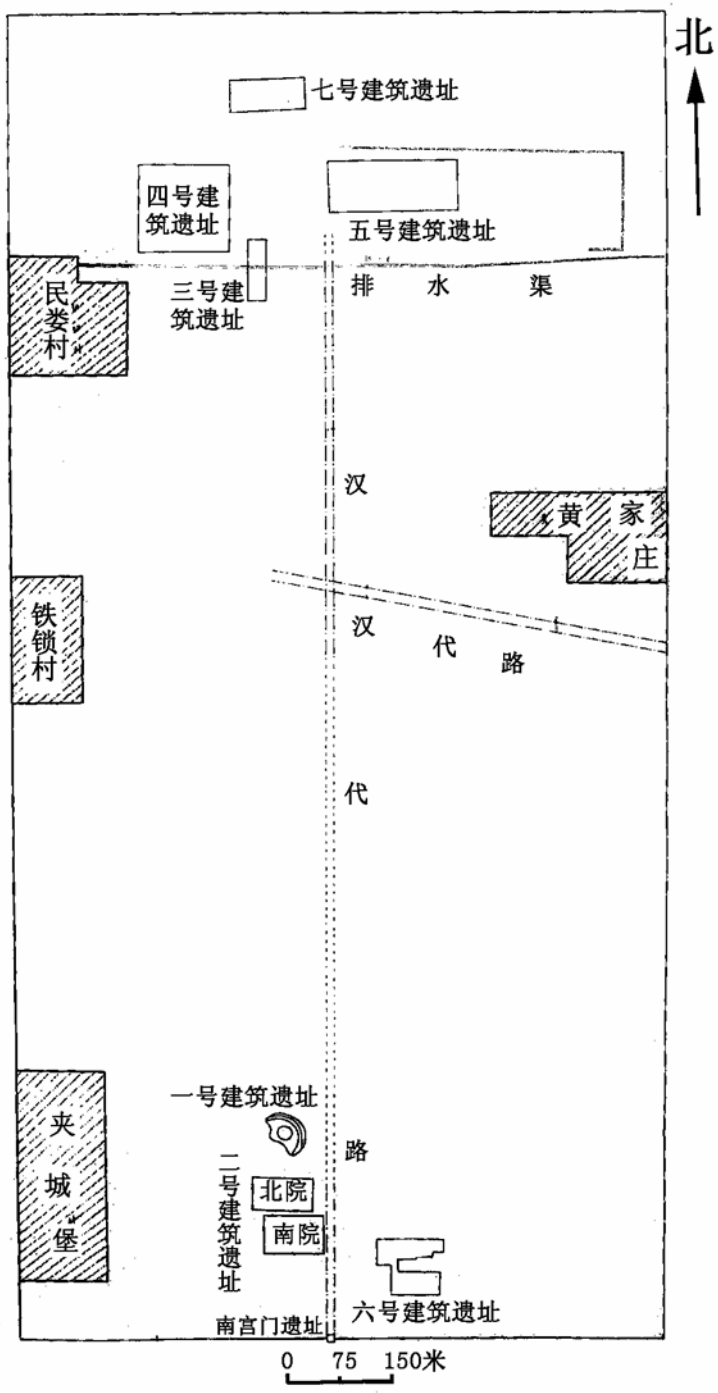
汉长安城遗址平面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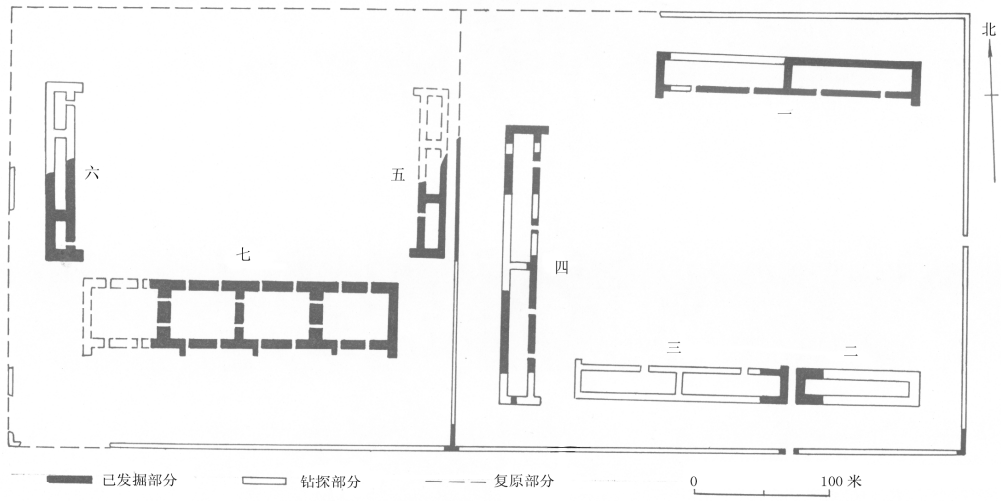
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布局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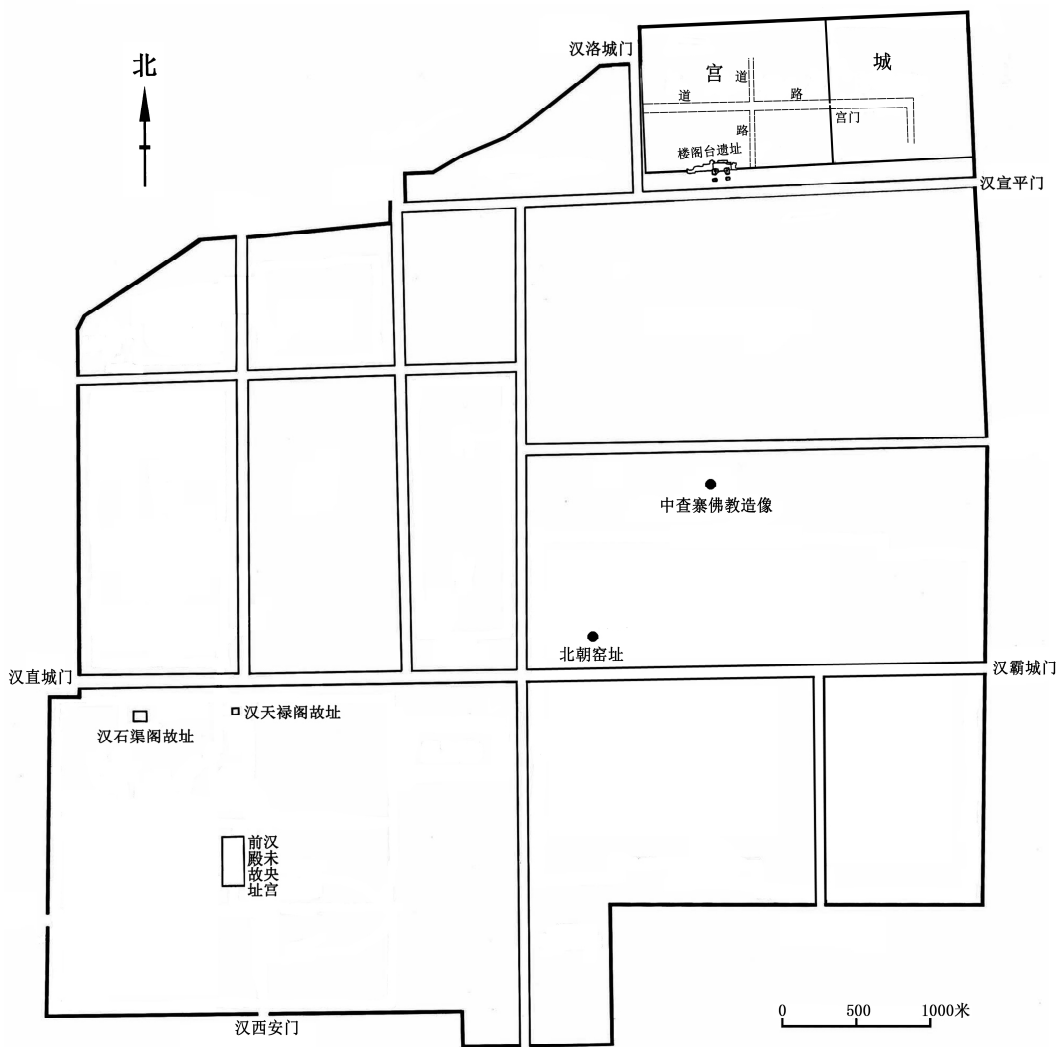


长乐宫遗址钻探平面示意图





武库遗址平面复原、分布图



劉振東, 「漢長安城之研究現狀—漢都長安的結構」에 대한 토론문

金慶浩(成均館大)

1. 漢長安城建設概要

1) 高祖, 惠帝 시기

- 한 고조5년(B.C. 202) 유방은 누경의 건의를 받아들여 관중 장안에 수도를 정하고 장안현을 설치한 이후에 秦興樂宮을 보수하여 長樂宮을 건축하기 시작.
- 고조7년(B.C. 200), 장락궁을 건설하고 유방은 櫟陽(현 陝西省 西安 閻良區 武屯鎮)에서 장안으로 수도를 이주하며, 未央宮, 武庫, 太倉 등의 건설을 蕭何 등에게 맡김.
- 고조9년(B.C. 198), 미양궁을 건설하였으며, 북궁 또한 건설.
- 혜제원년(B.C. 194), 혜제는 즉위 후 도성의 성벽 축조에 착수. 서쪽 성벽과 북쪽 성벽의 축조부터 시작하여 5년 후(B.C. 190) 전부 완공함. 이 과정에서 무수히 많은 노동력이 동원됨. 예를 들면, 혜제3년(B.C. 192) 봄, 14만 6천 여 명을 징집.
- 혜제6년(B.C. 189), 西市를 건설, 장안성의 규모를 갖추게 됨.

2) 武帝시기

- 건원3년(B.C.138) 上林苑, 원광6년(129), 漕渠공사, 원수3년(120), 昆明池, 원정2년(115), 柏梁臺, 태초원년(104), 建章宮, 태초4년(107), 明光宮과 桂宮 등을 건설.
- 장안성 건설의 정점시기

3) 王莽시기

- 장안성 남쪽 지역에 明堂, 辟雍, 宗廟 등의 禮制 건축을 건설.
- 官社, 官稷 등을 修建하여 도성의 완성된 예제건축군을 구성함.

이상의 내용은 유진동 선생님의 발표 내용을 재구성한 것이다. 이와 같이 일련의 과정을 통해서 건설된 한 장안성의 구조와 성격과 관련하여 몇 가지 질의를 하고자 한다. 이에 대한 유선생님의 고견을 통해 한 장안성의 그것에 대한 이해의 폭을 제고할 수 있으리라 기대한다.

2. 몇 가지 질의

1) 禮制建築과 都城 構造 :

유방이 秦의 社稷을 폐하고 새로이 사직을 장안성 남쪽 교외 지역에 건설한 것은 주지의 사실이다. 이와 관련하여 蕭何가 未央宮을 건설할 때 남북 궁문 사이의 도로는 미양궁성의 軸線이 되었으며, 이 축선은 남북방향의 西安門과 橫門 사이를 가로질러 도성 장안선의 축선이 되었을 것이다. 이 축선을 따라 한의 사직은 축선의 서쪽에 위치하였으며 서한 말기 사직이 훼손되어 다시 건설하였을 때도 이 축선의 서쪽에 위치하여 서한시기 社稷의 위치는 종묘와 상대적으로 오른쪽에 위치하는 이른바 “右社”에 배치함을 알 수 있다. 이처럼 한대 도성의 건설에서 이른바 “左祖右社”의 관념이 반영된 구체적 내용에 관한 설명을 듣고 싶다.

이와 더불어 종묘와 사직이 모두 장안성 밖에 위치하고 있다. 그렇지만 北魏 洛陽城의 종묘와 사직은 이와 달리 도성의 안에 위치하고 있음을 볼 때 이러한 위치의 변화가 발생한 배경은 무엇인지에 대해 알고 싶다.

2) 渭橋유지의 성격 : 2012년 4월에 발굴된 渭橋유지의 위치를 보면 한 장안성 북쪽에 위치한 廚城門에 상당히 인접된 지역임을 알 수 있다. 현재까지 진행된 발굴 결과에 근거하여 한 장안성의 성격을 이해하는데 주요한 내용 등이 있다면 이에 대한 소개를 부탁드립니다. (예를 들면, 서역과의 교역 등)

3) 본 발표문에서는 한 장안성과 관련하여 연구현황을 소개하고 있지만, 관련 근거와 구체적 내용을 제시하고 있지 않고 있다. 2000년 이후의 주요 관련 연구 성과에 대한 설명이 있다면 장안성에 대한 이해의 폭을 넓힐 수 있을 것이라 기대된다.



魏晋南北朝都城的形制结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钱国祥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都城 形制结构

作者简介：1961年2月出生，河南省洛阳市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洛阳汉魏城队队长。

魏晋南北朝时期，介于中国历史上两汉与隋唐时期形成的两大统一帝国之间，是中国封建社会分裂时间最长的时代。这个时期，既是一个大动乱的时期，也是促进中华各民族融合、各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社会经济与贸易繁荣以及生产力进步的一个大发展时期，为以后大一统的隋唐盛世帝国的出现构建了坚实基础。

一、历史概况

当时的中国北方地区，曹操首先以曹魏政权势力兴起之地的邺城作为王都，开启了这个时期都城形制结构变化的序幕。曹丕篡汉建立魏朝以后，正式建都洛阳，三国鼎立局面形成，随着政局逐渐稳定，社会经济逐渐得到了复苏与发展，发达的生产技术、繁荣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复兴都是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都城洛阳的城市建设也出现了与以往都城不同的形制面貌。西晋篡魏以后，仍以洛阳为都，继续延续了曹魏新开创的都城形制结构，随着社会经济和军事力量逐渐强大，灭掉了南方的吴、蜀二国，国家得到了短暂的统一，促使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和物质生活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使当时的中国北方又一次陷入到纷争的战乱形势下，各少数民族建立的十六国割据政权轮番登场，中原的衣冠世族大都背井离乡逃到了南方，晋王朝也被迫迁徙到南方。此后的北方地区，经过百余年的战乱纷争，逐渐被兴起于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所统治。他们入主中原先后以平城和洛阳为都城，其大力推行的汉化政策和以中原正统王朝自居的做法，不仅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大融合，同时也吸收了各种新的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极大地推动了北方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自北魏入主中原，到东、西魏分裂分别以邺城和长安为都，之后北齐和北周又分别代替东、西魏，这些割据政权建立的朝代被称为北朝。这个时期的北方地区战乱虽然频仍，但社会经济仍在逐渐恢复，尤其是自汉代开创形成的连接中西文化传播与商贸交流的纽带——丝绸之路自北魏以来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兴盛，形成了和南方的南朝诸政权分庭抗礼的局面，进入到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

在南方地区，三国时期的吴国和蜀国作为鼎足三立的另外两方，分别依据江东和巴蜀富庶的土地和地理环境，先后以建邺和成都作为都城，社会经济也都得到快速的发展。尤其是江东地区，随着西晋末年司马氏统治集团和大量中原士官贵族的南迁建康，中原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生产技术传入，也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经济文化繁荣。因此，东晋及后续的宋、齐、梁、陈诸朝，皆以江东富庶之地和建康城为依托，和占据中原的北朝政权相抗衡，历史上被称为南朝。由于自东吴开始，东晋、宋、齐、梁、陈各朝均以江东地区的建康城（东吴称建邺）为都，在中国历史上也将其称为南方六朝。

除上述地区，周边地区还有一些割据政权建立的都城，他们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不具有典型性，或者缺乏相关考古资料，故未作为本文研究的内容。

二、各都城的考察研究与形制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目前已经考古发现而且城址布局研究较有收获的都城，主要有中原和北方地区的曹魏邺北城（河北省邯郸市）、曹魏西晋洛阳城（河南省洛阳市）、北魏洛阳城（河南省洛阳市）、东魏北齐邺南城（河北省邯郸市），南方地区的六朝建康城（江苏省南京市）等。这些城址经历的建都朝代较多，都城形制结构变化最具有典型性和延续特点，代表了这个时期都城形制的基本面貌和主要变化特点，是研究这个时期都城形制变化的重要对象。下面根据时代排序，对这些都城分别简要介绍。

（一）曹魏王都邺城的形制结构

曹魏邺城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 20 公里，主要位于今漳河的北岸，故也称之为邺北城。建安九年（204 年）曹操平袁绍后，开始营建邺城，之后作为曹魏政权的王都。曹魏篡汉正式建都洛阳以后，为五都之一。之后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冉魏和前燕继续作为都城。

邺城遗址除了著名的铜爵台和金虎台外，城址地面上遗迹已无存。据考古勘察（图一），城址现残存有东、北、南三面墙基，大致为横长方形，东西 2400 米，南北 1700 米，略小于《水经注》“东西六里，南北五里”^①的记载。在东墙中段和北墙中段略偏东，分别发现一座门址，门道宽约 20~22 米，应分别是记载的建春门和广德门。城内勘探发现 6 条大道。其中东西向大道 1 条，横穿城址并将城内分为南北两部分，应是连接东墙建春门至西墙金明门的主干大道。城址北部有 2 条南北向大道，宽 10~13 米，间隔约 360 米。在两条大道之间，勘探发现夯土建筑基址 10 余处，较大基址东西 60~75 米，南北 35~45 米，应为宫殿区。在西侧大道以西、铜爵三台基址东侧，勘探也发现一些规模较大的夯土殿基，记载这里为铜爵园^②，后赵在此修建有九华宫。东侧大道以东，未发现夯土基址，记载为“戚里”^③。城址的南部即东西向大道以南，有 3 条南北向大道，等距平行排列，间隔约 980 米。中间 1 条大道

长 730 米，宽约 17 米，是邳北城最宽的道路，应是南起中阳门、北对宫殿区的南北向主干大道。西面 1 条即凤阳门大道，东面 1 条即广阳门大道，宽皆约 13 米。残存的金虎台遗址位于城址西墙中段金明门北侧，南北 120 米，东西 71 米，高 12 米。著名的铜爵台基址在其北侧 83 米处，保存较差，仅存东南角，南北 50 米，东西 43 米，高 4~6 米。铜爵台北面的冰井台，已无遗迹残存。

根据考古勘察资料，学者们对曹魏邳城的形制结构做了许多研究(图二)，概括有以下几点：1、宫前金明门至建春门之间的东西横街将全城划为南北两部分，北区的中部为宫殿区，西部是苑囿(铜爵园)，东部是高官贵族宅第(戚里)；南区为一般衙署、府库和里坊等。2、宫殿区内礼仪性的大朝与日常政务的常朝东西并列，形成两条南北向的宫殿建筑轴线，西面大朝区为止车门、端门和文昌殿轴线；东面常朝区为司马门、勤政殿轴线。3、大朝区的止车门前有十字相交的御街，其南北向御街直抵南城门中阳门，形成全城的中轴线。

(二) 曹魏西晋洛阳都城的形制结构

曹魏西晋洛阳城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东面 15 公里，主要在邙山南面的洛河北岸。

曹魏在东汉洛阳城废墟上重建都城，城圈规模未超过东汉。大城城门仍为十二座，位置与形制大都沿用前代，仅名称有所变化(图三)。据记载，当时城门皆有双阙，皆开三道，门有阁，闭中，开左右出入。城内大道中央为御道，两边筑土墙，公卿尚书章服从中道，凡人行左、右道，左入右出，不得相逢。夹道种有槐、柳树^④。考古发掘的建春门遗址证实，北魏城门确为沿用汉晋，城门为三个门洞^⑤。

这个时期较大的变化，是新筑宫城——洛阳宫(图四)。据记载，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在洛阳起建始殿，就是在汉北宫西北的濯龙园伐树修建^⑥。曹丕黄初元年以魏代汉称帝，以洛阳为都，初营洛阳宫，就是以建始殿朝群臣^⑦。大治洛阳宫是在魏明帝青龙三年，时起昭阳、太极诸殿与总章观、凌霄阙等^⑧。关于曹魏初期修建的洛阳宫，目前较公认的看法是在汉北宫故地重新营建，

是一座位于大城北部中间的单一宫城，北魏宫城即是在其规模基础上营建，近年的考古资料也支持这一说法^⑨。据考察，曹魏洛阳宫平面为南北长方形，四面皆有宫门。南墙有 2 座门址，西面为宫城正门阊阖门^⑩，其向南正对南北轴线大街铜驼街和大城正门宣阳门。考古发掘的北魏宫城阊阖门，即是在魏晋宫城阊阖门基址上沿用修建的。阊阖门的东面还有一座宫门司马门，魏明帝曾在此筑阙，因阙体崩塌压死数百人而不再筑阙，但门前筑有门屏建筑^⑪。另据记载，洛阳宫东墙上还有东掖门^⑫、云龙门、万春门^⑬；西墙上有西掖门^⑭、神虎门（或神兽门）^⑮和千秋门^⑯；北面有承明门^⑰。

在宫城正门阊阖门北面第二重宫墙上，是记载的南止车门。门前的御道呈 T 字型，南北向御道南对阊阖门，东西向横道分别正对东掖门和西掖门。南止车门以内，则还有第三重宫墙上的端门^⑱。端门以内，由南到北则排列有太极殿、式乾殿和昭阳殿^⑲三重主殿组成的洛阳宫内主要宫殿。其中太极殿为大朝正殿，是举行大朝会等重要礼仪活动的主殿，两侧分别有东堂和西堂，三殿并列。式乾殿为第二重主殿，是皇帝寝殿。昭阳殿为第三重主殿，是皇后寝殿，后避司马昭讳改称明阳殿或显阳殿^⑳，其东面为含章殿，西面为徽音殿^㉑，也是三殿并列。昭阳殿以北为后宫，主要殿堂有崇华殿（九龙殿）、嘉福殿、云气殿等，还有高台建筑凌云台和苑内水池灵芝池等。后宫北面，是东汉就存在的皇家禁苑——芳林园。曹魏初期在园内修筑有景阳山，重新穿凿了汉代的天渊池，池中则修筑了九华台，后避齐王芳讳改称华林园^㉒。在洛阳宫东侧大司马门内的南北轴线上，宫城南面还有尚书曹和朝堂等重要官署建筑^㉓。在洛阳宫东北面，还修建有太子宫——东宫，其南临建春门内御道^㉔，宫门有正德门、承华门、簿室门等^㉕，宫殿有崇政殿^㉖。

随着宫城形制的变化，新筑宫城正门阊阖门南直的大城宣阳门也就成了大城南墙的正门。二门之间的御街，也成了整个城市的南北轴线。明帝曾置铜驼诸兽于阊阖南街，故后代也称其为铜驼街^㉗。曹魏初期出于军事防卫的考虑，在洛阳城北墙上还建造百尺楼^㉘和三层楼的大夏门^㉙两座高台建筑，并在大城西北角内修筑一座小城——金墉城^㉚。另据记载，时洛阳有三市，大市名

曰金市，在大城内宫城西侧；马市在大城东，前有拱形石桥，桥下可过大船；洛阳县市在大城南³¹。

据考察研究，曹魏西晋洛阳都城虽然规模上沿承东汉都城，但都城内的格局却出现了崭新变化。主要有几个方面特点：1、都城为南北长方形，城门仍为 12 座，主要城门和街道皆开三道，形成一套完整的都城城门和御街规制。2、宫城形制出现巨大变化，由位于都城北中部的单一宫城取代汉代的“三宫制”，宫城主殿称为太极殿，正门为设有双阙的阊阖门。3、在宫城布局中，大朝正殿（南宫）居前，帝后寝宫（北宫）居后，宫城北部又紧接皇家苑囿，形成一套完整的宫苑布局制度。4、宫前出现南北轴线大街——铜驼街，其北对宫中正殿，南直大城正门宣阳门。5、宫城内出现两条南北轴线，西面轴线由阊阖门向北直对太极殿和帝后寝宫主殿，向南直对宫前御街铜驼街和大城宣阳门；东面轴线由司马门北对尚书曹和朝堂等宫内重要官署区。6、宫殿区出现了以大朝正殿太极殿、皇帝寝殿式乾殿和皇后寝殿昭阳殿（显阳殿）三组主殿南北纵列的三大殿格局。宫城主殿太极殿和昭阳殿两侧均为三殿并列的建筑形式，尤其太极殿两侧设立东堂和西堂，是东西堂制度的肇始。7、太子宫设立在宫城东北面，形成较为完善的东宫制度。8、随着经济繁荣发展，漕运和商贸活动较为发达，市场数量增多，由在都城内设置，逐渐向城外周边一般居民区繁衍。

（三）东晋南朝建康城的形制结构

晋元帝建武元年（317 年），司马睿即位于建康，后世称东晋。之后，南朝宋、齐、梁、陈四朝均建都于建康城。

东晋建立时，是在原东吴太初宫旧址之上重建的府舍为宫（图五）³²。据《建康实录》引《舆地志》记载，建康都城周长二十里十九步。当时因国力所限，都城是用竹篱代墙，称为“篱墙”。直至南齐建元二年（480 年），才改筑都墙³³。东晋初年，只把建康南面正门（东吴所筑白门）依照洛阳城改称宣阳门，在门外向南的大道两侧建立宗庙和社稷³⁴，又使这条御道向南延伸穿过朱雀门和秦淮河上的朱雀航。晋成帝咸和三年（328 年），建康宫殿被叛军

苏峻烧毁。咸和五年在名相王导主持下，在城址中部兴建新宫——建康宫（又称台城），并修建城门，开辟御道。重修的建康宫殿、城门、街道主要布局和建筑物名称，大都依照魏晋洛阳都城制度。新修的东晋都城开有 6 座城门。南面 3 门，正南为宣阳门，西面陵阳门，东面开阳门。东面 2 门，南面一门曰清明门；北面一门曰建春门。西面 1 门，为西明门，东面正对建春门。除了开阳门和陵阳门，其余各门皆为三个门道³⁵。刘宋以后的建康都城增改城门，城门数量达到 12 个（图六），使之符合汉晋帝都制度。新增城门有西墙闾阖门、南墙清阳门和北墙大夏门、广莫门、玄武门和延熹门等，还将原来的广莫门改称承明门、开阳门改称津阳门³⁶。

新修的建康宫城在旧宫之东略向北移，是东吴的后苑城所在。宫城周长八里，东晋时开有五座宫门。南面二门，居中的正门称为大司马门，门内正对宫中正殿太极殿，门外南对建康城正门宣阳门和淮水河畔的朱雀门，距离宣阳门二里、朱雀门五里。大司马门之东是南掖门，刘宋称为闾阖门，陈名端门，门内是以尚书省和朝堂为主的重要官署区，门外南对建康城南门开阳门。宫城东、西面各开一门，分别是东掖门和西掖门。北面开一门，曰平昌门，与南面的南掖门南北相对³⁷。建康城宫城南门大司马门内的第二重门是南止车门，梁名应门；第三重门是端门，宋名南中华门，梁名太阳门。第三重端门以内，是以太极殿等主殿为中心的宫殿区。南止车门之东是应门，其南对宫城南掖门（宋闾阖门），北面是朝堂和尚书省等重要官署。宫城布局也呈两条南北建筑轴线，与魏晋洛阳宫西面以闾阖门和太极殿为轴线的朝殿寝宫区、东面以大司马门和尚书朝堂为轴线的朝堂官署区的布置，有异曲同工之处，只是两处宫城的大司马门和闾阖门位置颠倒而已。此外，东面第二重门称万春门（宋名云龙门），第三重门云龙门；西面第二重门称千秋门（宋名神虎门），第三重门神虎门。这些宫门在名称上都承袭洛阳宫，多数方位也比较接近。

建康宫的宫殿区布局和洛阳宫也极为相似，都分前、后两部分。前为大朝正殿区，后为帝后寝宫区，即面朝后寝之制。其正殿太极殿，开间十三间，

虽然名称沿用洛阳宫太极殿，但早期殿基乃是将军府舍的正厅，规模较小，后期重修以后则具有一定规模³⁸。太极殿东、西两侧，也并排设置太极东堂和太极西堂³⁹。太极殿北侧的帝寝主殿为式乾殿（宋名延昌殿，或中斋），东有正福殿（齐名东斋），西有璿仪殿（齐称西斋）。后寝的主殿为显阳殿，东有含章殿（宋称合殿），西有徽音殿。据学者研究，上述三座主殿不仅南北纵列，而且东西均为三殿并列⁴⁰。

建康宫城的北面，是苑囿区。西北的鸡笼山东吴时就是宫苑之地，东晋在此也修建有与洛阳城相同的皇家禁苑——华林园，也营建有景阳山⁴¹、天渊池（或作天泉池）以及清暑殿等殿台楼观数十座。在宫城的东北面还营建有太后居住的永安宫⁴²。另外在覆舟山下，还修建一处皇家禁苑——乐游苑⁴³。

建康城的太子宫，东晋初年暂设在宫城的西南，西逼运渚。太元十七年（392年）始将台城东南御道东面的左卫府迁往他处，营建东宫⁴⁴，以符合东宫之名。刘宋元嘉十五年（438年）又移到宫城东北晋永安宫旧地，梁天监五年（506年）又有重建⁴⁵。宫门有承华门、安阳门和则天门等，其中东宫的西门正对宫城的东门⁴⁶（图七）。显然建康城的东宫制度，也在极力仿制洛阳。

建康城作为全国经济的中心，水运和商业贸易特别发达，“是时贡使商旅，方舟万计。”⁴⁷ 东吴时就在淮水南岸朱雀航西南的长干里建有大市⁴⁸，东晋以后又建有许多市场⁴⁹，而且多分布在城外。其市场分散开放设置并和居民区紧密联系的做法，显然是与其发达的商业经济密切相关，远比当时北朝的商业繁荣发达。建康城的南郊淮水南岸，也设立有太学和明堂，显然也是承袭洛阳城的做法。

东晋和南朝在建康都城与宫殿，虽然大体上是在东吴基础上建造，但在不断重修改建过程中，基本形制布局却是承继魏晋洛阳都城，因此两个都城有诸多的相似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都城城门由最初的六个，最后也增设到十二个，主要城门为三个门道。2、都城北部中间设置单一宫城，正殿也称太极殿，宫前也设置南北轴线御街，直对的大城正门也称宣阳门。3、宫城布局也为大朝正殿居前，帝后寝宫居后，宫北设置华林园。4、宫城内也

设置两条南北建筑轴线，西面轴线由大司马门向北直对宫内主殿太极殿，向南直对大城宣阳门和南北轴线御街；东面轴线由南掖门（宋闾阖门）北对尚书朝堂等官署区。5、宫殿区也为以大朝正殿太极殿、皇帝寝殿式乾殿和皇后寝殿显阳殿南北纵列的三大殿格局，太极殿两侧也设置东堂和西堂，帝、后寝殿两侧也设置配殿，均是东西并列三殿。6、太子宫由最初在宫城西南逐渐改设到东面，以符合东宫之名。7、建康城的水运和商业贸易更加发达，市场增多，且向城外周边一般居民区繁衍。

（四）北魏洛阳城的形制结构

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自平城迁都洛阳，在魏晋城址基础上重建洛阳城。太和十九年，新都始立，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当时除将西墙晋西明门（汉曰雍门）因邪出堵塞，在东对东阳门的西墙上改开西阳门外⁴⁷；还在西墙闾阖城门北，即金墉城前东西大道西穿大城西墙处新开承明门，以方便当时暂住金墉城的孝文帝去城外王南寺拜佛论经⁴⁸。故此，北魏洛阳城门达到了13座（图八）。

北魏宫城基本上在魏晋洛阳宫基础上重建⁴⁹。据考察，北魏宫城南北1400米，东西660米，呈南北长方形（图九）。宫城被大城闾阖门至建春门之间的东西御道横穿，被分成南、北两部分⁵¹。被横穿的宫西墙门称千秋门⁵²，宫东墙门为云龙门⁵³，宫城南门即正门仍曰闾阖门。宫城南半部有东、西两条南北向建筑轴线，西侧轴线主要建筑为宫城正门闾阖门、二号和三号宫门、正殿太极殿、式乾殿、显阳殿等。东侧轴线为司马门和朝堂等⁵⁴。其中太极殿与朝堂同为帝王朝会处理重大事件之殿堂，式乾殿与显阳殿则分别是广集诸王或名僧亲讲经论⁵⁵和纳讼亲理冤狱⁵⁶的殿所。太极殿东西约100米，南北60米，两侧分别还有太极东堂和西堂。宫城北半部为后宫所在，也称西游园。园内主要殿堂有宣光殿、嘉福殿、九龙殿、宣慈观、灵芝钓台、凌云台等，大型水池则有碧海曲池、灵芝九龙池等⁵⁷。在宫城北面，北魏仍然营修了前朝营造的皇家禁苑华林园⁵⁸。据《洛阳伽蓝记》：“园中有大海，即汉天渊池。

池中犹有（魏）文帝九华台。高祖于台上造清凉殿，世宗在海内作蓬莱山。海西南有景阳山。”上述宫苑中的门阙、殿台、园池名称与位置多承魏晋之旧。显而易见，北魏洛阳宫城也是承继曹魏初期修筑的洛阳宫的形制结构。

北魏宫城以南的城市街道格局仍然沿用魏晋，如宫城阊阖门南至宣阳城门的南北大街铜驼街，仍是该城的南北轴线。这个时期宫城以南主要为官署区，太庙、太社和重要官署集中排列在铜驼街两侧，还有一些重要寺院与官宅。北魏洛阳城内最大的佛教寺院永宁寺，即位于太尉府的西侧。另据记载，景明二年（501年）“改筑圆丘于伊水之阳。”即洛水南、伊水北的夹河地带⁶⁴。

北魏洛阳都城形制发生较大变化，是在宣武帝景明年间，将汉晋洛阳大城变成了内城，在内城外新建了外郭城，并修筑了320（或323）个里坊⁶⁵，城市范围达到“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空前规模⁶⁶。整个郭城呈东西长方形，郭城内有三条东西大道贯穿全城（图六）⁶⁷。内城中除了宫殿、禁苑、官署、社庙、府库及重要的佛寺和官邸外，一般官宅、寺院、民居、手工业作坊和市场大都放到了内城以外的郭城内。其中在西郭城中部、东郭城南部和洛水以南分别有大市、小市和四通市三个市场⁶⁸。

北魏政权在十六国争霸的大动乱中逐渐入主中原，为了显示其建都洛阳的正统地位，其重建的都城和宫殿显然都在模仿魏晋洛阳城。但随着民族融合、社会经济和对外贸易的繁荣发展，为了适应大量外来商人和居民的居住、生活和贸易，里坊制和外郭城应运而生，北魏都城规模的扩大是必然趋势。其都城形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点：1、在魏晋都城基础上重修内城，外围新建了外郭城，在都城内规划设置320多个里坊，使都城外围的郭区变成真正意义的郭城，这种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组成的都城形制结构是都城发展史上的创新。2、宫城是在魏晋宫城基础上重建营建，形制布局基本承袭前朝，南北长方形的单一宫城位于内城中北部，南部为大朝正殿区，北部为后宫寝殿区，宫城北部为禁苑区。3、宫城阊阖门前直对的轴线大街铜驼街两

侧为重要的官署区，设置有太社、太庙和主要官署建筑，使内城朝着皇城的性质变化。4、宫殿区内仍设置东、西两条南北向建筑轴线，西面轴线闾阖门直对太极殿，东面轴线司马门正对朝堂。5、大朝正殿太极殿和帝、后寝殿也皆为三大殿纵列格局，太极殿两侧也设置东、西堂，三殿并列。6、东宫位于宫城东部，继续魏晋东宫之制。7、随着外郭城的出现，市场逐渐改到外郭城内，而且数量增多、规模扩大，都城形制结构和功能内涵均发生了崭新的变化，对后世都城具有深远的影响。

（五）东魏北齐邺南城的形制结构

北朝后期，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534年），由洛阳迁都邺城，天平二年开始营建邺南城宫室，兴和元年（539年）“发畿内民夫十万人城邺城，四十日罢”，同年新宫建成。邺南城是东魏、北齐（534~577年）的都城，此时的邺北城仍继续使用。

据记载，邺南城“东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⁵⁰。考察的城址东西最宽2800米，南北约3460米，与记载尚有一定差距（图十）。城址呈南北长方形，南面两角呈圆角弧形，形制特殊，具有军事防御的功能。记载邺南城有城门14座，南墙、北墙各3座，东墙、西墙各4座。考察确定的城门东墙1座、南墙3座、西墙4座、北墙3座（邺北城南墙），计11座。南墙中间的朱明门经过发掘，是一座带有双阙的都城正门，三个门道。邺南城东、西、南三面城墙外侧均设置有墩台，计有50座，墩台间距85~95米。乾门南侧发掘一座墩台，平面长方形，南北宽18米，东西伸出墙外部分约12米。据记载，营建邺南城时，为防止漳河水患，筑有长堤，又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⁵¹，勘探在邺南城东、南、西墙外面均发现护城河遗迹。城内发现南北向和东西向大街各三条。中间的朱明门大街残长1920米，宽38.5米，南端起自朱明门，北抵宫城正门止车门。据在朱明门大街两侧勘探，发现许多夯土基址，结合洛阳城铜驼街两侧的官署建筑，可能与文献记载的尚书省等官署建筑有关⁵²。

据考察，宫城也位于城址北部中央，四面均有宫墙，南北约970米，东

西约 620 米（图十一）。南宫墙中间有一宫门，南面正对朱明门大街，应为宫城正门止车门。西宫墙和东宫墙中段，也各发现一门，分别与西城墙乾门和东城墙上春门相对。宫城内勘探还发现夯土建筑基址 14 座，中轴线上约有 10 座。根据记载，自宫城南墙正门止车门，在中轴线上向北依次为端门、阊阖门、太极殿、朱华门、昭阳殿和显阳殿⁵³。三座大的宫殿依次为太极殿、昭阳殿和显阳殿，除显阳殿略偏东，三殿基本纵向依次排列。太极殿两侧也有太极东堂和西堂，昭阳殿两侧则有含光殿和凉风殿，均为三殿并列。后宫有左、右院，左院有显阳殿，右院有宣光殿。后宫北面，则是皇家禁苑——后园。此外，在宫城的东部也设置有东宫。另据记载，端门外御道东还设有南向的大司马府；御道西则设有台门北向的御史台。

据《彰德府志·邺都宫室志》记载，东市在东郭，西市在西郭。表明邺南城应存在和北魏洛阳城相同的外郭城，主要市场也设置在大城外的郭城内。还记载邺南城“盖四百余坊，然皆莫见其名，不获其分布所在”。虽然目前在史传志石中仅发现里坊名称 20 余处，但此四百余坊应该确实存在，仅在大城内也安置不下，应该和北魏洛阳城一样也主要分布在外郭城内，尤其是市场周围。

综上所述，东魏北齐邺南城是一座先规划、然后营建的全新都城，它不像北魏洛阳城是在旧城基础上改造营建而成，布局形制结构更为规整和合理。由于东、西魏分裂被迫而迁都，东魏都城模仿洛京是承继正统的政治需求，因此邺南城的营建基本设计原则“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宪章前代显然指的是曹魏西晋都城，模写洛京也毫无疑问说的是北魏洛阳城。故该城形制布局中处处蕴涵着北魏洛阳城甚至魏晋洛阳城的影子，实乃其模写洛京之真实写照。其都城布局主要有几方面的特点：1、大城外围存在和北魏洛阳城相同的外郭城，而且也为东西长方形，其内是大城和宫城，也组成三重城圈的格局。2、大城为南北长方形，虽然规模略小于洛阳城，城门数量多于洛阳城，但基本形制和格局相近。3、单一宫城位于大城内北部中央，宫城内也

是朝殿区居南，后宫寝殿区居北，北部为禁苑后园。4、宫前也设置轴线大街——朱明门大街，街两侧布置重要的太庙和官署建筑。5、宫城正门分别为止车门、端门、阊阖门；正殿为大朝太极殿、内朝昭阳殿、后宫显阳殿，也是三大殿纵列格局；太极殿两侧也有太极东、西堂，昭阳殿两侧则有含光殿和凉风殿，均为三殿并列。6、大司马府和御史台等重要中央官署分别设置在第二道宫门——端门外两侧，接近洛阳宫东侧轴线司马门内设置朝堂等重要官署的做法。7、大城西南角和东南角呈弧形圆角，墙垣外侧设置有排列规整的墩台，是适应当时军事防御形势的特点。

三、魏晋南北朝都城形制的形成及影响

总体来看，上述都城的形制布局特点，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城形制结构的基本特征和沿革变化。从相关考古和文献资料观察，这些都城的基本形制布局 and 结构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和延续特点，而且发展变化规律清晰。其中既蕴涵着以往传统都城的形制特点，又有新形势下社会经济发展、军事斗争、民族融合、文化商贸交流和宗教传播等促生的新变化。

这些都城中，曹魏邺北城作为一代英豪曹操的王都，其城市格局的形成具有肇始性，是由其作为王都的级别和功能需求而设置的，也和当时的社会政治军事形势和经济状况有关，最重要的是对曹氏建立魏朝后定都洛阳的新都城格局有直接影响。而曹魏洛阳都城，是新都城格局的原产地，其都城和宫城形制结构代表了中国古代都城由多宫制到单一宫城制重要转折时期的最主要特征，也是后世都城竞相模写的典范之作。这种状况的形成，显然是与当时中国南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态势有关。当时的中原地区，陷入十六国争霸的剧烈大动乱之中，由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在汉地建立的割据政权，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统地位，所建都城和宫殿都极力模仿魏晋洛阳都城。

南迁的东晋政权也不例外，虽然偏居南方，但社会相对较为安定，在与北方十六国的对峙中，为了标榜其为中原正朔所在，在典章制度、都城建设和宫室制度等方面，显然也都尽量承袭魏晋传统，以示正统。这些都促使在中原地区初步形成的新的都城制度，在经过都城南迁远播到南朝各代后，又经过北朝各代在中原地区的承袭与重新营建，而得到更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根据这个时期都城的形制布局结构和变化特点，可以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的都城形制结构和制度的形成及作用，做一基本概括：

1、曹魏邺北城，作为汉代诸侯国的王都，其布局特点的形成，显然是根据其作为王都的等级、施政功能以及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需要而设置的，是新的朝代都城形制产生的肇始和萌发之地。

2、曹魏和西晋国都洛阳城，是新的朝代都城形制的重要模板，其创立了与秦汉时期传统都城完全不同的崭新都城形制结构。又是之后的东晋、南朝和北朝各代都城竞相仿制模写的都城形制典范，是中国古代都城由多宫制向单一宫城制发展演变的重要转折地点。

3、东晋南朝建康都城，是在东吴都城的基础上进行的扩建，并完全按照西晋洛阳都城的形制结构兴建的崭新都城，只是受限于地理与区域环境，都城轮廓和规模略有差异。

4、北魏洛阳都城，是在曹魏西晋洛阳城基础上重修的都城，其内城和宫城形制结构，主要宫殿、宫门、池苑名称，以及宫前轴线大街铜驼街等，皆沿用曹魏洛阳城制度。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民族融合和文化商贸交流的深入，都城规模有所扩大和创新，新扩建外郭城、增设市场、并在都城内修建 320 个里坊，都城面貌和内涵出现崭新的变化，形成了三重城圈的都城形制结构，是一座拥有大量规整的里坊和市场、便于大量居民和外来商人生活居住和进行商业贸易的新型国际性大都市。

5、东魏北齐邺南城，是在曹魏邺北城之南重新规划兴建的全新都城，城市形制结构完全参照北魏洛阳城的格局来建造，布局结构更为合理和规整，

是改进完善版的北魏洛阳城的翻版，对后世隋唐盛世都城的生产有直接的重要影响。

总之，以曹魏西晋洛阳都城为典型特征的都城形制的出现，其布局形制明显改变了以往都城前朝后市和多宫制的格局，确立了宫城位于整个城市北部中间，这是中国古代都城宫殿布局形制的一个重要变化。而太极殿名称在曹魏洛阳宫的出现也很有意义，以后历代正殿皆以太极为名，也始于此时⁵⁴。因此，可以说曹魏洛阳都城创立的是一座“建中立极”的崭新都城形制，不仅对后世的中国古代都城影响极为深远，也远播到东亚汉文化圈国家，尤其直接为之后大一统的隋唐盛世王朝都城制度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注释

^① 《水经注》卷十“浊漳水”条注。

^② 左思：《魏都赋》李善注：“文昌殿西有铜爵园，……铜爵园西有三台”。《文选》卷六，中华书局影印本。

^③ 《魏都赋》：“亦有戚里，置宫之东”。

^④ 《河南志·晋城阙古迹》：“晋都城亦在成周，门十二”下引陆机《洛阳记》、《晋书》云。中华书局，1994年。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北魏建春门遗址的发掘》，《考古》1988年第9期。

^⑥ a. 《后汉书·五行志二》：“中平中，长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树中，有人面生鬢。”注《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公在雒阳，起建始殿，伐濯龙树而血出。又掘徙梨，根伤而血出。曹公恶之，遂寝疾，是月薨。”

b. 《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濯龙园。司马彪《续汉书》曰：在洛阳西北角。《续汉志》曰：近北宫。”

^⑦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

^⑧ 《三国志·魏志·明帝纪》。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河南洛阳汉魏故城北魏宫城闾阖门遗址》，《考古》2003年7期。

^⑩ 《水经注·谷水》：“魏明帝上法太极，于洛阳南宫起太极殿于汉崇德殿之故处。改雉门为闾阖门。”

^⑪ 《水经注·谷水》：“渠水自铜驼街东迤司马门南。魏明帝始筑阙，崩压杀数百人，遂不复筑，故无阙门。门南屏中，旧有置铜翁仲处。”

- ¹² 《晋书·荀勖传》：“高贵乡公欲为变时，大将军掾孙佑等守闾阖门。帝弟安阳侯鞬闻难欲入，佑谓鞬曰：‘未有入者，可从东掖门。’”
- ¹³ 《河南志·晋城阙古迹》：“云龙门。”“万春门。”
- ¹⁴ 《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高贵乡公讳髦。公入于洛阳，群臣迎拜西掖门南。至止车门下舆。左右曰：‘旧乘舆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为！’遂步至太极东堂，见于太后。其日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
- ¹⁵ 《河南志·晋城阙古迹》：“神兽门。东对云龙门。”
- ¹⁶ 《河南志·晋城阙古迹》：“千秋门。齐王罔臣五人，大治第舍，开千秋门南墉以通西阁。”
- ¹⁷ a. 《魏志·文帝纪》裴注云：“诸书记是时帝居北宫，以建始殿朝群臣，门曰承明。”
b. 《河南志·魏城阙古迹》：“承明门。陆机《洛阳记》曰：承明门，后宫出入之门。公曰：魏明帝作建始殿，朝会皆由承明门。”
- ¹⁸ 《宋书·礼志四》元会议：“魏司空王朗奏事曰：‘故事，正月朔贺。殿下设两百华镫，对于二阶之间。端门设庭燎火炬。’”
- ¹⁹ 《太平御览·卷一七五》居处部 3：“又云洛阳昭阳殿，魏明帝所治，在太极殿之北。”
- ²⁰ a. 《河南志·晋城阙古迹》：“明阳殿。本昭阳殿，避文帝讳改。”
b. 《河南志·魏城阙古迹》：“显阳殿。明帝景初间造，皇后正殿也。按，晋文帝讳昭，遂改曰显阳。”
- ²¹ 《河南志·魏城阙古迹》：“含章殿，显阳殿之东。徽音殿，显阳殿之西。”
- ²² a. 《河南志·魏城阙古迹》：“华林园。即汉芳林园。避齐王名改华林。”
b. 《读史方輿纪要·河南三》华林园条：“在故洛城内东北隅，与宫城相接，有东西二门，魏文帝所起。亦曰芳林园。”
- ²³ a. 《资治通鉴·魏纪五·明帝纪》：明帝太和六年“帝尝卒至尚书门，陈矫跪问帝曰：……帝惭，回车而返。”
b. 《晋书·何曾传》：“咸宁四年（何曾）薨，时年八十，帝于朝堂素服举哀。”
- ²⁴ 《水经注·谷水》注云：“今按：周威烈王葬洛阳城内东北隅，景王塚在洛阳太仓中，翟泉在两塚之间，侧广莫门道东，建春门路北，路即东宫街也。”
- ²⁵ a. 《河南志·晋城阙古迹》：“太子宫。陆机《洛阳记》曰：太子宫在大宫东，簿室门外，中有承华门。”
b. 挚虞《连理颂》：“东宫正德之内，承华之外，槐树二枝，连理而生。”《全晋文·卷七十七》，中华书局《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二册，1987年。
- ²⁶ 《河南志·晋城阙古迹》：“崇政殿。晋太子宫有崇政殿。”
- ²⁷ a. 《玉海·卷一六九》魏闾阖门条引《魏略》：“青龙二年筑闾阖门诸门阙外罍罍，明帝置铜驼诸兽于闾阖门南街。”
b. 《水经注·谷水》：“太尉司徒两坊间谓之铜驼街。旧魏明帝置铜驼诸兽于闾阖南街。陆机云：驼高九尺，脊出太尉府坊者也。”
c. 《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铜驼街。华延儒《洛阳记》曰：汉有两铜驼，在宫之南街四会道头，夹路东西相对，高九尺。汉时所谓铜驼街。”
- ²⁸ a. 《河南志·魏城阙古迹》“百尺楼。《洛阳记》曰：洛阳城内西北隅，有百尺楼，文帝造。”
b. 《洛阳伽蓝记》城内：“（金墉）城东北角有魏文帝百尺楼。”
c. 《太平御览·卷一七六》引《洛阳地记》：“金墉城，东北角有楼，高百尺，魏文帝

造也。”

- d. 《太平御览·卷一七九》引华延雋《洛中记》：“金墉城东北有百尺楼，魏都水使者陈熙造。”
- ²⁹ a. 《水经注·谷水》：“谷水又东历大夏门下，故夏门也。陆机《与弟书》云：门有三层，高百尺。魏明帝造。”
- b. 《河南志·魏城阙古迹》：“三层楼。《魏略》曰：武帝立北宫，明帝造三层楼，高十丈。陆机《与弟书》曰：大夏门，魏明帝造。有三层楼，高百尺。”
- ³⁰ a. 《太平御览·卷一七六》引《洛阳地记》：“洛阳城内西北角有金墉城。”
- b. 《水经注·谷水》：“谷水又东迳金墉城北。魏明帝于洛阳城西北角筑之，谓之金墉城。”
- c. 《读史方輿纪要·河南三》金墉城条：“金墉城，故洛阳城西北隅也，魏明帝筑。”
- ³¹ 《河南志·晋城阙古迹》：“三市。陆机《洛阳记》曰：洛阳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在临商观之西；马市在大城之东；洛阳县市在大城南。一说三市谓平乐市、金市、马市也。金市在凌云台西北，对洛阳垒；马市在大城东，前有石桥，悉用大石，下员以通水，可过大舫。”
- ³² 《建康实录·卷五》：“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秋七月，以琅玕王睿为安东将军，……镇建邺。……因吴旧都城修而居之，太初宫为府舍。”
- ³³ 《资治通鉴·齐纪一·高帝建元二年》：“自晋以来，建康宫之外城唯设竹篱，而有六门。会有发白虎尊者，言‘白门三重关，竹篱穿不完。’上感其言，命改立都墙。”
- ³⁴ 《建康实录·卷五》：“改元建武元年，初备百官，立宗庙社稷。”原注云：“案《图经》，晋初置宗庙，在古都城宣阳门外，郭璞卜迁之，左宗庙，右社稷。”
- ³⁵ 《建康实录·卷七》注引《輿地志》云。
- ³⁶ 《景定建康志·卷二十·门阙》古城城门：“又按《宫苑记》，凡十有二门。……”《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影印本。
- ³⁷ 《建康实录·卷七》晋成帝咸和六年十一月。
- ³⁸ 《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一·城阙志二》古宫殿：“太极殿，建康宫内正殿也，晋初造，以十二间象十二月。至梁武帝改制十三间象闰焉。高八丈，长二十七丈，广十丈，内外并以锦石为砌。”
- ³⁹ 《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一·城阙志二》古宫殿：“太极殿，……次东有太极东堂七间，次西有太极西堂七间，亦以锦石为砌。更有东西二上阁，在堂殿之间。方庭阔六十亩。”
- ⁴⁰ 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106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 ⁴¹ 《建康实录·卷十二》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是岁，堰玄武湖于乐游苑北，兴景阳山于华林园。”
- ⁴² 《建康实录·卷九》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春正月，起清暑殿于华林园。夏四月，新作永安宫。”
- ⁴³ 《建康实录·卷十二》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七月甘露降乐游苑条，原注曰：“按《輿地志》，其地旧是晋北郊，宋元嘉中移郊坛出外，以其地为北苑。……后改曰乐游苑。”
- ⁴⁴ 《建康实录·卷九》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八月、新作东宫，徙左卫营。”
- ⁴⁵ 《建康实录·卷二十》陈宣帝：太建九年十二月，皇太子居新宫条，原注云：“按《輿地志》，其地本晋东海王第，后筑为永安宫，穆帝何皇后居之。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始

筑为东宫，齐末为火宅焚尽。梁天监五年更修筑于故齐地，盛加结构。”

⁴⁶ 《景定建康志·卷二十·门阙》古东宫门：“按《宫苑记》，南面正中曰承华门，……东面正中曰安阳门，……西面正中曰则天门，西直对台城东华门。”

⁴⁷ 《宋书·五行志四》晋安帝元兴三年。

⁴⁸ 《太平御览·卷八二七》引《丹阳记》：“京师四市：建康大市，孙权所立；建康东市；同时立秣陵斗场市；隆安中发禾营人交易，因成市也。”

⁴⁹ 《景定建康志·卷十六·镇市》：“《古市》：按《宫苑记》：吴大帝立大市，在建初寺前，其寺亦名大市寺。宋武帝永初中立北市，在大夏门外归善寺前。宋又立南市，在三桥篱门外斗场村内，亦名东市。又有小市、牛马市、谷市、蚬市、纱市等十一所，皆边淮列肆稗贩焉。内纱市在城西北耆阇寺前。又有苑市，再广莫门内路东。盐市在朱雀门西，今银行、花行、鸡行、镇淮桥、新桥、笪桥、清化市皆市也。”

⁴⁷ 《水经注·谷水》：“（谷水）南出迳西阳门。旧汉氏之西明门也，亦曰雍门矣，旧门在南，太和中以故门斜出，故徙是门东对东阳门。”

⁴⁸ 《洛阳伽蓝记·序》承明门。

⁴⁹ 《河南志》后魏城阙古迹：“宫室。按，宫殿多仍魏晋旧名。或云依《洛阳图》修缮某所某居，疑总名闾阖宫。然又与上门名相犯。”

⁵¹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察》，《考古》1973年第4期。

⁵² a. 《洛阳伽蓝记》城内：“瑶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闾阖城门御道北，东去千秋门二里。”

b. 《河南志》后魏城阙古迹：“千秋门。宫西门，西对闾阖门。”

⁵³ a. 《魏书·前废帝纪》：“入自建春、云龙门，升太极前殿，群臣拜贺。”

b. 《河南志》后魏城阙古迹：“云龙门。宫东门。”

⁵⁴ 《魏书·郭祚传》：“（世宗）下诏：‘御在太极，驺唱至止车门；御在朝堂，至司马门。’”

⁵⁵ 《魏书·世宗纪》：“正始三年，十有一月甲子，帝为京兆王愉、清河王怳、广平王怀、汝南王悦讲《孝经》于式乾殿。”“永平二年，冬十月己丑，帝于式乾殿为诸僧、朝臣讲《维摩诘经》。”

⁵⁶ 《魏书·出帝纪》：“中兴二年，六月己卯，帝临显阳殿纳讼。”“秋七月乙卯，帝临显阳殿，亲理冤狱。”

⁵⁷ 《洛阳伽蓝记》城内：西游园。

⁵⁸ a. 《河南志》魏城阙古迹：“华林园。即汉芳林园。避齐王名改华林。”

b. 《读史方輿纪要》河南三·华林园条：“在故洛城内东北隅，与宫城相接，有东西二门，魏文帝所起。亦曰芳林园。”

⁶⁴ 《魏书·世宗纪》。

⁶⁵ a. 《魏书·广阳王嘉传》：“嘉表请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虽有暂劳，奸盗永止。诏从之。”

b. 《魏书·世宗纪》：“（景明）二年，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

⁶⁶ 《洛阳伽蓝记》城北：“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

⁶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考古》1993年第7期。

⁶⁸ 《洛阳伽蓝记》城西、城东、城南。

⁵⁰ 嘉靖《彰德府志·邺都宫室志》注引《邺中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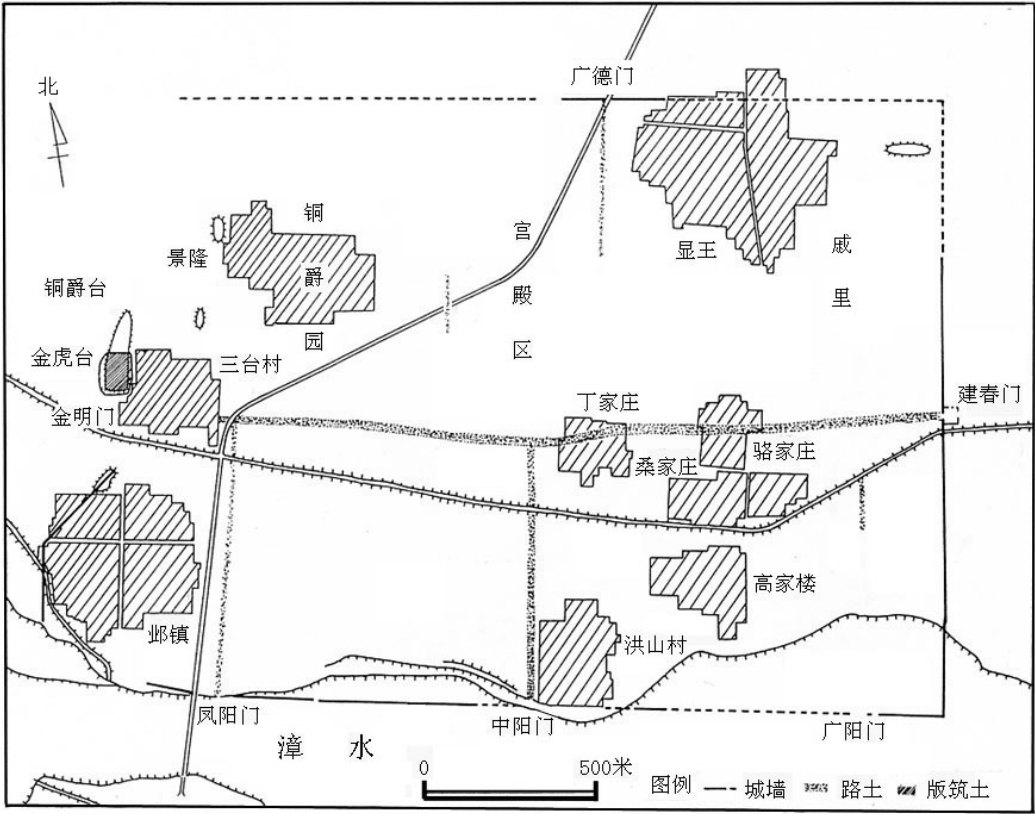
⁵¹ 《北齐书·高隆之传》。

⁵² 嘉靖《彰德府志·邺中宫室记》注引《邺中记》：“尚书省及卿寺百司自令仆而下，至二十八曹，并在宫阙之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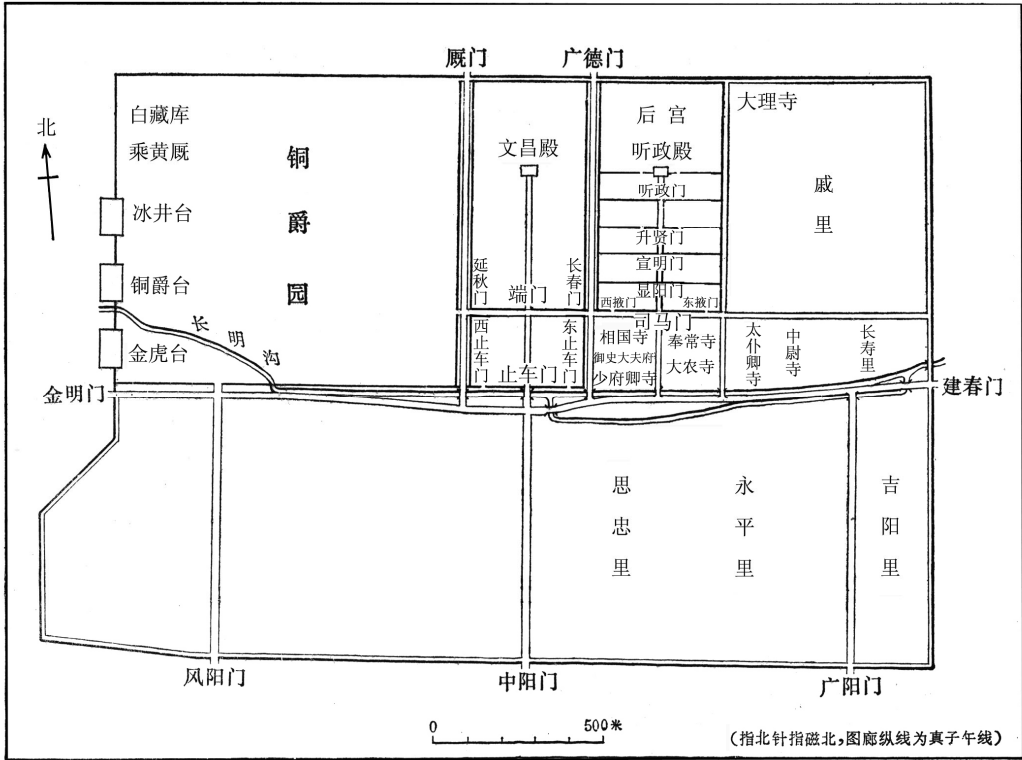
⁵³ 嘉靖《彰德府志·邺都宫室志》注引《邺中记》：“止车门内次至端门，端门之内次至闾阖门”；“闾阖门之内有太极殿”；“太极殿后三十步至朱华门，门内即昭阳殿”；“昭阳殿后有永巷，巷北有五楼门，门内则帝后宫，有左右院，左院有殿名显阳，右院有殿名宣光”。

⁵⁴ a. 《太平御览·卷一七五》引山谦之《丹阳记》曰：“周制，路寝也。秦汉曰前殿。今称太极曰前殿。洛宫之号始自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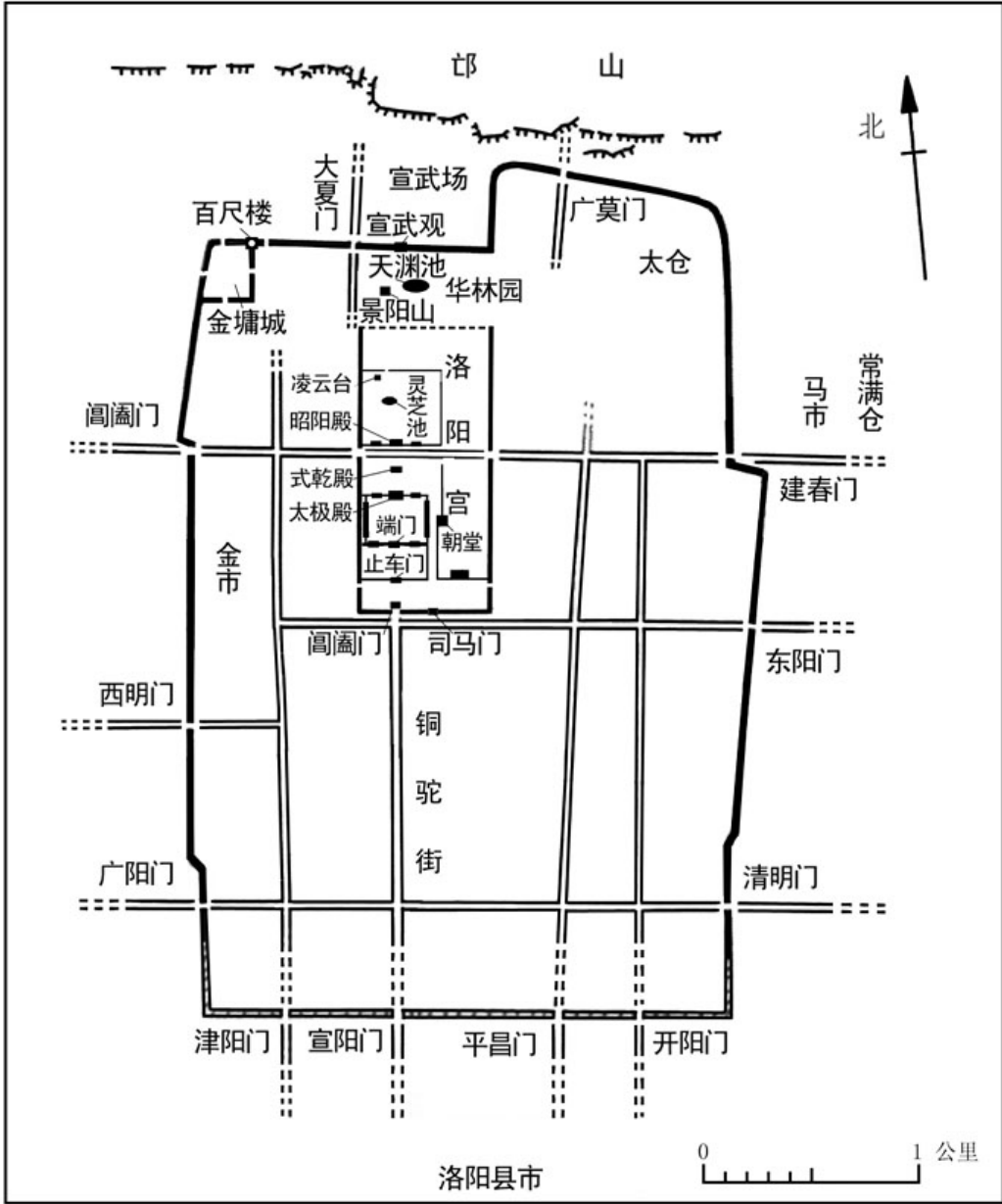
b. 《河南志·魏城阙古迹》：“历代正殿皆以太极名之，自始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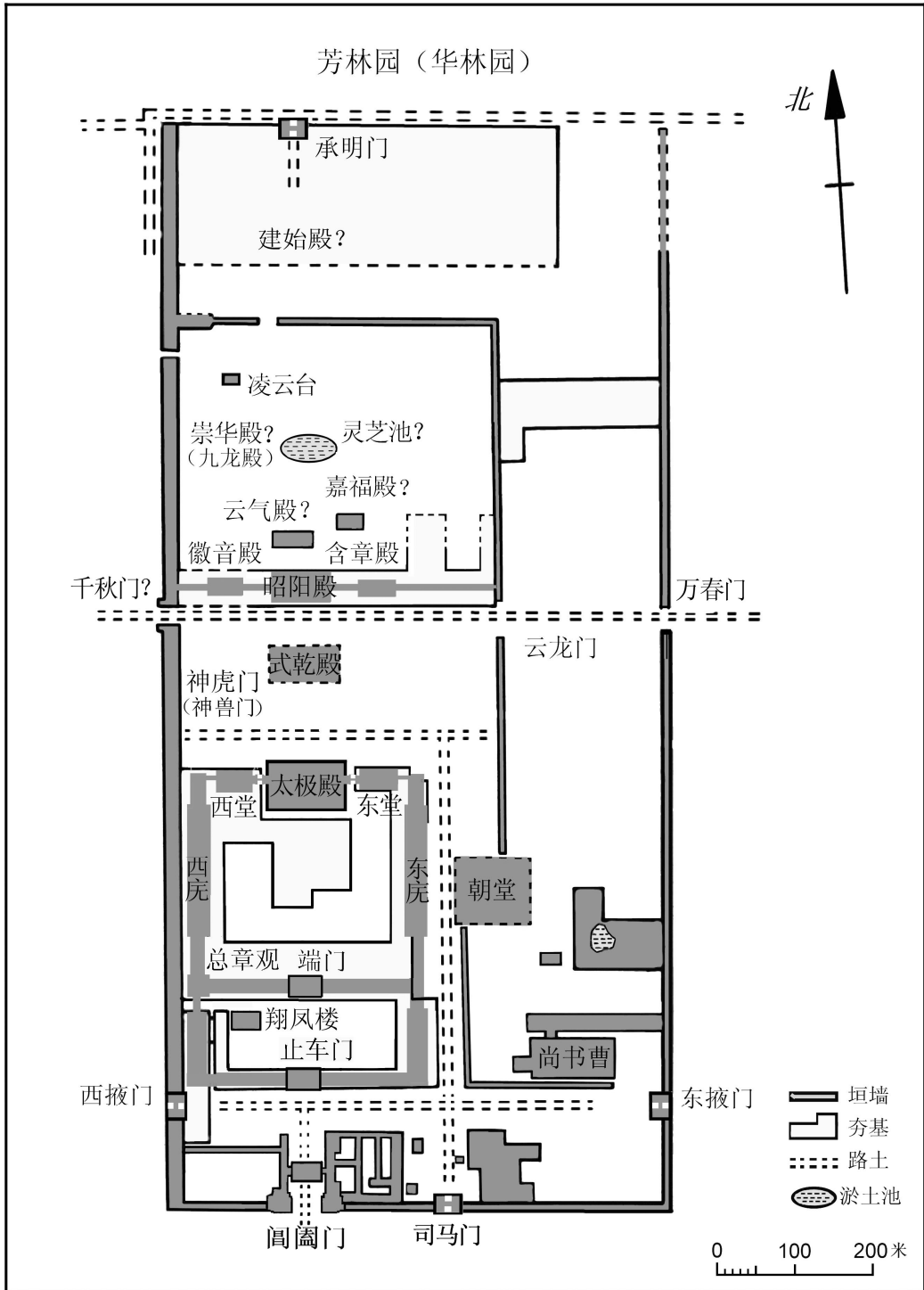
图一 邺北城遗址实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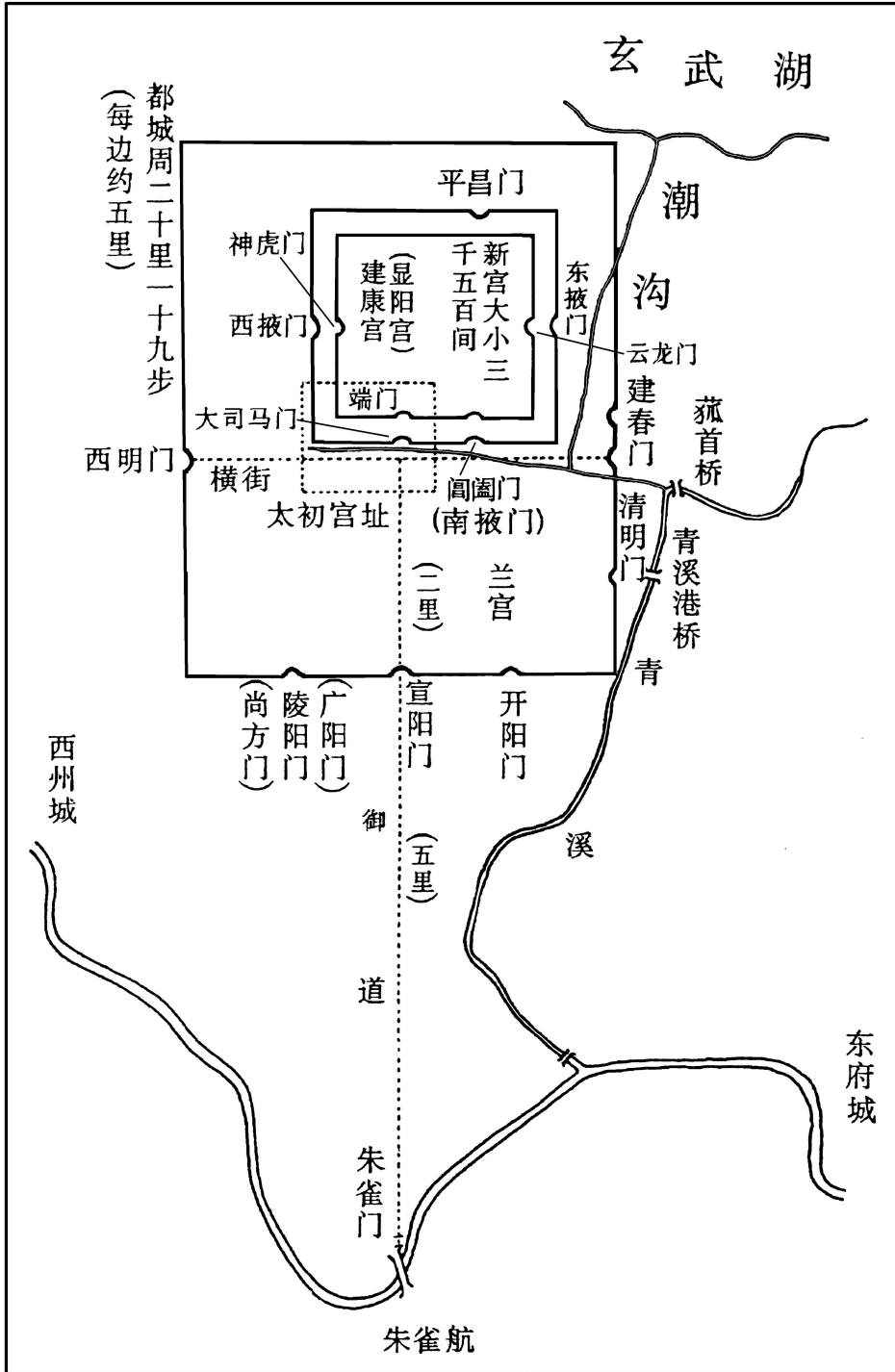
图二 曹魏邺北城平面复原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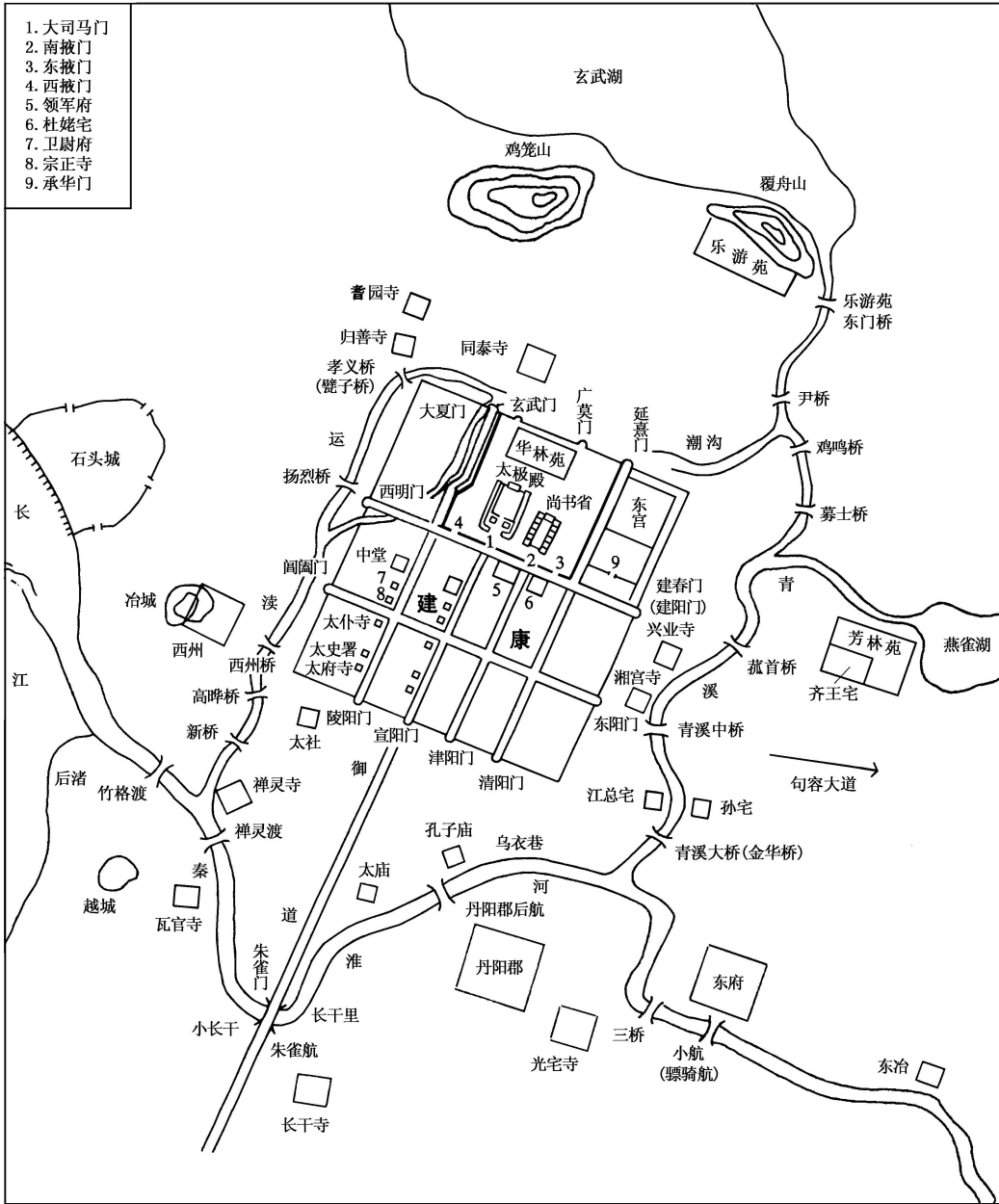
图三 曹魏、西晋洛阳城复原示意图



图四 曹魏、西晋洛阳宫城复原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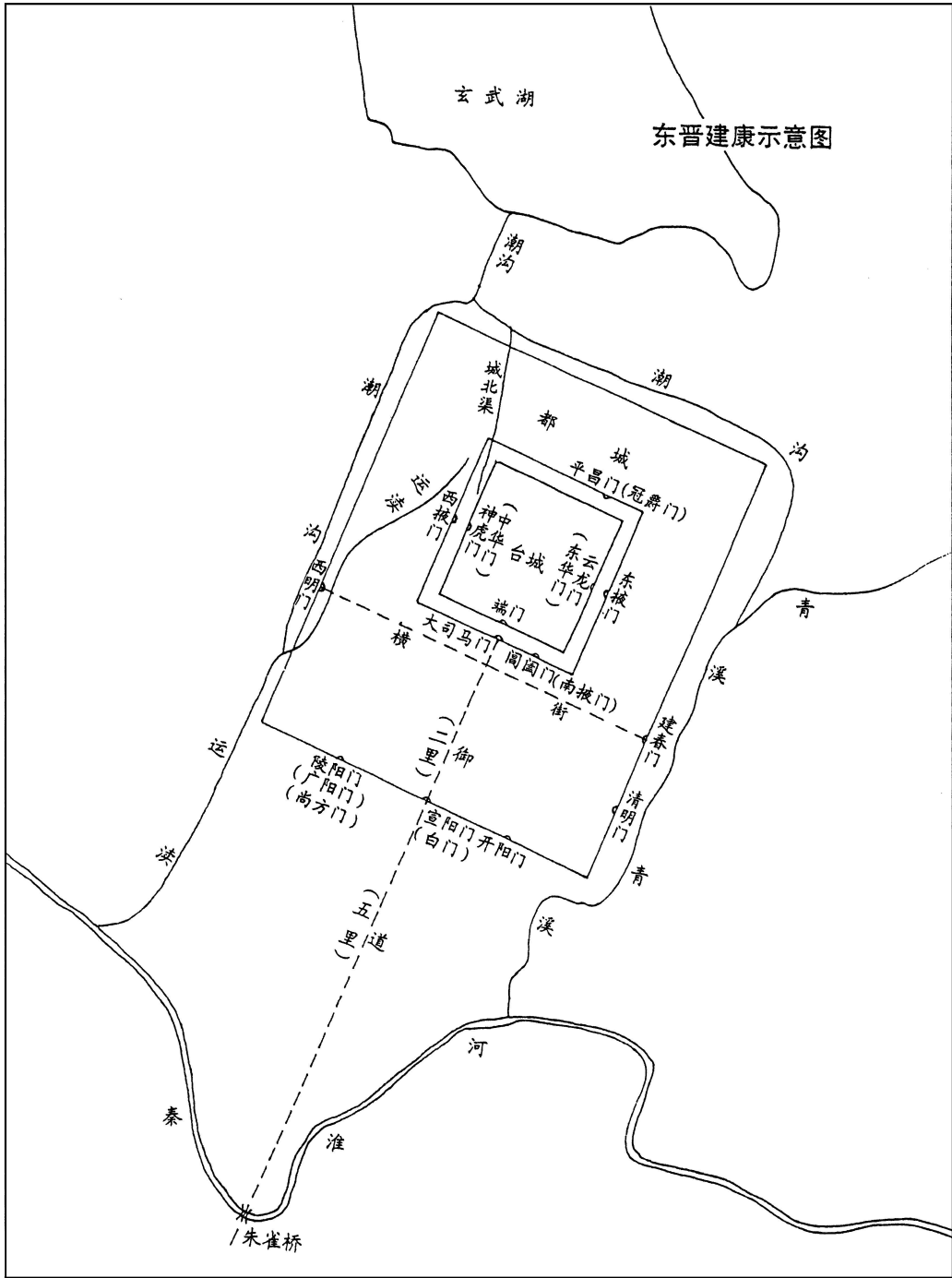


图五 朱楔所绘六朝都城及宫城位置图
 (此图引自朱楔著《金陵古迹图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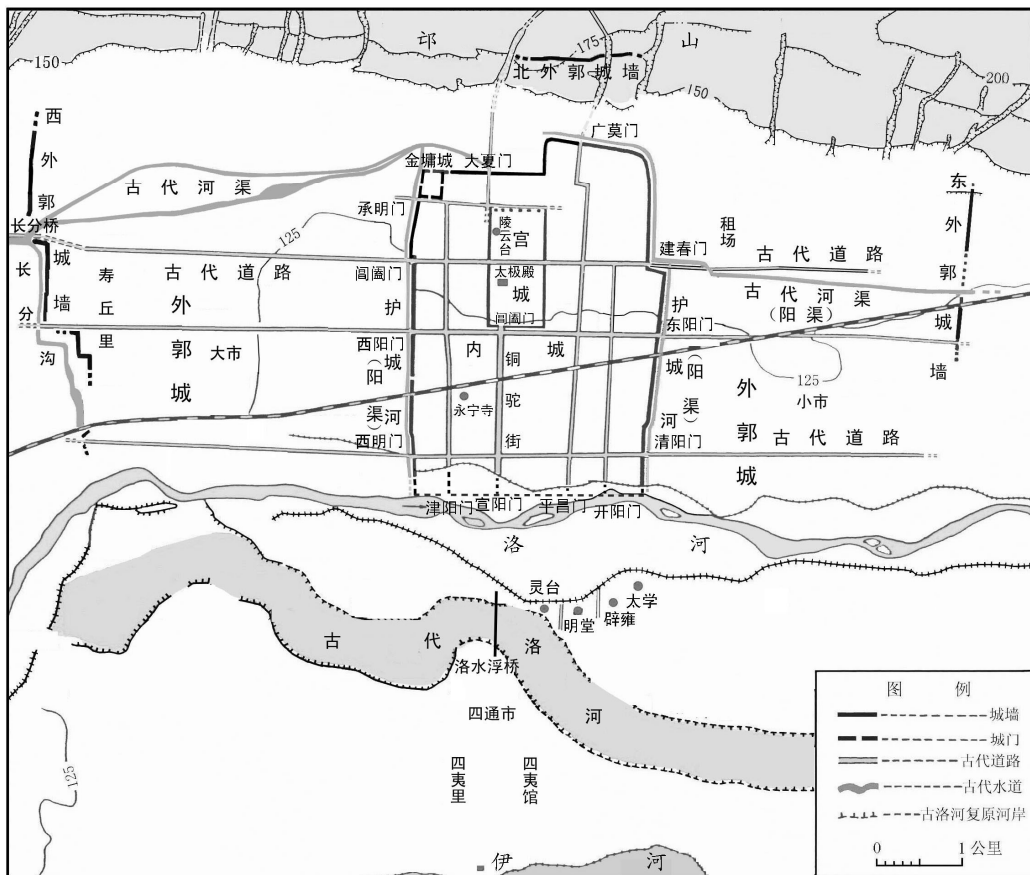


图六 郭湖生所绘六朝都城及宫城位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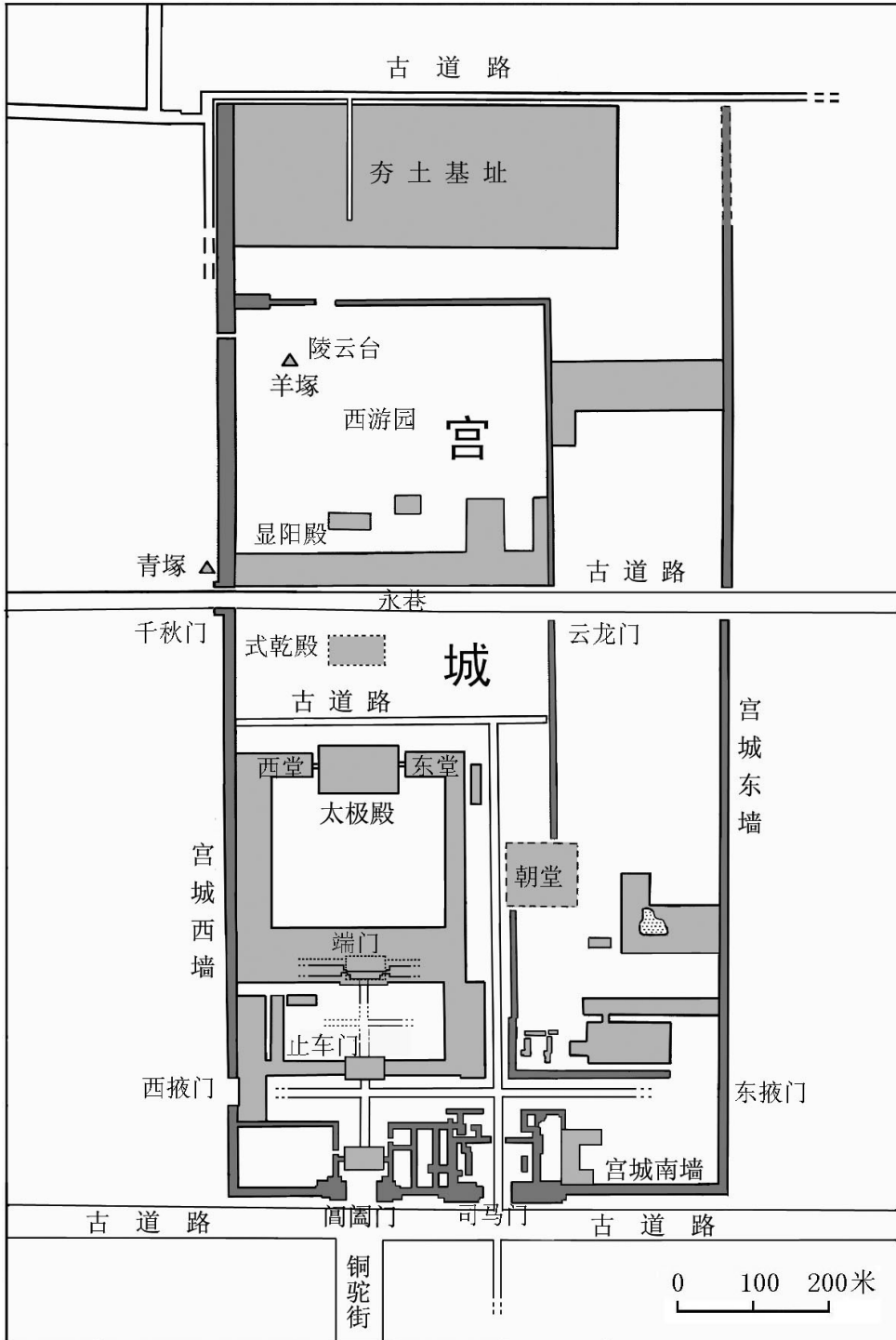
(此图引自郭湖生著《台城辩》，《文物》1999年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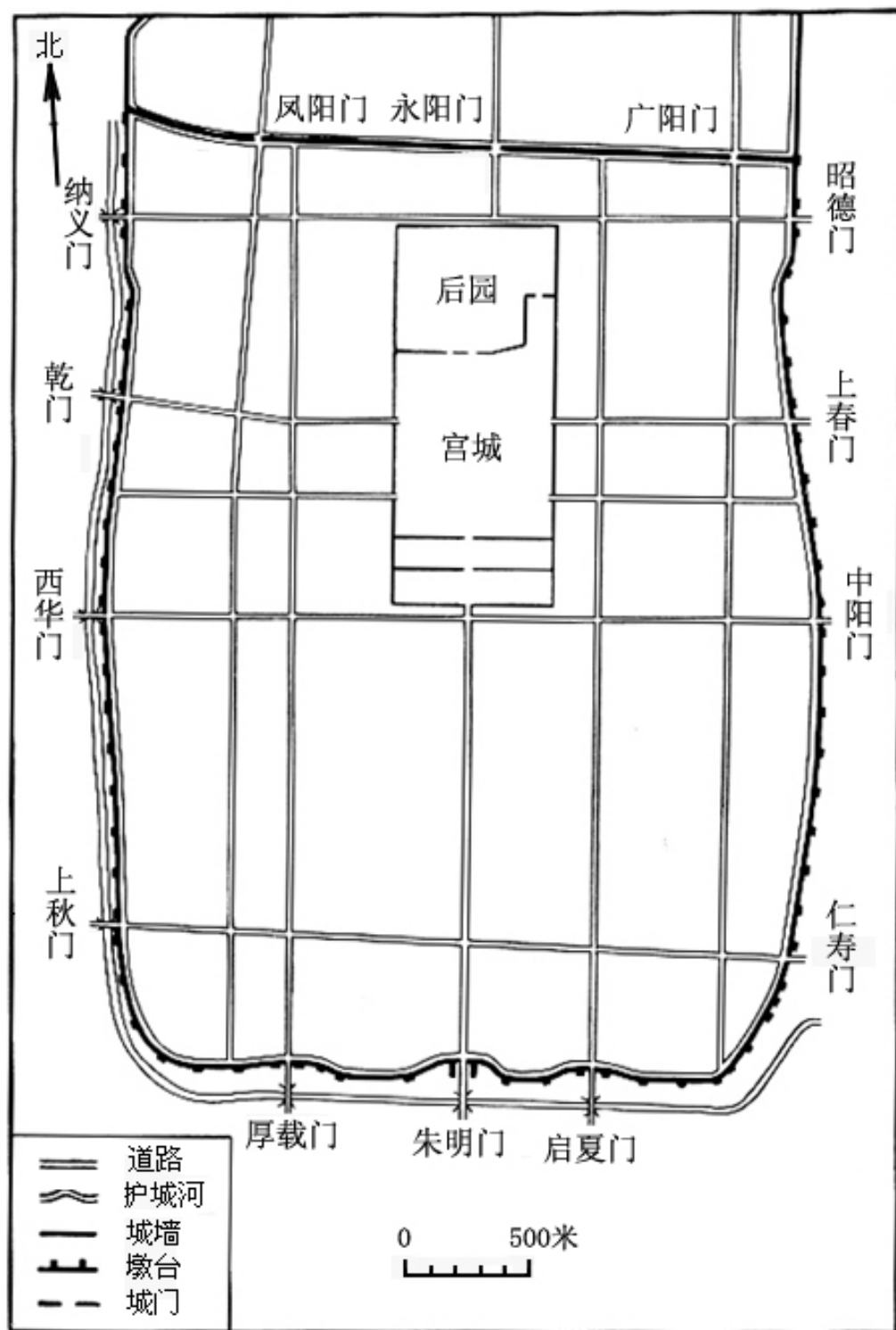
(此图引自卢海鸣著《六朝建康》47页, 南京出版社, 200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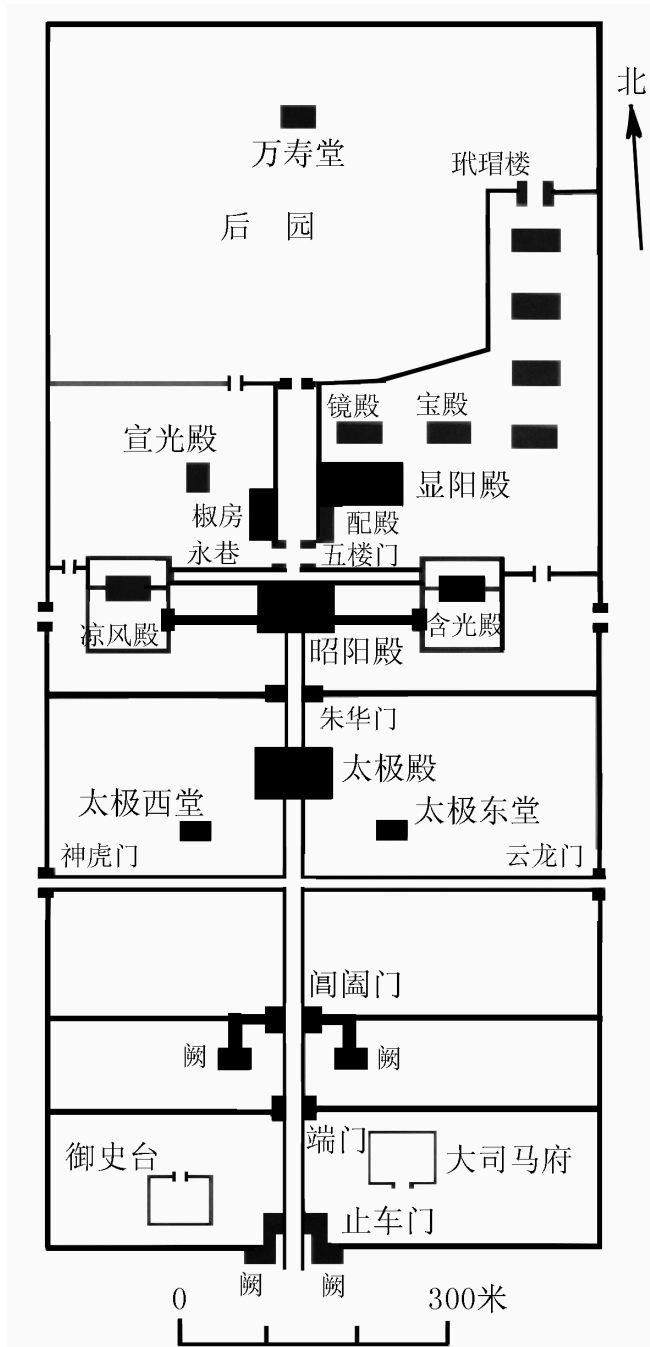
图八 北魏洛阳都城平面复原示意图



图九 北魏洛阳宫城勘察平面图



图十 东魏北齐邺南城平面复原示意图



图十一 东魏北齐邺南城宫城平面复原示意图

錢國祥, 「魏晉南北朝 都城의 형태와 구조」 토론문

신 성 곤(한양대학교 사학과)

이 논문에서는 魏晉南北朝 시기에 등장한 여러 왕조들의 도성, 즉 曹魏의 鄴城, 曹魏와 西晉의 洛陽城, 東晉과 南朝의 建康城, 北魏의 洛陽城, 東魏와 北齊의 鄴南城의 형태와 구조를 분석한 뒤, 曹魏와 西晉의 洛陽城을 전형적인 특징을 갖춘 都城으로 결론을 내렸다. 洛陽城의 배치와 형태를 보면 이전 都城의 前朝後市와 多宮制를 바꾸어 宮城을 도성의 북쪽 중간 위치에 배치하였는데, 이는 궁전 배치에서의 중대한 변화를 가져왔다. 또한 太極殿이라는 명칭이 曹魏의 洛陽宮에 출현한 것도 이후 역대 왕조에서 正殿에 太極이라는 명칭을 쓴 것은 이때부터이다. 따라서 曹魏의 洛陽城은 “建中立極”의 새로운 도성 형태로서 이후 왕조의 都城 구조와 여타 동아시아 한자 문화권의 국가들에 영향을 주었을 뿐 아니라, 隋唐 통일제국의 都城 제도 형성의 토대가 되었다고 한다.

都城의 형태와 구조라는 측면에서 본다면 확실히 曹魏의 洛陽城이 새로운 형태의 효시를 이룬다고 하기에 충분하다고 할 수 있고, 이 시기의 都城 구조 이해에 많은 도움을 주었다. 토론을 맡은 입장에서 이런 측면을 고려하면서 다음과 같은 몇 가지 질문을 드림으로써 토론을 갈음하고자 한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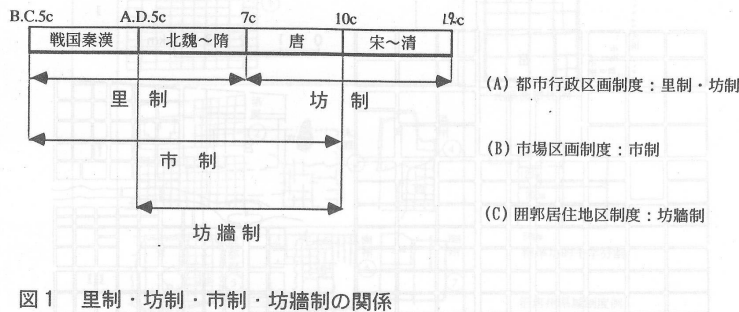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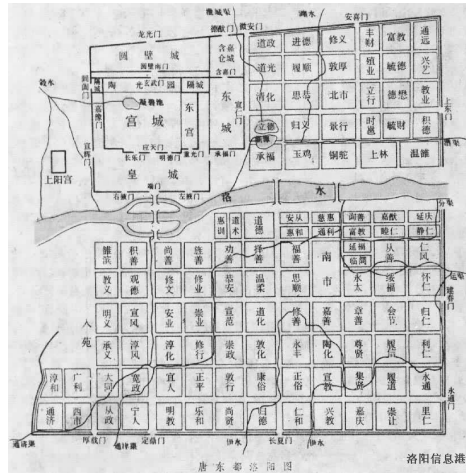
圖 1 里制·坊制·市制·坊牆制의關係

첫째, 都城의 外形이라는 측면에서 본다면 曹魏 洛陽城이 隋唐 長安城의 원형이 될 수 있다는 관점은 충분히 수긍할 수 있지만, 里制와 坊制, 市制 그리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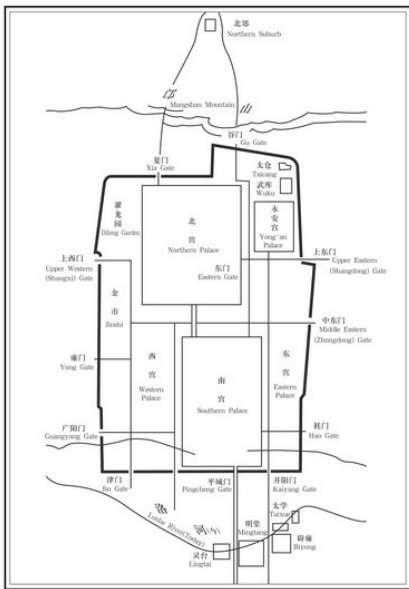
坊牆制라는 관점에서 본다면 가장 유사한 都城 구조는 北魏 洛陽城부터 비롯된 도성 내부의 坊牆制일 것이다. 이점에서 본다면 隋唐 長安城의 실제적인 원형은 坊制가

나타나지 않은 曹魏의 洛陽城이라기 보다 北魏 洛陽城일 가능성이 더 크다고 보아야 하는 것은 아닌가?

둘째, 당대 長安城은 확실히 曹魏 洛陽城의 형태를 띠고 있지만 옆의 그림에서 보듯이 唐代 洛陽城은 이와 달랐다. 宮城이 북쪽 가운데 있는 “建中”의 형태가 아니라, 동쪽으로 치우친 형태를 갖고 있다. 또한 市場의 배치도 長安城에서는 “前朝後市”의 형태가 바뀌어 朝廷 앞쪽에 東市와 西市가 배치되었지만, 洛陽城에서 南市와 北市는 여전히 이와 무관하게 배치되고 있다. 따라서 唐代에 洛陽城이 長安城과 다르게 이러한 형태로 구성된 이유는 무엇인지 궁금하다.



东汉洛陽城复原示意图
Restored Sketch Map of Luoyang City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셋째, “前朝後市”와 “多宮制”에서 “建中立極”의 형태로 바뀐 것이 曹魏 洛陽城의 가장 큰 변화라고 하였다. 그런데 옆의 그림에서 보듯이 前漢의 長安城과 달리 後漢의 洛陽城에서도 後市의 형태는 이미 깨어진 것 아닌가? 실제 唐代 洛陽城에서의 北市나 後漢 洛陽城에서의 金市는 모두 궁성의 옆쪽에 배치된 모습이다.

마지막으로 前漢의 長安城과 後漢의 洛陽城에서 曹魏의 洛陽城으로의 형태상의 변화가 큰 의의가 있다고 본다면 前漢과 後漢의 長安城과 後漢의 洛陽城을 前朝後市라는 전형적인 都城의 형태를 갖춘 사례라고 볼 수 있을까 하는 점에 의문이 있다. 都城 건축이라는 측면에서 볼 때 漢代의 都城이 과연 이전 시대 都城으로서 대표성을 띠고 있다고 판단할 수 있는가의 문제이다. “左祖右社, 面朝後市”의 관념은 『

『周禮』 『考工記』의 匠人에 등장한다. 그런데 『考工記』는 前漢 武帝 때에 河間獻王 劉德이 바친 것으로 秘府에 소장되어 세상에 공개되지 않다가 王莽 때에 비로소 세상에 알려졌다. 따라서 前漢의 長安城이나 後漢의 洛陽城에서 『周禮』에 따른 前朝後市 관념이 반영되었을 가능성은 거의 없다고 보아야 하는 것은 아닐까?

이상 都城에 관해 문외한으로서 의문나는 점을 간략히 서술하였다.

考古学视野下的“中国中世纪都城系统”

韩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

——以长安城为中心

公元 3-10 世纪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重要时期。由公元 3 世纪持续至 6 世纪的中国内地割据分裂,给北方的游牧民族入侵提供机会。此时期,北方地区以游牧为生的胡族越过游牧地域与农业地域交界处的农牧交错地带而入侵农业地域,进而在各地建立了政权。这些政权的都城,对 6 世纪末统一分裂局面的隋王朝首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隋开皇二年(582 年)建新都城大兴城,即唐长安前身。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附都城建筑》:“唐之宫城承隋之旧”,然“隋创新都,其市朝之位置所以与前此之长安殊异者,实受北魏孝文营建之洛阳都城及东魏、北齐之邺都南城之影响。”同时他还指出“隋代营建大兴新都城即后来唐代长安城诸人,除贺娄子干及宇文恺外,高颎、刘龙及高龙义即高义,或家世久居山东,或本为北齐宗世及遗臣,俱可谓洛阳邺都系文化之产物。”陈寅恪认识到邺城与隋大兴、唐长安的沿承关系,并从礼仪制度层面进行分析。学者将陈寅恪的看法概括为“邺—大兴—长安”系统,并将其称为“中国中世纪都城系统”¹。

中国中世纪的都城系统,从时间上来说,与中国古代史划分的中古时期相一致,中国多者多称其为“中古都城”,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这一时期,都城从设计、规划、布置都城建筑都有一定的相似和沿承。规划强调天人合一,君主至上,中央集权,按已有的理念对都城进行整体设计,并有序地

¹上田早苗:《后汉末期的邺地与魏郡》谷川道雄编《日中国际共同研究: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日本:京都玄文社,1989 年。

建筑，首先确定一个中心点，并沿这个中心点划出一条南北中轴线，宫城皇城居中轴线上，内朝中朝外朝由北向南依次排列，构成全城的核心，郭城围绕中心，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宫城、皇城、郭城环环相套，街区呈棋盘状，整体十分突出。

中国古代都城的研究，经历了唐宋地理学——明清考据学——古器物学——田野考古学几个阶段。田野考古已经成为中国古代都城研究的必要途径。古代都城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课题。自西方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伊始，中国学术界就把注意力集中到古代都城考古。中国古代都城的考古发掘，始于1928年李济先生主持的安阳殷墟的发掘。国际汉学大师伯希和在哈佛大学300年校庆时，称赞殷墟发掘是“近年来全亚洲最重大的考古发掘”。

中国的都城考古涉及内容很广，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城墙、城门、城壕、道路和给排水工程等都城基本公共设施；二、皇室和中央政府机构的各类宫殿、宫城、官署、武库、粮仓，以及宗庙、社稷、明堂、辟雍、灵台等礼制建筑；三、手工业和商业遗存，这是都城的主要经济部门；四、贵族宅第、市民居里及宗教设施；五、都城附近的离宫、行宫；六、皇陵及一般墓葬及相关建筑。

中国考古学者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把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²。其中在第三段从选址、规划设计、城制布局、结构区划、城市建筑与园林艺术等方面具有诸多共性，这些共性及传承关系形成了中国中世纪都城制系统，总结为“从曹魏邺都北城到隋唐两京城的棋盘格形封闭式规划，是人身依附关系加强后封建等级制森严时期的都城形态”，把中世纪的都城系统更具体化为：“邺（曹魏十六国）——洛阳（北魏）——邺南城（东魏北齐）——大兴（隋）——长安（唐）”。

²

邶城制度与中世纪都城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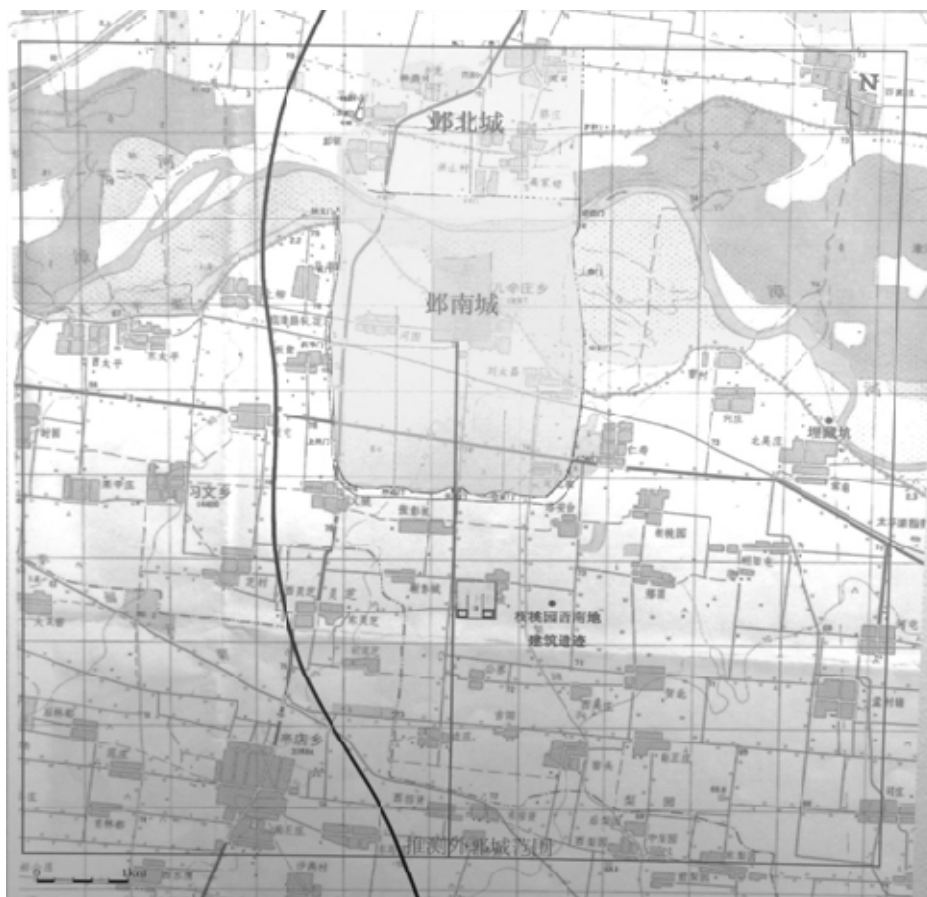
郭湖生先生从都城史的角度提出：“邶城制度是中国都城史上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约自三国曹魏都邶城始，迄於唐末梁（朱全忠）以汴州为东京止，延续约七百年，其间经历曹魏、西晋、东晋、宋、齐、梁、陈、隋、唐十朝都城的建置制度；并且影响北魏（拓跋氏）、东魏、北齐和周边国家如渤海国等，特别是日本的藤原京、长冈京、平城京、平安京等一系列都城建设，也均在邶城制度范围之内。当然，邶城制度本身也随中央政权的变化而有所发展变化，但基本特点不变。”并对邶城制度进行总结：“1、宫前东西横街直通东西城门，划全城为二，宫城在北且与北城垣合，坊里、衙署、市在南；2、礼仪性的大朝与日常政务的常朝在宫内并列；形成两组宫殿群，各有出入口：大朝区为文昌殿闾阖门；常朝区为勤政殿司马门；3、大朝门前形成御街，直抵南城门。在邶城，为南城垣中央的中阳门”³。

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在《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与古代史研究》中就提出：“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城市，逐步发展为完备的封闭式里坊制的城市。这种式样的城市发端于曹魏的邶北城。邶北城城市规划之特点是：宫城在城的北部中央，西为铜雀园和三台，东为贵族居住区戚里，中央官署集中于宫城前司马门外。东起建春门，西止金明门的一条横街，将全城分为南北两部分，横街以北为宫苑、戚里和中央官署，横街以南为里坊。宫苑区与里坊在全城面积中的比例为二分之一强，与东汉洛阳的比例相近。城市规划中出现了中轴线，从南城垣中央城门中阳门经止车门、端门至文昌殿，这是外朝；内朝的听政殿在其东侧，内外朝东西并列。铜雀园中的三台—冰井、铜雀、

³ 郭湖生：《论邶城制度》

金虎，不只是游乐之地，也带有军事性质。魏明帝在洛阳城西北隅建金墉城，即仿邺城之三台，又把边塞城堡上的墩台（宋以后称‘马面’）也筑在洛阳城垣外。强化军事设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建设上的时代特色”。

邺城遗址位于河北省临漳县，地处华北平原的中心区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邺城遗址包括邺北城和邺南城，两城南北衔接，大体呈“日”字型结构。邺北城也称曹魏邺城，先后是曹魏(204~265)、后赵(335~350)、冉魏(350~352)、前燕(357~370)的国都。曹魏邺城全面营建于曹操打败袁绍后的建安九年(204年)。邺南城又称东魏北齐邺城，是北魏分裂后东魏(534~550)、北齐(550~577)王朝的首都（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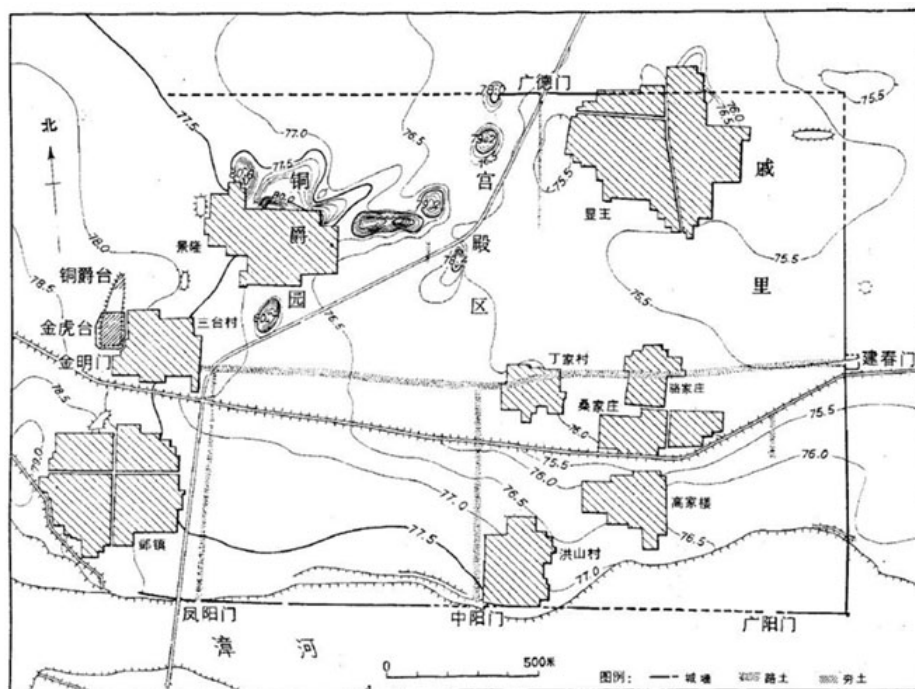


图一

曹魏邺城基本呈规整的长方形，正南城门中阳门位居南城墙正中，中阳门内大道直抵宫城正南门，向北直线延伸建筑有宫城正殿文昌殿，上述重要的建筑物和道路以点线构成了曹魏邺城全城中轴线。勘探出的曹魏邺城东西 2400 至 2620 米，南北 1700 米。城墙现全部埋于地下，城墙系夯土筑成，宽约 15~18 米（图二）。

经过考古工作逐渐明晰的曹魏邺城是一座规划严谨、继承与创新并重的都城，它贯穿全城中轴线的思想、单一宫城制度、区划规整功能有别的设计理念，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史上影响深远。

建筑于邺北城西城墙之上的铜雀三台遗迹，是指曹操在东汉末年始建的三个宏伟的高台建筑群，现在邺城遗存几乎消失殆尽，惟有三台中的金虎、铜雀二台屹立于漳河之滨，经历着邺城遗址 1800 余年的兴衰弃建。



图二

曹魏邺城的都城规划明确突出了全城中轴线的地位。整个都城中较严格地采用明确

在三国时代之后的中国历代都城规划基本都沿袭了这一特点，甚至东亚地区古代都城也体现了这样的都城规划要素，足见曹魏邺城影响的深远（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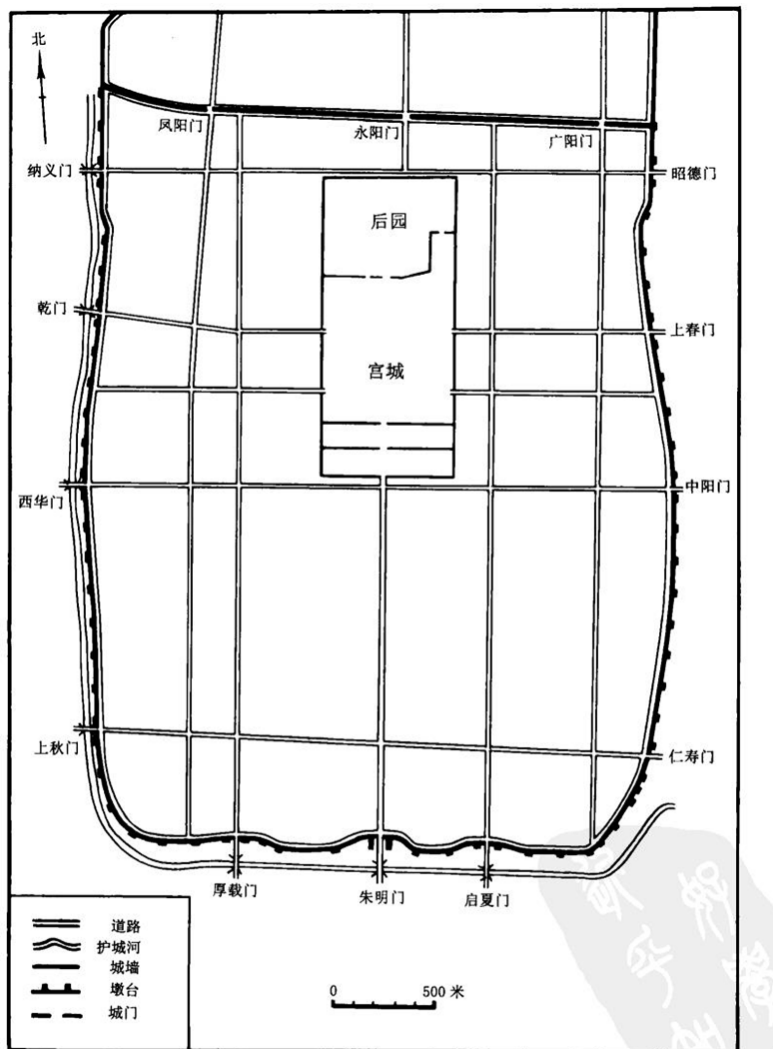
邺北城处于我国都城史上的过渡期，它开创的一些新规制，已成为后代都城规划的直接模仿对象。在这一方面，学术界同仁基本上达到了共识。“曹魏邺城开始，诸代王朝都城中的中央衙署便开始集中”⁴。“从邺北城开始，形成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一种新模式，给南北朝和隋唐都城规划以重大影响”，“具有划时代意义”⁵。

东魏、北齐邺都南城紧附于曹魏邺城之南，为南北向的长方形。高欢以“北城窄隘”，故筑南城。高欢建邺南城时，城垣形制按龟的形状设计、夯筑，利用仿生学的原理，增强都城的防御功能，这在中国古代都城建筑史上堪称是一个创举。邺南城“宪章前代，模写洛京”。“东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其形制由东西向的长方形变为南北向的长方形，布局整齐甚过北城。邺南城由外郭城、内城、宫城组成。宫城位于内城北部中央，其南面正门阊阖门与内城南墙正南门朱明门之间的干道就是全城的中轴线。宫城正中南门有3道门，即阊阖门、端门、止车门，开创了宫城正门由多门构成的先河。宫城南半部也有由大殿构成的中轴线，即太极殿、昭阳殿，昭阳殿东有宣光殿，西有凉风殿。北部称为后宫，大殿很多，可能因地制宜，自由布设，最北部则为后园，即御花园。由此可见，邺南城的宫城布局，也为后来唐、宋、元、明、清都城的宫殿布局开创了先例。由于有明显的中轴线，全城里坊、市场完全左右对称布局，十分整齐。“南城自兴和迁都之后，四民辐凑，里闾填溢。盖有四百余坊，然皆莫见其名，不获其分布所在。其有可见者有东市（东郭）、西市（西郭）、东魏太庙、大司马府、御史台、尚书省卿寺、司州牧廡、清都郡、京畿府……”坊也就是居民区，北城称里，南城称坊，从此以后坊名就成为居民区的称谓。四百余坊自然是以中轴线为中心左右对称布局。东、西二市的具体位置虽难确指，但对称布局却毫无问题。邺都南城这种完全对称布局的新格局，开创了中国都城整齐划一的新规制，隋唐长安城和元明清的北京城，其布局特点，都渊源于邺都南城。

⁴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第6期。

⁵ 段鹏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邺城》，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尽管“邺都南城，其制度盖取诸洛阳与北邺”，但在继承中有所发展，开创了一代都城的新模式。“自高欢善之，高洋饰之，卑陋旧贯，每求过美，故规模密于曹魏，奢侈甚于石赵”，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壮丽的都城之一，承前启后，为中国都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图四）。



图四

胡汉体制与中世纪都城系统

中世纪的都城是帝国皇帝权力的物化表现，都城空间场所的变化能最敏感地体现该时期所存在的诸问题。《周礼·考工记》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基本原则。其内容可归纳为中央宫阙、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左右民廛这四个原则。作为都城规划的金科玉律，这四个原则到隋大兴城，包括唐长安城，却遭到了放弃，背离了传统。特别是曹魏邺都以来，作为都城核心的宫城，偏于都城最北端的中央，从而背离了自古以来“前朝“和”后市“的原则，这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建设史上最大的转折。北宋吕大防的《长安图》：题记中说到有“隋氏建都之时，未遵从先王之法”。从公元3世纪到9世纪，中国西北和北方的胡族大量迁居内地，并纷纷建立政权。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王朝，为了得到正统地位，使其政权拿正当性得到农耕民族的认可，修城建都过程中，与中原王朝农耕民族的对立、冲突，乃至最后的相互吸收、融合，就构成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整个北方历史发展的主要特征。

朴汉济教授经过多年的思考和研究，提出的“胡汉体制”。所谓胡汉体制，是掌握自五胡入华至隋唐时代的历史发展潮流所需的研究方法，它不是单纯指狭义的政治体制或制度，而是广义的包括政治体制及制度在内，乃至胡汉民族在同一地区及统治体制内共存，并形成一种文化体制，由冲突，反目至融合，最终走向共存之路的历史过程，即包括以胡汉问题为中心发生的所有社会现象。换言之，笔者认为构成这个历史时期的最基本的部分是胡汉关系，汉族文化与胡族文化经过不断融合，最终形成既非单纯汉族的，也不是胡族的新文化，即经创造综合了的第三种形态的文化⁶。朴汉济先生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因大量的胡族内迁，整个北方大多由胡族建立政权，统治广大的胡汉诸族。他们虽然继承了原汉族统治的方式和制度，但仍然保留了许多胡族

⁶ 韩国·朴汉济：《西魏北周时代胡姓再行与胡汉体制》，《文史哲》，1993年第3期。

的制度和习俗。胡汉两种文化在矛盾、碰撞的过程之中,最后相互融合,形成带有胡汉两种民族特征的新体制。

朴先生的“胡汉体制“,是对陈寅恪先生的“太和文化传统”观点的发展,符合中世纪的时代特征。都城制度本身就是传承、变革中不断发展的。中世纪都城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如果认为是“胡汉体制”下形成的“既不属于汉族也不属于胡族的,即 Synthesized 的第三种形态的文化”,这是值得商榷的。中国古代都城发展中,吸收胡族的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汉族文化。我同意朴先生的“胡汉关系是构成这一时代的基本骨架”、不过只“是这一时代特殊的历史现象”⁷。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都城长安

地处关中平原的腹地的长安城,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山川形胜,成为周、秦、汉王朝的都城所在地。西汉王朝正是依赖于关中地区自然环境基础和经济基础,国力空前强大,都城长安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汉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建都洛阳,长安改为西京。东汉末年,汉室势微,董卓之乱,使长安城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大破坏。“自催、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赢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⁸”十六国时期的前赵、前秦、后秦和北朝时期的西魏、北周以及隋初均建都长安,前后长达百余年,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些王朝或政权虽前后不同,既然相继都在一个都城,则这样的都城不仅在易代之时,未多遭受破坏,甚至还不至于萧条”这也是作为都城所在地的难得经历。⁹”

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五朝以长安为都城,在各自统治期间,都对长

⁷韩国·朴汉济:《北魏王权与胡汉体制》,载《中国史研究的成果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⁸《后汉书》卷一百二《董卓传》,中华书局。

⁹史念海、史先智:《论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的小城、子成和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期。

安城内的建筑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复。这时期的文献中多次出现“长安大城”、“子城”¹⁰、“小城”¹¹、“皇城”¹²等，但却十分简略，并不能让人完全明白此时期长安城的情况。有学者曾就这些名称讨论过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长安城，认为符健时的长安小城，北魏时乐安王范所筑的长安小城及西魏初年赵青雀据以为乱的长安子城，西魏北周时期的皇城都是在西汉时期的未央宫旧址上建立的，也就是故汉长安城的西南角¹³。

十六国北朝时期长安城的考古工作，起步很早。上世纪 50 年代，王仲殊先生就根据汉长安城的考古工作，探讨了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汉长安城霸城、直城门、西安门的使用和废弃情况¹⁴。随后，王先生发表了宣平门发掘的成果¹⁵，并进行深入研究，指出了宣平门与其他几个城门的不同之处，同时又对三个发掘的城门在整个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修补过程进行了大胆科学推测和阐述，最后，以此四个门的考古成果为例证，推测了西汉以后到隋唐之前，这座城市城门的演变过程及规律。成为后学者研究汉长安城城门必须重视的重要成果（图五）。

宣平门等遗址的发掘，揭示了东汉至隋初进行维修改建的情况，获取了汉代以后长安城沿革的重要信息。

宣平门，新莽时期改为春王门，东汉之后称青门。通过发掘得知宣平门共有门洞 3 个，中间门洞为皇帝御用的驰道，同汉城内道路中间的驰道相连，两侧门洞方供臣民出入之用。门洞间的夯土宽为 4 米多，门洞宽度同其他 11 座汉城城门洞基本相似，约 8 米左右，这点同历史文献中可并行 4 车的记载是相符的。门洞不是我们常见的明西安城

¹⁰《周书·文帝纪下》云：大统四年(538年)，“大军之东伐也，关中留兵少，而前后所虏东魏士卒，皆流散在民间，乃谋为乱。及李虎等至长安，计无所出，乃与公卿魏太子出次渭北。关中大震恐，百姓相剽劫。于是沙苑所虏军人赵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据长安子城，伏德保咸阳，与太守慕容思庆各收降卒，以拒还师。长安大城民皆相率拒青雀，每日接战。魏帝留止闾乡，遣太祖讨之。”

¹¹《晋书·苻健载记》云：永和十年(354年)：“(桓)温率众四万趋长安……健遣其子苻率雄、菁等众五万距温于尧柳城愁思堆。温转战而前，次于灊上，苻等退营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固守长安小城，遣精锐三万为游军以距温”。

¹²《唐六典》卷二《户部尚书》载：“后周地官置宫门中士一人，下士一人。掌皇城五门之禁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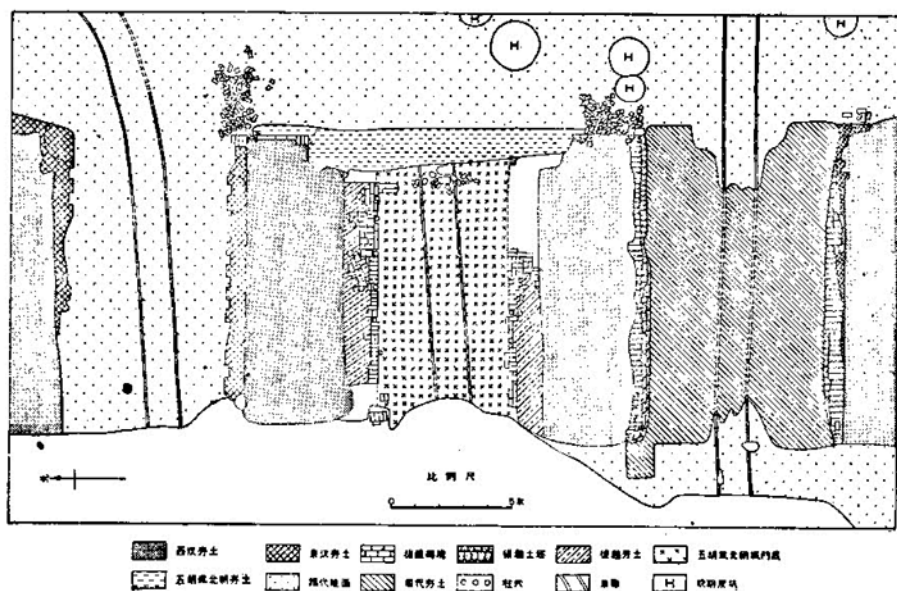
¹³史念海、史先智：《论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的小城、子城和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期。

¹⁴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

¹⁵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收获续记---宣平门的发掘》，《考古通讯》1958年第4期。

墙的那种券孔式门洞，而是在门洞两侧先铺石础，石础上立木柱，柱上设过梁，过梁上建门楼。西汉末年赤眉军毁长安城，宣平门也焚于烈火中，火势之大已将门洞两壁烧的红赤。因宣平门所处位置的重要性，东汉时期宣平门得以第一次修缮，修缮后门洞变窄，仅为6.5米左右。在发掘现场出土了大量印记砖，印文有“石安宋利”、“石安曹平”等，砖上所指“石安”即为后赵时期石勒在咸阳设立的石安县，这就说明宣平门在后赵时期也得以一次修缮。

关于宣平门的废弃时期，通过发掘应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中间门洞被封闭，照片中编号为“4”处，是一道宽1.7米的夯土墙，将中间门洞封闭，封闭的时间应该在北周至隋期间。其次是南北两侧门洞的封闭，应是在唐设立禁苑时期，随着唐禁苑的设立，整个汉长安城成为了园中园，宣平门因距太极宫最远，故被整个封闭，宣平门的千年使命得以结束。



图五

2003年4—7月,对楼阁台遗址进行了考古钻探。在汉长安城东北,宣平门以北,洛城门以东,发现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宫城遗址。宫城由东、西二小城组成,两个小城的时代相同(图六)。得出结论为:发现的两个小城应是自前赵以来,经前后秦、北朝直到隋初长安城的东、西宫城遗址,东宫为太子宫,西宫为皇宫。西宫内的楼阁台建筑遗址应是前后秦时期太极前殿、北周时期露(路)寝的旧址,而两阙之间或者就是露(路)门的所在¹⁶。随后,刘振东先生发表《西汉长安城的沿革与形制布局的变化》,根据考古发现,结合文献,复原了此时期宫城、都城的平面图,阐述了相同的观点,但同时又认为“魏晋时为旧宫新葺为主,长安城布局形制无大变化”。根据考古发现,总结出的这个观点是客观的,对以前的观点提出挑战。

2008年,在新发现的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宫城中间的城墙上发现一座宫门,为单门道排叉柱式,路土分为四期。“这次发掘完整地揭示出该时期长安宫城宫门的规模和建筑形式,为研究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建筑技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有助于研究这一时期长安城宫城的形制布局和沿革”¹⁷。

2008年5—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对直城门遗址进行全面发掘,认为其毁于王莽末年至东汉初年的战火。“东汉以后,中门道和南门道被废弃不用,北门道经过清理后继续使用,历经十六国、西魏、北周,直到隋朝初年兴建大兴城后才被废弃”¹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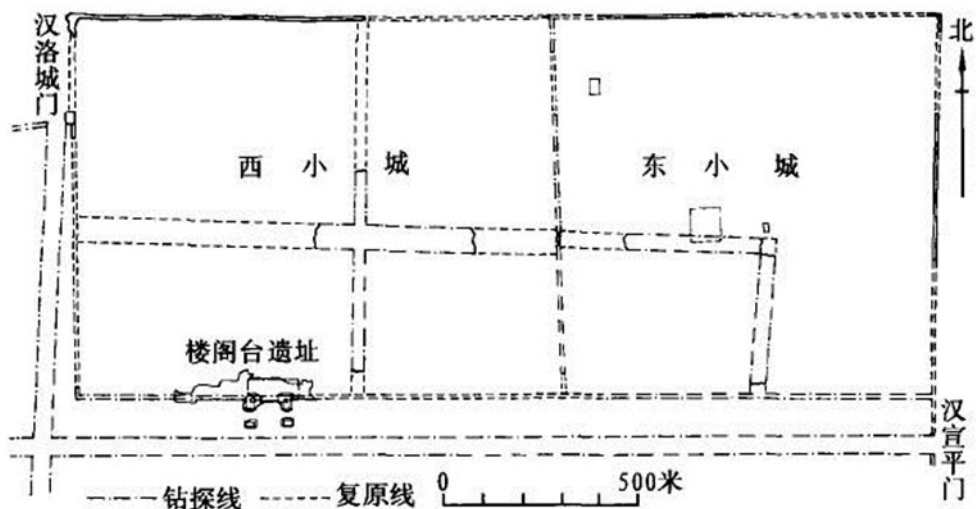
十六国北朝时期长安城的考古工作,取得显著的成果。对于了解此时期建都长安城的胡族政权的都城有很大帮助。尽管这些胡族采用了汉、秦、周三个与前代汉王朝相同的国号,他们企图通过相同的国号使其与前代汉王朝之间有文化上的继承关系,为其民族政权寻找一个合理存在的依据,以保证政权的正统性。都城选址在旧长安城,但宫城还是放弃汉未央宫,选址在都城东北部。这些现象与“十六国时期邺城(北城)和东魏、

¹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遗址的钻探与试掘》,《考古》2008年第9期。

¹⁷ 刘振东等:《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2号建筑(宫门)遗址发掘》,《200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¹⁸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汉长安城直城门遗址200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5期。

北齐新筑邺南城的宫城均位于城北的中部,曹魏、西晋、北魏洛阳城宫城位于城北略偏西部,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的宫城位于城的东北部,符合该时期宫城位于都城北部的规律。¹⁹”



图二 宫城遗址钻探平面图

隋唐时期的都城长安

在十六国北朝胡族统治者的不懈努力下,北方胡族政权的正统地位得到北方汉族的认可,北朝政权在北魏时期最终成为与南朝分庭抗礼的中原正朔王朝。北魏建都洛阳,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开启了隋唐历史的先河。

作为中世纪都城系统的集大成者,同时取得正统地位的胡族帝王,把“天地人”合一和帝王独尊中央集权与体现封建政治秩序等观念融入了都城的构

¹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遗址的钻探与试掘》,《考古》2008年第9期。

建。在城市规划上，极力强调天地人合一，君主至上，按已有的理念对都城进行整体设计，并有序地建筑。

建中立极，首先确定一个中心点，并沿这个中心点划出一条南北中轴线，宫城皇城居中轴线上，内朝中朝外朝由北向南依次排列，构成全城的核心，郭城围绕中心，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宫城、皇城、郭城环环相套，街区呈棋盘状，整体感十分突出。

公元 581 年，北周出身的隋文帝统一中国，建立隋政权。开皇二年（公元 582 年）因汉旧都“此城从汉，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之聚”，决心另外营建新都——大兴城（图七）。

隋唐长安城在继承了邺城制度、北魏洛阳等都城规划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都城制度。新的长安城由禁苑、宫城、皇城和郭城四部分组成。宫城是皇帝居住的地方，由太极宫、东宫、掖庭宫和太仓组成。皇城是官厅街。郭城是官员、平民百姓和商人居住的地区。新长安城的城市规划是把重点放在为政者的统治理念的视觉化方面，城市居民的生活机能是被放在第二位的。总而言之，长安是一座典型的前现代化城市，与首先考虑居民的存在现代化城市不同²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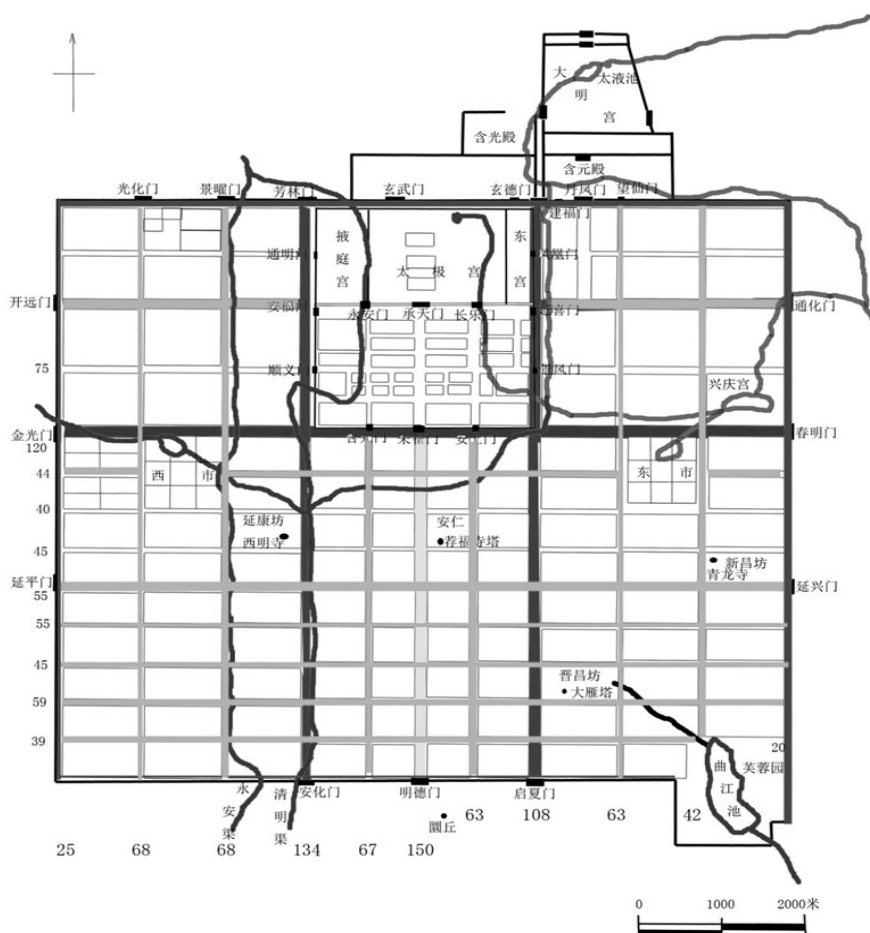
隋唐长安城，是基于一个显示皇帝居住的宫殿（太极殿）的中心性的城市规划建设起来的。位于长安中心的太极殿（隋的大兴殿）被设想成是一个与掌握宇宙中心的天帝所在地直通的场所。因此太极殿是这个世界上受天帝之命的唯一男性，成为天子——皇帝，作为天和地的中介，依照宇宙的运行法则展开政治活动的世界的中心。祭祀环绕着天帝的天上星座，以及太阳和月亮的祭坛（日坛、月坛）把长安城围在中间。在此意义上，长安是宇宙之都，是一座象征着普遍性的都城。长安以太极殿为起点，在南北延伸的中轴

²⁰ 妹尾达彦：《长安の都市计划》，谈讲社。

大街两旁，具有代表性的政治、经济、宗教设施呈格子状，对称地排列着，结构井井有条。

对于隋唐长安城的研究，从历史地理学和城市史学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唐宋地理学者对隋唐长安城的考察和记述。

隋唐长安城从6世纪末至10世纪初，经历了由封建帝都向前近代都市的演变。这个时期长安城对东亚的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律令制都城产生一定影响。隋唐长安城的空间格局的变化，是考古工作者所追求的目标。工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



以大明宫为例，利用考古资料，结合文献，对八世纪开始长安城的变化进行阐述。

在七世纪后半叶和八世纪前半叶，相继建成了新的宫殿（大明宫、兴庆宫）。在这种形势的直接影响下，进入八、九世纪后，根据宇宙论制定的城市规划开始被抛弃，特别是随着科举制度扎根，阶层出现流动，社会出现动荡，排外的传统思想开始抬头，来自中国外部的佛教等外来宗教逐步成为被排挤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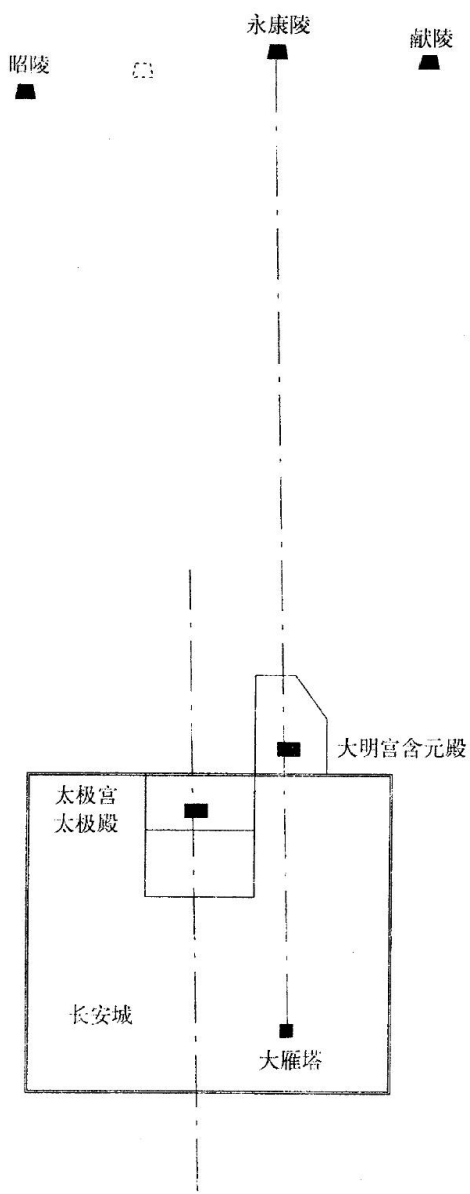
高宗于龙朔三年四月“幸蓬莱宫新起含元殿”高宗开始在大明宫听政和居住。此时唐代中央政治活动核心开始从太极宫移向大明宫。

肃宗时代，大明宫才固定成为唐代中央政治活动的中心。大明宫成为唐帝国君主居住和中央政治活动的主要空间，相对于“西内”太极宫，称“东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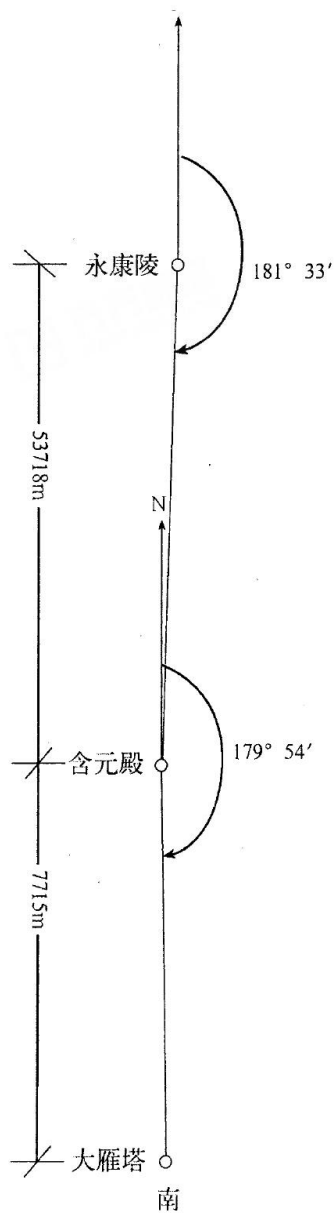
整体布局，大明宫的南北中轴线：丹凤门—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并以此为中心，形成外朝、中朝、内朝三个空间。中轴线上的三座宫殿是唐代皇帝与官员进行国家政治、礼仪等活动的主要场所。考古发现，整个宫城以三道宫墙为隔离，分为前、中、内三个空间，形成不同的政治活动场所（图八、九）。

大明宫东西宽三里，南北长五里；吕大防图（题记）、李好文长安志图是东西广二里一四八步，南北长为四里九十五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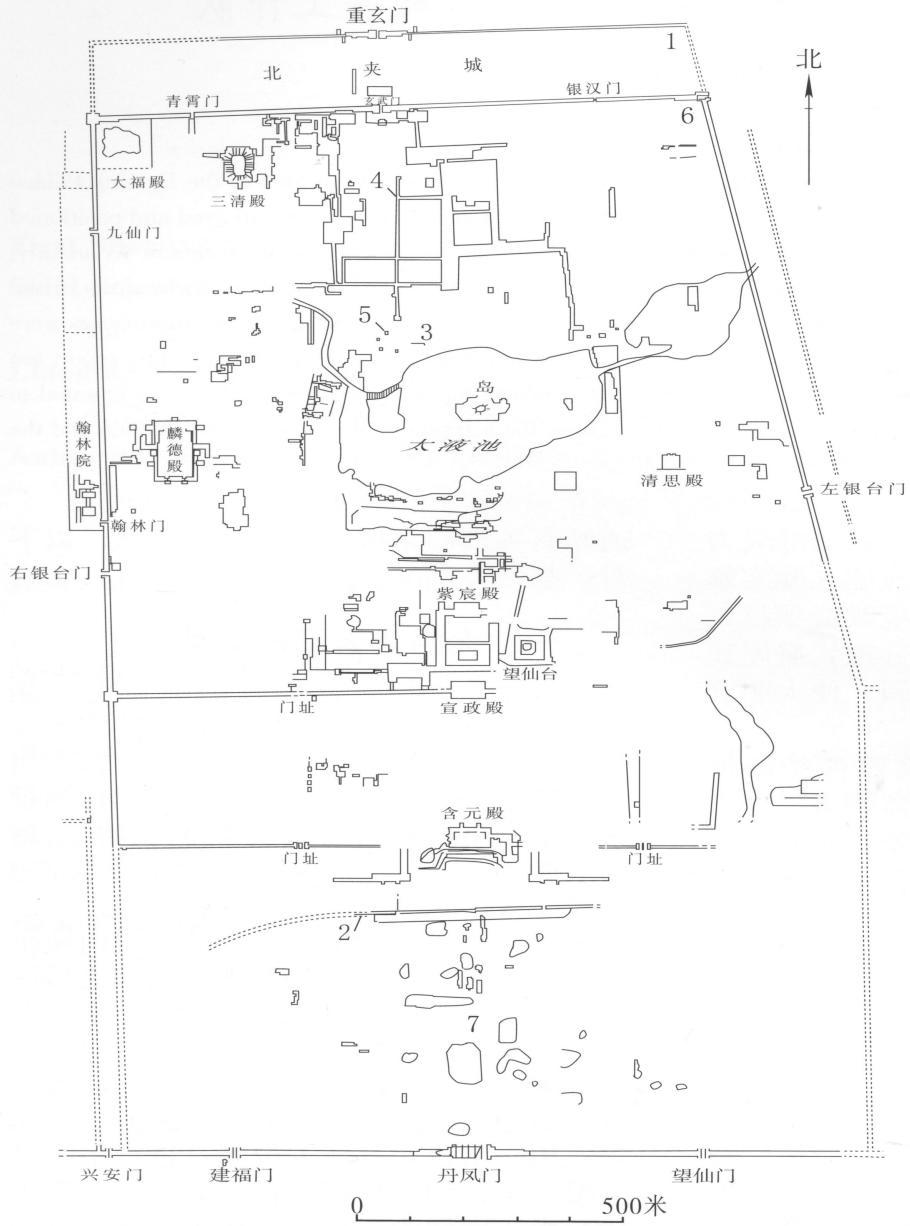
据发掘实测，西城墙实测长 2256 米，以每步 1.47 米、每里 360 步（唐大程里）计算，一里应是 529.2 米，比五里少 390 米。南北五里之说不符，四里九十五步的记载相近。



图一 永康陵、含元殿、大雁塔对应关系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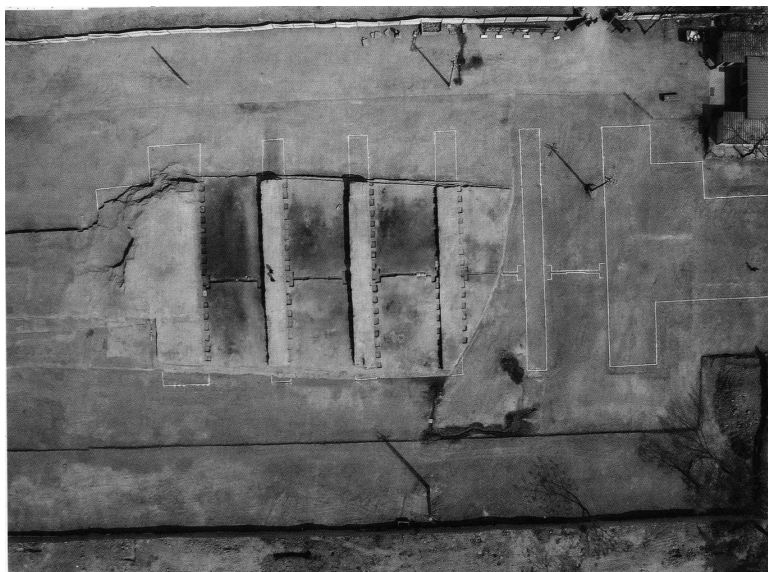


图二 永康陵—含元殿—大雁塔
中轴线空间关系图



图一 2007~2011年唐大明宫遗址考古平面图

- 1.夹城东北角 2.龙首渠西延部分 3.太液池北过水涵洞 4.玄武门南过水涵洞
- 5.出土封泥的灰坑 6.宫城东北角基址 7.御道路土面



丹凤门位置在南城的中部，与大明宫的正殿“含元殿”南北对照，相距 610 米，西距宫城的西南角 650 米(以门中算起)，距东内苑东墙约 1100 米。丹凤门门址是用黄土夯筑而成，由东、西墩台和 5 个门道、4 道隔墙，以及东、西两侧的城墙和慢道组成。整个门址基座东西长 74.5 米、南北宽 33 米、保存高度为 2 米，唐代地面以下的基槽深 2.2 米。五个门道的形状尺寸相同，净宽皆为 8.5 米。《西安市唐长安城大明宫丹凤门遗址的发掘》，考古，2006 年 7 期（图十）

图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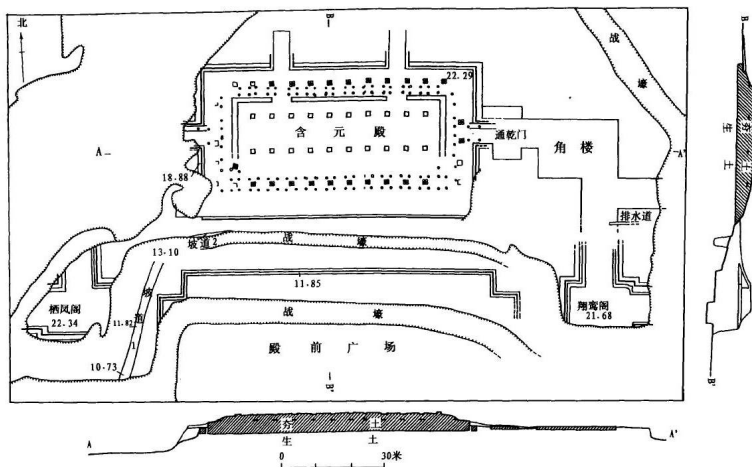
含元殿的形态

含元殿为大明宫的正殿，在丹凤门北 600 米。初建于龙朔二年(公元“2 年)，竣工于龙朔三年四月。唐李华《含元殿赋》将殿名的寓意解释得很清楚：“含元建名，易乾坤之说，日：含宏光大，又日：元亨利贞，括万象以为尊”。长安元年十二月(公元 702 年)曾改称大明殿，神龙元年(公元 705 年)复称含元

殿。含元殿是皇帝举行外朝大典的场所，特别是大唐开元礼颁行后，元正、冬至的大朝会多在此举行。改元、大赦、册封、受贡等重要活动亦多在此殿举行。

“丹凤门内正段，曰‘含元殿’。（注：殿即龙首山之东趾也，阶上高于平四十余尺，南去丹凤门四百余步，东西广五百步。殿前玉阶三级，每级引出一螭头；其下为龙尾道，委蛇屈曲凡七转。今元正、冬至于此听朝也。）夹段两阁：左曰‘翔鸾阁’；右曰‘栖凤阁’。（注：与殿飞廊相接。夹殿东有通乾门，西有观象门。阁下即朝堂、肺石、登闻鼓，如‘承天’之制。）”

考古发掘表明，含元殿为一层次分明的建筑群，通过位置高低和中偏来表现主次关系，主要包括殿堂、两阁、飞廊、殿前广场等。



图五 含元殿遗迹平、剖面图

唐代中期，皇帝居住的主要宫殿从原来的太极宫迁到了东北部的大明宫。

延英殿的位置及其对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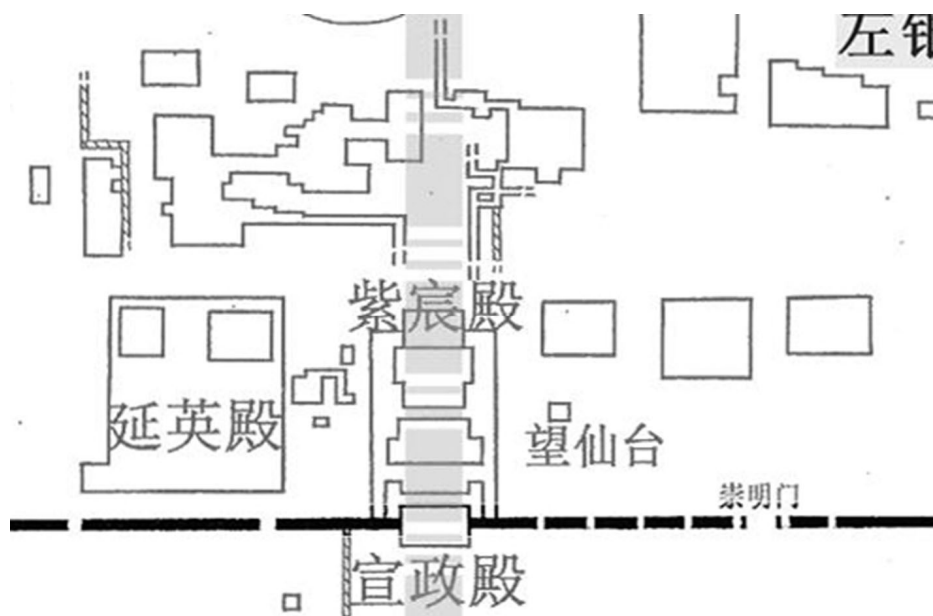
文献记载从中唐开始，帝王把听政场所从外朝及中朝逐渐向日常居住的内廷转移。这不仅是地理位置的变换，同时也体现了其政策与政治意图的变

化。大明宫内廷中轴线以外的宫殿增加，特别是紫宸殿西侧，这包括延英殿、麟德殿，在唐代后期政治生活中作用重大。

延英殿，是皇帝召对宰相及重要官员讲议政事，并对一些军国大事做出决策的地方，产生在唐代代宗大历以后。延英殿在大明宫中的政治功能极为重要，主要是为了提高皇帝决策的效能，保持重大决策的秘密性

延英殿是大明宫一处重要的建筑物，位于紫宸殿延西南。其功能除了作为“延英召对”的场所外，还有群臣向皇帝问起居、延英奉觞、延英奉慰、延英中谢、召见官员、面授官职、召见外来使者、举办宴乐等许多功能。在唐后期延英殿在大明宫中的重要性，不仅超过了其他殿阁，也超过含元、宣政、紫宸等三大殿，在唐代的政治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反映了帝王听政活动在空间上的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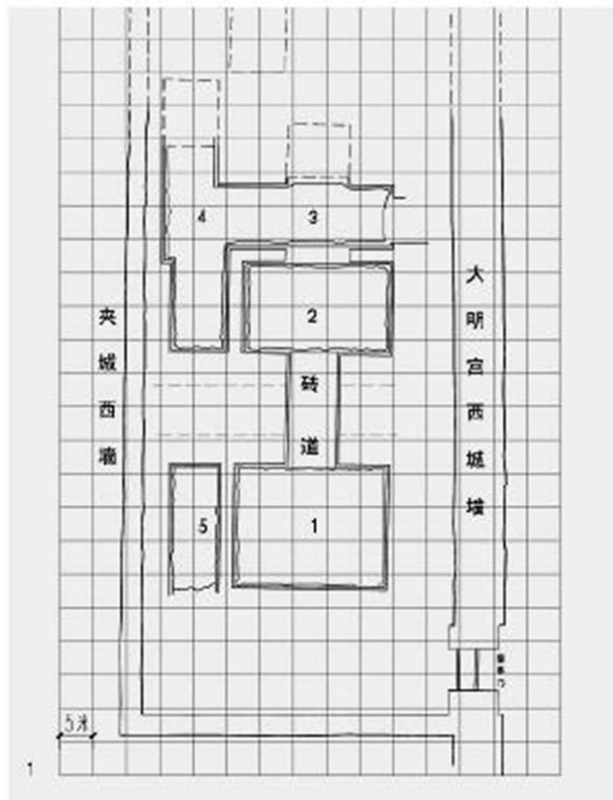
最早记载延英殿在紫宸殿之西的文献。《大唐六典》卷7《工部尚书》条云：“宣政之左曰东上阁，右曰西上阁，次西曰延英门，其内之左曰延英殿，右曰含象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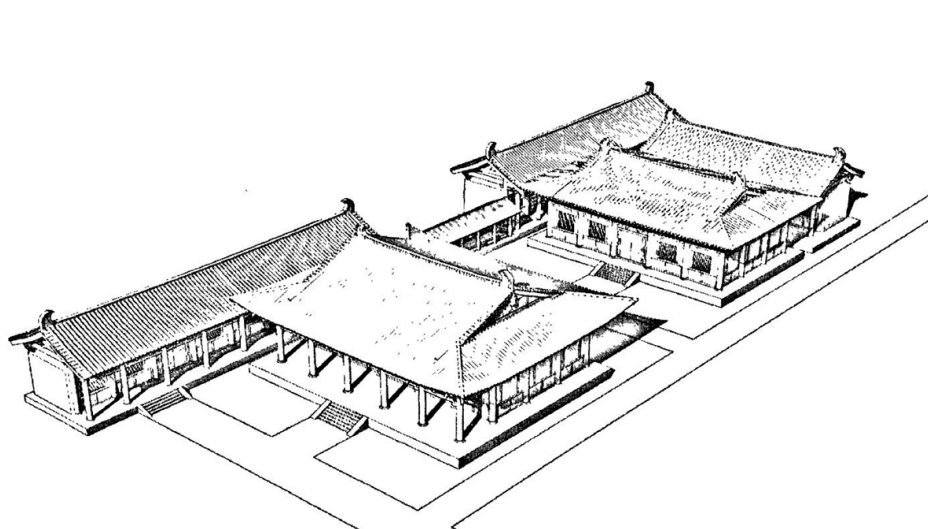
翰林院的位置及影响

翰林待诏的职掌是掌表疏批答与应和文章,为文学侍从之臣“翰林院者,,盖天下以艺能技术见召者之所处也。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以后,另建学士院,改翰林供奉为翰林学士,专章内命“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由是别建学士院,律掌内制“安史之乱以后,旧的中书机构遭到严重破坏,政事堂议政制度此时已失去决策意义”在外朝宰相机构遭到巨大破坏的情况下,内朝事权迅速发展“翰林学士因草诏之事渐多,其政治地位已超过中书舍人”在德宗时,翰林院置书诏印,正式确立了翰林学士的草诏权“翰林学士,待直禁廷,专司制诰,甚至参议机密”此后,由于翰林学士日益重要,与皇帝关系十分密切,除起草诏救之外,并参与了核心决策,与外朝的宰相渐有分庭抗礼之势。



7-3 翰林院整体鸟瞰图



八世纪中叶以后，大明宫取代太极宫成为新的政治舞台，伴随着唐长安城的政治宇宙之都逐渐被消解，萌发了“唐宋变革”的兆头。居民、市场也随着这场变革而发生变化，长安政治地位消失后，这种变革就完成了，宋代开始了新的近代都市空间。

殷墟 도읍의 구조

— 최근의 고고학적 조사 성과를 통해 본 —

김정열(숭실대 사학과) / 岳洪彬(中國社會科學院 考古研究所)

머리말

‘殷墟’는 商 왕조 후기의 도읍으로, 河南省 북부에 위치한 安陽市 일원에 위치한 다. 『史記』 項羽本紀와 『水經注』에 은허가 洹河의 남쪽에 위치한다는 기록이 있는 것을 보면, 漢代 이후 상당한 시간까지도 지상에 도시의 흔적이 남아있었다고 생각되나, 은허 유적이 실제로 확인된 것은 20세기 이후의 일이었다. 王懿榮에 의해 甲骨文이 발견되고 그것이 상 후기의 유물임이 확인된 다음, 갑골의 출토 지점을 추적하는 과정에서 비로소 현재의 위치에서 은허가 확인되었다.

『古本竹書紀年』에 따르면 상 왕조의 제19대 군주인 盤庚이 殷에 천도한 이후 마지막 군주인 帝辛 때에 왕조가 멸망하게 되는 273년간 은허는 줄곧 상왕조의 도읍이었다. 여기에 전하는 구체적인 시간 폭에 대해서는 상이한 의견이 있지만, 은허 발굴이 본격적으로 시작된 1928년 이래 최근까지 약 80여 년간 꾸준히 이루어진 발굴조사의 성과는 그 기록의 신빙성을 입증하는 것으로 생각된다.

은허는 고대 왕조인 상의 都邑으로서, 당시로서는 중원 일대의 최대 규모 도시였음에 분명하다. 은허가 어떤 구조적 특징을 가지고 있었는지에 대한 물음은 중국 고대 도시의 공간 구조를 이해하는 데에도 유용하겠지만, 이를 넘어 중국 고대 국가의 정치적, 사회적 구조와 그 기능의 양상을 이해하는 데도 적잖이 기여할 것이 분명하다. 그러나 이에 대한 인식은, 그것이 주로 물질문화의 연구에 의존할 수밖에 없는 상황에서, 유적 발굴조사의 성과에 크게 영향 받지 않을 수 없다. 때문에 은허의 구조에 대한 이해의 정도는 유적 조사의 진전에 따라 변화를 겪게 된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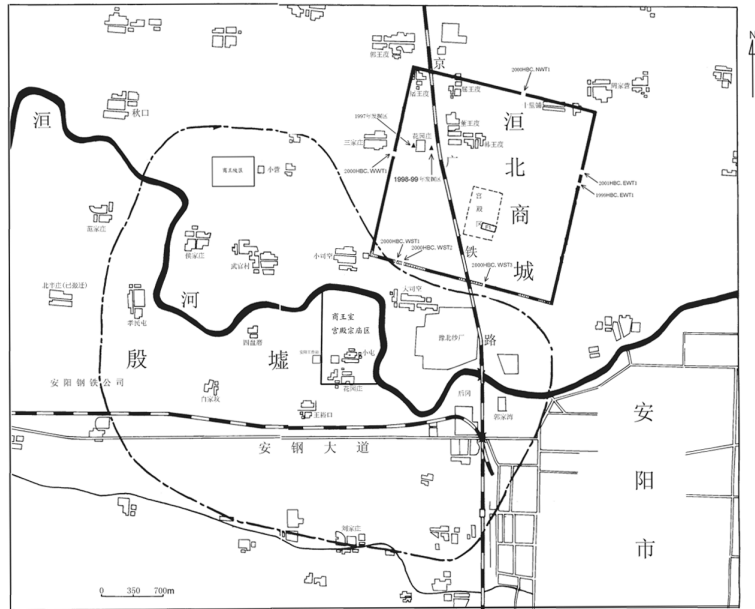
이 문제에 대한 연구가 1990년대 이후에 들어서야 본격적으로 시작된 것은 그와 같은 상황에 말미암은 것이다. 2000년대에 들어 은허를 세계문화유산으로 등재하기 위해 유적 정비가 적극 추진되었고 은허의 서쪽에 위치한 安陽鐵鋼이 경기 활황에

힘입어 공장 부지를 확대해 가면서 유적에 대한 발굴조사도 크게 진척을 보았다. 이에 따라 은허의 도시 구조에 대한 이해가 보다 심화될 수 있는 길이 열리게 되었다. 이 글은 바로 은허에서 획득된 근년의 고고학적 조사 자료를 토대로 은허의 도시 구조를 해명하기 위한 목적에서 작성된 것이다.

1. 은허의 최신 발견

가. 洹北商城

洹北商城은 安陽市の 北郊, 은허 유적의 동북 외곽 일원에 위치한다.[도면1] 유적은 남으로 洹河에 인접해 있고 북으로는 낮은 구릉지대가 이어지는 평원 상에 입지한다. 1999년 발견된 이래 모두 다섯 차례에 걸쳐 조사가 진행되었으며, 이를 통해 지금은 환북상성의 구조와 성내의 유적 배치 상황에 대해 그 대강을 이해할 수 있게 되었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 2003a·b·c; 同 2010)



[도면 1] 洹北商城과 殷墟 유적 평면배치도

환북상성의 평면 형태는 대체로 정방형이며, 방향은 13도이다. 평면 규모는 남북 2200m, 동서 2150m로 총 면적이 4.7km²에 달한다. ‘환북상성’이라는 유적 명칭이 의

미하는 바는 그 유구가 성곽이라는 뜻이지만, 이 유구는 일반적인 토축 성곽과 현격한 차이가 있다. 모두 일곱 지점에서 진행된 단면 조사에 의하면 첫째, 환복상성에서는 기초 도랑[基槽] 外周에서 호성하가 발견되지 않았다. 호성하는 성곽의 외연에서 성의 방어 기능을 제고하는 효용 이외에 城體를 쌓아올릴 때 필요한 흙을 채취하는 取土源이 되기 때문에 대부분의 토축 성곽에 수반된다. 둘째, 환복상성에서는 지상의 성벽이 확인되지 않을 뿐만 아니라 폭 7-11m, 깊이 4m 가량에 달하는 기초 도랑 내부가 판축토로 메워져 있지 않고, 심지어 일부 구간에서는 진흙이 관찰된다. 때문에 환복상성은 그 초기 단계에 사주에 호성하가 있었을 뿐이고, 성벽은 후기 단계에 비로소 수축되기 시작되었다고 판단된다. 그러나 이후 환복상성은 알 수 없는 이유로 인해 완성되기 못한 상태에서 폐기되었다.(鄭振香 2002; 岳洪彬 등 2011)

환복상성이 포괄하는 범위 내에는 대형 판축기단, 주거지, 묘장 등이 산포되어 있다. 판축기단은 성의 중축선 偏南, 동서 약 200m, 남북 500m 범위에서 지금까지 대략 30여 기가 발견되었다. 모두 건물지로 추정되며, 그 평면구조는 一字形도 있고 回字形도 있다. 이들 기단 사이에는 상호간에 중복현상이 발견되지 않고, 방향도 성벽의 방향인 13°와 대체로 일치한다. 게다가 대체로 규모가 크고¹⁾ 양질의 흙으로 판축하였을 뿐만 아니라 유구에서 발견된 주춧돌의 직경도 0.35m이상이어서 적잖은 규모의 지상 건물이 세워졌음을 짐작하게 한다. 예컨대 1호 기단은, 그 동부 약 1/3이 아직 발굴되지 않았으나, 동서 173m, 남북 85-91.5m의 평면 크기로, 지금까지 발견된 商代 건물 가운데 최대 규모이다. 회자형 건물지로, 중앙의 정원을 둘러싸고 북으로 主殿, 서로는 西配殿, 남으로는 門塾과 南廡가 배치되어 있고, 동쪽에도 역시 西配殿과 대칭을 이루는 東配殿이 있었을 것으로 추정된다.

城內에는 그밖에도 다수의 주거지가 분포되어 있다. 여러 차례에 걸친 보링 조사[鑽探]의 결과에 따르면, 성내 서북부와 북부, 그리고 동부 일대에는 주거지가 밀집된 지역이 확인되었다. 주거지의 크기는 다양하며, 그 가운데는 평면 300m²의 규모에 달하는 대형 건물도 포함되어 있다. 주거지가 밀집 분포되어 있는 지역은 취락으로 추정되며, 취락과 취락 사이에는 상대적으로 유물이 잘 발견되지 않는 공지가 있고,

1) 판축기단의 평면 형태를 알 수 있는 것은 1호와 2호 건물지로 모두 回字形이다. 이 양자를 제외하고는 아직 그 평면 형태를 확인할 수 없지만, 대부분 판축기단군의 동쪽을 관통하는 안양항공운동학교 비행장 위구의 단면을 통해서 그 규모를 짐작할 수 있다. 이들 판축기단 가운데 적어도 2기는 그 남북 폭이 19m를 넘고, 1곳은 14m에 가까우며, 7곳은 8-12m 사이, 10곳은 5m 전후이다.

공지에서는 취락과 취락을 연결하는 도로가 관찰된다. 또 약간의 공지에서는 취락에서 독립하여 단독으로 존재하는 판축기단이 발견되는 경우도 있다. 취락 주변에서는 墓葬도 왕왕 발견되며, 이것은 인근 취락 거주민이 매장된 묘지의 일부일 것으로 추정된다.

洹北商城의 건설시점에 대해서는 특히 殷墟와의 상호연관성과 관련하여 학계의 관심이 상당하였다. 성벽과 대형 건물이 구축된 시기는 二里崗文化期보다 늦고 殷墟文化期보다 빠른 이른바 中商文化期²⁾에 해당한다. 즉 환북상성은 지금까지 은허에서 확인된 대부분의 유적보다 이른 시기에 건조된 것이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2003) 城內의 1호 건물이 건설된 것은 中商文化 제2기 경이며, 성곽의 축조 개시기는 대체로 中商文化 제3기로 판단되어 1호 건물보다 약간 늦다. 금후의 추가조사를 기대해야 하겠지만, 현재까지의 자료로는 먼저 상당수의 건물들이 이곳에 세워지고 난 다음 그 주위에 성벽이 건설되기 시작하였을 가능성이 높다. 위에서 언급한 것처럼, 환북상성은 성벽이 건설되는 도중에 폐기되었는데, 그 시점은 殷墟文化期 이전이다.

문헌기록에 의하면 은허로 천도한 군주는 상왕조의 제19대 군주인 盤庚이다. 그러나 이전까지의 고고학적 조사 결과에 의하면 은허 유적이 본격적으로 건설되기 시작한 은허문화³⁾ 제1기는 제22대 군주인 武丁 때에 해당된다. 그러므로 상 왕실의 遷殷은 반경이 아니라 무정 때의 사건이라 인식하는 견해가 존재했다.(楊錫璋 1981; 彭金章·曉田 1988) 그러나 거대한 규모의 환북상성이 발견되고, 그 연대는 은허문화 제

- 2) 傳統的인 商代문화의 考古學的 文化編年은 前期, 즉 二里崗文化期和 後期, 즉 殷墟文化期로 구성되었다. 그러나 이 兩大期の 문화 면모에는 사실 상당한 차이점도 존재하였기 때문에, 그 間隙을 매우려는 논의가 있어 왔다. 최근에 唐際根은 이 이를테면 중간 계단을 ‘中商文化’로 명명하고, 3기의 文化編年을 시도하였다(당제근 1999). 그는 기존의 二里崗上層文化 2期(즉 白家莊期)를 二里崗文化에서 독립시켜 中商文化 1기라 하고, 河南 安陽 花園莊의 前期 유적과 河北 藁城 臺西村 前期 墓葬에서 발견된 문화적 특징을 개괄하여 中商文化 2기로, 花園莊의 後期 유적과 臺西村의 後期 住居址 및 後期 墓葬을 中商文化 3기라 하였다.
- 3) 80여 년에 걸친 야외 조사, 발굴과 연구에 입각하여 은허문화는 연속되는 4개의 시기로 구분한다. 즉 은허문화 제1기~은허문화 제4기가 그것이다. 은허문화 제1기와 제2기를 은허 전기, 제3기와 제4기를 은허 후기로 칭하는 학연구자도 있으며, 근래에는 고고학적 발굴 자료의 지속적인 증가를 토대로 제1기를 전기와 후기 등 두 단계로 나누기도 한다. 은허문화의 고고학적 분기와 상 왕실 세계 사이의 상관관계를 정리하면 아래의 표와 같다.

은허문화	洹北商城期			제1기	제2기		제3기			제4기			
상왕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전기 후기		祖庚	祖甲	廩辛	康丁	武乙	文丁	帝乙	帝辛
갑골문	제1기			제2기		제3기		제4기		제5기			
절대연대	1300BC											1046BC	

1기보다 선행하는 것이 확인됨으로써 문헌이 전하는 반경의 천은은 사실일 가능성이 높아지게 되었다. 천은의 최초 지점은 현재 安陽市 북교의 환북상성 일원에 해당될 것이다.

나. 宮殿, 宗廟 구역

1928년부터 1937년까지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考古組는 은허에서 15차례의 발굴을 시행하였다. 이 가운데 12차례는 小屯村 일대에 집중되었다. 이를 통해 소둔촌 동북 지역 일원에서 대규모 궁전·종묘 유적을 발견하였으며, 여기에서는 2만 4918편의 갑골을 포함한 진귀한 유물도 다량 출토되었다. 궁전·종묘 구역은 환하남안, 환하가 굽이치는 곳에 위치한다. 북쪽과 동쪽은 환하에 잇닿아 있으며 그 서남쪽 약 200m 지점에 소둔촌이 위치한다. 궁전·종묘유적은 일대의 제고점에 입지하는데, 그 해발고도는 약 78~79m, 평면 면적은 약 70만㎡에 달한다.[도면2] 1950년대 이래 중국사회과학원 고고연구소는 이 궁전·종묘 구역에서 총 19차례 걸쳐는 추가발굴을 진행하였다.(岳洪彬 등 2006) 1976년에 발굴된 저명한 婦好墓도 곧 이 궁전·종묘 구역 내에 위치한다.



[도면 2] 은허 궁전·종묘 구역 개념도

1) 방어시설

1958년 궁전·종묘 구역의 서쪽에서 대형 붓도랑[大灰溝]이 발견되었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87). 당시에는 소둔촌 중심에서 서쪽으로 약 200m 떨어진 지점에서, 남북 방향으로 뻗은 약 800m 가량이 확인되었으며, 그 북단은 환하까지 이어졌다. 1986년 속개된 조사를 통해 이 남북향의 붓도랑은 더 남쪽으로 진행하다가 화원장촌에 이르러 동쪽으로 꺾여 동진하고, 그 동단은 환하와 연결되는 것이 확인되었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94) 그 결과 이 붓도랑의 길이는 남북 약 1100m, 동서 약 650m이며, 그 폭은 좁은 곳이 7m, 넓은 곳이 21m에 달하는 것이 최종 확인되었다.[도면2]

이 붓도랑은 마치 궁전·종묘 구역의 서, 남 양면을 에워싸는 형상이며 그 양단은 환하와 연결되어 환하의 물이 붓도랑으로 들어오도록 설계되었다. 궁전·종묘 구역의 동, 북 양면은 원래 환하가 진행하면서 에워싸는 부분이기 때문에, 전체적으로 보면 붓도랑과 환하가 소둔촌의 궁전·종묘 구역의 四周를 둘러싸게 되고, 따라서 소둔촌·화원장촌 일대의 구역은 사면이 물로 완벽하게 봉쇄된 지역을 형성하게 된다. 즉 은허의 궁전·종묘 구역은 사방이 폐쇄된 지역 안에 안전하게 위치하게 되는 셈이다 이와 같은 양상에 입각하여, 이 붓도랑은 인공적으로 개착된 궁전·종묘 구역의 방어시설로 추정되었으며, 이 범위 이내가 바로 은허 상대 도읍의 핵심 지역, 즉 궁전·종묘구역으로 인식되고 있다(楊錫璋·劉一曼 2004; 鄭振香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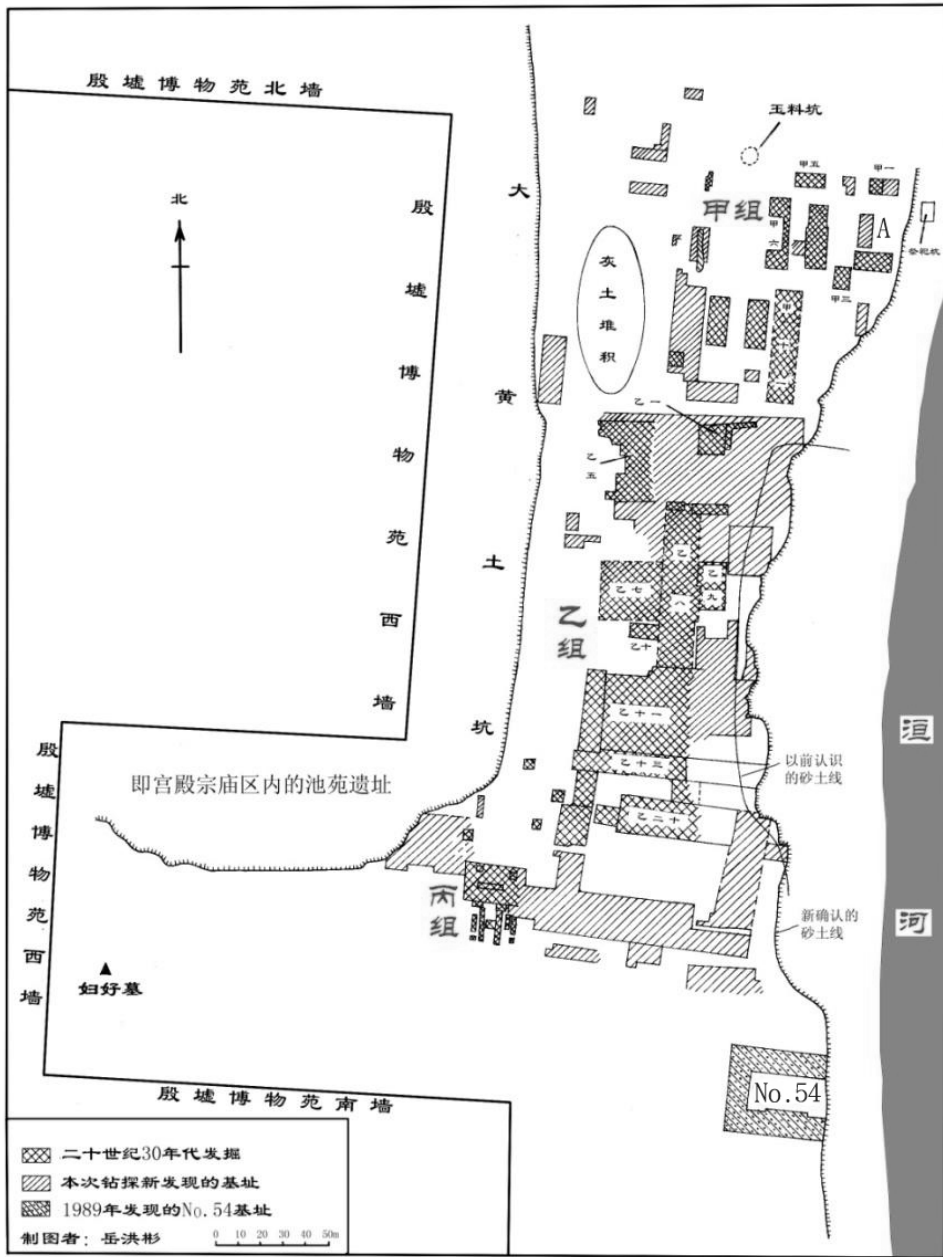
다만 일찍이 이 붓도랑이 처음 발견되었을 그 퇴적토 내부에서 모두 은허문화 제2기의 묘장 1기를 포함한 22기의 無墓壙墓와 3기의 祭祀坑이 확인된 바 있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87; 鄭振香 2011), 2004년 小屯南路 일대의 조사 때는 이 붓도랑의 경로와 직교하는 지점에서 장시간에 걸쳐 형성된 동서 폭 60m 이상의 대형 회토 퇴적이 발견되기도 하였다. 이 후자의 퇴적토 내부에서도 소형 묘장과 묘광이 없이 무질서하게 방치된 인골이 조사되었다.(岳洪彬 등 2006) 한편, 붓도랑의 일부 구간에서는 공들여 조영된 부대시설의 흔적이 관찰된 사례도 있다. 이를테면 소둔촌 서쪽에서 확인된 붓도랑의 남북향 구간 동벽 경사면 일부에서 직경 약 10cm 가량의 강돌로 경사면을 포장한 보호시설이 시설되었으며(岳洪彬 등 2006), 같은 구간의 다른 일부에서는 붓도랑의 동쪽 경계에 평행하여 강돌과 토기로 포장한 도로시설도 발견되었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94) 이런 부대시설은 일반적인 붓도랑의 경우라면 볼 수 없는 비교적 특수한 장치로 생각된다.

위와 같은 현상은, 이 붓도랑이 은허문화 제2기경까지 방어시설로 사용되다가 후에 그 일부는 제사장으로 사용되면서 점차 평지로 변모하고, 그 중의 일부 구간은 소형 연못으로 그 용도가 변경되었음을 시사한다. 이것은 궁전·종묘구역은 은허문화 제2기를 거치면서 점차 붓도랑 구역 밖까지 팽창하여 갔을 가능성을 제기한다. 1958년 중국사회과학원 고고연구소 安陽工作站 건설 당시, 붓도랑 서쪽에 인접한 부지 내에서 8명이 매장된 奠基坑과 강돌로 포장된 도로를 갖춘 지상건물의 판축기단이 확인된 것이나, 2004년에도 동일 구역에서 대형 판축기단이 발견된 것은 이 궁전·종묘구역의 팽창과 관련이 있을 것이다.(岳洪彬 등 2006)

2) 궁전·종묘 건물[도면3]

1994년 발간된 은허 유적의 총괄 정리에서 소둔촌의 궁전·종묘 구역 내에서 총 53기의 판축 건물기단과 세밀하고 꼼꼼하게 설계된 배수시설, 그리고 그 주변으로 다수의 무덤과 제사갱, 저장갱 등이 발견되었다고 보고되었으며, 이 53기의 건물기단은 그 분포 지역과 건물 구조의 연계성을 고려할 때 3개의 그룹, 즉 甲組, 乙組, 丙組로 구별된다고 인식되었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94).

이 가운데 갑조는 궁전·종묘 구역의 최북단에 위치한다. 남북 약 100m, 동서 약 90m의 구역 내에서 모두 15기의 판축 건물기단이 발견되었다. 기단 주변에서는 특히 우물, 생활폐기물 퇴적 등이 확인되었으므로 갑조는 주거용의 침전 유구로 추정되었다. 을조는 갑조의 남쪽에 위치한다. 그 범위는 남북 약 200m, 동서 약 100m이며, 모두 21기의 기단이 확인되었다. 이 가운데 규모가 가장 큰 것은 乙8 기단이다. 이 기단은 남북향의 장방형으로 평면 규모는 남북 약 85m, 동서 약 14.5m이다. 을조 기단의 판축토와 그 주변에서는 다량의 제사 유존과 중·소형 묘장 등이 발견되는데, 이것에 근거하여 을조 기단은 상 왕실 종묘건물군의 흔적으로 추정되었다. 병조는 을조의 서남쪽에 위치한다. 을조와 병조 양자간의 거리는 매우 가까워 일부 지역에서는 양자가 연결되는 경우도 있다. 병조의 규모는 갑조와 을조의 그것보다 작아, 남북 약 50m, 동서 약 35m의 범위 내에서 모두 17기의 판축기단이 발굴되었다. 병조에 배치된 건물은 그 개별 규모가 비교적 작다. 丙1 기단은 병조 가운데 규모가 가장 큰 사례인데, 평면 방향으로 남북 17m, 동서 20m의 크기이다. 병조 기단의 크기가 비교적 작고 판축토 가운데서도 다량의 제사 유존이 정리되었으므로, 이 기단군은 왕실의 祭壇址인 것으로 추정되었다.



[도면 3] 궁전·종묘 구역 판축기단 분포도

즉 궁전·종묘 구역은 갑조의 침전, 을조의 종묘, 병조의 제단으로 구성되었으며, 따라서 이 구역은 왕실에 속한 생활과 제의의 복합공간이라고 인식되어 왔다. 이들 가운데 갑조와 을조는 은허문화 제1기부터, 병조는 은허문화 제2기부터 건설되기 시

작하였으며, 어느 경우에도 은허문화 제4기에 이르러 폐기되었다. 대체로 보아 은허가 왕조의 도움으로서 기능하는 기간 내내 존속한 유적이다.

그런데 최근의 조사를 통해 궁전·종묘 구역에 대한 기존의 이해에 다소의 수정이 불가피한 현상이 관찰되었다.

우선 2004년부터 2005년까지 진행된 궁전·종묘 구역 내부의 전면 재조사 성과를 통해 기존의 53기 이외에 상당수의 새로운 기단이 확인되었다.(岳洪彬 등 2011), 이 가운데는 예컨대 제54호 기단군처럼 이전에 알지 못했던 것도 포함되어 있다. 제54호 기단군은 을조 건물기단군의 동남쪽에 약 40m의 거리를 두고 있다. 북, 서, 남에 배치된 3기의 판축기단이 하나로 연결되어 전체적으로 ‘凹’자형을 이루며, 총면적은 5000㎡가량이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2010) 그밖에도 기존에 인식된 판축기단의 평면 형태가 상당수 수정되어야 하며, 이를 통해 단독 건물로 인식되어 오던 것이 새롭게 확인된 판축기단과 함께 일군의 조합으로 이해되어야 하는 경우가 많다는 점도 확인되었다. 이를테면 갑조 기단의 甲1, 甲3은 새롭게 확인된 ‘A’기단과 함께 ‘ㄷ’자형의 평면 구조를 가지는 하나의 건물군일 가능성이 제기된 것이 그 하나의 사례이다.(岳洪彬 등 2013)

뿐만 아니라 궁전·종묘 구역의 성격에 대한 재평가를 시도할 수 있는 일련의 현상이 확인된 것은 특히 주목할 만하다. 이 구역의 초기 발굴 단계에서 甲2, 甲3, 甲4, 甲6 등 기단의 판축토와 그 주변의 저장갱에서 상당량의 銅渣와 銅鏽가 발견되고 乙5 기단 부근의 저장갱에서 2506점, 판축토에서 334점 그리고 기단 상부의 저장갱에서 512점에 거푸집이 출토된 사실이 주목된 바 있다.(石璋如 1959) 乙5 기단은 을조의 최북단에 위치하여 갑조에 인접해 있다. 그리고 2004년 진행된 구역 내부 조사에서는 갑5 기단의 서쪽에서 평면 면적 약 20㎡의 玉·石料 저장갱이 확인되었으며, 2005년에는 갑 13기단의 서쪽에서 270여 점에 달하는 骨·角料와 磨石이 출토되었고, 역시 갑조 서쪽에 위치한 2005AXT3J1에서는 燒成 과정에서 실패한 점토질의 灰陶罐 1점이 출토되었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 2009) 후자는 갑조 기단군 부근에 토기 제작 공방이 위치하였을 가능성을 시사한다.(岳洪彬 등 2013)

이상의 현상을 볼 때, 갑조 기단과 그 인근에는 鑄銅, 製石, 製玉, 製骨角 등의 공방이 분포하고 어쩌면 製陶 공방이 자리하였을 가능성이 있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갑조 기단이 궁전·종묘 구역의 최북단에 위치하고, 그 북쪽과 동쪽으로 환하에 인접하여 있으므로 이 구역은 수공업 공방을 설치하기에 적합한 환경을 가지고 있다. 따

라서 갑조 기단은 기존의 이해와는 달리 수공업 공방이 집중된 생산 구역으로 기능하였다고 판단할 수 있다.

3) 연못[池苑] 유적

2004년 진행된 궁전·종묘구역의 보링 조사를 통해 갑조와 을조 건물군의 서쪽, 병조 건물군의 서북쪽에서 대형 진흙 구덩이가 발견되었다.[도면2] 구덩이의 형태는東西長의 타원형으로, 평면 면적은 약 4만 5000㎡에 달하며, 가장 깊은 곳은 그 깊이가 13m 이상에 달한다. 이 구덩이는 동북 방향으로 물길을 형성하여 환하의 남안으로 연결되도록 설계되었다. 구덩이와 연결된 물길에서는 2기의 戰國時代 묘장이 조사되어 전국시대 이전에 그 기능을 상실한 것으로 보이지만, 물길을 포함한 구덩이는 일찍이 궁전·종묘 구역이 건설될 때부터 배치된 것으로 생각된다. 그 이유는 이 구덩이는 물론 물길까지 갑조, 을조, 병조 등 궁전·종묘구역 내의 주요 건물군과 중복되지 않고, 물길의 동쪽과 남쪽에 연하여 수기의 은허문화기의 관축 건물기단이 발견되었기 때문이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 2009)

은허 유적 발굴 초기에 을조, 병조 등 관축 건물기단의 관축토 아래와 그 부근에서 대량의 도랑이 발견된 바 있다. 이 도랑은 을조 관축기단군 아래에서만 해도 31줄이 확인되었으며, 그 전체 길이 또한 650.9m에 달한다. 이들 도랑은 서로 연결되어 있으며 예컨대 K14 도랑에서 확인되는 것처럼 적어도 그 일부는 위의 대형 구덩이와 연결되어 있다.(石璋如 1959) 이와 같은 구조는 환하의 물이 구덩이를 통해 궁전·종묘 구역까지 진입할 수 있고, 관축기단군의 빗물과 하수는 도랑과 구덩이를 통해 환하까지 배출될 수 있도록 설계된 것이다. 따라서 이 구덩이는 상 왕실 궁전·종묘 구역의 중요한 시설, 즉 연못[池苑] 유적으로 궁원까지 물을 끌어들이 수도 있고 또 홍수를 환하까지 배출할 수도 있는 시설로 판단된다.(岳洪彬 등 2006·2011)

二里頭, 偃師商城, 鄭州商城 등에서 확인된 ‘宮城’ 유적에서는 모두 대형 연못이 확인된 바 있으며 특히 후 양자의 그것은 모두 평면 규모가 2만㎡를 상회한다. 이것을 보면 연못 시설은 고대 궁전 시설을 구성하는 주요한 일부였다고 생각된다. 연못은 관상용 기능뿐만 아니라 화재에 대비한 저수시설로서도 활용될 수 있었다. 소둔촌 일대의 궁전·종묘 구역을 건설할 때 필요했을 관축토는 이 연못의 굴착 과정에서 획득되었을 가능성도 높다.

4) 기타 유적

1976년부터 1985년 동안 소둔촌 서북 지역 약 3600㎡ 범위 내에서 진행된 발굴 조사 보고가 2004년 발간되었다. 이 보고를 통해 이전까지 공백이었던 소둔촌 서북 일대 유구 분포 상황에 관한 약간의 정보를 얻을 수 있게 되었다. 이때의 발굴을 통해 확인된 상대 유존에는 판축기단 49기, 회갱과 저장갱 165기, 묘장 30기, 제사갱 17기 등이 포함되어 있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2004) 판축기단은 대개 지상건물의 기단으로 추정되며, 그 규모는 최대 125㎡(F42), 최소 6㎡(F6)로 비교적 작은 규모에 속한다. 판축기단에는 연대는 제1기의 것부터 제4기의 것까지 골고루 확인되지만, 그 가운데 제2기와 제3기의 것이 비교적 다수를 점한다.

묘장은 장방형의 토광수혈묘가 26기로 대다수를 차지한다. 이 가운데 M5(婦好墓)와 M17, M18 등 3기는 일찍이 보고된 바 있다. M5는 개구부의 평면 크기가 남북 5.6m, 동서 4m에 달하며 16구의 순장인과 200여 점의 청동예기를 포함한 총 1928점의 부장품이 매납된 대형 묘장으로, 武丁의 법정배우자 가운데 하나인 婦好의 무덤으로 추정된다. M17과 M18에서도 각각 청동예기 3점과 24점을 포함한 다량의 부장품이 수장되었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8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 1981) 그 외의 묘장 가운데 M34와 M43 등은 묘실 면적이 開口部를 기준으로 약 33㎡와 10㎡에 달하지만 도굴로 인해 그 부장품은 확인하기 어렵고, 이를 제외한 묘장은 모두 평면 면적 2㎡ 이하로 소형묘이다. 묘장의 연대 역시 은허문화 제1기부터 제4기의 것까지 두루 포함되어 있으나 특히 제2기의 것이 많다.

소둔촌 서북 지역을 제외하고도 궁전·종묘 구역 내부 혹은 그에 인접한 지역에서 간헐적으로 판축기단이 발견된다. 위에 언급한 것처럼, 1958년과 2004년 대형 붓도랑이 조사되었을 때 그 남북향 구간의 동쪽과 서쪽에서 각각 수기씩 판축기단이 조사된 것이 그 하나의 사례이다. 이밖에 1992년 궁전·종묘 구역의 남부에 해당하는 花園莊에서 판축기단 3기가 조사되었다. 이 중 F2는 그 평면 규모가 동서 28m, 남북 13m에 달하는 대형 지상건물지이다.(楊錫璋·劉一曼 1998) 2002~2004년에 小屯南路 건설 과정에서 진행된 구제발굴 때에도 수기의 소형 판축기단이 발견된 바 있다.

묘장의 조사례도 상당수에 달한다. 1930년대 소둔 궁전·종묘 구역의 초기 발굴 때에 乙·丙組 기단 주변에서 약 30기에 달하는 묘장이 발견된 사례가 있지만, 1992년~2002년 화원장 동쪽 지역에서 진행된 발굴에서는 M54를 포함한 총 42기가 확인된 바도 있다. M54는 개구부 면적이 남북 5.04m, 동서 폭 3.23~3.30m에 달하며

청동예기 40점을 포함하여 총 577점의 부장품이 매납되었다. 이밖의 묘장은 대체로 수점의 청동예기가 부장되거나 약간의 토기를 부장한 소형묘에 속한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2007) 궁전·종묘 지역 내에서는 이상을 제외하고도 최소 30기 이상의 묘장이 분포되어 있다. 붓도랑의 서쪽에 인접해 있는 현 安陽工作站 부지 내에서도 단속적으로 50여 기의 묘장이 조사되었는데, 이 가운데는 묘광의 남북으로 묘도가 설치된 이른바 중자형 대묘 1기도 포함되어 있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站 2009)

공방 유적은 갑조 기지 인근 지역에 집중되어 있지만, 이를 제외하고도 다음과 같은 사례가 보고된 바 있다. 1975년 소둔촌 서북쪽에서 조사된 2기의 반지하식 주거지(F10, F11)에서는 260여 점의 장방형 磨石과 600여 점의 圓錐形 石料가 발견되었다. 유구의 연대는 은허문화 제4기에 해당한다. 발굴자는 이 주거지가 옥·석기를 제작한 공방 유적일 것이라 추정하였다.(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 1976) 화원장 서남쪽, 붓도랑의 서남 모서리 일원에서는 대형 骨料坑이 발견되었다. 평면 면적 약 550m² 가량의 구덩이에서 소뼈를 중심으로 한 다량의 짐승 뼈가 발견되었으며 이들 가운데 약간에서 가공 흔적이 관찰된다. 이 구덩이 부근에도 골기 제작 공방이 있었을 가능성이 높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 1992)

다. 외곽 구역

1) 취락 유적

은허 유적에서는 궁전·종묘 구역의 외연에 산포되어 있는 다수의 취락 유적이 관찰된다. 이를테면 同樂寨, 秋口村, 侯家莊, 武官村, 三家莊, 大司空村, 小司空村, 高樓莊, 後岡, 薛家莊, 小莊, 郭家灣, 苗圃, 張家墳, 邵家棚, 梯子口, 王裕口, 四盤磨, 白家墳, 北徐家橋, 西八里莊, 梅園莊, 戚家莊, 劉家莊, 孝民屯, 北辛莊, 范家莊 등 근 30 곳에 달하는 자연촌락 인근에서 주거지 혹은 회갱, 저장갱 등이 확인되므로, 이곳에 취락이 형성되어 있었던 것을 알 수 있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94; 鄭若葵 1995; 鄭振香 2002; 孟憲武·李貴昌 2011) 이들 가운데 武官村, 三家莊, 大司空村, 小司空村, 郭家灣, 苗圃, 王裕口, 四盤磨, 白家墳, 梅園莊, 劉家莊, 孝民屯, 范家莊 등지에서는 은허문화 제1기의 유존이 출토되어 은허 유적의 형성기부터 이들 지점에 촌락이 형성되었음을 짐작하게 한다.(岳洪彬 등 2011) 이들 취락유적에서 발견되는 주

거지는 수혈식 주거지로 제한되는 것은 아니다. 北徐家橋, 八里莊, 王裕口, 劉家莊, 苗圃, 薛家莊, 小莊 등지에서는 모두 지상건물이 세워진 관축기단 유적이 발견된 바 있다. 특히 北徐家橋에서는 약 8000m²의 범위 내에 밀집 분포하는 약 20組에 달하는 四合院式 지상 건물의 관축기단이 확인되었다.(孟憲武·李貴昌 2004)

2) 묘지 유적

환하 북안의 侯家莊촌 북쪽, 왕실의 궁전·종묘 구역에서 환하를 사이에 두고 멀리 바라보이는 곳에 대형 묘장이 집중 분포되어 있다. 이 구역은 왕의 陵墓, 왕실 성원 일부분의 묘장 그리고 이와 관련된 제사 유존이 집중적으로 분포하는 왕릉 구역으로 인식되고 있다. 이 지역은 지세가 비교적 높아 약 80m의 해발고도를 보인다. 묘도를 갖춘 대형 묘장 13기와 완성되지 않은 무덤 1기 그리고 수천 기의 제사갱이 정리되었다. 왕릉 구역은 동구와 서구 2구역으로 공간이 분할되어 있으며, 서구에는 4개의 묘도를 갖춘 대형 무덤 7기, 완성되지 않은 대형 무덤 1기(M1567) 그리고 1개의 묘도를 갖춘 무덤 1기 등이 포함되어 있다. 동구에는 4개의 묘도를 갖춘 대형 무덤 1기(M1400), 2개의 묘도가 있는 대형 무덤 3기(M1443, M1129, 무관촌대묘M1), 그리고 1개의 묘도가 있는 대형 무덤 1기(M260) 등이 포함되어 있다. 무게 875kg에 달하는 司母戊方鼎이 單墓道 대묘인 M260에서 출토되었다고 전한다. 이 구역에서는 약 3000기에 달하는 소형 무덤도 발견되었고, 이 가운데 1487기가 발굴되었다. 그 일부는 대형 묘장의 배장묘지만 대부분은 왕릉과 관련이 있는 제사 유존이다.

은허에서는 이 왕릉 구역 이외에도 상당량의 묘장이 발견되었다. 묘장 자료는 주거지 자료보다 더욱 풍부하다. 지금까지 은허에서 발굴된 묘장 자료는 이미 1만 기를 상회하며, 同樂寨, 秋口村, 侯家莊, 三家莊, 大司空村, 後岡, 高樓莊, 薛家莊, 郭家莊, 梯子口, 苗圃, 四盤磨, 王裕口, 劉家莊, 白家墳, 梅園莊, 戚家莊, 孝民屯, 北辛莊, 范家莊 등지에서는 다수의 묘장이 밀집하여 분포하는 묘지가 조사되었다.(胡進駐 2010)

묘지의 무덤은 대개 취락 유적의 인근에서 확인된다. 묘지 내의 묘장은 일정한 질서 하에 배치되는 양상을 보이기 때문에 區와 組 등으로 분류할 수 있다. 때때로 묘지를 단위로 혹은 區와 組를 단위로 출토 청동예기의 族徽가 서로 다르거나 부장된 토기 조합에서 차별적 양상이 나타나기 때문에 크게는 묘지가, 작게는 그 안에 포괄되는 구와 조가 서로 다른 혈연집단의 塋域으로 인식된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安陽工作隊 1979) 뿐만 아니라 근년에 조사된 後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 1993)이나 郭家莊 묘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98)에서 관찰되는 것처럼 서로 다른 묘지 사이 혹은 묘구·조 사이에는 규모와 구조, 부장품에서 차별적인 양상이 관찰되는데, 이것은 집단 내부에 존재하는 서로 다른 支系나 가족의 정치적·경제적 차이를 반영하는 현상으로 이해된다. 예컨대 郭家莊 묘지는 북구, 중구, 남구 등 3개의 묘구로 분할되고 각 묘구 마다 약간의 組가 존재하는데, 이 묘지에서 발견된 單墓道 묘장 M171과 평면 면적 13㎡의 규모로 청동예기 44점을 포함하여 총 353점의 부장품이 매납된 M160은 모두 북구의 제3조에 배치되어 있다. 이상의 2기를 포함한 북구 묘장은 대부분 평면 3~8㎡의 묘실과 棺·槨의 2중 장구, 청동예기, 殉葬人을 보유하고 있는 반면, 중구에서 발견된 묘장은 그 최대 규모의 것도 평면 면적이 6㎡에 불과하고, 남구의 묘장은 대체로 2.5㎡ 이하에 지나지 않는다.(楊錫璋·劉一曼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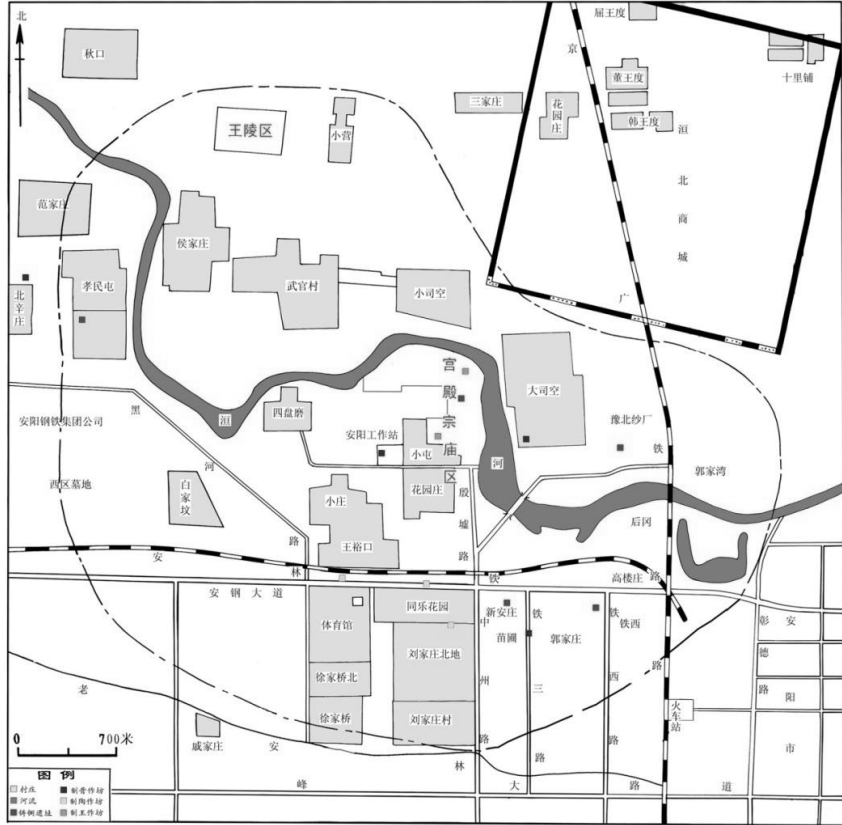
3) 공방 유적

은허에서 현재까지 발견된 청동기 주조 공방은 小屯村 궁전·종묘 구역 내, 묘포 북쪽, 薛家莊 남쪽, 大司空村 동남쪽, 孝民屯 등 모두 5곳에 달한다. 골기 제조 공방은 小屯村, 花園莊, 北辛莊, 대사공촌, 鐵三路 등 모두 4곳에서 확인되었다. 토기 공방도 3곳 발견되었는데 王裕口 남쪽, 安鋼大道, 劉家莊 북쪽 등의 지점에서 조사되었다.[도면4]

1994년까지 확인된 청동기 공방 유적은 모두 네 지점이었으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94) 이후의 조사를 통해 北辛莊 한 곳이 추가되었다. 이밖에 孝民屯 유적은, 최초의 조사에서는 소규모 공방 유적으로 인지되었으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87), 2000년 이후의 발굴조사를 통해 이전까지 최대 규모로 알려진 苗圃 유적보다 더 규모가 큰 대형 청동기 공방 유적인 것이 밝혀졌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 2006; 安陽孝民屯考古隊 2007)

苗圃 유적은 궁전·종묘 구역 동남쪽 약 1km 지점에 위치하며, 유적 규모는 1만㎡ 이상이다. 이 유적에서는 거푸집 제작, 거푸집, 주조 등에 관련된 유존이 말고도 약 5000 편의 鎔銅 공구와 2만 편에 달하는 鑄造 공구는 물론 연마석과 각종 調整 도구 등이 출토되었다. 유적은 동구, 서구 등 두 구역으로 구분할 수 있으며, 두 구역은 약 25m의 거리를 두고 있다. 동구는 鑄銅과 관련된 유물과 유구를 상당수 포함

하고 있으므로 생산구역인 것으로 추정된다. 서구에는 비교적 많은 수량의 주거지가 분포되어 있고, 주거지 내부에는 대부분 노지가 발견되는 반면 청동기 제작 관련 유물은 잘 발견되지 않아 주거구역인 것으로 추정된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8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 1986)



[도면 4] 은허 수공업 공방 유적 분포도

孝民屯 유적은 은허의 서쪽 외곽에 위치한다. 궁전·종묘 구역의 서쪽 약 2.5km 지점에서 발견되었다. 유적의 분포 특징으로 보아 역시 동구와 서구 등 2구역으로 구분할 수 있으며, 유적의 전체 면적은 5만㎡ 이상에 달한다. 현재까지 알려진 은허 최대 규모의 청동기 제작 공방 유적이다. 이 유적에서는 주동과 관련된 일련의 유존이 확인되었으며, 다량의 토제 거푸집도 출토되었다. 특히 수혈주거지 F43에서 출토된 거푸집의 바닥부는 그 직경이 1.54m에 달하며, 이 거푸집으로 주조되었을 대형 청동기는 현재까지 알려진 商代 최대의 청동기 司母戊鼎보다 훨씬 크다.

골기 공방 유적 중 小屯村과 花園莊 유적은 궁전·종묘 구역 내에 위치하며, 鐵三路 유적은 최근에 발견되었다.(李志鵬 등 2010) 제골 공방 유적 가운데 비교적 규모가 큰 것은 1958~1961년 사이에 확인된 大司空村과 北辛莊의 그것이다. 대사공촌 골기 공방은 환하 북안 대사공촌 동남 지역에 위치하고 있다. 공방 유적의 범위는 약 1380㎡이다. 여기에서는 제작장과 골료 저장갱이 발견되었으며, 3만 5000편에 달하는 골·각료, 반성품과 폐료, 그리고 다량의 골기 제작용 청동제 도구와 마석 등이 출토되었다. 대사공촌 골기 공방 유적은 지금까지 은허에서 발견된 동종의 공방 가운데 규모가 가장 크다. 이 공방 유적은 은허문화 제2기에 시작되었고 은허문화 제3기와 제4기에 번영했다. 北辛莊 제골 공방 유적은 환하의 남안, 은허의 서쪽 외곽에 위치하며 소둔촌 궁전·종묘 구역에서 약 3km가량 떨어져 있다. 이 유적에서는 제작장과 대형 골료 저장갱이 발견되었다. 위에서 말한 바와 같이 북신장에서는 골기 제작 공방 이외에 청동기 제작 공방도 발견된 바 있다.

옥기 공방 유적은 많이 발견되지 않았다. 지금까지 종묘·궁전 구역에서 2곳이 발견된 것 이외에 다른 지역에서는 확인된 바 없다. 토기 공방 유적 역시 모두 3곳이 발견되었지만 본격적인 발굴이 진행된 곳은 花園莊의 남쪽, 安鋼大道에 위치한 공방 1곳에 불과하다. 이 공방은 소둔촌의 궁전·종묘 구역의 정남쪽에 위치하며 양자의 거리는 약 500m가량이다. 공방의 규모는 6만㎡ 이상으로 은허에서 지금까지 발견된 모든 공방 가운데 최대 규모이다. 이곳에서는 지금까지 약 20여 기의 가마가 조사되었다.(岳占偉 등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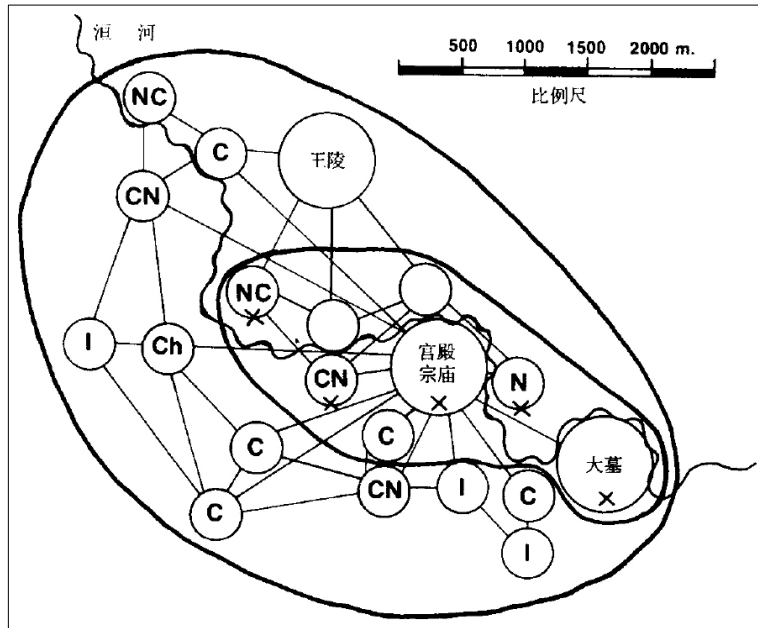
2. 商都 殷墟의 구조

은허가 상 후기의 도읍이라는 사실은 갑골문의 발견을 통해 입증되었다. 은허 발굴 초기에는 은허 유적의 범위가 아직 분명하게 인식되지 못했다. 1960년대 초에 이르러 유적의 면적이 24km² 이상에 이르는 것으로 인지되었으나(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安陽發掘隊 1961), 지금은 유적의 전체 면적이 약 36km²에 도달한 것으로 평가된다(岳洪彬 등 2011).

고대 도시로서의 은허가 어떻게 구성되어 있었으며 어떤 특징을 가지고 있는지에 대한 문제는 발굴 초기 단계에서 본격적으로 다루어지지 않았다. 1928~1937년까지의 발굴조사는 그 시간이 비교적 짧았고 小屯, 侯家莊, 後岡, 大司空村 등 몇몇 주요 지점만을 대상으로 하였기 때문에, 은허는 몇 개의 유적 지점으로 이해되는 경향이 강

하여 은허 전체를 하나의 전체로서 파악하려는 시도는 이루어지지 않았다.(楊錫璋·劉一曼 1998; 2004) 초기 발굴의 책임자였던 李濟는 殷墟가 가지는 역사학적, 고고학적 의의와 연구 과제 등을 충분히 숙지하고 있었음에도 불구하고, 은허의 구조에 대한 질문을 던지는 데까지 도달하지 못했다.(李濟 1968·2011)

은허 유적을 하나의 전체로 보고 그 구조를 이해하려는 시각은 1960년대에 들어 처음으로 제시되었다. 당시 은허의 발굴을 담당한 安陽發掘隊는 1958년부터 1961년까지 발굴 성과에 입각하여 은허의 구조에 대한 윤곽을 그리고자 하였다. 그들에 따르면 은허는 환하 남안의 소둔촌에 위치하는 궁전·종묘 구역과 북안에 위치하는 무관촌·후가장 일대의 왕릉 구역이 두 개의 축을 형성하고, 그 주변에 중소 노예주와 자유민이 거주하는 취락과 묘장, 그리고 수공업 공방이 배치되었다고 판단하였다.



[도면 5] 張光直의 은허 구조 개념도

N 귀족거주구 C 평민거주구 I 공방 Ch 차마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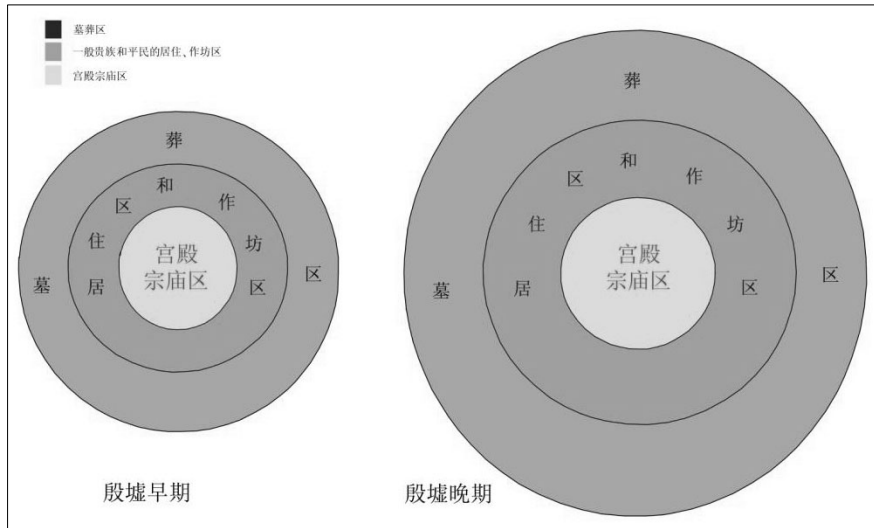
발굴조사의 진전에 따라 1978년 張光直은 보다 복잡한 은허의 구조를 상징할 수 있게 되었다. 그에 따르면, 은허는 일정한 공간상에 불연속적으로 분포하는, 고유한 성격을 가진 개별 단위의 집합체로서, 궁전·종묘, 왕릉, 서로 다른 계층이 거주하는 취락, 공방구역 등이 그 개별 단위에 해당한다. 그 구상은 이 이상 분명하게 언명되지 않았지만, 그가 제시한 개념도에 의하면, 은허에는 궁전·종묘와 왕릉을 중심으

로, 그 주변에 귀족의 거주 구역이, 그 외곽으로는 평민의 거주 구역이, 다시 그 외연으로는 공방 구역이 분포하는 것으로 이해된 것으로 보인다.(張光直 2002) 즉 은허에는 기능적인 차이가 있는 다양한 개별 단위가 존재하고, 이들이 엄격하진 않지만 그 기능의 계층적 차이에 따라 중심에서 외곽으로 확장되는 마치 그물망과 같은 구조를 형성하는 것으로 이해되었다.[도면5]

중화인민공화국이 성립된 이래 은허 발굴을 주도한 연구자들은 약 40여 년 동안의 조사 성과를 바탕으로 간결한 도시 모델을 제안하였다. 그들은 은허 유적은 200여 년에 걸친 발전 과정을 통해 형성된 것이며, 현재의 유적 분포가 다소 복잡한 양상을 노정한다 할지라도 그 구조는 비교적 단순하다는 결론에 도달하였다. 그들에 따르면 은허는 궁전·종묘 구역을 중심으로 하고, 그 외연에는 거주 구역과 공방 구역이 입지하며, 다시 그 밖으로는 묘지가 분포한다. 은허를 구성하는 복수의 유적에서 거주 구역과 공방, 묘장이 혼재하는 이유는 도시의 팽창에 따른 결과이다. 은허문화제1기 때에 유적의 분포 면적은 매우 작았으나, 제2·3기에 들어 확대되고 제4기에 이르렀을 때 현재의 전체 은허 지역으로 확대되었다. 따라서 시기가 이른 묘장들은 소둔촌에 가까운 곳에 조영되었지만, 인구의 증가에 따라 거주 구역이 확대되고 그와 함께 묘지 또한 확대된 거주 구역 외곽으로 이전하여 갔다. 은허에 단순한 묘지는 있어도 단순한 거주 구역이 존재하지 않는 이유는 그 유적이 처음에는 묘지로 사용되다 이후 거주 구역의 확대에 따라 거주 구역으로 변모하였기 때문이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2004; 鄭振香 2002; 楊錫璋·劉一曼 2004)

이들의 견해는 은허 유적이 중심에서 외곽으로 점차 확대되었으며, 그에 따라 거주 구역과 공방 구역이 부단히 바깥쪽으로 팽창하고, 이것은 다시 묘지가 유적의 외연으로 이전되도록 하는 연쇄적 반응을 불러 일으켰다는 동태적인 이해를 보여준다. 이와 같은 동태적 발전 모델은 마치 동심원이 안에서 밖으로 퍼져나가는 형태와 유사하며 따라서 동심원적 발전 모델이라 부를 수 있다. 이 동심원적 모델은 안양공작대의 초기 구상을 계승하고 장광직의 견해를 일부 수용하면서도, 은허 유적의 복잡한 내용을 일련의 합리적인 과정으로 이해하려는 시도였다고 할 수 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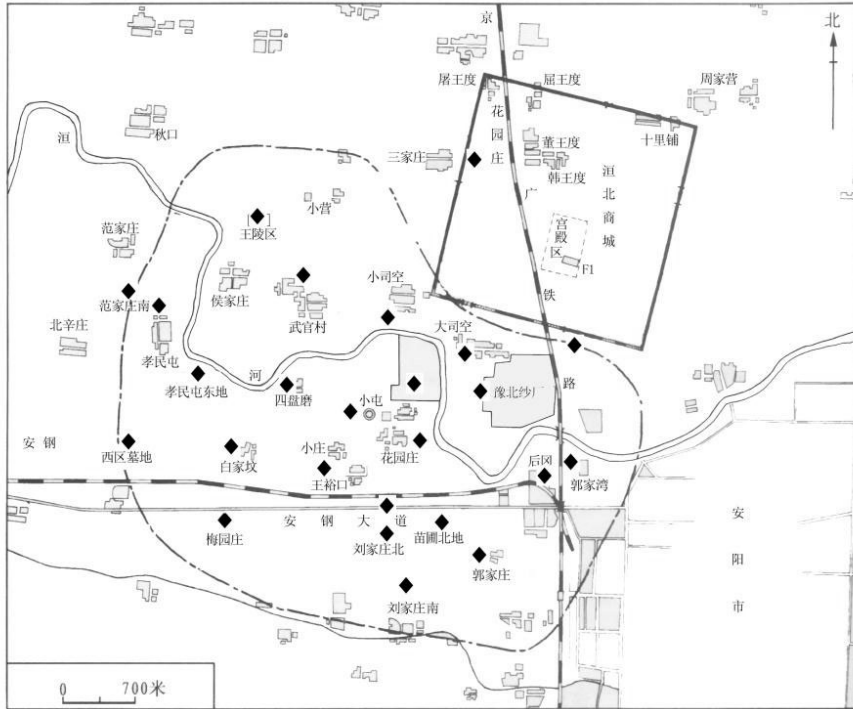
그러나 張光直의 기능 분할 모델과 후자의 동심원적 발전 모델은 근년에 들어 진척된 고고학적 조사 성과와는 배치되는 점이 적지 않다.



[도면 6] 동심원 발전 모델 개념도

먼저, 은허문화 제1기의 분포 지역은 소둔의 궁전·종묘 구역과 그 인근에서 제한적으로 확인되는 것은 아니다. 이를테면 환하 이북의 侯家莊, 武官村, 小司空村, 大司空村, 三家莊, 郭家灣에서, 그리고 환하 이남의 後岡, 高樓莊, 郭家莊, 苗圃, 劉家莊, 王裕口, 梅園莊, 四盤磨, 安陽鋼鐵 공장 구역, 孝民屯, 白家墳, 范家莊 등, 소둔의 궁전·종묘 구역과 그 인근 지역은 물론 은허 유적 거의 전역에서 은허문화 제1기에 해당하는 유존이 확인되고 있다.[도면7] 이와 같은 현상은 동심원적 발전 모델로는 합리적인 설명을 부여하기 어렵다.

다음으로 주목하여야 할 사실은 이들 유적 지점에서는 대개 은허문화 제1기에 속하는 회갱과 저장갱 혹은 묘장이 확인되며 그 일부에서는 같은 시기의 거주 유적이 발견되는 점이다. 즉 주거 유적과 묘장이 병존하는 현상이 분명하게 관찰되는 것이다. 뿐만 아니라 이들 유적 가운데 상당수에는 시대를 같이하거나 혹은 달리하는 공방 유적도 확인된다. 은허 유적의 서쪽 외곽에서 확인된 孝民屯과 范家莊 유적의 경우는 전형적인 사례이다. 효민둔 유적은 은허 유적의 서쪽 외곽에 위치하며, 궁전·종묘 구역에서 약 2.5km 떨어져 있다. 1966년부터 1977년까지 효민둔 남지에서 상대묘장 900여 기, 차마갱 5기 등을 발굴했다. 이 묘지는 저명한 은허 서구 묘지를 구성하는 주요 부분이다. 그런데 종전에는 이 구역 내는 모두 묘지라고 이해하였지만, 근 수년간의 발굴 자료를 통해 이곳에 은허문화 제1기부터 취락이 존재하고 있었음을 확인할 수 있게 되었다.



[도면 7] 은허문화 제1기 유존 본포도

2003년 안양강철의 확장공사에 따른 구제발굴을 통해 효민둔에서 3개의 그룹으로 형성된 90여 기의 수혈식 주거지가 발굴되었다. 이들 수혈식 주거지의 연대는 은허문화 제1기부터 시작되어 은허문화 제2기까지 이어진다. 이어 은허문화 제3·4기에 이르면 이 지역에서는 청동기 주조와 관련된 공방 유적이 대량으로 출현하기 시작한다. 2003년의 발굴에서는 발굴 면적에 제한이 있었으므로 은허문화 제1기의 주거지와 같은 시기에 속하는 재구덩이, 무덤 등이 발견되지 않았다. 그러나 2005년 안양강철 소결공장 건립에 따른 약 400㎡ 면적에 대한 구제발굴을 통해, 효민둔 취락 유적에서 서쪽으로 약 200m 떨어진 范家莊 남쪽에서 은허문화 제1기의 회갱과 저장갱 등이 확인되었다. 인접한 위치로 보아 范家莊 유적은 효민둔의 수혈식 주거지 취락과 연결된 유적이라 판단된다. 은허문화 제1기부터 제4기까지 이 효민둔 일대의 취락이 발전해 나간 맥락을 분명하게 확인할 수 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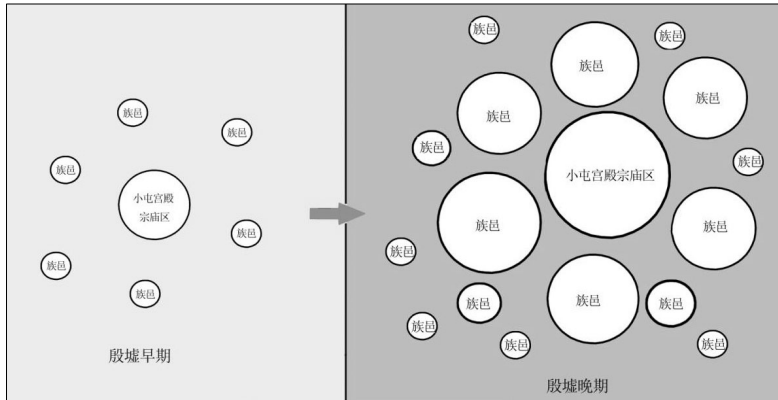
효민둔과 범가장에서 확인되는 것과 동일한, 복합적인 성격의 유적은 은허에서 매우 빈번히 발견된다. 이들 취락은 주거 구역과 묘지로 구성되며 때때로 수공업 공방을 보유하는 하나의 완결된 단위로서 은허 형성 초기부터 복수의 지점에 분포했다.

게다가 다양한 규모의 묘장이나 하나의 묘지에 혼재하고 판축기단을 가진 지상식 건물과 수혈식 주거지가 동일한 주거구역에서 확인되는 것은 이 복합적 성격의 유적이 계층적 속성에 의해 정의될 수 있는 것이 아니라는 점도 명백히 시사한다. 소둔의 궁전·종묘 구역도 사실은 이와 같은 취락의 하나였다고 이해해야 할 것이다. 궁전·종묘 구역 내에 거대한 판축기단은 물론 소형 주거지, 대소 규모의 묘장 그리고 수공업 공방이 혼재되어 있는 것은 그와 같은 사실을 잘 설명한다. 이와 같은 현상은 張光直의 기능 분할 모델과는 사뭇 배치되는 양상이라 할 수 있다.

한편, 鄭若葵는 위의 두 가지 모델과는 달리 은허의 도시 모델을 ‘族邑모델’이라 정의한 바 있다. ‘족읍’은 동일한 씨족이 집거하는 취락을 의미하는 것인데, 그는 은허가 복수의 족읍이 왕족의 족읍을 둘러싼 형태로 구성되어 있으며, 왕족 족읍의 주변 약 30km² 범위 내에 산포하는 복수의 족읍은 구심적인 형태로 층층이 분포되어 있었다고 생각하였다. 이때 각각의 족읍은, 그에 따르면, 상대적으로 독립된 취락 단원으로서, 각자의 고유한 세력범위를 가지는 주거, 생산, 묘지의 종합체였다. 유일한 예외라면 왕릉 구역이 그것으로서, 이곳은 전문적인 매장과 제사를 위한 은허 구성원 전체의 공공장소였다.

근래의 고고학적 발굴 성과는 鄭若葵의 견해가 기본적으로 옳다는 점을 입증하고 있는 것으로 보인다. 다만 여기에는 덧붙여 설명해야 할 것도 있다. 그것은 이들 취락이 대체로 소형에서 대형으로의 발전 과정을 경험했다는 사실이다. 예컨대 궁전·종묘 구역의 일부를 구성하는 소둔촌 서쪽 지역에 대한 발굴 결과를 보면, 이 지역의 은허문화 제2기 유존은 발굴 구역의 서북부에만 분포되어 있었지만, 이후 은허문화 제3기와 제4기 때에는 유적의 분포범위가 서쪽, 남쪽으로 확장되는 현상을 뚜렷하게 보인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2004) 이것은 궁전·종묘 구역에서만 확인되는 것은 아니다. 다른 수많은 취락 역시 유사한 발전 추세를 거쳤다. 은허문화 제1기의 유존은 비교적 성글게 분포되어 있으며 이것은 취락과 취락 사이에 커다란 공백지대가 있었음을 암시한다. 이것은 은허 내의 취락 배치가 몇몇 ‘점’이 분포하는 형태로 이루어져 있었음을 의미한다. 그러나 각 취락의 발전에 따라 취락 간의 공백지대가 점차 작아져서 ‘점’의 분포는 점차 ‘면’으로 확대되고 마침내 전체 도읍의 평면 배치가 형성되었다. 이 과정에서 은허문화 제2기 혹은 제3·4기에 들어 새로 출현한 소형 취락도 관찰되는데, 그것은 아마도 취락의 내부 분화에 따라 새로 성립된 支族과 관련이 있을 것이다.(岳洪彬 2011)

이처럼 복합적인 기능을 가진 복수의 취락이 존재하고, 이들이 팽창하는 과정을 통해 은허가 형성되어 갔다고 인식하는 것을 정약규의 술어를 빌려 ‘족읍모델’이라 칭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이 ‘족읍모델’은 은허 발전 과정 중에 ‘복수의 점’의 확장되어, 그 복수의 점이 전체 도읍의 평면 배치로 이어져 나간 것을 반영한다. 이것은 하나의 점이 확장되어 간 것을 의미하는 동심원적 모델과는 다르다.



[도면 8] 족읍모델 개념도

맺음말

거대한 규모의 성곽, 판축기단 위에 세워진 위엄 있는 건물, 기능과 계층에 따른 공간의 분할 원칙 등은 이리두, 언사상성, 정주상성 등 중국 초기의 도시 유적에서 관찰되는 보편적인 현상이다. 반경의 천은 초기 환수의 북안에서 구상하였던 도시의 구조는 환북상성에 나타나며, 그것은 二里頭的 계통을 잇는 것이었다. 그러나 환북상성식의 모델은 은허가 상 왕조의 도읍으로 본격적인 발전에 접어들기 이전에 폐기되고 말았다.

상 국가의 정점에 위치한 은허는 이리두 계통의 그것과는 전혀 다른 구조를 가지고 있는 도시였음이 발굴 자료의 축적과 함께 점차 분명해지고 있다. 은허는 주거와 생산, 묘지를 공유하는 집단이 영위하는 개별 취락이 집적된 형태로 구성되었다. 즉 은허는 소둔촌의 궁전·종묘 구역을 중심으로 그 주변에 상당한 수의 족읍이 분포되어 있는 대형 취락이었으며, 소둔촌의 궁전·종묘 구역 역시 규모의 차이는 있을지언정 그 본질적인 속성에는 차이가 없었다. 동일한 성격의 취락이 집적된 공동체가

은허의 핵심적 속성인 것이다.

은허에서 보이는 이와 같은 고대 도시의 구조는 그 국가의 정치적, 사회적 구조와 깊은 관계를 맺고 있을 것으로 생각된다. 시대는 다소 내려가지만, 주 왕조의 초기 도읍인 周原 유적과 濼鎬 유적도, 현재까지의 발굴 결과를 감안하면, 은허의 그것과 유사한 구조를 가지고 있을 가능성이 높다. 그렇다면 은허의 도시 구조는 특이한 것이 아니고 오히려 중국 초기 국가의 본질적인 특성과 모종의 관계를 맺고 있는 것이 아닐까? 그 내면에 존재한 상호 관계를 탐구하는 것은 흥미로운 과제가 될 것이다.

참고문헌

- 唐際根 1999, 「中商文化研究」, 『考古學報』 1999年 第4期.
- 石璋如 1959, 『殷墟第一本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乙編殷墟建築遺存』,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岳洪彬 등 2006, 「小屯宮殿宗廟區布局初探」,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 편, 『三代考古(二)』, 科學出版社.
- 岳洪彬 등 2011, 「殷墟都邑布局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 편, 『三代考古(四)』, 科學出版社.
- 楊錫璋 1981, 「安陽殷墟西北岡大墓的分期及有關問題」, 『中原文物』 1981年 第3期.
- 楊錫璋·劉一曼 1998, 「1980年以來殷墟發掘的主要收穫」,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편, 『中國商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楊錫璋·劉一曼 2004, 「殷墟考古七十年的主要收穫」, 『考古學集刊』 15, 文物出版社.
- 鄭若葵 1995, 「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 『中原文物』 1995年 第3期.
- 鄭振香 2002, 「安陽殷墟布局及其相關問題」, 『21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鄭振香 2011, 「論安陽殷墟圍溝的發現及其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편, 『殷墟與商文化-殷墟科學發掘80周年紀念文集』, 科學出版社.
-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 1961, 「1958-1959年殷墟發掘簡報」, 『考古』 1961年 第2期.
-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 1976, 「1975年安陽殷墟的新發現」, 『考古』 1976年 第4期.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80, 『殷墟婦好墓』, 文物出版社.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87, 『殷墟發掘報告(1958~1961)』, 文物出版社.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94, 『殷墟的發現與研究』, 科學出版社.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98, 『安陽殷墟郭家莊商代墓葬 1982년~1992年考古發掘報告』,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2003, 『中國考古學 夏商卷』,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2004, 『安陽小屯』, 夏商周斷代工程叢書,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2007, 『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商代墓葬』, 科學出版社.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2010, 『安陽殷墟小屯建築遺存』, 文物出版社.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 1979, 「1969-1977年殷墟西區墓葬發掘報告」, 『考古學報』 1979年 第1期.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 1981, 「安陽小屯村北的兩座殷代墓」, 『考古學報』 1981年 第4期.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 1986, 「1980-1982年安陽苗圃北地遺址發掘簡報」, 『考古』 1986年 第2期.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 1992, 「1986~1987年安陽花園莊南地發掘報告」, 『考古學報』 1992年 第1期.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 1993, 「1991年後岡殷墓的發掘」, 『考古』 1993年 第10期.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 2003a, 「洹北商城的考古新發現」,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 第5期.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 2003b, 「河南安陽市洹北商城的勘察與試掘」, 『考古』 2003年 第5期.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 2003c, 「河南安陽市洹北商城宮殿區 I 號基址發掘簡報」, 『考古』 2003年 第5期.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 2006, 「2000-2001年安陽孝民屯東南地殷代鑄銅遺址發掘報告」, 『考古學報』 2006年 第3期.
- 安陽孝民屯考古隊 2007, 「河南安陽市孝民屯商代鑄銅遺址2003-2004年的發掘」, 『考古』 2007年 第1期.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 2009a, 「2004-2005年殷墟小屯宮殿宗廟區的勘探和發掘」, 『考古學報』 2009年 第2期.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 2009b, 「河南安陽市殷墟小屯西地商代大墓發掘簡報」, 『考古』 2009年 第9期.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 2010, 「河南安陽市洹北商城宮殿區 II 號基址發掘簡報」, 『考古』 2010年 第1期.
- 彭金璋·曉田 1988, 「殷墟爲武丁以來殷之舊都說」, 『中國考古學會第五次年會論文集』, 文物出版社.
- 李志鵬 등 2010, 「殷墟鐵三路製骨作坊遺址出土製骨遺存的分析與初步認識」, 『中國文物

報』2010年 9月 17日.

岳占偉 等 2008, 「殷墟首次發現一處重要的製陶作坊區」, 『中國文物報』 2008年 10月 15日.

孟憲武·李貴昌 2011, 「安陽殷墟邊緣區域考古概述」,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編, 『殷墟與商文化-殷墟科學發掘80周年紀念文集』, 科學出版社.

孟憲武·李貴昌 2004, 「殷墟四合院式建築基址考察」, 『中原文物』 2004年 第5期.

胡進駐 2010, 『殷墟晚商墓葬研究』,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李濟 1968, 「安陽發掘與中國古史問題」,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40本.

李濟 2011, 『安陽』, 商務印書館.

張光直 2002, 『商文明』, 遼寧教育出版社.

진동하는 중축선

— 한대 도성 건축 이념의 시간적 추이 —

김 병 준(서울대)

I. 중국 도시사에서의 漢 長安城

중국 도성사 전체에서 차지하는 한대 長安城의 위상을 들여다 보면, 그저 帝國의 도성으로서 겨우 자리를 갖추기 시작했다는 정도로 평가받을 뿐 별다른 의미를 부여 받지 못한 채 도성 내에 어떤 궁전이 어떻게 배치되어 있는가에만 논의가 집중되고 있다는 인상을 받게 된다. 그 까닭은 수당시대에 도성 제도가 완성된다고 전제하고 이러한 완성태에 도달하는 과정을 소급해 추적하는 과정 속에 한 장안성 연구가 위치해 있기 때문이다. 한 장안성이 수당시대의 도성과 다른 모습을 갖고 있는 이상, 한 장안성은 기원 혹은 과도기로서의 평가 이상을 받기 어려웠다. 수당시대 도성과 유사한 모습은 北魏 도성 이전에서 찾기 힘들기 때문이다.

가령 『周禮』 考工記에 중국 도성의 전통적 관념과 원칙이 담겨져 있는데, 일반적으로는 이러한 원칙이 수당시대 도성에는 잘 반영되어 있는 반면 한대에는 이에 부합되지 않는다고 본다. 考工記의 원칙으로 지적되는 中央宮闕, 面朝後市, 左祖右社, 左右民廛라는 원칙 중, 한 장안성에서는 일단 외견상으로 後市의 원칙을 제외하고는 정확히 들어맞는 것을 찾을 수 없는 것 같이 보이는 것이 사실이다. 하지만 수당시대 도성이라고 해서 이러한 원칙이 잘 적용된 것도 아니다. 당대 장안성의 경우도 左祖右社를 제외하고는 맞는 것이 없다.¹⁾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수당시대의 도성을 완성태로 보는 전제 하에 서있기 때문에, 구체적인 분석을 하기에 앞서 『隋書』의 ‘周制에 의거했다’라는 한 구절을 인용하면서 『周禮』의 관념이 반영되었음을 의심하지 않았던 것이다.

그 중에서도 본고에서 다루고자 하는 中軸線을 다룬 연구가 가장 두드러진다. 수

1) 박한제, 「중국 고대의 都市 -漢-唐의 都城構造를 중심으로」, 『강좌 고대사』 7,

당시대 도성에는 좌우 대칭의 中軸線이 명확하게 드러나기 때문에 이것을 가장 전형적 형태의 중축선으로 가정하고, 그 이전의 도성을 검토하는 방식이 주요한 연구 흐름으로 자리잡고 있다. 특히 수당시대에 들어와서 正殿인 太極殿과 중축선이 연결되는 점이야말로 가장 완성된 형태의 도시 설계라는 것이다. 이러한 기준으로 앞선 시기의 도성을 판단하기 때문에, 수당시대와 비슷한 모습이 드러나면 그것은 중축선의 범주에 넣어 설명하고, 그것과 크게 다르다면 그것은 중축선이라고 할 수 없다는 식의 결론이 나오게 된다.²⁾ 자연히 수당시대와 비교적 가까운 북위시기에서 그 原型을 찾는 반면, 그보다 앞선 진한시대 도성은 중축선의 존재를 인정하지 않게 되는 결론에 이르게 된다.

그런데 문제는 진한시대 도성에 중축선이 존재했느냐 그 자체가 아니다. 중축선 존재 여부는 다시 중축선에 결부되어 있는 관념의 존재 여부와 연결되기 마련이다. 중축선은 곧 우주의 질서를 도성에 반영하는 의미가 담겨있다. 그렇다면 진한시대에는 도성에 우주의 질서를 반영하려는 의지가 없었다는 말인가? 수당시대의 중축선과 같이 도성의 정가운데에 위치하여 좌우대칭을 이루지 않는다면, 그것은 곧 도성 설계에 우주질서를 반영하겠다는 의지가 부족한 것인가? 실제로 이렇게 결론을 내리는 글은 없겠지만, 수당시대 도성의 중축선의 의미를 크게 강조하면서 동시에 이러한 형태의 중축선을 진한시대 도성에서 찾을 수 없다는 논법은 자칫 이러한 오해를 불러 일으킬 여지가 큰 입에 틀림없다.

좀 더 따지고 보면 이런 도성사 연구 경향은 일본의 도성사 연구에서 비롯되었다. 일본 고대의 도성이 수당시대의 도성으로부터 직접적인 영향을 받았던 것은 주지하는 바이다. 이 때문에 일본 학계에서는 수당시대 도성이 늘 도성사 논의의 중심에서 있었던 것이다. 중국의 도성 설계의 발전이라는 각도에서 초기의 형태부터 자연스럽게 맥락을 따라가기 보다는, 일본의 도성을 이해한다는 전제 위에서 그 전형인 수당시대의 도성으로 어떻게 발전해 왔는가가 중심이 되었다. 한국에서의 연구도 이러한 연구 경향에서 크게 벗어나지 않았지만, 심지어 중국에서의 연구도 이러한 일본의 도성사 연구의 강한 자극 하에 있었던 것 같다. 본고는 일단 수당시대 중심의 기존 도성사 연구 경향을 반성하는 차원에서, 먼저 그동안 中軸線이라는 개념이 어떻게 정의되어 왔는지부터 살펴보고자 한다.

2) 中軸線이 아니라 그냥 軸線에 불과하다든가, 혹은 都城 中軸線이 아니라 宮殿 中軸線만이 존재했다든가 하는 식의 구차한 설명이 이루어지기도 한다. 積山洋, 『中國古代都城の軸線プランと正殿』, 『條里制・古代都市研究』 22, 條里制・古代都市研究會(京都), 2007.

II. 中軸線의 의미에 대한 검토

(1) 中軸線의 다양한 지표

기존의 논의에서 중축선은 다음과 같은 두 가지 조건을 갖추어야 했다. 첫째는 황제가 거주하는 正殿과 황제가 天地에 제사를 지내는 南郊 및 北郊를 잇는 도로가 연결되어 있어야 한다. 둘째는 그 도로가 도성의 정중앙을 통과하여 도성 전체를 좌우로 균등하게 양분해야 한다. 그런데 이 두 가지 조건에 핵심을 이루는 것은 황제가 거쳐하는 正殿의 위치다.³⁾ 수당시대의 太極殿이 여기에 해당되는데, 이렇게 正殿에서 출발하는 축선이 가능하기 위해서는 일단 正殿이 하나이어야 했다. 따라서 曹魏의 鄴城까지 正殿은 文昌殿과 聽政殿의 두 개였는데, 魏의 洛陽城에 이르러 하나로 통합되어 太極殿이 성립되면서 중요한 중축선 정립을 위한 획기가 되었다고 이해한다. 南宮과 北宮의 두 개의 궁전으로 구성된 後漢의 洛陽城은 중축선의 논의 범위에서 벗어나게 되었다.

이렇듯 正殿이 중축선의 핵심이 되어야 까닭은 수당시대의 도성을 기준으로 했기 때문일 뿐이다. 지상 세계에서 통치자인 황제를 상징하는 공간으로서 正殿의 의미는 충분히 인정된다. 그러나 도성이 처음 만들어지는 夏商周 시기부터 중축선의 의미를 찾아가 보면, 중축선의 한쪽 끝이 반드시 황제가 거쳐하는 正殿에 국한될 필요는 없다.

夏商周 시기 도성 유적에서는 대규모 향축 건축 유지가 종종 발견되곤 한다. 이 건축을 궁전 유적이라고 부르기도 하지만, 보통은 宮殿宗廟 유지라고 부른다. 그 까닭은 초기 도성 유적의 경우 이 양자는 결코 분리될 수 없기 때문이다. “뭉 중에 종묘가 있는 곳을 都라고 하고 없으면 그냥 뭉이라고 일컫는다”는 기록이나, “옛날 하상주 시기 三代의 성왕은 먼 처음 나라를 세우고 도읍을 건설 할 때에 반드시 國의 正壇을 골라 그곳에 종묘를 둔다”고 한 기록은 모두 도성의 가장 중요한 건축이 곧 종묘라는 점을 응변해 준다. 사실 궁전과 종묘의 구조도 동일하다. 후한 蔡邕의 『獨斷』에 의하면, “人君이 거쳐하는 곳은 앞쪽에 朝가 있고 뒤쪽에 寢이 있다. 죽고 나서는 앞쪽에 廟 혹은 朝를 두고, 뒤쪽에 생전의 寢을 본따 寢을 만든다. 廟에는 神主를 모시고 昭穆을 배열한다. 寢에는 살아있을 때와 같은 의관과 器仗을 둔다. 이 모

3) 妹尾達彦, 『長安の都市計畫』, 講談社, 2001.

든 것을 ‘宮’이라고 일컫기도 한다.”라고 되어 있다. 이처럼 문헌에서는 ‘廟’와 ‘宮’이 통용되는 사례가 많다. 서주 중후기의 금문에는 왕이 周의 <大廟><康廟><康宮><康昭宮><昭宮><康穆宮><般宮><駒宮> 등에서 冊命 의례를 행했다. 서주 왕실의 입장에서 가장 중요한 정치적 행위인 冊命 의례가 종묘에서 행해졌다는 사실은 곧 궁전의 기본적 속성이 종묘에서 비롯된다는 것을 의미한다.

二里頭 유지의 2호 궁전이라든가 偃師 尸鄉溝의 4호 궁전유지는 궁실과 침묘가 하나였던 모습을 잘 보여주는 것으로 평가받고 있다. 앞쪽의 堂은 議政과 제사의 공간으로서 ‘廟’에 해당되고, 뒤쪽의 室은 생활 공간으로서 ‘寢’에 해당되는데, 이 ‘廟’와 ‘寢’은 하나의 지붕 아래에 놓여 있어서 廟寢이 하나가 된 모습이다. 그리고 이 건축물은 다시 이곳을 둘러싸고 있는 성벽의 문과 연결되어 軸線을 구성하게 된다. 다시 말해 초기 단계에서의 도성의 軸線은 종묘를 그 기점으로 하여 만들어졌던 것이다.⁴⁾

그 이후 점차 宮室이 분리되어 鳳雛 甲組 유지처럼 종묘와 궁실의 건물은 분리되지만, 양자 모두 동일한 구역 안에 설치되어 있다는 점은 변함이 없다. 전국시대에 들어서 양자가 더욱 분리된 모습을 보이지만, 여전히 궁전과 종묘는 기본적으로 동일한 지역에 위치하고 있었다. 다시 말해 궁전과 종묘는 본래 결합된 것이었으며, 전국시대 이후 점차 궁전과 종묘가 분리되어 궁전이 중심이 되는 경향을 보이지만 궁전의 기본 속성은 종묘에 있다는 점을 기억해 둘 필요가 있다. 따라서 후대가 되면 중축선의 한쪽 끝이 正殿에 연결되지만, 초기 단계에 발생한 중축선은 궁전과 합일되었던 종묘에 연결되어 있었던 것으로 볼 수 있을 것이다. 적어도 중축선에는 단지 황제가 지상에서 거처하는 궁전이라는 위치만이 아니라, 황제가 자신의 조상을 제사 드리는 종묘라는 위치도 포함되어 있다고 보아야 할 것 같다.

이러한 해석은 중축선의 다른 한 측면이 황제가 天地 제사를 거행하는 장소라는 점과 긴밀히 연관되어 있다. 하지만 기왕의 연구에서는 종묘 제사와 天地 제사를 대립하는 것으로 이해해 왔기 때문에 중축선 논의에서도 종묘 제사는 경시될 수밖에 없었다. 예컨대 郊祀 제도 논의에서 天地 제사를 지내는 곳이 長安城의 南郊와 北郊로 옮겨왔던 시점이 매우 중요시되는데,⁵⁾ 그 이유는 장안성 주변이 아니라 멀리 떨어진 곳에서 天地를 제사하게 되면 황제가 일일이 제사를 지내러 가지 않고 멀리서 遙拜하는데 그치기 때문에 진정한 天地 제사가 되지 못한다는 것이다. 또 종묘에서

4) 許宏, 『先秦城市考古學研究』,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 pp.134-135.

5) 佐川英治, 『漢代の郊祀と都城の空間』, 『アジア遊學』, 勉誠出版社, 2012.

는 황제의 조상에게 제사를 지내는데, 이는 天地 제사와 모순 관계였다고 이해하면서, 한대에 劉氏에 의한 天命의 세습을 골자로 하는 宗廟 제사를 天地 제사보다 더 중시했었던 상황을 匡衡 등이 개혁하고자 했다는 것이다. 그러나 이러한 논의는 지나치게 종묘 제사와 천지 제사를 이분화시킨 결과이다. 우선 한대의 황제가 종묘 제사를 중시한 것은 명백한 사실이지만, 그렇다고 天地 제사를 소홀히 한 것도 아니다. 거리가 멀어 遙拜하거나 몇 년에 한 번씩 제사를 지내는 경우가 있지만, 그것은 天地 제사를 각각 甘泉과 汾陰에서 지내야 한다는 전통이 있었기 때문에 이를 장안 南郊와 北郊로 옮기지 않았을 뿐이다. 오히려 종묘 제사와 天地 제사는 왕조 초기부터 항상 함께 치러야 할 두 가지 주요 제사였다. 황제 개인이 天地 제사를 지냄으로써 황제가 天命을 대리한다는 관념이 중축선에 반영되었다고 보는 것이지만, 황제는 기본적으로 자신의 조상으로부터 天命을 승계하는 존재이기 때문에 진정한 受命은 조상 제사가 天地 제사와 연결됨으로써 비로소 가능해지기 때문이다.

한편 天地 제사가 장안성 南郊와 北郊 근처로 옮겨와야 진정한 郊祀 제도로서의 의미를 갖는다는 견해의 배경에는 우주의 상징을 구현하는 것이 都城의 주변에서 이루어져야 한다는 생각이 깔려있기 때문인 듯하다. 가령 甘泉과 汾陰은 황제가 거처하는 곳으로부터 멀어서 설령 그곳에 행차한다고 하더라도 그곳은 이른바 우주 질서를 지상세계에 구현하는 작업과는 상관이 없을 것이라는 것이다. 그러나 이 또한 수당시대 도성을 중심으로 한 상징체계에 집중한 기존의 연구 경향에 영향을 받은 결과라고 생각한다. 진한시대는 물론 수당시대에도 도성은 그 주변의 훨씬 넓은 범위 안에서 자연 지표와의 관련성 하에 기본 방향이 설정되었다. 따라서 중축선 논의에서도 도성을 포함한 주변 지역, 나아가 제국의 영역까지도 포함한 이해가 필요하다.

이상의 논의를 정리하면, 중축선 논의에 포함되어야 할 조건은 수당시대 도성에서와 같이 正殿과 圓丘을 잇는 선에 국한해서는 안 된다는 것이다. 正殿의 본래적 의미에 포함되어 있는 宗廟를 함께 고려해야 하며, 아울러 天地 제사를 지내는 장소 역시 반드시 도성의 근교에 국한시킬 필요가 없다. 古來로부터의 전통과 습속을 고려하여, 여러 종류의 軸線이 상정될 필요가 있다.

(2) 中軸線의 변동

기존의 중축선 논의에서 또 한 가지 간과되고 있는 부분이 <중축선의 변동 가능성>이다. 즉 중축선은 計劃都市라는 전제 위에서 논의되어 왔다. 도성이 처음 설계되

고 만들어지는 왕조 초기에 그 원칙이 반영되었다면 그 모습은 도성이 파괴되기 전까지는 항상 그 모습을 유지할 수 있다. 왕조가 개창되는 시점부터 멸망하는 시기까지 일관된 중축선의 모습을 찾을 수 있는 것이다. 누구에게든 확실히 중축선이 명확히 드러날 뿐 아니라, 오랫동안 일관된 모습을 유지하고 있기 때문에 중축선의 의미가 더 강력하게 느껴지는 것은 분명하다. 하지만 이런 전제 또한 수당시대의 도성에서 중축선의 전형적 형태를 찾았던 데에서 비롯되었던 만큼, 그 타당성 여부를 다시 검토해 볼 필요가 있다.

첫째, 도성의 설계는 여러 차례 이루어졌다. 왕조 초기에 결정된 중축선이 왕조가 멸망하고 폐허가 될 때까지 이어진다는 생각은 기본적으로 도성의 설계가 단 한 번 이루어진다는 생각에서 비롯된다. 하지만 도성의 기본적인 설계가 왕조 초기에 이루어진다고 하더라도, 그 뒤에 얼마든지 추가되거나 변경될 수 있다. 한대의 경우는 말할 나위도 없지만, 그 이후 시대에도 이러한 현상은 자주 일어났다. 가령 북위시대의 도성도 태조 도무제 천흥 원년(398년)에 중국식 궁실과 종묘, 사직이 만들어진 이후, 명원제 시기 泰常7년(422)에 외곽이 축조되었으며, 太武帝 시기 延和원년(432)에 대규모 사민이 이루어지면서 새로운 건축이 추가되게 되었다. 이렇게 성곽이 만들어지거나 새로운 건축이 추가되면, 당연히 그 설계의 일정한 변화가 발생하기 마련이다. 물론 처음에 만들어진 것을 허물어 버릴 수 없는 한 기존의 설계를 최대한 존중할 수 밖에 없지만, 새로운 건축을 통해 처음과는 상이한 의미를 부여할 수 있다.

둘째, 開祖가 아닌 후대의 황제라도 충분히 자신의 정치적 이념을 도성 설계에 반영하려는 의지를 가질 수 있다. 왕조 초기의 설계는 기본적으로 왕조를 창시한 開祖의 이념이 담겨있기 마련인 만큼 중요한 원칙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開祖를 계승함으로써 정통성을 갖게 되는 후대의 皇帝들이 이러한 왕조의 이념을 지켜야 하는 것도 분명하다. 하지만 자신이 새롭게 다시 한번 受命天子임을 드러내 보이려는 시도가 꾸준히 나타난 것도 사실이다. 도성 설계에 아무런 변화가 없다는 것은 더 이상 도성 설계에 담겨있는 이념을 준수한다는 것도 있지만, 그 반대로 왕조의 황제들이 왕조의 이념에 추가하여 개개인의 통치 이념을 새롭게 확장하려는 노력이 보이지 않는다는 뜻이 되기도 하다.

셋째, 완전한 좌우대칭 형태의 중축선이 아니라고 해서 그 중축선이 갖는 의미가 줄어들지는 않는다. 앞서 만들어진 건축 위에 새로운 건축이 추가된다면 그 전체 구조는 매우 복잡해져 그 설계에 담은 상징이 명백히 드러나지 않게 되기 쉽다. 하

지만 중축선의 형태가 불명확하더라도 더욱 중요한 것은 그 중축선에 담고자 했던 상징이다.

이와 같이 굳이 중축선이 왕조 초기에 설정되어 불변한 상태로 남아있어야 할 필요는 없다. 황제마다 자신의 정치적 이념을 강화하고 그것을 도성의 설계에 반영할 가능성은 충분하다. 전한의 시기에서 이러한 가능성을 가장 분명하게 타진해 볼 수 있다.

전한의 도성이 처음부터 완전한 설계 위에서 진행된 것이 아니라는 사실은 이미 잘 알려져 있는 사실이다. 전한의 장안성은 개개의 역사적 지층들 속에 담긴 여러 개의 모습으로 구성되어 있다.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기존의 한 장안성과 관련한 논의에서는 이러한 축차적 건축이 갖는 상징성의 변화에 대해서는 거의 언급하지 않았다. 모든 연구에서 장안성의 축성 과정이 혜제, 무제, 왕망의 세 단계로 이루어졌다는 점을 말하면서도, 정작 각 단계 별로 진행된 도성 건축이 어떤 원칙과 상징을 갖고 진행되었는지에 대해서는 언급이 없다. 도성 설계의 상징은 언제나 축성이 완료된 최종 단계 즉 왕망의 단계에 형성된 장안성의 지도를 바탕으로 논의될 뿐이었다. 각 단계별로 진행된 도성 건축은 결코 무의미한 건축의 집적이 아니었다. 새로운 건축은 옛 것을 새롭게 재해석하고 도성의 건축적 상징적 구조를 바꾸어 놓았다.⁶⁾

도성의 점진적인 축조를 설명하면서도 도성의 상징은 언급하지 않는 까닭은 도성의 설계가 갖는 상징과 의미가 왕조 내에서 변동될 수 있다는 점을 인정하지 않았기 때문이다. 그러한 상징은 왕조 초반에 결정되기 마련이고, 이후 설계의 변동에 따라 바뀌지 않을 것이라고 생각한 것이다. 開祖가 아닌 황제가 자신만의 이념형을 도성 설계에 반영하지 못할 것이라는 생각이 깔려있기 때문일지도 모르겠다. 그러나 전한의 황제들은 비록 高祖가 받은 天命을 계승하는 형태를 취하고 있으면서도 자신이 새롭게 天命을 받을 수 있다는 생각했으며, 새로운 天命의 受命에 적합한 개혁을 시행하는데, 그 대표적인 사례가 이른바 改曆을 포함한 왕조 전반의 제도 개혁, 그리고 그것과 동반한 封禪 제사이다. 이러한 개혁과 봉선은 왕조의 창건에 버금갈 만한 사건이다. 天命을 다시금 받았다는 증거로 각종 吉祥과 前兆가 뒷받침되어야만 비로소 가능한 것이었다. 高祖가 天命을 받았다는 점을 결코 부인하지 않았기에 高廟를 즉위 의례 때에 필수적으로 알현해야 하는 곳으로 받아들이면서도, 그와 동시에 자신이 직접 天地에 제사를 지내 天과의 직접적인 소통을 꾀하고, 그러한 소통을 改曆

6) 무홍 지음, 김병준 옮김, 『순간과 영원』, 아카넷, 2001.

등 각종 제도 개혁으로 표현한 것이다. 『易緯稽覽圖』에 “昌以西伯受命, 入戊午三十九年伐崇侯, 作靈臺, 改正朔, 布王號于天下, 受籙應河圖”라는 기록은 天命의 受命과 改正朔의 상관 관계를 말해준다. 이 때 도성의 설계에 자신의 이상을 반영하지 않으면 오히려 이상한 일일 것이다.

Ⅲ. 中軸線의 계승과 출현

(1) 秦 都城의 계승 : 高祖

漢 高祖 元年 項羽가 沛公을 巴, 蜀, 漢中을 다스리는 漢王에 봉했을 때 都邑은 南鄭이었다. 2년 2월에 漢王은 秦의 社稷을 없애고 漢의 사직을 세웠지만, 이곳은 南鄭이었을 것이다. 2년 6월에 太子를 세우고 櫟陽을 지키도록 했고, 關中에 있는 제후들의 子弟들도 櫟陽에 모이도록 했다. 한편 漢王은 5년 정월에 황제에 즉위했는데, 그 즉위 장소는 櫟陽이 아니라 齊陰 근처 汜水의 동쪽이었으며, 도읍은 洛陽에 두었다.

그러나 劉敬과 張良의 주장에 따라 5월 長安에 도읍을 두게 되었다. 다만 아직 궁전이 마련되지 않아 櫟陽으로 돌아갈 수밖에 없었다. 그 해 後9월 蕭何는 비로소 秦의 興樂宮을 수리하여 長樂宮을 만들기 시작했다. 고조 7년 2월 長樂宮이 완성된 이후 9년에 미양궁과 前殿, 그리고 기본적인 武庫와 太倉이 세워졌지만, 고조는 여전히 주로 長樂宮에 거처하다가 이곳에서 사망하였다. 따라서 7년까지는 秦의 궁전이 여기 저기에 남아있는 상태였으며, 7년부터 9년까지는 長樂宮을 正殿으로 삼아 그 주변에 관청이 만들어지기 시작했고, 9년부터 12년까지는 미양궁과 前殿, 그리고 武庫와 太倉이라는 국가의 주요 시설이 갖추어지기 시작했다. 長陵이 정확히 언제부터 만들어지기 시작했는지 분명하지 않지만, 蕭何가 장안성의 장락궁과 미양궁을 연이어 수리할 때에 그 위치는 정해졌을 것이다. 따라서 7년 이후에는 장락궁-미양궁, 그리고 渭河를 건넌 북쪽 편에 長陵을 잇는 軸線이 마련되었을 것이다.

소하가 장안성 건축을 시작하면서 기본적인 남북 축선을 고려했을 것임은 바로 그 이전 시기인 秦代에 이미 도성 설계에 天上의 모습을 반영했다는 사실이 일반에게 널리 알려져 있었으므로 소하가 이를 인식하지 못할 까닭이 없었을 것이기 때문이다. 秦始皇은 전국을 통일하면서 渭河의 북쪽 도성 북쪽으로 자신이 멸망시킨 6국의 궁실을 모방해 놓아 통일 帝國의 도성임을 드러내고자 했고, 渭河 남쪽에는 높은 章

臺와 苑林 및 종묘를 만들었다. 27년에는 渭南에 天極을 모방한 極廟를 만들고 이를 자신의 壽陵이 있는 酈山과 연결시켰다. 宗廟와 陵墓를 결합하고자 하였던 것이다. 즉 통일 이후 秦제국의 도성은 渭河를 중심으로 북쪽의 행정 중심과 남쪽의 종묘 및 유락 중심의 두 지역으로 구분되어 있었다.

진시황 35년 이러한 설계에 약간의 변화가 추가되었다. 함양의 인구가 많아지면서 위하 남쪽으로 도성을 확장하고자 하여 阿房宮을 착공하면서, 위하 북쪽의 함양과 남쪽의 아방궁을 연결하는 도로를 만들어 天極의 關道가 은하를 건너 營室에 이르는 형상을 드러내고자 했다. 渭河를 은하로 간주하고, 남북의 축선을 만들어 도성에 우주 천상의 질서를 표현하고자 했던 것이다. 한 가지 흥미로운 사실은 위하 남북의 축선을 언급한 뒤 곧이어 동해 바다 胸界에 돌을 세워 秦의 동문으로 삼았다고 기록되어 있는데, 이 위치는 極廟와 능묘를 연결하는 동서의 축선에 맞닿아 있다는 점이다.

소하가 기본적으로 秦代의 도성 咸陽을 계승하려는 원칙을 갖고 있었던 이상, 한의 도읍 장안의 설계에도 제국의 중심으로서의 도성이라는 점과 우주의 질서가 반영되어야 한다는 점이 반영되었을 것임은 명백하다. 고조 9년에 미양궁이 완성되면서 비로소 남북을 잇는 축선이 모습을 갖추었을 것이다. 현재 社稷의 위치와 上帝를 비롯한 諸神에 대한 사당의 위치는 분명하지 않지만, 축선이 마련된 장락궁의 주변 혹은 장락궁과 미양궁의 사이에 놓여져 있을 것이라고 추정된다. 미양궁과 함께 만들어졌던 武庫가 이 가운데에 놓여진 것도 이러한 축선 개념이 반영된 결과일 것이다. 다만 이 축선은 성벽이 전제되지 않은 상태에서 설정된 것이었다.

한편 軸線의 근본적 의미가 天命을 받았음을 드러내 보이는 것이었다면, 漢의 축선은 秦의 축선과는 달라야 했을 것이다. 진시황 35년에 설정된 축선이 阿房宮과 渭河 북쪽의 함양궁을 잇는 선이었던 것을 이제 장락궁과 長陵의 선으로 일단 옮겨왔다고 해석된다.

(2) 장안성의 築城: 혜제와 여후

고조시기의 장안성 설계를 蕭何가 담당했다고 한다면, 고조가 죽은 뒤 혜제가 즉위하면서부터는 叔孫通이 뒤를 이었다. 그가 시작했던 첫 번째 공사는 장안성 축성 공사였다. 혜제가 즉위한 元年 春正月부터 성을 쌓기 시작했고, 3년에 장안 주변의 男女 14만 6천명을 징발해 30일간 성을 쌓았고, 4년에 축성의 절반을 완성했으며, 5

년과 6년에도 축성을 계속하여 6년에 축성이 완성되었다고 한다.

고조 말기에 성벽 없이 장락궁과 미양궁 및 주요 기관이 마련된 것은 秦 도성 함양과 동일한 방식이었으나, 이제 혜제 시기에 들어와 축성을 시작했다는 것 자체가 이전과 다른 또 하나의 기념비를 만들어내는 작업이었다. 이 축성의 의미와 관련해 많은 논의가 이루어졌지만, 남쪽 성벽은 南斗를, 그리고 북쪽 성벽은 北斗를 형상했다는 견해는⁷⁾ 더 이상 받아들여지지 않는 추세다. 주된 입장은 성의 북쪽은 위하의 흐름에 따라, 그리고 성의 남쪽은 공간이 넓어서 자연적으로 만들어진 것이라는 것이다. 그러나 필자는 성벽의 형태에 天文의 현상을 반영했다는 입장에서 있다. 그 이유는 첫째, 혜제 초기 성벽을 만들면서 굳이 渭河 가까이까지 성벽을 만들 필요가 없었다. 혜제 원년까지 장안성은 위하에서 남쪽으로 멀리 떨어진 장락궁과 미양궁으로 이루어진 조합에 불과했다. 북쪽에 大市(東市)가 있었지만, 그 위치가 어디인지 확실하지 않거니와, 西市는 혜제 6년 6월이 돼서야 설치되었다. 동시와 서시를 성벽에 넣기 위해서 渭河 가까이까지 성벽을 만들었다는 주장은 성립하지 않는다. 전국 시대의 사례를 보면 얼마든지 시장을 포함하지 않은 상태에서 渭河와 멀리 떨어진 곳에 직선 형태의 성벽을 만들 수 있었음에도 불구하고, 또 남쪽 성벽도 얼마든지 직선 형태의 성벽을 만들 수 있었음에도 불구하고, 굳이 北斗와 南斗의 형태를 취한 것은 결코 기술적인 한계 때문이거나 우연적인 것은 아니었을 것이다.

둘째, 제국의 도성에 우주질서의 상징이 갖추어져야 한다는 사실을 秦의 사례에서 보았고, 비록 고조가 처음에 과도한 사치를 반대했지만 蕭何의 축선 설계가 반영된 장락궁과 미양궁 건축에 동의해서 그 기본이 만들어져 있는데, 혜제가 이를 갑자기 포기할 리 없기 때문이다.

셋째, 혜제가 즉위하자마자 예법을 통해 천자의 위엄을 강화하려는 숙손통에게 陵園과 寢廟에 관한 禮法 논의 일체를 맡겼다는 것은⁸⁾ 축성에 특별한 의미를 부여했을 가능성이 크다.

한편 고조가 죽을 때까지 장락궁을 주 正殿으로 이용했던 것과 달리, 혜제는 즉위와 함께 미양궁을 황궁으로 삼았다. 여태후는 장락궁에, 혜제는 미양궁에 거처하는 형세가 되었다. 미양궁의 東闕이 특별하게 만들어진 까닭도 長樂宮으로의 朝謁을 위해서였지만, 실제 혜제는 미양궁을 나와 장락궁으로 자주 행차했다. 다시 말해 여태

7) 『三輔黃圖』 卷1 漢長安故城 “城南爲南斗形，北爲北斗形，至今人呼漢京城爲斗城是也。”

8) 『史記』 卷99 叔孫通列傳 p.2725 “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箸也。”

후가 정권을 장악하고 있었던 이상, 장안성의 구조는 미양궁만이 正殿으로서 기능한 것이 아니라, 미양궁과 장락궁이 함께 좌우에 늘어선 상태로 正殿의 역할을 담당했던 것이다. 그렇다면 正殿을 지나가는 축선이 있다면, 그 축선은 미양궁과 장락궁의 가운데를 지나가는 것이 마땅하다.

혜제와 여후에게 또 한 가지 중요했던 것은 한 왕조의 안정화 작업이었다. 이제 막 왕조가 개창한 상태에서 開祖인 고조가 사망하고, 15살 혜제가 즉위한 상태였기 때문에, 이들에게는 왕조의 開祖를 정통성의 근거로 삼아야 했고, 이를 위해서는 高祖에 대한 신비화 작업이 필요했다. 이를 위한 가장 중요한 작업은 무엇보다 高廟의 제작일 것이다. 혜제가 즉위할 때는 물론 빈번히 高廟에게 참배하였다는 것은 이러한 상황을 반영한다. 사실 秦代부터 陵園과 宗廟가 결합되는 경향이 보이고, 진시황의 경우에도 極廟와 鄴山이 결합되어 있었던 것을 고려하면, 혜제가 高廟를 長陵에서 떼어내어 도성의 정가운데에 위치시킨 것은 그가 도성의 중축선에 각별한 의미를 부여한 것이라고 보아야 한다.

앞서 살펴본 장안성의 축성도 이러한 맥락에서 이해가 가능하다. 성벽을 만든다는 것은 곧 성문을 만든다는 것을 의미한다. 그리고 성문은 다시 도성 내부의 도로와 연결된다. 즉 축성은 성문과 대로의 위치와 방향을 염두에 두지 않을 수 없는 것이다. 그런데 혜제가 축성한 장안성의 정 가운데에 安門이 만들어지고 그 문을 따라 安門大街가 형성되었으며, 그 安門大街에 고묘가 설치되었고, 그리고 이렇게 이어지는 축선을 따라 북쪽으로 위하를 건너게 되면 長陵에 이르게 되어, 이른바 중축선이 형성되었던 것이다.

최근 GPS를 이용한 연구에 의하면, 이 중축선의 남쪽과 북쪽에 다시 중요한 지표가 연결되어 있었다고 한다.⁹⁾ 즉 남쪽으로는 子午谷에, 그리고 북쪽으로는 三原縣 嵯峨鄉 天井岸村에 위치한 직경 250m, 깊이 30m의 대형 圓坑이 모두 동경 108도 52분에 위치한다는 것이다. 그리고 이는 다시 『한서』 高帝紀 “元年冬十月, 五星聚于東井”으로 연결되는데, 『한서』 천문지는 이 東井을 고조가 수명을 받은 증거라고 해석하고 있기 때문이다. 다시 말해 고조의 受命을 드러내 보이기 위해 남북으로 75km나 이어지는 중축선을 설정하고 그 곳에 子午谷, 安門, 高廟, 長陵, 東井을 올려 놓았던 것이다.¹⁰⁾

9) 黃曉芬, 『漢長安城建設における南北の中軸ラインとその象徴性』, 『史學雜誌』 115-11, 2006.

10) 김병준, 『한대 묘장의 위치와 축조에 관한 몇 가지 문제』, 『중국고대사연구』 12, 2004.

혜제가 죽은 뒤 여후 시기에도 기본적인 정치 이념은 변하지 않았다. 혜제와 마찬가지로 고조의 종묘를 특별히 중시하였는데, 열후의 功을 서열화해서 조정에서의 지위를 결정하고 이를 高廟에 보관하자는 여후의 주장은 開祖인 高祖에 기대어 한 왕조를 안정시키려는 자신의 정치 이념이 담겨있다. 특히 주목되는 점은 先帝의 宗廟와 廟寢, 園官에 대한 사항을 법령으로 정해 두어 신하들이 마음대로 논의하지 못하도록 하고 이를 어길 경우 棄市에 처하도록 했다는 점이다. 다시 말해 자신들이 설정한 중축선과 그에 담았던 상징을 그대로 유지하려는 강력한 의지가 표현된 것이다.

IV. 中軸線의 이동과 분리

(1) 文帝의 改曆 시도

문제 시기의 초반부는 혜제와 여후 시기와 크게 다를 바 없었다. 여후 세력을 제거하고 즉위했지만, 그 정당성은 오로지 高祖의 일족이라는 데에 있었다. 高廟에 알현하는 것을 시작으로 정무를 시작했을 뿐 아니라, 즉위하자마자 太子를 세워 宗廟를 존중했다는 기록은 이런 분위기를 전해준다.

하지만 취약한 정통성은 다시금 文帝 나름대로 통치의 정당성을 구하지 않으면 안 되게 만들었다. 다만 즉위 이후 道家之學을 표방한 문제는 당장 이를 시행할 수 없었다.¹¹⁾ 그러나 어느 정도 시간이 흐른 시점, 문제 13년이 되면서 상황은 바뀌기 시작한다. 그 이전까지만 해도 문제의 天 제사는 개인의 기복을 위한 것이었다. 그러던 것이 문제 13년과 14년 조칙에서는 더 이상 天 제사를 통해 복을 자신에게만 돌리지 않고, 이제부터는 백성을 위한 덕치를 행하고자 한다는 새로운 통치 입장을 강조한 것이다.¹²⁾ 이러한 입장 변화에 맞추어 문제 13년 公孫臣이 黃龍의 출현을 受命의 상징이라고 간주하고 “改正朔, 易服色”을 주장했는데, 문제 16년 黃龍이 나타났다고 하자 문제는 곧 역보와 복색 등의 개혁을 직접 명령하였다. 그리고 그해 여름 天과의 소통을 위해 본인이 직접 上帝와 諸神에게 친히 郊祭하기 위해 雍五畝를 제사지냈

11) 『史記』卷23, 禮書 p.1159 “孝文郎位, 有司議欲定儀禮. 孝文好道家之學, 以爲繁禮飾貌, 無益於治, 躬化謂何耳, 故罷去之.”

12) 好並隆司, 『秦漢帝國史研究』, pp.310-313

다. 문제 17년에는 辛垣平이 長安에 神氣가 나타난 것을 역시 上帝의 징험이라고 보고 上帝에게 제사지낼 것을 주장하자, 문제는 渭陽五帝廟를 만들었다. 이 渭陽五帝廟는 상제를 위해 殿을 만들고 五帝를 위해 5門을 설치하였는데, 상세한 바는 알기 어렵지만 기존의 雍五畝를 뛰어넘는 上帝의 존재를 인정한 새로운 祭天 의식으로 생각된다. 더욱이 한 高祖가 秦의 雍四畝에 더해 자신을 黑帝로 간주하여 雍五畝를 구성했다는 것을 참고하면, 高祖를 포함하는 五畝를 초월하는 의지가 엿보인다. 문제는 이 의식을 치룬 뒤 더욱 본격적으로 새로운 受命을 드러내 보일 巡守와 封禪을 준비하기 시작했다. 한마디로 문제는 새로운 受命天子으로서의 모습을 드러내 보이고자 했던 것이다.

한편 渭陽五帝廟는 渭水와 灊水가 만나는 지점에 두었는데, 일단 기존에 祭天 의식이 이루어지는 雍에서 벗어나 새로운 장소를 지정했다는 점에 주목할 필요가 있다. 이어 문제는 五帝壇을 세우게 되는데, 그 장소는 자신의 능원인 霸陵에서 直北한 곳이라고 한다. 그런데 이 두 장소는 실질적으로 남북의 축선을 이룬다. 결국 문제는 자신의 능원인 霸陵, 渭陽五帝廟, 五帝壇을 하나의 축선 위에 올려놓고 祭天 의식을 거행하면서, 자신이 새로운 受命天子임을 내보이고자 했던 것이다.

이러한 분위기는 改元으로까지 이어졌고, 이어서 汾陰 제사를 통해 또 다른 天命의 상징인 周鼎을 기다리기도 했지만, 辛垣平의 神氣 운운한 것이 모두 거짓으로 판명되면서 渭陽五帝廟와 長門五帝壇에 대한 제사는 물론 改制 전반에 대해 흥미를 잃어버리고는 다시금 초반부처럼 高廟에 대한 중시로 되돌아가게 되었다.

이상의 논의를 정리하여 도성의 설계에 반영하면, 문제 초반부에는 기존의 중축선을 그대로 묵수하였지만, 13년 이후 새로운 受命天子를 자임하기 위해 새로운 축선을 설정하기에 이르렀다. 기존 도성의 安門大街 중축선을 그대로 둔 상태에서 자신이 설정한 새로운 중축선을 만드려고 했던 셈이다. 하지만 결국 그 시도도 실패로 돌아가 버렸다.

(2) 武帝의 太初 改曆과 중축선의 분열

景帝 시기에는 새로운 受命을 찾으려는 시도가 보이지 않는다. 그보다는 부친의 종묘를 太宗廟로 격상하는 등 종묘 제도를 정비하여 郡國에서 이를 따르도록 하고, 제후들도 侍祠할 것을 명령하였다. 기존의 중축선을 통해 조상이 받은 天命을 계승하는 방식이 사용되었던 것이다.

武帝는 즉위한 후 文帝의 예를 좇아 새로운 제도 개혁을 시도했다. 유생들은 天子가 巡守와 봉선을 행하고 역보와 복색을 바꾸는 대대적 개혁을 통해 새로운 受命天子의 모습을 갖출 것을 건의했으나 竇太后의 반대로 그 뜻을 이루지 못했다.¹³⁾ 竇太后가 사망한 이후 무제는 본격적인 개혁에 착수했다. 그런데 그 개혁은 도성의 기존 설계를 크게 흐트러뜨리는 것이었다.

먼저 무제는 장안성 안에 새로운 건축을 다수 만들기 시작했다. 그런데 그 중 가장 중요한 건축은 태초 元년에 만들어진 建章宮이었다. 건장궁은 매우 화려하고 그 안에는 고층 건축이 즐비하였다고 하며, 別風闕과 井干樓를 잇는 天橋, 그리고 神明臺, 承露盤을 이고 있는 선인이 장관이었다고 한다. 하지만 建章宮은 단지 離宮이나 別館은 아니었다. 이곳에는 千門萬戶라 불릴 정도로 많은 건축이 들어와 있었고, 무엇보다 황제가 거주하는 前殿으로서 玉堂이 갖추어져 있었다. 그리하여 未央宮의 前殿과 함께 황제의 주요 정치 공간이었다는 것이다. 무제는 적지 않은 기간 동안 건장궁의 前殿에서 정무를 보았다. 昭帝가 즉위하면서 그 주요 정치공간을 건장궁에서 미양궁으로 옮겨왔다고 한 것은 그만큼 무제가 건장궁에 오래 머물렀다는 것을 의미한다.

그런데 이렇게 황제의 정치적 공간이 건장궁으로 확대되었다는 것은 단순한 도성의 확대에 그치지 않는다. 그동안 고조 이래 도성 내의 주요 정치 공간은 미양궁과 장락궁이었다. 황제의 거주공간으로서의 미양궁, 태후의 공간으로서의 장락궁이라는 두 개의 궁실이 동서로 나란히 놓여 있고, 그 사이를 安門大街 중축선이 지나갔던 것이다. 그만큼 전한 초기의 정치는 황제와 태후가 함께 이끌어갔다고 할 수도 있다. 무제의 초반부 역시 황제와 두태후가 정치의 중심에 있었다. 그런데 이러한 도성 중심 구조가 建章宮의 건축으로 말미암아 뒤바뀌어진 것이다. 建章宮은 미양궁의 서쪽에 위치한다. 따라서 도성의 중심도 미양궁-장락궁의 가운데 축선이 아니라 건장궁-미양궁-장락궁의 가운데, 즉 미양궁을 중심으로 축선으로 옮겨오게 되는 것이다. 현재 고고발굴 결과 미양궁 前殿에서 미양궁의 南宮門 그리고 장안성 남쪽 西安門을 잇는 축선이 확인되는데, 무제는 安門大街의 축선을 이곳으로 옮겨왔던 것이다. 사실 건장궁을 포함한 구도 속에서 형성된 이 중축선은 어찌 보면 惠帝가 사망의 성벽을 둘러쌓아 만든 도성의 구조를 해체하는 것이기도 하다. 더 이상 성벽으로 둘러친 상

13) 『史記』 封禪書 p.1384 “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曆服色事未就。”

태에서의 도성 설계에 만족하지 않고, 이를 과감히 벗어난 상태에서의 설계 방식이었다. 이는 진시황의 도성 설계와도 맥을 같이 한다.

이 중축선의 남쪽을 따라가면 이른바 漢 社稷 유지가 이어진다. 전술한 바와 같이 한 왕조를 성립하자마자 고조가 세운 社稷은 장안에 세워지지 않았지만 그 뒤 安門 大街 주변에 高廟와 함께 두어져 있었을 것이라고 추정된다. 그런데 한의 社稷은 그 이후 다시 한 번 세워지게 되는데, (“又立官社”) 그 단서는 “夏禹를 配祀한다”는 것이다. 그런데 漢의 社稷에 夏禹를 配祀한다는 것은 적어도 漢이 공식적으로 夏禹와의 배타적 관계를 공인해야만 하는 것이다. 일반적으로 漢은 堯의 후예라고 알려져 있지만, 顧頡剛의 분석에 의하면 이는 전한 말 혹은 후한초 緯書가 유행하면서 성립된 것일 뿐 전한에서는 이러한 연계를 찾을 수 없다. 五德終始說의 木德이 夏禹에 해당되지만, 漢은 水德說과 土德說 사이를 오고 갔을 뿐 木德과는 상관이 없다. 전한 왕조 시기 夏禹와의 유일한 관련은 武帝 太初년간의 改曆과 관련된 것 뿐이다. 太初曆은 建寅 즉 夏正을 사용하였던 것이다. 이렇게 夏와의 관련을 언급한 것으로는 태초 改曆에 참여했던 사마천이 夏를 忠, 殷을 敬, 周를 文으로 비정하고, 文의 弊는 忠으로 구해야 하는 바 漢이 마땅히 夏의 忠으로 이 문제를 해결해야 한다고 주장한 바 있다. 즉 武帝 태초년간 太初曆이 채택되면서 漢과 夏의 배타적 관계가 가능해졌다고 추정되는 바이다. 따라서 漢의 社稷에 夏禹를 配祀했다면, 그것은 武帝 시기일 수밖에 없는 것이다. 장안성 남쪽 F13호 및 F14호 건축유지에 대한 논의가 아직도 진행중이지만,¹⁴⁾ 일단 漢의 社稷 유지라고 보는 데에는 많은 연구자가 동의하고 있다. 이곳이 社稷이라면 이는 무제 太初 년간 새롭게 세워진 官社이며, 이곳에 세워진 까닭은 바로 태초년간 새로운 중축선이 이곳으로 옮겨왔기 때문이라고 생각한다. 하지만 이 중축선은 황제의 正殿과 社稷을 잇는 선이지, 天地 제사를 통해 受命을 도성 중축선에 반영하겠다는 생각은 없었다.

한편 竇太后 사망 이후 무제는 여전히 雍五畝에서 郊祀 제사를 드렸지만, 謬忌의 太一 제사 건의를 듣고 난 뒤 天의 최고신으로서 太一을 제사지낸 반면 종래의 五帝를 太一의 보좌로 끌어내렸다. 高祖가 스스로 자신을 五帝의 하나인 黑帝라고 한 것을 참조하면, 무제는 고조가 받은 天命을 뛰어넘는 受命天子를 겨냥하고 있었다고 볼 수 있다. 다만 그 장소는 여전히 長安의 東南郊이거나 혹은 雍이었다. 그런데 太

14) 黃展岳, 『史籍所見의 漢長安城南郊禮制建築』, 同氏著, 『先秦兩漢考古論叢』, 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8 ; 劉瑞, 『漢長安城南郊社稷建築初探』, 『咸陽師範學院學報』 2007-2.

初년간 改曆과 함께 郊祀제도가 정비되면서 太一은 甘泉에서, 그리고 后土는 汾陰에서 제사를 지내도록 정리되었다. 결국 天地 제사는 文帝 시기 渭陽五帝廟와 長門五帝壇을 잇는 남북 축선에서 甘泉과 汾陰을 잇는 동서 축선으로 바뀌었다. 흥미있는 것은 이러한 동서 축선을 잇는 선 위에 泰山이 위치하고 있는데, 무제는 이 泰山에 明堂을 세웠다는 점이다. 요컨대 무제는 高廟를 통한 천명의 계승을 부정하지는 않았지만, 다시 한 번 스스로 受命天子임을 증명하기 위해 봉선과 명당을 거행하였고, 太一 및 后土 제사를 甘泉과 汾陰에서 시행했는데, 이것들은 모두 장안성의 범위를 떠나 한 제국 전체 영역을 가로지르는 동서 축선 위에 놓여있었다.

V. 중축선의 회귀

成帝 시기 匡衡은 帝王의 임무로서 天에 대한 제사를 강조하고 기존의 제사 의례에 대한 개혁을 주장하였다. 그 내용의 핵심은 郊祀 장소가 너무 멀기 때문에 비용상 큰 부담이 되므로 甘泉의 太一 제사와 汾陰의 后土 제사를 長安城으로 옮기자는 것이다. 그리하여 장안 근교에 남쪽과 북쪽 두 곳에 2채를 만들고, 雍五畝를 폐지하며 전국의 주술적 舊祀를 폐지하였다. 武帝가 受命天子를 자임하며 도성 安門大街 중축선에 묶어 놓았던 天地 제사를 제국의 동서 축선에 올려 놓았었는데, 이제 다시 天地 제사 장소를 도성 주변으로 다시 끌고 온 셈이었다. 또 한 가지 明堂의 위치도 장안성 근처로 옮겨오게 된다. 蔡邕의 <明堂月令論>에 의하면, "명당은 천자의 太廟이며 황제가 上帝를 숭배함과 동시에 조상에게 제사를 드리는 장소이다." 무제가 泰山 아래에 명당을 세웠던 것을 장안성 남쪽으로 옮겨왔던 것이다.

이 두 가지 제사 장소가 하나의 중축선으로 이어지게 되는데, 그 중축선은 무제 이전으로 거슬러 올라가는 전통적 중축선, 즉 安門大街와 高廟를 잇는 중축선과 일치하게 된다. 한편 왕망은 天地를 제사하는 명당에 조상을 配祀하는 방식을 결합하였는데, 이것이야말로 종묘와 天地 제사가 합일된 형태의 중축선이라고 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결국 成帝 이후 중축선은 武帝가 흐트러뜨려 놓은 중축선을 다시 본래의 형태로 되돌려 놓은 의미가 강하다. 왕망은 地皇3年 建章宮을 비롯한 장안성 서쪽의 궁전 10여 곳의 궁실을 허물고 그 건축재료를 이용해 장안성 남쪽의 소위 王莽九廟를 건

설했는데, 이것 또한 무제의 독특한 중축선 설계를 부정하고 전통적인 중축선의 의미를 되살리려는 의도로 파악된다.

결론

본고에서는 중국 도성사에서 한 장안성이 갖는 위상이 항상 始源的 의미 혹은 과도기적 의미 이상을 갖지 못하는 데에 착목하여, 그 원인이 무엇인지를 살펴보았다. 도성사 연구가 일본에서 시작된 도성사 연구의 영향 하에 수당시대 도성을 완성태로 두고, 그곳에 도달하는 과정을 추적하였기 때문이라고 보았다. 따라서 기존 연구의 방향과는 반대로 초기 국가의 도성 형태를 분석하여 그 의미를 찾아내고 그것이 어떻게 변용되어 갔는지의 방식이 필요하다.

이러한 입장에서 중축선의 문제를 생각해 보면, 중축선을 구성하는 요소에 대한 재검토가 가능하다. 중축선은 황제의 正殿과 天地 제사를 지내는 圜丘를 연결하는 선으로서 도성의 정가운데를 갈라 도성이 좌우대칭을 이루게 하는 것으로 받아들여져 왔다. 그러나 황제의 正殿은 宗廟의 성격에서 분리되어 온 것인만큼 그 자체가 절대적인 요소가 될 수 없다. 이와 함께 종묘의 위치가 더 적극적으로 고려되어야 한다. 天地 제사 장소로서의 圜丘나 南北郊가 중요한 요소이기는 하지만, 受命天子로서 새로운 天命을 드러내 보이는 방식이 어떻게 표현되었는가가 더 중요하므로 반드시 도성 주변의 남북교가 존재하는 것만을 기준으로 삼을 수는 없다.

또 한 가지는 중축선의 설계가 반드시 왕조 초기에 확정될 필요가 없다는 것이다. 開祖가 받은 天命을 계승하는 방식이 종묘에서의 즉위의례로 의례화 되지만, 황제에 따라서는 자신이 다시 한 번 天命을 받은 受命天子로서의 모습을 드러내고자 했기 때문이다. 이 경우 天命의 符應으로서의 중축선은 새롭게 만들어지거나 변경될 수 있었다.

이러한 각도에서 전한 시기 漢 長安城의 중축선이 어떻게 변화하는지를 살펴보았다. 秦의 도읍 함양의 구조와 중축선을 계승하는 원칙 하에, 고조 말기 장안성은 남북의 축선이 생겨났으며, 혜제시기에 들어와 성벽이 둘러쌓여지면서 가운데를 지나가는 중축선의 의미가 분명해졌다. 중축선이 곧 도성에 우주의 질서를 반영하려는 의도였던 만큼, 장안성의 북벽과 남벽도 각각 천문을 형상한 것이라고 보는 것이 옳을

것이다. 이후 문제가 재위 후반부에 자신의 정통성을 확립하려는 차원에서 전통적 중축선 대신 새로운 중축선을 설정하고자 하였던 모습이 있었지만 실패로 돌아갔다. 이러한 시도는 무제 태초년간에 들어와 완성을 보았다. 기존의 중축선과는 달리 성벽을 뛰어넘은 거시적 시각에서 다시금 중축선이 설정되었으며, 天地 제사와 관련해서는 장안을 뛰어넘은 제국 전체 영역에서 동서로 이어지는 축선이 만들어졌다고 생각된다. 성제 시기에 들어오면 다시 유가들에 의해 다시 전통적인 중축선으로의 회귀가 이루어졌는데, 이번에는 天地 제사와 宗廟 제사가 합일된 형태의 진정한 중축선을 추구하게 되었다.

中国中古の都城設計と天の祭祀

佐川英治（東京大学）

2014年9月19日・20日 中国古中世史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 中国都城の歴史的特質

奈良の平城京は唐の長安城の4分の1のモデルで作られたそうであるが¹、その後の長岡京や平安京にも中国の都城の設計が用いられている。それらに共通する基本的な特徴は、まず天子の宮殿から南に真っ直ぐ伸びる大街があり、そこから左右対称に碁盤の目状の街がつけられることにある。そして、この設計のモデルとなったのが唐の長安城である（図1）。東アジアの古典的な都城のスタイルは唐の長安城で完成し、以後の中国の都城設計の模範となったのである。

今日、Google Earth で北京を見れば一目瞭然であるが、北京の街の中心には故宮がある。その故宮では南北一直線に大型の建物が並び、左右の建築の配置はほぼ左右対称である。そしてこうした故宮の設計が核となって四方に街路を広げていったところに北京の街が現れる。都市の南の郊外にある巨大な天壇公園は、かつて皇帝が円丘で天を祀った場所である。北の郊外には地壇公園があり、かつて皇帝が方壇で地を祀った場所である。天壇と地壇は故宮をはさんで対をなし街の中軸線を構成している。

こうした都城の設計はたんに古代の遺産として残っているだけではない。故宮の中軸線を南に下れば、天安門の毛沢東肖像、人民英雄記念碑、毛主席紀念堂が一直線にならび、北に遡るならその遙か先には北京オリンピックのオリンピックスタジアムがある。そこには偉大な中国の歴史の過去と未来を象徴する建物が配置されており、この中軸線が都市設計の中軸線であると同時に歴史の中軸線でも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おそく北京が首都であるかぎり、この中軸線は将来の都市設計にも影響をあたえ続けるであろう。

さらに興味深いのは、古代の都城の中軸線が現代の街に復活を遂げつつあることである。今日の洛陽の市街地は、隋唐洛陽城の上に広がるが、現在の町並みは近代の都市設計によるもので古代のそれを継承していない。しかし、今日洛陽市街区の世界遺産の登録を目指すなかで、隋唐洛陽宮とその中軸線上にある応天門や定鼎門の発掘や再建が進められ、古代の中軸線が街の街路として復活されつつある。日本でも奈良では平城遷都1300年祭を記念して第一次大極殿が再建された。この大極殿は先に再建された朱雀門と正対し、平城京の中軸線を現代に蘇らせている。これらはいずれも観光を主たる目的としたものであり、現在の都市計画に波及する効果は少ないであろうが、将来あるかもしれない都市の改造において何らかの拠り所となる可能性をもつものである。

¹ 井上和人『日本古代都城制の研究——藤原京・平城京の史的意義』吉川弘文館、200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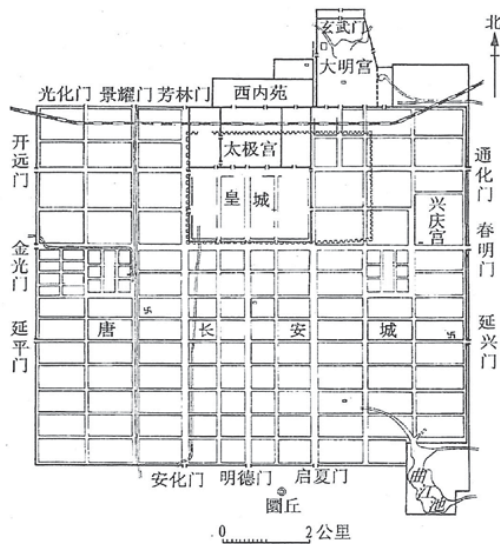


図1 唐長安城平面及園丘位置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陝西西安唐長安城園丘遺址的発掘」『考古』2000年第7期)

東アジアの古典的都城プランをもっとも象徴するものは、政治上の重要な建物の直列によって示される中軸線と、中軸線に対する左右対称の設計である。そのもっとも高度な完成形態は唐の長安城にあった。そこで中国古代史を研究する者として関心をもつのは、このような都城プランがどのようにして生まれ、なぜ唐代にその完成度をもっとも高めるのかという点である。

二 日本における漢魏洛陽城研究の現在

今日中国古代都城史の研究にはかなりの蓄積があるとはいえ、この問いに対する明快な答えを探すことは難しいであろう。陳寅恪は『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において唐の長安城のプランの淵源を探り、「夫北魏洛都新制其所以殊異於前代舊規之故、雖不易確知、然東魏鄴都南城及隋代大興即唐代長安之都邑建置全部直受北魏洛都之影響。」²⁾と述べている。陳寅恪はここで唐の長安城の設計が直接北魏の洛陽城に由来すること、そして北魏の洛陽城の設計にはそれまでとは隔絶した大きな変化がみられることを指摘している。そこで陳寅恪は西方文化の影響を考える。確かに北魏の時代に佛教文化が大きく栄え、シルクロードの繁栄した時代であったことを考えれば、西方文化の影響は当然視野に入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はいえ、中国の都城史の展開それ自体のなかにこの変化の由来をみ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ものであろうか。

この問題を考えるにあたって、まず指摘してお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は、陳寅恪の時代と今日では研究の条件が大きく異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日中戦争の下、昆明に疎開していた陳寅恪が、わずかな文献にたよって考えるしかなかったのに対して、今日では考古的な調査や発掘の成果ならびに遺跡をめぐる地理情報が豊富にある。とくに内陸部の急速な経済発展にともない、ここ数十年における資料や研究の充実にはめざましいものがある。漢魏洛陽城に関する研究も大きく発展した。

杜金鵬・銭国祥編『漢魏洛陽城遺址研究』(科学出版社、北京、2007年1月)は、編者らによって進められてきた漢魏洛陽城の発掘や研究に、これまでのとくに重要な発掘報告や研究論文を加えて編集し、今日の研究の到達点を示した大変意義ある研究成果である。また個別の遺跡に関して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漢魏洛陽故城南郊東漢刑徒墓地』(文物出版社、北京、2007年8月)や中国社会科学

²⁾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初版1940年、中華書局1974年重版、第70頁。

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漢魏洛陽故城南郊礼制建築遺址 1962～1992年考古発掘報告』（文物出版社、北京、2010年7月）といった充実した報告書が刊行され、新たな知見を提供している。あるいは現地に長期滞在して地道なフィールドワークを重ねた日本人研究者の研究成果として、塩沢裕仁『千年帝都洛陽 その遺跡と人文・自然環境』（雄山閣、東京、2010年1月）も出版されている。因みに、本書では遺跡の位置を確定するのにアメリカのCORONA衛星の航空写真を用いているが、CORONA衛星やGoogle Earthの航空写真、旧ソ連の参謀本部が作成した10万分の1の地図などは、それまでは外国研究者には難しかった遺跡の地理的把握を容易なものにした。さらに近年の発掘の成果を踏まえた李久昌『国家、空間与社会—古代洛陽都城空間演變研究—』（三秦出版社、西安、2007年11月）、段鵬琦『漢魏洛陽故城』（文物出版社、北京、2009年4月）、塩沢裕仁『東漢魏晋南北朝都城境域研究』（洛陽博物館文化叢書、洛陽、2009年2月）といった研究書も出版されている。漢魏洛陽城発掘も進み、城倉正祥「漢魏洛陽城—北魏宮城西南隅の発掘調査」（『奈文研紀要』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独立法人国立文化財機構奈良文化財研究所聯合考古隊「河南洛陽市漢魏故城発現—北魏宮城五号建築遺址」（『考古』2012年1期）、銭国祥「漢魏洛陽城の北魏宮城中枢南部の共同調査」（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日中韓古代都城文化の潮流—奈文研六〇年都城の発掘と国際共同研究』東京：クバプロ、2013年）などによって北魏の宮城の範囲がほぼ漢の北宮を踏襲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ている。このほか都城の周囲で発見される墓葬や墓誌に関する報告や資料集・研究書などは、これらに勝るペースで量を増やしている。

このように漢魏洛陽城に関する資料と研究は急速に量を増しており、北魏洛陽の都城制度の淵源を西晋洛陽→曹魏洛陽→後漢洛陽とさかのぼらせることを可能にしつつある。このことは日本の中国史研究者にも大きな刺激をあたえ、例えば2010年以降でも、村元健一「後漢雒陽城の南宮と北宮の役割について」（『大阪歴史博物館研究紀要』8、2010年）、同「中国 北朝都城の祭祀空間」（『都城制研究』7、2013年）；向井佑介「魏の洛陽城建設と文字瓦」（『待兼山考古学論叢Ⅱ—大阪大学考古学研究室20周年記念論集—』2010年）、同「曹魏洛陽の宮城をめぐる近年の議論」（『史林』95巻1号、2012年）；外村中「魏晋洛陽都城制度攷」（『人文学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99、2010年）；渡邊将智「後漢洛陽城における皇帝・諸官の政治空間」（『史学雑誌』第119編第12号、2010年）；角山典幸「北魏洛陽城の平面プランと住民の居住状況について」（『人文研紀要』72、2011年）、同「北魏洛陽仏寺著増考」（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編『アフロ・ユーラシア大陸の都市と国家』中央大学出版部、2014年3月）；塩沢裕仁「漢魏洛陽城穀水水文考」（『東洋史研究』71巻2号、2012年）；田中一輝「魏晋洛陽城研究序説」（『立命館史学』34、2013年）のほか、塩沢裕仁『後漢魏晋南北朝都城境域研究』（雄山閣、2013年）の大作が出版された。この間、報告者も「「奢靡」と「狂直」——洛陽建設をめぐる魏の明帝と高堂隆」（『中国文史論叢』6、2010年）、「游牧与農耕之間——北魏平城鹿苑的機能及其變遷」（『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聯誼会会刊』第2巻、中華書局、2011年）、「漢代の郊祀と都城の空間」（小島毅編『東アジアの王権と宗教』、勉誠出版、2012年）、「漢六朝の郊祀与城市規画」（余欣主編『中古時代的礼儀、宗教与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曹魏明帝太極殿的所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山西出版传媒集團・北岳文芸出版社、2012年）、「論六朝建康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地位」（范金民、胡阿祥主編『江南地域文化的歷史演進文集』、生活・読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などの論文を発表してきた。このように研究が盛んになったのは、文献に乏しく不明な点の多かった後漢から西晋にかけての洛陽城について、近年のさまざまな発掘や調査が刺激をあたえ、議論を呼び起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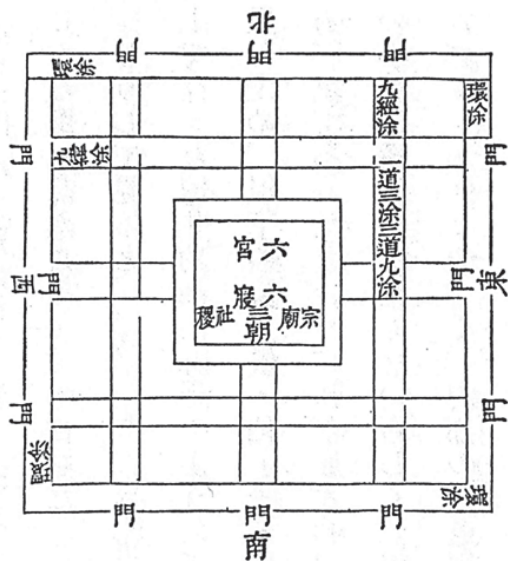


図2 王城図（戴震『考工記図』）

していることの表れである。

もともと、今日進められている漢魏洛陽城の見直しは、主として考古学の分野の研究者によって進められており、それ自体は極めて参照価値の高いものの、発掘や調査はまだごく一部の地域を対象におこなわれただけで全面的とはいえず、文献との矛盾も多く残したままである。よって今日の中国都城史の研究においては、考古学者から発せられる議論を慎重に吟味しつつ、後漢以降の洛陽を中心とした都城制度の展開を再検討することが課題となっている。

本稿では上記の問題の一端として円丘の問題をとりあげる。北魏の洛陽城にせよ唐の長安城にせよ、都城を南北に貫く中軸線の起点となるものに太極殿があり、終点となるものに円丘があった。従来都城の歴史といえば、城郭や宮殿、道路、水路などの構成と変遷を取り上げるのが一般的であるが、そこには政治的なものや地理的なものなどさまざまな要素が含まれており、純粋な設計の理念を抽出することには困難もある。しかし、円丘は純粋に理念的な建造物であり、他の制約を受けることが少ない。都城における円丘の変遷をたどることで従来とは異なる都城の歴史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以下では、近年の筆者の研究にもとに、中国古代の都城における円丘の歴史を概述してみよう。

三 前漢における南北郊出現の意味

円丘で上帝（天）を祀る祭祀を郊祀という。郊祀の由来は古いが、郊祀と都城がかかわりをもつようになるのは前漢末のことである。漢の郊祀は秦のそれを受けついでもので、本来は山川崇拜と深いかかわりを持っていた。郊祀の場所も雲陽や汾陰など都の長安から遠く離れた辺鄙な所に置かれていた。武帝の時代には神仙思想と深いかかわりを持ち、秦より継承した郊祀に加え、黄帝昇仙の伝説のある甘泉に壮麗な神殿を築いて太一なる神格を祀った。しかし、武帝の死後、しだいに儒教の影響が強まるなかで郊祀制度にも転機が訪れた。

成帝の建始元年（前32）、宰相の匡衡と張譚は、郊祀を長安の南と北の郊外でおこなうよう上表し、旧来の郊祀をすべて廃止した。廃止の主な理由は「事與古制殊」すなわち古礼に合致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たが、より積極的な意味は「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漢書』郊祀志）

すなわち郊祀を天子にとっての最大の礼と位置づけることにあった³。ただし、長安での郊祀がそのまま定着することはなく、永始三年（前 14）にはことごとく旧制に戻された。綏和二年（前 7）には再び新制が復活され、哀帝の建平三年（前 4）にはまた旧制にもどされた。ついに平帝の元始五年（紀元 5）、大司馬王莽が新制にある重要な改変を加えて長安の南北二郊を復活させるまで、三十年近くの間、新旧の制度は目まぐるしく入れ替わった⁴。

新旧の郊祀制度が置廃を繰り返した背景には、漢代における皇帝権力の問題がある。前漢時代の皇帝にとって皇位を継承するうえでの最大の要件は宗廟で高祖（劉邦）に下った天命を継承することであった⁵。ゆえに皇帝は「継體之君」と呼ばれた⁶。漢代における最も重要な祭祀はまぎれもなく宗廟の祭祀であって、漢代の祭儀においては皇帝親祭（皇帝が自ら祭祀を執り行うこと）が規定されていたのは宗廟のみであり、郊祀は別宮から遙拝しておこなうものとされていた⁷。

これに対して郊祀を天子にとっての最大の礼と位置づけたのは董仲舒である。董仲舒はいわゆる天人相関説を打ち立てた人物として知られる。董仲舒にとって天子とは常に天命に耳を傾け天譴に恐懼しつつ徳政に努めるものであった⁸。ゆえに天と天子が交感する場である郊祀は天子にとって最大の礼でなくてはならなかった。董仲舒は、天子は宗廟の祭祀を欠くことはあっても郊祀を欠くことはないとし、「百神之祭不卜、而郊獨卜、郊祭最大也。」（『春秋繁露』郊祀第六十九）、「所聞古者天子之事、莫重於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春秋繁露』郊事第七十一）と断じた⁹。匡衡らが郊祀を長安に移そうとしたのは、まさにこのためであった。

こうした郊祀を成帝が受け入れた背景には、漢帝国の成立から 160 年以上が経ち、高祖の創業の権威に頼るだけでは皇帝の権威を維持しにくくなっていたことがある。すでに武帝の時代には天命を更新せよとする再受命の要請が知識人から出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た。一方で、郊祀を重視することは、天子に有徳者を要請することになり、劉氏による世襲支配の正当性が問われかねない危うさを持っていた¹⁰。この時期、前漢の皇位は成帝—哀帝—平帝と継承されるが、成帝にも哀帝にも嗣子がなく、直系宗族が途絶えていた。こうした皇位継承の不安定さは郊祀の混乱にいっそうの拍車をかけた。

王莽は熱心な儒教の信奉者であったが、必ずしも匡衡らと同じ立場ではなく、匡衡らが今文学派であったのに対して、王莽は古文学派であった。古文学は今文学に比べて天よりも人を重視する立場をとる

³ 『漢書』卷二十五下郊祀志下：「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

⁴ 『漢書』郊祀志：「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焉。」

⁵ 西嶋定生「漢代における即位儀礼——とくに帝位継承のばあいについて」『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 年。

⁶ 『史記』卷四十九外戚世家に唐・司馬貞の索隱は、「按、繼體謂非創業之主、而是嫡子繼先帝之正體而立者也。守文猶守法也、謂非受命創制之君、但守先帝法度為之主耳。」と注している。ゆえに「繼體之君」の使命は第一に祖先を祀って宗廟を護持することにあつた。

⁷ 『晋書』卷八十三江道伝：「案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別宮遙拜、不詣壇所。」

⁸ 『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伝所載『对策』：「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

⁹ 蘇輿『春秋繁露義証』中華書局、1992 年。『春秋繁露』は雑多な内容を含んでおり、必ずしも全てが董仲舒の思想を反映し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が、天を重視することにおいては董仲舒の思想を継承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内山俊彦「董仲舒」『中国古代思想史における自然認識』創文社、1987 年。

¹⁰ 『漢書』卷七十五眭弘伝に「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とある。漢代にはもともと「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漢書』卷五十二竇嬰伝）とする天下観があつたが、天人相関説の影響が強まると「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漢書』卷八十五谷永伝）とする考え方が強まった。

とされる。王莽は平帝の時に長安の南北二郊を復活するにあたって、『孝経』聖治章の「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に基づき、南郊で天を祀る際に高祖を配祀し、北郊で地を祀る際に高后を配祀するよう祭儀を改めた¹¹。この意味は、天に祖先を配祀することで郊祀を祖先の祭祀へと読み替えることにあった。こうした王莽の郊祀改革によって、ひとまずは郊祀と宗廟の緊張は緩和され、皇帝制度の下での共存が可能となった。郊祀は長安の近郊に落ち着くことを得た。ただし、前漢はまもなく王莽に禅譲して滅び、王莽の新も15年足らずで滅びたので、実際に都城の設計に影響を与えるようになるのは後漢の洛陽においてであった。

四 宗廟と漢以前の都市設計

ここで郊祀が都城の設計にもたらした影響を考えるために漢以前の都市設計について考えてみたい。『周礼』冬官考工記については不明な点が多いが、前漢成帝の時代に『周礼』の欠けていた冬官を劉歆が本来『周礼』とはかかわりない『考工記』をもって補ったものとされており、「考工記」自体は東周以後の時代に斉の人によって書かれたものらしい¹²。しかし、少なくとも漢代の儒家にとっては、考工記の匠人営国の制度が、本来あるべき、天子の都城制度であったはずである。その内容は次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る(図2)。

(A)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B)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歩、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歩、塗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个、闔門容小扃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内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C)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塗九軌、環塗七軌、野塗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塗以爲諸侯經塗、野塗以爲都經塗。¹³

内容は三段に分かれている。(A)は都城の制度である。(B)は夏・殷・周の宮室の制度が述べられている。(C)は諸侯の都城の制度との区別である。研究者が多く論じるのは(A)であるが、ここから都城の設計の手順を復元する考え方もあれば¹⁴、都城の要件の羅列に過ぎないとする考え方もある¹⁵。いま(A)の部分を見ると、方九里に区画し、門を設け、道を作り、祖と社を置き、朝と市を配置す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一見すると都城は外から内へ向かう“外発内向”のプランで作られたかのようである。

もっとも、さらに慎重に見るならば、「左祖右社」「面朝後市」とあるのは、いずれも宮室を中心に据えて位置を述べており、その前提に宮室が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したがって宮室のことは(B)になってはじめて出てくるのであるが、実は(A)の前に(B)があるのである。

¹¹ 『漢書』郊祀志：「莽又頗改其祭禮。」

¹² 清・孫詒讓『周礼正義』卷七十四。王文錦、陳玉露点校『周礼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2月、第3101-3105頁。

¹³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会整理『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345-1354頁。

¹⁴ 村田治郎『中国の帝都』、綜芸舎、1981年、第33-42頁。

¹⁵ 佐原康夫「中国における都城の理念と東アジア」、館野和己編『古代都城のかたち』同成社、2009年、第137頁。

(B)のプランの最初に出てくるのは夏后氏の世室・殷人の重屋・周人の明堂である。この堂には廟門、闈門、路門、応門が設置される。いま鄭玄の注によって簡単に述べておくならば、廟門は宗廟の南の大門、闈門は廟中の小門、路門は大寝の門、応門は朝門にして正門である。門の順序は廟→寝→朝の順になっている。次に路寝の内の後宮として九室、路門の外の外朝としての九室が述べられる。(C)は諸侯の都城が天子のそれとほぼ同じ設計であるものの、天子の都城より門の高さ、道の広さにおいて一等下ることを述べている。

以上、考工記の記事を辿ってみると、一見“外発内向”のプランのように見えながら、実はそのプランの出発点にあるのは夏の世室、殷の重屋、周の明堂である。ではこの三者は何であろうか。鄭玄の注によれば、世室は宗廟、重屋は王宮の正堂にして大寝のごときもの、明堂は政教を明らかにする堂（明政教之堂）である。この三つを挙げることについては「此三者或挙宗廟、或挙王寝、或挙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という。すなわちこの三つの形制は全く同じである。形制は同じのままに、名称でいえば、世室→重屋→明堂と変わり、機能でいえば、宗廟→王寝→政堂と移り変わったことになる。

『詩経』大雅・文王之什・緜には古公亶父が周原で都邑を築いたときのことが謳われている。

(D) 日止日時、築室于茲。(E)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F) 迺召司空、迺召司徒、俾立室家。(G) 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揀之陿陿、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鼙鼓弗勝。(H) 迺立 臯鬲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I) 迺立冢土、戎醜攸行。¹⁶

その順序を追えば、(D) 場所を選定し、(E) 境界を定め、(F) 司空と司徒に建設を命じ、(G) 廟を建築し、(H) 臯門と応門を立て、(I) 冢土を建てる、となる。

臯門と應門は「王之郭門」と「王之正門」である。鄭玄の箋には「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としている。楊寛はまだこの時代の周の都城には城郭がなかったという考えのもとに、臯門と應門をそれぞれ宮殿の外門と正門としている¹⁷。冢土は毛伝によれば大社である。

上記の順序を考工記と比較すると、(A)のうち「方九里」や「九經九緯」は(E)に相当し、(B)は(F)から(H)に相当するといえるが、(A)に「左祖右社」とあるような宮殿外の祭祀施設の設置は(I)の順序となっている。つまり具体的な建築の順序は、廟→門→社となっているのである。『尚書』洛誥に、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歳、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

とあり、完成したばかりの洛邑に到着した成王は、最初に文王と武王を祭り、周公の功績を称えてその後嗣を魯侯に立てたのであるが、それらはみな太室すなわち宗廟でおこなわれた¹⁸。「王賓」とは成王が周公を臣下としてではなく賓客として扱ったこと、「殺禋」は犠牲を捧げること、「咸格」とは文武百官を皆至らせること、「裸」は酒を地に注いで神を祭ることである。このことも都邑において最初にあるべき施設は宗廟であっ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

しかも考工記の営国制度では宮城の中心施設は世室→重屋→明堂と移り変わったように記されているが、これは一つの観念的な図式であって、『礼記』曲礼下には、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厩庫為次、居室為後。

¹⁶ 十三経注疏整理委員会整理『毛詩正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55-1160頁。

¹⁷ 楊寛著、西嶋定生監訳、尾形勇、高木智見共訳『中国都城の起源と発展』、学生社、1987年、第56頁。

¹⁸ 孔安国伝は「太室、清廟」といい、王肅は「太室、清廟中央之室」といい、孔穎達は疏で「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裸獻鬯酒以告神」としている。『尚書正義』、第494-49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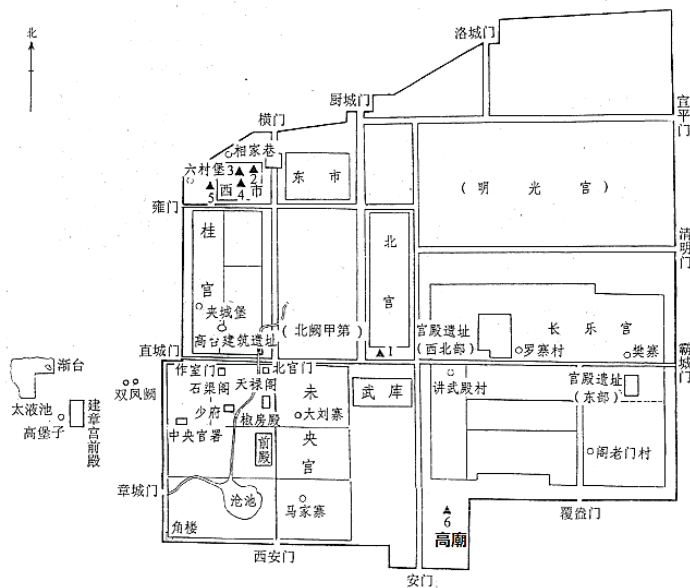


図3 漢長安城遺址平面示意図(劉慶柱・李毓芳『漢長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18頁)

とあり、宮室を営む場合には宗廟→厩庫→居室の順にせよとしており、依然として宗廟が宮室の中心とされている。これと先ほどの『詩経』大雅・緜の記事および考工記の「左祖右社」「面朝后市」の記事などを合わせて建設の順序を考えると、つまりは宗廟を築くことから始まって、次にその他の宮殿の施設に及び、宮殿の門に及び、その外にある祭祀施設に及ぶというように、宗廟を起点とする“内発外向”のプランとなる。『墨子』明鬼篇に、

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曰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

といい、『呂氏春秋』慎勢篇に、

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

とあるのは、なお戦国期にいたるまで宗廟を起点とする都市プランが聖王の制度と見なされていたことの明証である¹⁹。

宮室を築くにあたって、王の居室よりも先に宗廟と厩庫を築く理由について、鄭玄は『礼記』曲礼下の注で「重先祖及國之用」としている。また『左伝』莊公二十八年(前666)条には、

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とあり、都は宗廟と先君の位牌があることで邑と区別された。また襄公二十七年(前546)条に、「崔、宗邑也、必在宗主」とあり、杜注に「宗邑、宗廟所在」とあるように宗廟のある邑を宗邑とも言った。このように宗廟の有無は都市の格を決定する最も要件であった。このことからすれば、宮室を営むにあたってまず宗廟を築くのは、祖先を崇敬すると同時に、宗廟の有無が都城たることの第一要件を決定したからである。

以上のように、宮は廟であり、廟があるがゆえに邑は都城になると考えると、始皇帝が渭水の南に新都を建設するに当たり、「信宮」を建て、これを「極廟」と名付けて天極に準えたことに注目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すなわち『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に、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自

¹⁹ 高木智見『先秦の社会と思想』創文社、2001年12月。高木氏は夏殷西周春秋時代を「原中国」の時代と呼び、この時代においていかに宗廟が重要であったかを思想の面から詳しく論じており、この二つの記事を取りあげて都城の建設の最優先事項は宗廟の建設にあったとしてい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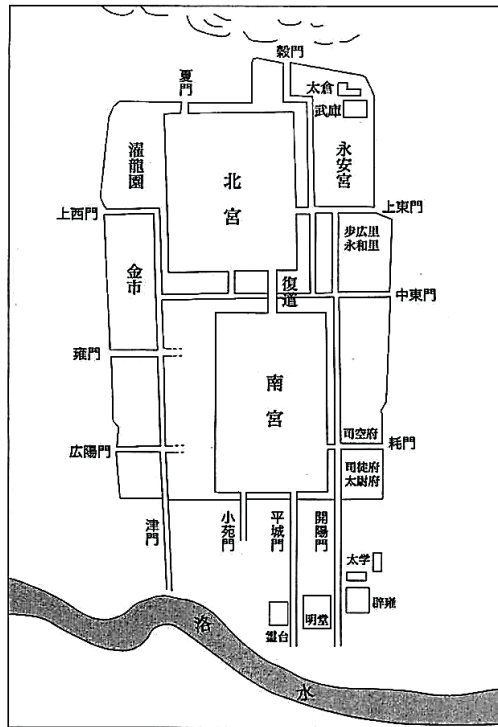


図4 後漢洛陽図（佐川英治「漢代の郊祀と都城の空間」）

極廟道通鄴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

とある。始皇帝もやはり渭南の新都の建設に当たり、廟をもって新宮の中心としたのであり、それは宗廟をもって都城の第一要件となす先秦の都城の伝統を踏襲したものであった²⁰。

今日、前漢の長安に中軸線と呼べるようなものがあるのかどうか、あるとしてもそれは長安城のどこをとおっているのかについては議論がある。一つの有力な説としては、南城垣のほぼ中央にある安門から入って未央宮と長樂宮の間を北に走る大街を長安城の中軸線とみる説がある²¹。この大街の南端には高廟（高祖劉邦の宗廟）があり（図3）、高祖の霊は毎月この大街を通過して長安城を遊覧した。ゆえにこの大街は「宗廟道」とも呼ばれ、神聖な道とされていた²²。この大街の北の延長線上には高祖の陵墓である長陵があり、長安は渭水をはさんで長陵と向かい合う関係にあった。

しかし、長安城全体を見渡したとき、この中軸線が都城の設計の中軸であったかといえ、必ずしもそうとはいえない。漢の長安城を一見して気づくことは、長樂宮、未央宮、建章宮といった宮殿が、東西にならんで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こうした長安の宮殿の配置は、秦の宮殿の配置を受けつぐものである。『史記』秦本紀によれば、始皇帝は渭水を天の川にみたてそれに沿って星を排列するように宮殿を建てたとしており、秦の宮殿は渭水に沿って東西にならんでいた。東西にならぶ漢の宮殿は、こうした

²⁰ 栗原朋信によれば、『史記』卷六始皇本紀始皇二十六年条に、「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とあるように、秦の始皇帝は六国の併合の成功を祖先の靈威に因るものと考えており、自らに新たな天命が下ったものとは考えていなかった。栗原朋信「秦の郊祀と宗廟の祭祀」『秦漢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0年、第92-121頁。

²¹ 黄曉芬「漢長安城建設における南北の中軸線ラインとその象徴性」『史学雑誌』115編第11号、2006年。

²² 『漢書』卷九十九叔孫通伝：「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人、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

秦の宮殿の配置を継承している²³。しかも、漢の宮殿は決して長安城内だけにあるのではなくて、各所に無数に存在していた。これも秦の始皇帝の都城プランを継承している。すなわち、秦漢の都城プランは宗廟を地上の天極として宮殿が天界の星の如く無限に広がっていく“内発外向”の都城プランであった。

五 南郊と後漢洛陽の都市空間

後漢洛陽城内には北宮と南宮という二つの宮殿があったが、やはり正対せず東西に位置をずらして配置されている。後漢の洛陽にははまだ建物を南北に配置することへの強い執着はみいだせない。ただし、前漢の長安城にははっきりとした正門がないのに対して²⁴、後漢の洛陽城には明確な正門が存在していた。後漢洛陽城の門は全部で十二門あり、南城垣には4つの門が開かれていたが、そのうちの東から2番目の門である平城門がそれである(図4)。この平城門が正門であった理由は、皇帝が南郊で郊祀をおこなう際、この門から出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たためである²⁵。それゆえに平城門は「正陽之門」とされ²⁶、南宮の門と接続され、十二門のうちこの門だけが宮門を護衛する衛尉の管轄とされた。平城門と南郊は「南北郊路」と呼ばれる特別な道路で結ばれ²⁷、道の両側には明堂、靈台、辟雍といった礼制建築が立ちならんだ。楊寛のいう「坐北朝南」プランの出現である²⁸。この時代にはまだ太極殿はなかったが、のちに太極殿と円丘で結ばれる中軸線の萌芽といえるものがこの時代に生まれている。

後漢王朝を建て洛陽に都を置いた光武帝は、劉氏とはいえ前漢の宗室からいえば全くの傍系であり、劉氏であることは皇帝となるうえでの必要条件ではあったが十分条件ではなかった。光武帝は皇帝となるために神秘的な予言である図讖を最大限に利用しなければならず、当初から天命に対する強い関心を持っていた。光武帝は洛陽に都を定めると最初に宗廟とともに洛陽城南七里に南郊を建設した²⁹。

光武帝ははじめ郊祀に王莽の祭儀を用いたが、のちに堯を配祀しようとした。堯は『史記』五帝本紀に現れる五帝の一人である。五行思想の隆盛にともない、前漢の武帝のころから漢の祖先は堯であるとする言説が説か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た。すなわち、伏羲(木)―神農(火)―黄帝(土)―少昊(金)―顓頊(水)―帝嚳(木)―帝堯(火)―帝舜(土)―夏(金)―商(水)―周(木)―漢(火)と巡る五徳相生説において、堯は漢にとっての火徳の祖であり、儒教的な理念上の祖であった。光武帝は血縁上の祖である高祖に代えて理念上の祖である堯を天に配祀することで郊祀の理念的な性格を強めようとした。しかし、光武帝の企画は「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として先送りを唱える古文派の杜林の反対論によって頓挫させられた³⁰。しかし、後漢時代を通じて南郊はさまざまな皇帝祭祀の場として

²³ 池田雄一「秦咸陽城と漢長安城——とくに漢長安城建設の経緯をめぐって」(『中国古代の聚落と地方行政』汲古書院、2002年5月)および佐原康夫「都城としての漢長安城」(『漢代都市機構の研究』汲古書院、2002年2月)。

²⁴ 漢長安城の正門については、北の横門と東の宣平門を都門として重視する楊寛『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の説もあるが、劉慶柱『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7月)などによる批判もあり、いまだ判然としない。

²⁵ 楊寛『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137頁。

²⁶ 『統漢書』五行志一：「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最尊者。」

²⁷ 『後漢書』宦官列伝：「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

²⁸ 前掲『中国都城の起源と発展』及び『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²⁹ 『統漢書』祭祀志上：「(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

³⁰ 『統漢書』祭祀志上の注に引く所の『東漢觀記』に杜林の上疏を載せて「……民無愚智、思仰漢徳、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論。后稷近於周、民戸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郊

整備されていき、その重要性を増していった³¹。

後漢時代には、班固の「兩都賦」や張衡の「兩京賦」が作られ、都市の比較が文学の主題となった。「兩都賦」と「兩京賦」の構成はほぼ同じであり、まずは壮麗で活気ある長安を懐かしむ人が長安を追慕して詠い、ついで洛陽の人が質素ながらも礼儀の備わった洛陽が長安に勝ることを詠い、結果長安の人を説き伏せ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る³²。長安との対比のなかで洛陽の儀礼都市としてのイメージは増幅されていった。張衡の「東京賦」には天子が南郊を祀る次のようなシーンがある。それは長安にはなかった光景であり、洛陽の儀礼都市としての性格を象徴するものであった。

及將祀天郊、報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爲虔。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殫。然後以獻精誠、奉禋祀、曰「允矣、天子者也。」……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鱗鱗。殿未出乎城闕、旆已反乎郊畛。

ただし、注意すべきは、後漢洛陽にはまだ都城を貫く南北の中軸線は登場し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る。南郊とは五行に対応した五兆の一である。五兆は東、西、南、北と中央からなる。このうち中央は未の地に配当される³³。それゆえ、東郊、西郊、南郊、北郊はそれぞれ正方位ではなく、寅（東北東）、申（西南西）、巳（南南東）、亥（北北西）となる³⁴。すなわち、南郊の方位は巳（南南東）であり、正南ではない³⁵。また『宋書』卷十六礼志に「諸儒又云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内」とあるように³⁶、それぞれの方位の基準となるのは国すなわち都城であって、後世のように宮殿と円丘を正対させ、両者を御道で結んで中軸線となす発想はまだなかった。このような発想が生まれるには、もう一段の天の祭祀の発展が必要であった。

六 円丘の出現と都市設計の転換

後漢王朝崩壊後、洛陽は曹魏に継承されたが、魏の明帝は大規模な洛陽城の改造にとりくもうとした。明帝は太極殿をはじめとする壮麗な宮殿の数々を造り、これを諫める臣下との間に激しい対立を生んだ。とくに若き皇帝のよき理解者であり指南役でもあった高堂隆は、こと宮殿建設に関しては「狂直」と称されるほど激しく明帝を諫めた。

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鮡、考績不成、九載乃殞。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とある。

³¹ 例えば『後漢書』樊宏伝附條伝第二十二に「永平元年（58）、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礼儀、以讖記正五經異說。」とある。あるいは、清・陳立の『白虎通疏証』の「天子諡南郊」条をみよ。

³² このモチーフはさらに建安七年に杜陵と杜篤が「論都賦」を著して長安への遷都を説いたのに対して、王景が「金人論」を著して洛陽の美点を称えたことに遡る。『後漢書』循吏列伝第六十六。

³³ 『統漢書』祭祀志中：「迎時氣、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

³⁴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年正月壬午条の注に漢の礼制度を述べて、「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赤帝位在丙巳、黃帝位在丁未、白帝位在庚申、黑帝位在壬亥。」とある。これは南郊壇における五帝の配置であるが、五兆の配置もこれと同じはずである。

³⁵ 漢の南郊が巳地にあったことは、『晋書』卷十九礼志上に「驃騎王導・僕射荀崧・太常華恒・中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立南郊於巳地。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晋初之儀。」に明らかである。

³⁶ 『礼記正義』郊特性・孔穎達疏に「其祭天之處、冬至則祭於圓丘。圓丘所在雖無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とあり、疏に引く鄭玄の『駁五經異義』には「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其圓丘之祭。」と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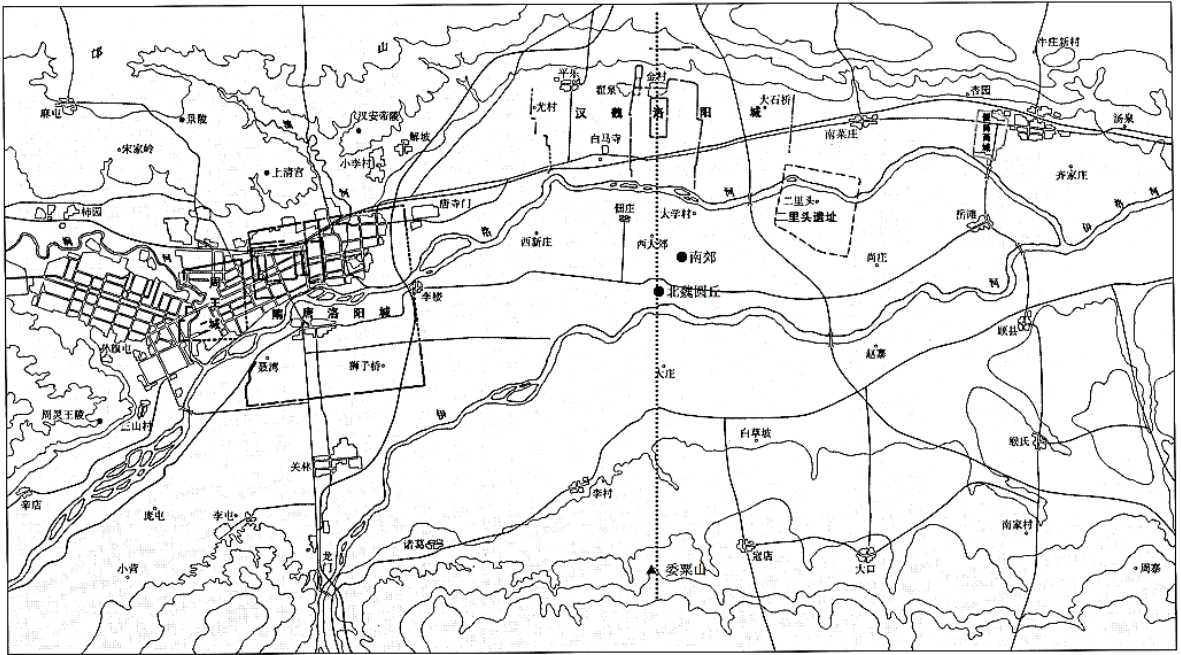


図5 洛陽古代都城形成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博物館洛陽分館』文化芸術出版社、1998年）に加筆

明帝の太極殿はその後多くの王朝で宮殿の正殿の名として採用され、日本の古代都城にも踏襲された。また太極殿に正対する宮殿の南門の名を闔闔門という。近年、北魏の闔闔門は中国社会科学院によって発掘され、その全貌が明らかとなった。その位置はかつての後漢洛陽城の北宮の場所にある。問題は北魏の闔闔門の下からほぼ同じ規模の魏晋期の門闕の遺構が発見されたことである。南朝宋の裴松之が書いた『三国志』の注や北魏の酈道元の『水経注』などの文献は、明帝の太極殿が漢の南宮に建てられたと明記する。しかし、今日では上記の発掘の成果から、北魏の太極殿—闔闔門は明帝の太極殿—闔闔門をそのまま踏襲したとする説が有力となっている³⁷。

明帝は始皇帝や武帝が長安に残した作った巨大モニュメントを洛陽に移そうとするなど、秦の始皇帝や漢の武帝が長安でおこなった壮麗な宮殿建設を復活しようとした。それは後漢王朝の崩壊を目の当たりにした明帝が、三国鼎立して争う状況のなかで、始皇帝や漢の武帝のような強い皇帝に回帰しようとしたものであった。

一方、高堂隆は都城の建設は次の順序にあるべきだと述べている（『三国志』巻二十五高堂隆伝）。

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

ここには都城設計におけるある重要な発想の転換がみられる。それは都城を建てる際に「先定天地社稷之位」としていることである。ここでいう天地社稷之位とは、円丘・方沢・南北郊・明堂・社稷のことである。とりわけ、注意すべきは南北郊の前に円丘・方沢が挙げられていることである。

本来、南郊で天を祀る場所を円丘といい、北郊で地を祀る場所を方沢という。南郊と円丘、北郊と方沢は本来一体のものである。あえて両者を分離するのは、後漢末の大儒鄭玄の説による。鄭玄は、天には六天あり、宇宙の最高神である昊天上帝の下に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枢紐、白帝白招拒、

³⁷ 銭国祥「由闔闔門談漢魏洛陽城宮城形制」『漢魏洛陽城遺址研究』。

黒帝汁光紀の五精帝があると考えていた。五精帝の交替によって時間は運行し、五精帝のいずれかが感生帝となって王朝は交替する。感生帝とは簡単に言えば王朝の守護神といってよい。しかし、礼は王朝の枠を超えた永遠のものであるから、鄭玄は南郊とは別に昊天上帝を祀る円丘の郊祀があるべきだと考えていた。

曹魏をはじめ、南郊に太祖曹操を配祀して天を祀り、北郊に太祖の皇后を配祀して地を祀る南北二郊の制度を立てていた。これは王莽の祭儀を踏襲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れに対して高堂隆は明帝に説き、鄭玄説にもとづく円丘と方沢を作らせた。方沢の場所は定かではないが、円丘は委粟山に作られたことが知られている。委粟山は今日では現地の考古学者によって漢魏洛陽城の南約 25 kmにある禹宿穀堆という名の山に比定されている。禹宿穀堆は北緯 34° 32′ 44″、東経 112° 36′ 32″ にあり、万安山の支脈に連なる高さ 50mの小高い山である（巻末写真）³⁸。その山は洛陽盆地を挟んで漢魏洛陽城とほぼ正対する位置にある（図5）。そして円丘には舜を配祀し、方沢には舜の妃を配祀した³⁹。舜は曹魏にとっての土徳の祖であるが、時代を越えた有徳者である⁴⁰。すなわち、南北郊の郊祀が王朝と密着した性格をもつものに対して、円丘と方沢の郊祀はより普遍性、永遠性を備えるものであった。委粟山に円丘を営んだのもまた鄭玄の学説に基づくもので、鄭玄は南郊が人工の基壇を用いるのに対して、円丘は自然の丘陵によるべきものとしていた⁴¹。このことは礼を永遠のものとする、ひいては礼の普遍的な実践へと結びつくものであった。

すなわち、円丘・方沢を都城の設計の基点とする高堂隆の主張は、後漢洛陽城よりもさらに高いレベルで都城設計における礼的規範を実現しようとするものであった。その際、円丘と方沢は五兆の一たる南郊や北郊と違って南北にしか基点をもたない施設であり、すなわち都城建設における礼的規範とは、南北方向に基軸を設定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が、ここではっきりと認識されるにいたった。さらに、『礼記』の「宗廟爲先」に対して、「先定天地社稷之位」とすることで、都城の設計の基点は円丘・方沢→南北郊→明堂・社稷→宮殿の順序となり、それまでの“内発外向”から“外発内向”へと転換された。

ただし、委粟山の円丘は長くは続かなかった。高堂隆の郊祀改革は「皇天無親、惟徳是輔」⁴²とする立場にもとづくものであったが、王権安定の基盤を創業者曹操の権威とその血縁にもとめる立場の人々はこれに強く反発した⁴³。高堂隆と明帝の死後、曹魏は郊祀を停止してしまう⁴⁴。魏の学者王肅は鄭玄を

³⁸ 段鵬琦『漢魏洛陽故城』、文物出版社、2009年、63-64頁。

³⁹ 『三国志』卷三明帝紀景初三年冬十月条に「乙卯、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圓丘。」とあり、裴注に「魏書載詔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章神明、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見經、是以制度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祀。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圓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とある。

⁴⁰ これは鄭玄の説に基づくもので、『礼記』祭法に「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魯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魯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とあり、鄭玄は注で「有虞氏以上尚徳、禘郊祖宗配用有徳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代之。」と述べている。

⁴¹ このことは唐の王涇の『大唐郊祀録』に「鄭玄義云、以冬至日祀昊天上帝圓丘、是自然之丘、非人力所築、禮器曰、至敬不壇是也。夏至祭感生帝於南郊太壇、人力所築、祭法云、燔柴於太壇祭天也。」と解説するのが分かりやすく、神格の違いに応じて壇の性質も異なると鄭玄は考えていたのである。

⁴² 『魏書』高堂隆伝の高堂隆が死の直前に明帝に送った言葉に「夫皇天無親、惟徳是輔。民詠徳政、則延期過歴、下有怨歎、擢録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とある。「皇天無親、惟徳是輔」は『書経』蔡仲之命の言葉である。

⁴³ 『三国志』卷十四蔣濟伝：「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爲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爲舜本姓媯、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通典』卷四十二吉礼郊天上：「魚豢議曰、昔后稷以功配天。漢出自堯、不以堯配天、明不紹也。且舜已越數代。武皇肇創洪業、宜以配天。」

批判し天の神格は一であるとして円郊一体を唱えた。西晋は王肅の説を採用し、南北郊以外に円丘・方沢を祀らず、王莽の祭儀に回帰した。

しかし、高堂隆の円丘は、のちに洛陽に遷都してきた北魏によってややかたちを変えて復活される。北魏がかつてない壮大な規模の洛陽城を完成させたとき、太極殿から真っ直ぐに伸びた中軸線はこの円丘に到達したのである。

七 宋の南郊と中軸線の出現

後漢の洛陽で五兆が設定されたことで、都城の城壁の外側にはもう一つの都城空間が設定された。五兆の範囲は礼の緯書である『含文嘉』の注に、

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為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為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

とあり⁴⁵、また『太平御覽』卷五百二十八礼儀部に曹魏の『皇覽』を引き、

皇覽・禮云、天子迎四節日、天子迎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于東堂、距邦八里……自春分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于南堂、距邦七里……夏至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于西堂、距邦九里堂……自秋分數至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

とあって、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五里であった。『洛陽伽藍記』によれば、西晋の時、城東の建春門外に七里橋あり⁴⁶、城西の閶闔門外七里に長分橋があり⁴⁷、都市と郊外の境界をなしていた。上記の五兆の境域はまさにこれを包み込むようにしてあった。

東晋の建康もこれを踏襲した。『晋書』卷十九礼志上に「驃騎王導・僕射荀崧・太常華恒・中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立南郊於巳地。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晋初之儀。」とあり、『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四・古廟壇考証に『唐会要』を引いて、「晋元建武二年(318)定郊兆於建鄴之南、去城七里、一壇之上、尊卑雜位千五百神。」とある。すなわち、後漢の洛陽と同制にして都城の南の巳地七里に南郊を築いたのである。

しかし、南北朝時代に入ると、都市の人口は肥大化し⁴⁸、市街地が兆域の外にまで広がるようになる。

⁴⁴ 『通典』卷四十二吉礼郊天上：「自正始以後、終魏代不復郊祀。」

⁴⁵ 『魏書』卷五十五劉芳伝。

⁴⁶ 『洛陽伽藍記』卷二城東・景興尼寺：「崇義里東有七里橋、以石爲之。中朝、杜預之荊州、出頓之所也。」

⁴⁷ 『洛陽伽藍記』卷四城西・大覺寺：「出閶闔門外七里、有長分橋。中朝時以穀水浚急、注於城下、多壞民家、立石橋以限之、長則分流入洛、故名長分橋。或云、晋河間王在長安遣張方征長沙王、營軍於此、因名爲張方溝也。未知孰是。今民間語訛、號爲張夫人橋。」

⁴⁸ 西漢の長安の人口について、佐藤武敏は、最盛期で城内16万人、城外を含めた長安県の人口で24万6200人くらいであったとし、首都にもかかわらず人口の少ないのは、長陵や茂陵といった陵邑を衛星都市として首都圏を構成していたのであろうと論じている(佐藤武敏『長安』東京：講談社、2004年、第77頁。原書、1971年、近藤出版社刊)。それでも、東漢では永和五年(140)の河南尹全体の人口が101万827人であったことを考えれば長安は大都市であった。長安では最盛期の三輔の人口は240万人を超えるからである。洛陽には陵邑のような衛星都市も見当たらない。しかし、漢帝国崩壊後の人々の流動化は、都市にとっては一つの発展の契機になったであろう。勿論三国から五胡十六東晋時代にかけては、戦乱で人口が激減した時代であり、それほどの大都市が生まれることはなかった。しかし、五世紀以降、南北朝の時代に入ると都市は再び巨大化していった。そこに現れたのが建康と北魏洛陽である。『洛陽伽藍記』巻五によれば、洛陽の戸数は10万9千余戸。1戸5人とすれば、約55万人となる。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の郭内に西漢の長安県の二倍以上、東漢の河南尹の半分以上の人口を収容する中国で最初の人口密集都市であった。同じ頃の梁の建康の人口について、『金陵記』は「二十八萬餘戸」とする。この数字に関しては、戸数ではなく戸口数とみる学者もある(盧海鳴『六朝都城』南京出版社、2002年、第八章第一節)。確かに、『宋書』卷三十・州郡志一に載せる丹陽尹全体の戸数が4万1011戸、口数が23万7341人であることを考えると、この数字は多すぎる。しかし、かりに戸数ではなく人口だとしても、東西南北各四十

ここにおいて建康でもより広域を対象とした新たな都市設計が必要になってくる。その一つの試みは、劉宋の孝武帝によっておこなわれた。『宋書』卷十四・礼志一に次のようにある。

宋孝武大明三(459)年九月、尚書右丞徐爰議「郊祀之位、遠古蔑聞。禮記『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漢初甘泉河東裡埋易位、終亦徙於長安南北。光武紹祚、定二郊洛陽南北。晉氏過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議、紛然不一。又南出道狹、未議開闢、遂於東南巳地創立丘壇。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謂。今聖凶重造、舊章畢新、南驛開塗、陽路修遠。謂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博士司馬興之、傅郁、太常丞陸澄並同爰議。乃移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正在宮之午地。世祖崩、前廢帝即位、以郊舊地爲吉祥、移還本處。

孝武帝の改革のねらいは郊外に都市設計を及ぼすことにあった。なぜなら、当時旧来の南郊は「居民之中」にあり、都市空間は南郊の境域を超えて広がり始めていたからである。この兆域を超えて広がり始めた都市空間を制御するために、孝武帝は馳道を築く。上記にいう「今聖凶重造、舊章畢新、南驛開塗、陽路修遠」である。この馳道は徐爰の議の二年後に完成した⁴⁹。建康にはこれ以前から御道があったが、その道は「南出道狹、未議開闢」というように狭く屈曲しており、都市全体を規制する中軸線とするには相応しくないものであった⁵⁰。この馳道を築くための新たな基点として置かれたのが牛頭山の西の新南郊である。それは宮殿と正対する午地に築かれた。

このことは都市設計上画期的な意味をもっている。第一に、それでの郊兆の位置は国(都城)を基準に設定されていたが、牛首山の新南郊は「正在宮之午地」とあるように宮殿を基準に設定された。第二は、宮殿と南郊が直線道路で結ばれた。ここに宮殿と南郊を正対させ、両者を結ぶ道路を都市の中軸線とする考え方が生まれた。これにより宮城と都城と外郭は一本の中軸線によって貫かれ、三つの空間に統一的な設計を及ぼすことが可能になった。このことは後の北魏の洛陽城の設計と完全に一致しており、孝武帝の都市設計は北魏洛陽城のそれを半世紀ほど先取りしたものであったとい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ただし、「世祖崩、前廢帝即位、以郊舊地爲吉祥、移還本處」とあるように、孝武帝の都市設計は貫徹されることがなかった。南朝の都市設計には漢の伝統の強い規制が働いていたのである。

八 北魏の円丘と外郭城建設

北魏はもともと鮮卑族の拓跋部を中心とした遊牧部族集団が建てた王朝であり、4世紀の終わりに道武帝が中原に進出し平城(山西省大同)に都として皇帝を称するようになった。5世紀の中頃には、平城にも中国式の皇帝儀礼に必要な設備が一通りは揃ったようであるが、それでもなお平城が遊牧文化の色濃い都市であったことは、平城を訪れた南朝の使者たちの見聞の記録からわかる⁵¹。

里の中に西漢の長安県より多く、宋の丹陽尹全体を上まわる戸口を収容していたわけであるから、ある程度の人口の密集化があったとしなくてはならない。建康に何らかの都市設計が必要になった背景には、まさにこのような都市の性格の変化があったのである。

⁴⁹ 『宋書』卷六孝武帝紀大明五年(461)閏月条:「丙申、初立馳道、自閭闔門至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于玄武湖。」

⁵⁰ 『世説新語』言語篇:「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為劣。」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⁵¹ 拙稿「遊牧と農耕の間——北魏平城の鹿苑の機能とその変遷」『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47、20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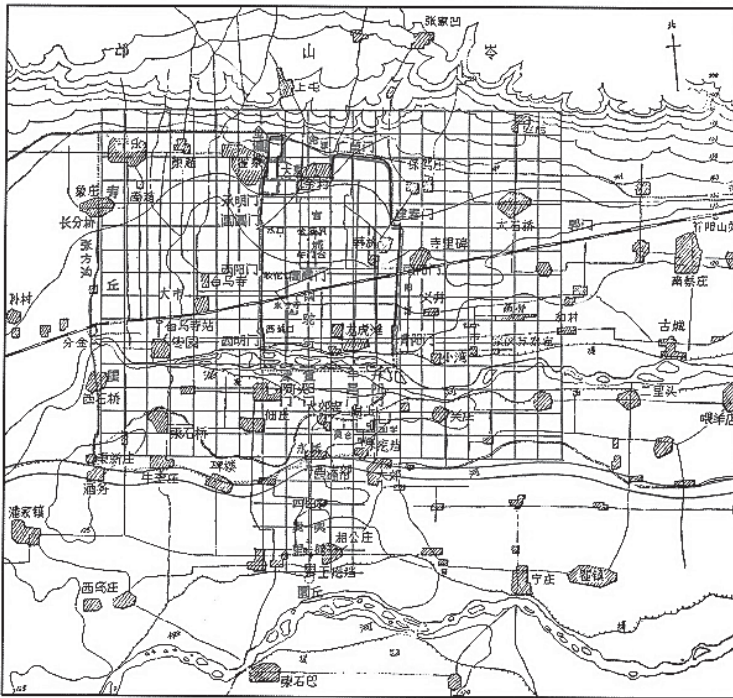


図6 洛陽城里示意图（宿白「北魏洛陽城和北邙陵墓」『文物』1978年7期）

平城の大幅な改造に取り組んだのは5世紀末の孝文帝である。孝文帝はそれまで宮城の正殿であった太華殿を取り壊して太極殿を建設し、太廟の再建をおこなった。これに際し、孝文帝は洛陽に使者を派遣して太極殿等の基壇の遺跡を測量させている。それ以前の北魏皇帝が雑多な建築を次々と増やしていったのは異なり、孝文帝は明堂、辟雍、南郊などの礼制建築の建設に力を注ぐとともに、礼に合致しない遊牧起源の祭祀やその施設は次々と廃止していった。

孝文帝は天下の統一を目指し太和十八年(494)に洛陽に遷都する。しかし、その後太和二十三年(499)に亡くなるまで南朝征伐に明け暮れ、都城の建設に取り組むことはなかった。北魏の洛陽城を建設したのは子の宣武帝である。宣武帝は景明三年(502)九月に三百二十三坊(三百二十坊とする説もあり)からなる外郭を建設するとともに、十一月には円丘を伊水の陽(北岸)に移し、翌年二月には太極殿を完成させた。

宣武帝が洛陽城を築いたとき、伊水の陽(北岸)に移築した円丘は、この委粟山の円丘である。現在、北魏の太極殿の遺址から南に真っ直ぐ下って伊水とぶつかるところに王圪垯と呼ばれる村がある。洛陽城からの距離は約6キロであり、漢の里数でいえば14里ほどである。太極殿と円丘が一本の真っ直ぐな御道で結ばれていたことは『洛陽伽藍記』の記載などから明らかであり、王圪垯村のあたりがかつて北魏の円丘が築かれていた場所であると考えて間違いない。また『水経注』穀水条には「穀水又東、逕宣陽門南、故小苑門也。皇都遷洛、移置于此、對閭闔門、南直洛水浮桁」とあり、北魏は宣陽門も移築して、太極殿—閭闔門—宣陽門—洛水浮橋—円丘とつらなる一直線の御道を完成させた⁵²。この御道の特徴は宣陽門をはさんで城内と城外を一直線に貫いていることであり、太極殿と円丘という明確な始点と終点を持つことで、その中間にある建築物が正しく南北の方向に排列されていることである。城内と城外がこのような一直線の御道で結ばれることはかつてないことであった。その目的は、旧来の城内と城

⁵² 同じく『水経注』によれば、北魏はかつての正門の平陽門を塞いでいる。一般に北魏は魏晋の洛陽城をそのまま継承したと考えられることが多いが、北魏が洛陽城に施した変更は決して小さくはな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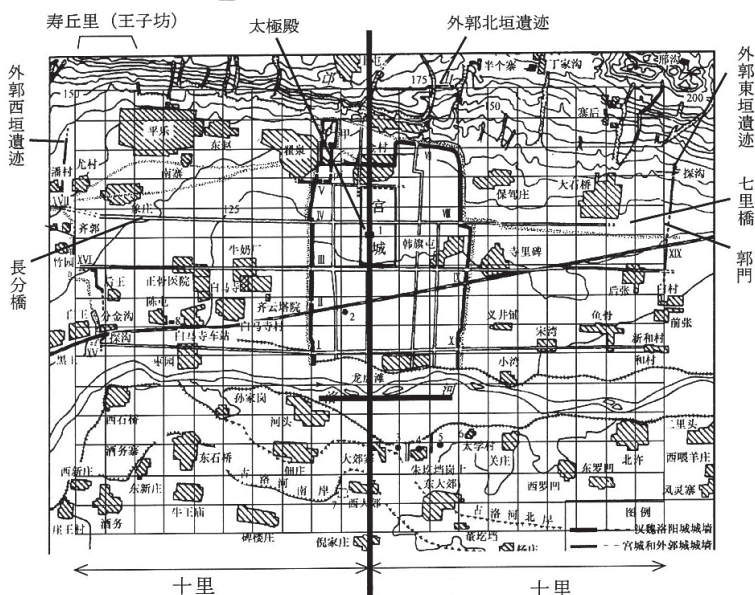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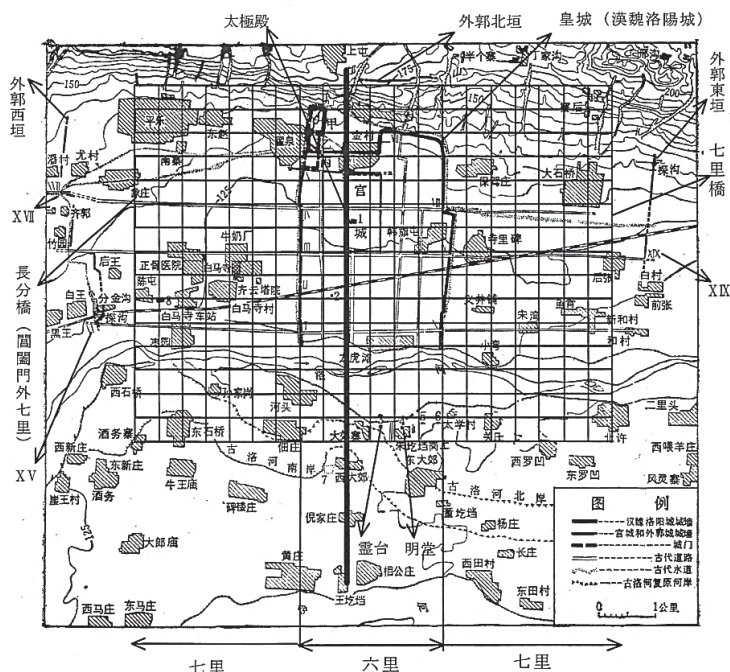


図7 (上) 図8 (下) 北魏洛陽城の形成と空間配置 (佐川英治)

外を一本の中軸線で貫くことにより、全体の設計を統一することにあつた。

後漢以来受けつがれてきた漢魏洛陽城の規模は東西六里、南北九里である。これに対して北魏の外郭の規模は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であったことが知られている。1978年に北京大学の宿白は、北魏は東西六里の洛陽城に対して外側に七里ずつ拡張して東西二十里の外郭を築いたとする説を発表し⁵³ (図6)、以後ほぼ定説となっている。しかし、1984年から89年にかけての調査で明らかになった外郭の規模は

⁵³ 宿白「北魏洛陽城和北邙陵墓—鮮卑遺迹輯録之三—」(原載『文物』1978年7期、『漢魏洛陽城遺址研究』、42-56頁収録)。

この予想を遙かに上まわるものであった⁵⁴ (図7)。筆者は、漢魏洛陽城の東西六里、南北九里は漢の尺度によるものであったのに対して (この点は実測によって確認されている)、北魏の外郭の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は漢の尺度を大きく上まわる北魏の尺度で示されたものであったと考える⁵⁵。北魏の尺度による東西二十里は今日調査で明らかになっている外郭城の幅にほぼ相当する。そしてこのように考えた場合、太極殿と円丘を結ぶ中軸線は外郭のほぼ中央を通る (図8)。北魏の外郭城は中軸線に対して左右対称に十里ずつの幅で設計された可能性が高い⁵⁶。

北魏洛陽城の空間を中軸線にそって縦にみると、太極殿—閶闔門の間は宮殿等がほとんどを占める皇帝の空間としてあり、閶闔門—宣陽門の間は官府が立ちならぶ百官公卿の空間としてある。そして、宣陽門—洛水浮橋の間は官僚の邸宅や兵士や庶民の家が建ちならぶ臣民の空間としてあり、洛水浮橋—円丘の間は帰化した人々が暮らす蕃夷の空間としてある (図9)。こうした空間の配置は『禹貢』に記されるころの天下の構成とそっくりであり、全体が天下秩序で構成さ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 (図10)。

北魏の外郭城の建設は、それまでの都城が王城であったのに対して、天下の人々が集まり暮らす空間を広く都城として設定しなおすものであった。そして、そうした空間の新たな規範として採用されたのが儒教經典にもとづく礼的秩序であり、その象徴をなすものが太極殿に正対する円丘であったのである。

七 南郊の消滅と古典的都市設計の完成

唐の長安城の円丘は1999年に西安郊外で発掘された。今日具体的な姿を知ることで最古の円丘である。唐の長安城は隋の大興城をほぼそのまま受けついでおり、円丘の位置や規模も隋を継承している。隋の文帝は大興城に円丘を造るにあたり、太陽門外の道の東二里に円丘を、西一里に南郊壇を築く「新制」を用いた。唐にいたって隋の太陽門は明德門と名前を変え、南郊を祀らず隋の円丘のみを継承したので、唐の円丘は明德門外の道の東二里の場所にあった。発掘されたのはこの円丘である。

明德門は長安城の正門であるが、北魏の洛陽城でいえば外郭の門にあたる。北魏の円丘が太極殿と完全に正対していたのに対して、隋唐の円丘が道を塞ぐのを避けている違いはあるが、中軸線上の外郭門外に築かれている点は北魏と同じであり、少なくともその配置からみる限り、隋の「新制」は全く北魏の洛陽城を継承したものである。この点からみても、隋の大興城すなわち唐の長安城は北魏洛陽城の影響を直接受けたものであるとする陳寅恪の指摘は正しい。

ではなぜそれは北魏で成立し、隋唐で完成をみたのであろうか。これまでみてきたように、円丘を基点に南北方向に中軸線を伸ばす意識は、すでに高堂隆の円丘や孝武帝の南郊にみられる。左右対称の設計が中軸線から展開するものであると考えれば、その淵源は北魏をさかのぼる中国史の中にすでに存在するのである。ただし、曹魏においても南朝においてもこの試みは一代で途切れ、以後は漢代の伝統に回帰した。このことを考えるならば、筆者は王城を取り囲む都市空間の発展の度合いと、民族的な伝統

⁵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工作隊「北魏洛陽外郭城和水道の調査」(原載『考古』1993年第7期、『漢魏洛陽城遺址研究』、621-630頁収録)。

⁵⁵ 『洛陽伽藍記』にいう「東西二十里」を北魏の尺制による距離と見るべきことは、何炳棣「北魏洛陽城郭規画」(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上冊)』台北:清華學報社、1964年9月、219-244頁、『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7月、399-434頁収録)も文獻學的に論じている。

⁵⁶ 拙稿「北魏洛陽の形成と空間配置—外郭と中軸線を中心に—」(『大阪市立大学東洋史論叢』別冊特集号、2005年)、「北魏洛陽城の中軸線及其空間設計試論」中国魏晉南北朝史学会・武漢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回顧与探索—中国魏晉南北朝史学会第九屆年會論文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8月、724-733頁。

から自由な立場であった北魏の征服王朝的な性格の二つが、この設計を生む歴史的環境になったと考える。もっとも、北魏の洛陽城は旧来の漢魏洛陽城を継承し、その上に新しい設計を重ねたために、全体としては古い設計と新しい設計が混在するものとなってしまった。隋は旧来の長安城を棄て、新しい場所に新しい城郭を築くことで新しい設計を伝統の制約を受けることなく実現したのである。この時、中国の古典的な都城設計は完成した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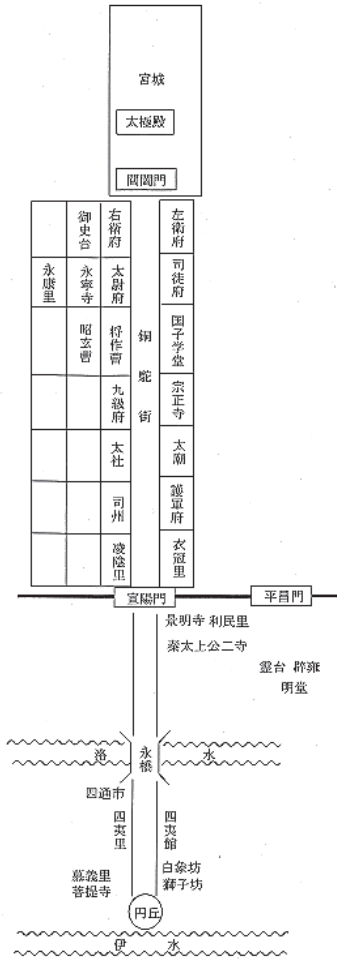


図9 北魏洛陽の御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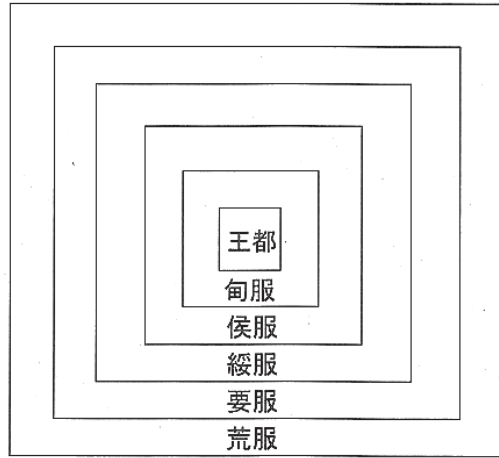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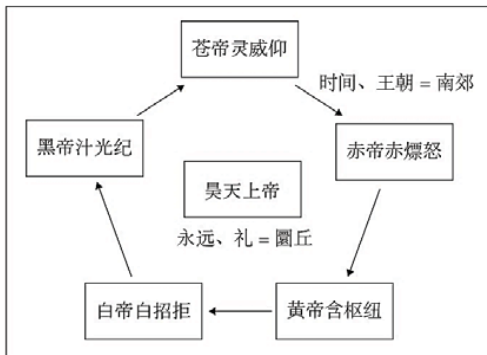


図10 『禹貢』の五服



写真 禹宿穀堆



参考 鄭玄学説における六天説

場所	円丘	南郊
祭神	昊天上帝	感生帝
配祀	有徳者	始祖
祭壇	自然丘陵	人工基壇

参考 鄭玄学説における円丘と南郊

隋唐長安城과 市場의 위상

최재영(한림대)

I. 문제 제기
II. 隋唐長安城의 市場 설치와 모습
III. 東市와 西市의 市制와 天下
IV. 맺음말

I. 문제 제기

隋唐長安城은 都城일까? 都市일까? 오늘날 전근대 왕조의 정치행정 중심지를 지칭하는 말로 京師, 京都, 王都, 都城, 首都 등 여러 용어가 사용되고 있다. 이 가운데 일반적으로 흔히 쓰이는 용어는 都城이지만 사료에서 자주 빈출하는 용어는 京師와 京都이다. 京師의 기원에 대해서 ‘京은 남향의 넓은 고지대로 많은 궁실을 세우는 데 적합한 곳이며 師는 군대 주둔지이다. 京에 강력한 군대가 주둔했기에 京師로 연칭되었으며 여기에 기원하여 國都를 京師라고 했다’고 주장하기도 한다.¹⁾ 그런데 사료마다 京師와 京都에 대한 정의는 달라 그 기원과 개념을 정리하기란 쉽지 않다.

그 의미를 파악하기 위해 우선 그 字義를 중국에서 가장 연원이 오래된 훈고서로서 늦어도 前漢 후기에는 작성되었을 것으로 추정하는 『爾雅』²⁾에서 찾아보면 京師와 京都를 설명하는 구절은 눈에 띄지 않는다. 京, 師, 都 세 문자 각각의 뜻을 살펴보면 京의 풀이는 卷1 釋詁와 卷7 釋丘에 등장한다. 釋詁篇에서는 弘 등 36자와 더불어 ‘크다(大)’는 의미라고 설명하고 있지만 疏에서 齊·楚의 교외지역에서 ‘크다’라는 뜻으로 사용되는 방언이라고 하였다.³⁾ 반면 釋丘篇에서는 언덕처럼 사람이 인위적으로 ‘아주 높게 만든

1) 楊寬, 『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pp.43

2) 『爾雅』의 편찬 시기는 ①西周的 周公 저작설, ②戰國 초기의 孔子 門人 저작설, ③戰國 말년의 저작설, ④西漢 초기의 저작설, ⑤西漢 중후기 저작설 등 5가지의 이설이 있다고 한다.(이충구·임재완·김병현·성당제 역주, 『이야주소 1』, 소명출판, 2004, p.7.)

3) 이충구·임재완·김병현·성당제 역주, 『이야주소 1』, 卷1 釋詁, pp.108~112. 「弘·廓·宏·溥·介·純·夏·幠·厖·墳·嘏·丕·奕·洪·誕·戎·駿·京·碩·濯·訐·宇·穹·壬·路·淫·甫·景·廢·壯·冢·簡·筓·啗·將·業·席, 大也. 疏:……京·碩·濯·訐者, “秦晉之間, 凡人

것'이라고 하였다.⁴⁾

師의 풀이는 卷2 釋詁下, 卷3 釋言, 卷10 釋獸, 卷10 釋畜 등 모두 네 곳에 등장한다. 釋詁篇에서는 黎 등 7자와 더불어 '많은'이라고 풀이하고 있으나⁵⁾ 釋言篇에서는 '사람'이라고 하였고 그에 대한 注나 疏에서도 이를 '사람의 무리'로 설명하였다.⁶⁾ 釋獸篇과 釋畜篇에서는 돼지나 개가 새끼 두 마리를 낳은 것을 가리킨다고 하였다.⁷⁾

한편 都에 대해서는 단순히 爰 등 다섯 글자와 더불어 어조사라고만 설명하고 있을 뿐이다.⁸⁾ 이러한 字義 풀이에서 京師에 대한 일반적인 통념인 정치행정의 중심지라는 의미를 유추하기란 어렵다. 그런데 京師 혹은 京都의 정의와 관련하여 宋 熙寧 9年(1076)에 宋敏求가 편찬한 하여 현재까지 장안의 연혁을 완정한 형태로 전하는 가장 오래된 자료인⁹⁾ 『長安志』 卷2의 京都 항목은 주목된다.

『長安志』는 卷2의 京都 항목을 살펴보면 그 이전 자료들을 인용하며 京都의 의미와 구체적인 역사적 사례를 소개하고 있다. 인용하고 있는 자료는 『釋名』, 『尚書大傳』, 『春秋左氏傳』, 『春秋公羊傳』, 『白虎通義』, 『帝王世紀』, 『風俗通義』, 『三輔決錄注』, 『五經要義』, 王嬰의 『古今通論』, 譙周의 『法訓』, 『史記』, 『漢書』, 杜篤의 『論都賦』 등이다. 우선 『釋名』의 '都'를 '國君이 거주하는 곳이자 人이 모여든 곳'이라고 부분을 인용하여 '都'의 의미를 제시한 뒤 각 자료에 등장하는 京都의 구절을 제시하고 있다. 그 가운데 京都의 字義나 구성 요소, 위치 등을 중심으로 내용을 추출하면 『春秋左氏傳』의 '都是 邑 가운데 先君의 宗廟之主가 있는 곳', 『春秋公羊傳』의 '京師는 천자가 거주하는 곳으로서 사람이 무리를 지고 거대한 곳', 『帝王世紀』의 '京師는 甸服의 안에 있는 곳 혹은 天子가 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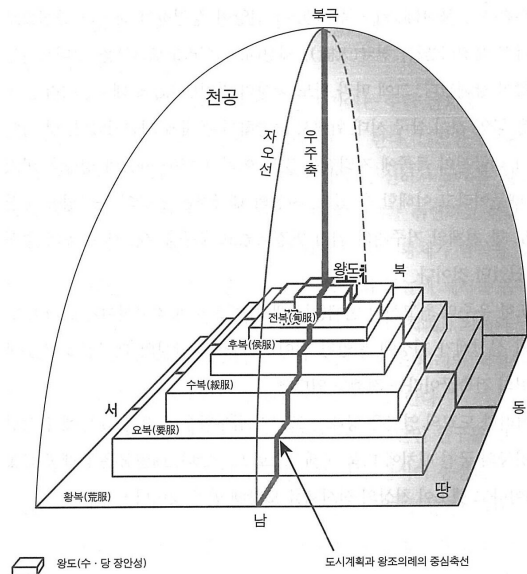
大謂之矣, 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 “齊宋之間曰碩, 荊吳楊甌之郊曰濯, 中齊西楚之間曰訃”, 此皆謂大, 方俗之殊語也……」

- 4) 이충구·임재완·김병현·성당제 역주, 『이야주소 4』, 卷7 釋丘, pp.95~96. 『絶高爲之京. 注: 人力所作. 音義: 作, 子各反. 疏: 言卓絶高大如丘, 而人力所作之者名京. 案春秋宣十二年左傳; “楚敗晉師於郟.” “潘黨曰: 君盍築武軍而需晉尸以爲京觀? 楚子曰云云: 今罪無所, 而民皆盡忠以死師君命, 又何以爲京觀乎?” 是其類也.』
- 5) 이충구·임재완·김병현·성당제 역주, 『이야주소 1』, 卷2 釋詁下, p.221. 『黎·庶·烝·多·醜·師·黎, 衆也.』
- 6) 이충구·임재완·김병현·성당제 역주, 『이야주소 2』 卷3 釋言, pp.144~145. 『師, 人也. 注: 謂人衆. 疏: 師, 衆也. 『周禮』 『大司馬』; “二十五百人爲師.” 故郭云; “謂人衆.” 『爾雅』에서 京을 ‘크다’와 ‘師’를 ‘무리’로 풀이한 것은 『春秋公羊傳』의 해석과 동일하다.(春秋公羊傳曰: 京師者, 天子之居也. 京者, 大也; 師者, 衆也, 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 7) 이충구·임재완·김병현·성당제 역주, 『이야주소 5』, 卷10 釋獸, p.401. 『豕生三, 豨; 二, 師; 一, 特.』; 이충구·임재완·김병현·성당제 역주, 『이야주소 5』, 卷10 釋畜, p.540. 『犬生三, 獾; 二, 師; 一, 獬.
- 8) 이충구·임재완·김병현·성당제 역주, 『이야주소 1』, 卷1 釋詁, p.152. 『爰·粵·于·那·都·繇, 於也.』 都城이라는 용어도 『爾雅』에서 보이지 않으며 城에 대한 글자 풀이 역시 없다.
- 9) 宋代에 편찬된 장안 관련 자료로서 呂大防의 『長安圖題記』, 張禮의 『遊城南記』, 그리고 程大昌의 『雍錄』 등이 있다. 각각 편찬시기는 元豐 3年(1080), 元祐元年(1086), 乾道·淳熙年刊(1165~1189)으로 『長安志』의 편찬 시기보다 늦다.

을 지어 사는 곳’, 『五經要義』의 ‘천명을 받은 王者가 萬國을 제어할 수 있도록 天地의 조화와 陰陽의 정기가 깃든 中土에 세운 곳’, 『法訓』의 ‘王者가 천하의 중심에서 거주하는 곳’ 등이다.¹⁰⁾ 이것을 총괄하여 정리하면 京都 혹은 京師란 ‘王者가 거주하는 곳이며 그 위치는 천하의 중심이며 그곳에는 宮과 宗廟가 있으며 많은 사람이 무리지어 있다.’라고 할 수 있다.

이러한 정의는 곧 『呂氏春秋』 審分覽의 慎勢篇에 기록된 “옛날 왕자는 천하의 중심을 선택하여 國을 세우며 國의 중심을 선택하여 宮을 세우며 宮의 중심을 선택하여 廟를 세운다.”¹¹⁾

구절 및 『白虎通義』 京師篇에서도 京師는 결국 왕자가 땅의 중심에 선택하여 세운 곳이라는 것을¹²⁾ 연상케 한다. [그림 1]에서 보이듯이 천하의 중심을 설정하여 경사를 두도록 都城 공간을 설계할 수 있는 구체적인 안을 담고 있는 것이 『周禮』 考工記의 匠人建國條와 匠人營國條이다. 匠人建國條에서는 “匠人이 도성을 건설하려고 할 때 水準器를 이용하여 평지를 측량하고 재는 기둥을 세워 두고 그림자를 관찰하여 (四方을 정확히 한다.) 規를 만들어 일출 때의 그림자와 일몰 때의 그림자를 확인하여 (東西 방향을 정하며) 한 낮의 그림자를 측량하여 (남쪽을), 밤에는 북극성을 확인하여 (북쪽을 확정하여) 아침의 그림자와 저녁의 그림자(남북 방향)를 바로 잡는다.”¹³⁾ 하여 도성의 위치와 도성의 남



10) 『長安志』(『宋元方志叢刊 1』, 北京, 中華書局, 1990) 卷2 京都, p.82-上·下. 『釋名』云: 都者, 國君所居, 人所都會也. 邑猶侶聚會之稱也. ……『春秋左氏傳』曰: 邑有先君宗廟之主曰都. 『春秋公羊傳』曰: 京師者, 天子之居也. 京者, 大也; 師者, 衆也, 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帝王世紀』曰: 天子畿方千里, 曰甸服, 甸服之內曰京師. 又曰: 天子所居宮曰都. …… 五經要義曰: 王者受命, 創始建國, 立都必居中土, 所以總天地之和, 据陰陽之正, 均統四方以制萬國者也. …… 譙周法訓曰王者居中國何也? 順天之和, 而同四方之統也.」 이외에 구체적인 역사적 사례로 『帝王世紀』의 周의 古公亶父가 都의 기틀을 닦은 과정, 『史記』와 『漢書』에서는 장안을 경도로 삼는 과정, 後漢 杜篤의 「論都賦」의 前漢의 쇠퇴에 따른 장안의 쇠락 등을 상세히 제시하고 있다.

11) 『呂氏春秋校釋』(上海, 學林出版社, 1990) 卷17 審分覽 六曰慎勢, p.1108. 「古之王者, 擇天下之中而立國, 擇國之中而立宮, 擇宮之宮而立廟.」

12) 『白虎通義疏證』(北京, 中華書局, 1994) 卷4 京師, p.157. 「王者京師必擇土中何? 所以均教道, 平往來, 使善易以聞, 爲惡易以聞, 明當懼慎, 損於善惡.」

13) 孫詒讓, 『周禮正義』(北京, 中華書局, 1987), pp.3415~3419. 「水地以縣, 置槩以縣, 眡以景. 爲規, 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 晝參諸日中之景, 夜考之極星, 以正朝夕.」 이 해석에는 本田二郎의 『周禮通釋 下』(秀英出版, 1979, pp.560~562)를 참조하였다.

북 방향을 결정하여 왕궁의 위치를 확정하는 방법을 제시하고 있다. 이와 연계하여 匠人營國條에서 ‘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¹⁴⁾라고 하여 도성 내의 시설물과 그 위치 등을 제시하고 있다. 이것은 京都란 천하의 중심에서 천하를 지배하는 곳임을 뜻한다. 京師는 君主→王宮→都城(京都)→九州→天下라는 권력의 확산 혹은 天下→九州→都城(京都)→王宮→君主라는 권력의 수렴에서 핵심 공간인 셈이다.¹⁵⁾

그런데 여기서 의문은 시장을 京都, 즉 都城에 왜 설치하였을까라는 점이다. 도성에 설치하는 시설물은 모두 네 곳이다. 종묘, 사직, 조정 그리고 시장이다. 그 가운데 종묘는 천하의 중심에서 군주의 천하 통치권 계승을 정당화하는 의례가 벌어진 곳(통치의 시간적 계승의 정당화)이며 사직은 군주의 천하 통치를 정당화하는 의례를 행하는 곳(공간에 대한 통치의 정당화)이라는 점에서 도성이 지닌 통치 성격에 부합한다. 실제 천하에 대한 통치 행위가 일상적으로 벌어진 조정 역시 마찬가지이다. 그렇다면 시장 설치에도 천하 통치와 관련된 측면이 반영되어 있지 않을까? 考工記를 전론한 기존의 연구 성과에서는 이 부문에 대해서 언급하고 있지 않다. 오히려 시장을 북쪽에 둔 이유로 도성이 정치적 성격이 강한 곳이기 때문에 경제적 기능을 크게 부각시킬 필요가 없고 형장도 겸하고 있어 궁으로부터 멀리 떼어 둘 필요가 있었기 때문이라는 지적이 있다.¹⁶⁾ 이는 시장을 단지 경제적 재화만 유통하는 공간으로 파악하여 도성에 설치된 시장에는 정치적 성격이 반영되어 있지 않다는 것을 의미한다. 그러나 ‘左祖右社，面朝後市’ 구절에서 종묘, 사직, 조정, 시장이 병렬적으로 나열되었다는 점에서나 도성이 천하 통치의 핵심공간이라는 정의에서 근거할 때 도성의 시장을 단순히 경제적 공간으로만 보기 힘들다.

시장이 천하와 관련되어 있다는 것과 관련하여 『周易』 繫辭傳에 해가 중천에 뜨면 시장이 형성되어 천하의 사람들이 모여 들고 천하의 재화가 모여 들어 ‘교역이 이루어진다’는 구절이¹⁷⁾ 주목된다. 시장은 곧 천하의 사람과 재화가 모여든 곳이라는 것이다. 그렇다면 도성의 시장은 천하의 사람과 재화가 모두 모여들고 나가는 공간으로 상정되었을 가능성도 있다. 이를 위해서 조정이 행정상 높은 위상이 곧 천하의 중심임을 나타내듯이 도성의 시장이 일반 시장에 비해 위상이 어떤 지를 살펴볼 것이다. 그 구체적인 모습을 『周禮』 考工記의 영향을 받아 건설된 隋唐長安城의 市場에서¹⁸⁾ 확인해 보고자 한다. 이를 통해 都城으로서 隋唐長安城의 모습을 다양한 측면에서 파악하는 데 일조하기를 기대

14) 孫詒讓, 『周禮正義』, pp.3423~3428.

15) 최재영, 『『周禮』 考工記의 도시계획원리와 隋唐長安城의 구조』, 『역사문화연구』 35, 2010, pp. 9~10.

16) 賀業鉅 저, 윤정분 역, 『중국 도성제도의 이론-『주례·고공기』의 도성제도』, 이회문화사, 1995, p.175.

17) 『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 整理本)』(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 卷8 繫辭下, p.351-下. 「日中爲市, 致天下之民, 聚天下之貨, 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18) 隋唐長安城의 市場에 대한 연구 성과는 매우 많다. 그 가운데 국내 연구성과로서 朴漢濟, 『隋唐長安城의 市場風景-胡漢文化의 交流와 統合의 現場』(『歷史教育』 84, 2002)는 隋唐長安城의 市場을 전반적으로 이해하는 데 일독할 필요가 있다.

한다.

II. 隋唐長安城의 시장 설치와 모습

주지하듯이 隋唐長安城의 대표적인 시장은 朱雀大街을 기준으로 동편인 萬年縣에 있는 東市와 서편인 長安縣에 있는 西市이다. 그러나 長安城에는 東市와 西市만 있는 것이 아니다. 이 두 시장 이외에도 다른 곳에 시장이 새로 설치되었다가 폐지되었다.¹⁹⁾ 우선 그 설치 시기와 정확한 장소는 알 수 없으나 垂拱年間(685~688)까지 南市가 長安城 내에 존재했었다.²⁰⁾ 그 뒤에 설치된 시장은 中市이다. 中市는 高宗때 설치되어 安善坊 전 지역과 그 남쪽의 大業坊 절반을 차지하였다. 노비, 말, 소, 나귀 등을 취급하는 상점이 있었으나 그 위치가 장안성의 남쪽에 치우쳐 있어 교역에 불편하여 결국 武則天 통치 말기에 폐지되었다. 그곳은 教躬場으로 바뀌고 威遠將軍에 소속되었다.²¹⁾ 中市 역시 그 정확한 설치 시기는 알 수 없으나 폐지 시기는 『唐會要』에는 따르면 長安元年(701) 12월이라고 하여²²⁾ 中市는 高宗 즉위와 더불어 설치되었다고 한다면 최대 51년간 존속했던 셈이다.

天寶 8年(749) 10월에는 威遠營에 南市가 설치되었다.²³⁾ 이것은 앞서 언급했던 垂拱年間까지 존속했던 南市와 다른 것이다. 그 위치에 대해서는 中市 폐지 된 후 그 자리를 威遠將軍이 관할한 것에서 보아 中市 지역에 다시 天寶 8년에 南市를 둔 것으로 이해된다.²⁴⁾ 南市는 開成(836~840)初에도 여전히 존속했다. 『西陽雜俎』에 南市라는 용어를 확인할 수 있기 때문이다. 東市の 백성이 아버지 상을 당해 喪具를 사기 위해 시장으로 나귀를 타고 가다가 그 나귀가 ‘나는 南市의 밀기울을 파는 집에 5400냥이 빚졌다’고 한다.²⁵⁾ 이것이 비록 귀신 요괴의 일화를 채록한 것이기 때문에 그 기록의 신빙성에 대해

19) 魏晉南北朝時代 都城에 설치된 시장의 수를 살펴보면 北魏 洛陽城에서 大市와 小市 두 곳이 있었으며 東魏·北齊의 鄴城 역시 東市와 西市 두 곳이 있었다. 반면 建康城에는 大市, 草市, 小市, 紗市, 牛馬市, 穀市, 蜆市, 鹽市, 苑市, 東市, 北市, 鬪場市 등 모두 12곳의 시장이 있었다.((朴漢濟, 『隋唐長安城의 市場風景-胡漢文化的 交流와 統合의 現場』, pp.280~281)

20) 『唐六典』(北京, 中華書局, 1992) 卷20 太府寺, p.543. 『京置東西南三市……垂拱中省京南市.』

21) 『長安志』 卷7 外廓城 次南安善坊, p.112-下. 『高宗時併此坊之大業坊之半, 立中市署, 領口馬牛驢之肆. 然已偏處京城之南交易者不便, 後但出文符於署司而已貨鬻者並移于市. 至武太后末年廢爲教躬場. 其場隸威遠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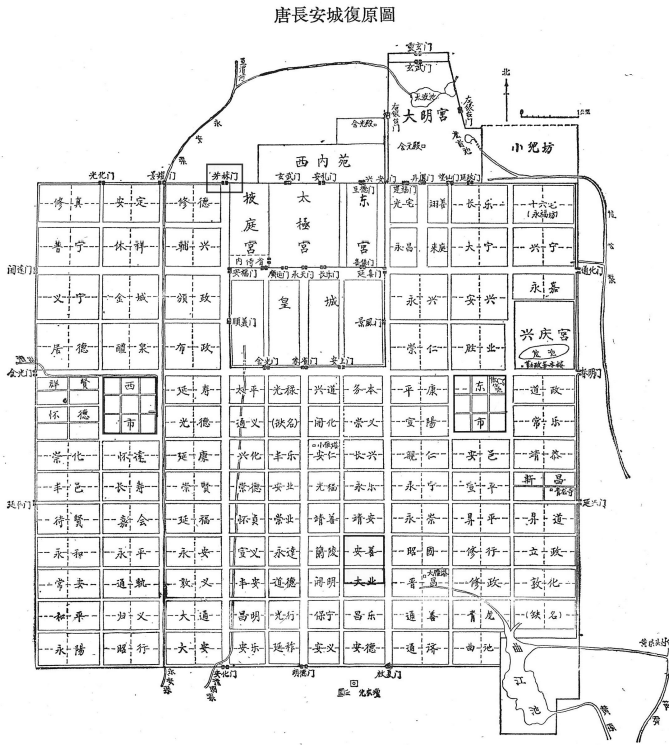
22) 『唐會要』(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卷86 市, p.1873. 『長安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廢京中市.』

23) 『唐會要』 卷86 市, p.1873. 『至天寶八載十月五日, 西京威遠營置南市.』

24) Victor Cunrui Xiong, *Sui-Tang Chang'an-A Study in the Urban History of Medieval Chin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0, 7. Marketplaces, p.167.

25) 『西陽雜俎』(北京: 中華書局, 1981) 前集 卷15 諾臯記 下, p.147. 『開成初, 東市百姓喪夫, 騎驢市凶具, 行百步, 驢忽曰: 我姓白名元通, 負君家力已足, 勿復騎我. 南市賣楚家. 欠我五千四百, 我又負君, 錢數亦如之. 今可賣我.』 其人驚異, 即牽行, 旋訪主賣之. 驢甚壯, 報價只及五千, 詣楚行, 乃還五千四百, 因賣之. 兩宿而死.』

다소 의문이 있을 수 있지만 東市 역시 기록한 것으로 보아 南市가 開成初에 존재했다는 것은 사실일 것이다. 하지만 자료의 한계상 그 폐지 시기가 언제였는지를 확인할 수는 없다.



<그림 2> 隋唐長安城의 市場 위치

이들 시장을 東市와 西市 만큼이나 都城의 시장으로서 모습을 갖추고 있다고 보기는 어렵다. 따라서 都城으로서 隋唐長安城과 시장의 관계를 이해하기 위해서는 東市와 西市만을 분석대상으로 할 수밖에 없다.

그 단서를 찾기 위해 隋唐長安城에 대한 도시사회지라고 할 수 있는 자료, 즉 唐代 韋述의 『兩京新記』, 宋代 宋敏求의 『長安志』, 그리고 清代 徐松의 『唐兩京城坊考』 등에 서술된 東市와 西市에 대한 기록을 살펴보고자 한다. 이들 세 자료에서는 같은 내용을 똑같이 기재한 부분도 있지만 편찬연대가 늦을수록 기사가 더 추가되어 있다. 이 세 자료를 바탕으로 우선 東市와 西市의 면모를 정리하면, 東市에 대해 『兩京新記』에서는 平準

長安城에서 가장 마지막에 설치된 시장은 新市이다. 그것은 元和 12年(817) 芳林門의 남쪽에 설치되었던 것이다.26) 芳林門은 外城 북쪽에 설치된 문으로 掖庭宮 서쪽 옆에 위치하였다. 新市の 폐지 시기 역시 확인할 수 있는 자료는 아직까지 보이지 않는 상황이다. 그러나 天寶 8年の 南市가 역시 中市와 똑같이 남쪽으로 安善坊에 있었고 新市는 북쪽으로 위치하고 있어 교역에 불편하여 그 존속기간이 길지 않았을 것이라는 추정은27) 납득할 만하다.

東市와 西市 외의 네 시장은 隋 大興城의 건설 때부터 계획적으로 설치된 것이 아니고 그 존속 기간도 짧아

26) 『冊府元龜』(南京, 鳳凰出版社, 2006) 卷14 都邑 2, p.147. 「(元和)十二年四月, 命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第五守進以衆二千築夾城, 自雲韶門·芳林門西至修德里, 以通于興福寺. 又置新市于芳林門南.」

27) 신성곤, 「唐代 長安의 市場과 일상」, 『글로벌시대와 동아시아의 문화표상(IV)-일상문화의 표상』 (2014.6.20. 한양대학교 동아시아문화연구소) 발표원고

署가 있고 東市의 동북쪽에 放生池가 있다고²⁸⁾ 한다. 『長安志』에 기술된 새로운 내용은 규모뿐만 아니라 東市 내의 상점으로 220行이 있고 천하의 기이한 물건이 모여든 곳이나 西市에 비해 번잡하지 않다는 것이다. 그 외에도 東市의 市署로 東市局과 平準局이 있으며 太府寺 소속이라는 사실도 전하고 있다.²⁹⁾ 『唐兩京城坊考』에서는 東市에 鐵行이라는 상점과 資聖寺라는 절이 있으며 東市의 서북쪽에 죄인을 처형하는 곳이 있다는 것이다.³⁰⁾

西市에 대한 내용을 살펴보면 『兩京新記』에서는 西市에서 市署 역시 太府寺 소속이며 大衣行이 있으며 放生池와 그 옆에 佛堂이 있었다고 한다.³¹⁾ 『長安志』에서는 平準署가 있으며 獨柳라는 처형지가 있었다는 사실을 새롭게 전하고 있고 『唐兩京城坊考』에서는 衣肆, 鞞轡行, 秤行, 寶家店, 景先宅 등 상점이 있다는³²⁾ 사실을 추가하고 있다.

이를 통해서 東市와 西市는 기본적으로 같은 모습을 띠고 있다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즉 太府寺 소속의 市署와 平準署가 설치되었고 전문 물품을 취급하는 상점이 많았고 죄인을 처형하는 장소가 있었다는 것이다. 여기서 도성이 천하 중심에서 통치하는 곳이라는 개념과 관련될 만한 것은 우선 죄인 처형일 것이다. 唐代 長安城에서 시장에서 죄인을 처형한 사례는 모두 18건이 확인된다. 특히 그 죄는 일반적으로 謀反이다. 이들을 시장에서

28) 『兩京新記集本 卷第三』, 『唐代研究のしおり-第六 長安と洛陽』,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56, p.205-下. 『西京東市, 平準署. 東北隅有放生池. 分灑水渠自道政坊東城, 西流注之. 俗號爲海池.』

29) 『長安志』 卷8 唐京城 2, p.118-下. 『次南東市. 隋曰都會市. 南北居兩坊之地. 東西南北各六百步, 四面各開一門定四面街各廣百步, 北街當皇城南之大街, 東出春明門, 廣狹不易於舊. 東面及南面三街向內開, 壯廣于舊. 街市內貨財二百二十行, 四面立邸, 四方珍奇, 皆所積集. 萬年縣戶口減于長安, 文公卿以下民止多在朱雀街東, 第宅所占勳貴, 由是商賈所湊, 多歸西市. 西市有口焉. 止號行自此之外, 繁雜稍劣于西市矣. 當中東市局, 次東平準局. 並隸太府寺. 東北隅有放生池. 分灑水渠自道政坊東入城, 西流注此, 池俗號爲海池.』

30) 『唐兩京城坊考』(北京, 中華書局, 1985) 徐松의 『唐兩京城坊考』 卷3 西京, p.75. 『鐵行. 乾巽子: 唐市鐵行有范生, 卜舉人連中成敗, 每卦一縑. 資聖寺. 太平廣記引博異志: 元和四年, 伐王承宗, 中尉吐突承璀獲恒陽生口馬奉忠等三十人, 馳詣闕, 憲宗令斬於東市西坡資聖寺側. 西北街, 唐書蔣鎮傳: 斬于東市西北街. 蓋刑人之所. 通鑑: 隆基將捕諸韋親黨, 斬韋溫于東市之北.』

31) 『兩京新記輯校』(『兩京新記輯校·大業雜記輯校』, 辛德勇 輯校, 三秦出版社, 2006) 卷3 長安縣所領, p.49. 隋曰利人市. 南北盡兩坊之地. 隸太府寺. 市內店肆如東市之制. 市署前有大衣行, 雜糴貨賣之所, 訛言反說, 不可解說. 西市北隅有海池. 長安中, 僧法成所穿, 分永安渠以注之, 以爲放生之所. 穿池得古石銘, 云“百年爲市, 而後爲池.” 自置都立市, 至是時百餘年矣. 池則有佛堂, 皆沙門法成所造. 市署前有市令載敏碑, 蒲州司兵徐彥伯爲其文也.

32) 『唐兩京城坊考』 卷3 西京, p.118. 『衣肆. 沈既濟任氏傳: 鄭子游入西市衣肆, 見任氏. 按韋述記云: 市署前有大衣行, 當卽此衣肆也. 鞞轡行. 逸史載江陵副使李君事, 有西市鞞轡行. 秤行. 寶家店. 乾巽子: 寶義西市買油錠數石, 雇庖人執爨, 傭人剝破麻鞋, 制爲法燭燭之, 獲無窮之利. 先是西市秤行之南, 有十餘畝坳下滯污之地, 目曰小海池, 爲旗亭之內衆穢所聚. 寶義遂求買之, 其主不測, 又酬錢三萬, 既獲之, 于其中立標, 懸幡子, 繞池設六七鋪, 制造煎餅及糰子. 召小兒擲瓦礫擊其幡標, 中者以煎餅糰啗, 不踰月, 兩街小兒競往, 計萬萬, 所擲瓦礫已滿池矣. 遂經度造店二十間, 當其要害, 日收利數千, 甚獲其要. 店今存焉, 號爲寶家店. 張家樓. 會昌解頤錄: 西市踰食店張家樓. 景先宅. 霍小玉傳: 小玉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 多託于西市寄附鋪候景先家貨賣.』

참형을 집행한 것은 황제권을 위협한 자를 공개적으로 처형함으로써 통치의 권위 강화와 안정을 도모했다는 점에서³³⁾ 시장과 천하 통치와는 연관성이 있다. 그런데 棄市 집행은 앞서 인용했던 『周易』의 繫辭傳에서 시장은 천하의 사람과 재화가 몰려드는 것이라고 한 것과는 무관하다. 대신 都城에는 사람과 재화가 몰려든다는 것과 관련하여 많은 상점이 존재하며 다양한 물품이 거래되는 모습도 주목할 수 있지만 그것은 주로 민간의 자발적인 상거래이기 때문에 당조의 통치 행위가 반영되어 있지 않다. 그렇다면 마지막으로 남은 것이 시장에 市署와 平準署가 설치되어 太府寺 소속이라는 것이다. 이것은 시장을 관리하는 市制이기 때문에 唐朝의 통치 행위이다. 여기에 천하의 중심과 통치라는 모습이 반영된 것을 아닐까?

Ⅲ. 東市와 西市의 市制와 天下

市制와 관련하여 주목되는 것이 東市와 西市의 市署가 太府寺 소속이라는 점이다. 太府寺의 최고 책임자인 太常卿이 관장하는 관서는 長安城의 東市와 西市의 市署, 洛陽城의 南市와 北市의 市署, 平準署, 左藏署, 右藏署, 그리고 常平署 등 모두 여덟 관서인데³⁴⁾ 京師의 市署가 太府寺 소속이라는 것은 일반 縣의 시장의 책임자인 市令이 縣令 책임하에 있는 것과³⁵⁾ 다르기 때문이다. 앞서 언급했듯이 長安城의 外城은 행정제도상 長安縣과 萬年縣으로 나뉘어져 있어 東市の 市令과 西市の 市令은 일반 현의 예를 따른다면 長安縣令과 萬年縣令의 책임하에 있어야 할 것이지만 그것이 아니라 太府寺 소속인 것이다. 그 이유를 언급한 연구 성과는 현재로서는 아직 찾지 못했다. 그러나 都城의 시장이기 때문에 太府寺의 소속으로 한 것은 아닐까?

『唐六典』에 따르면 太府卿의 직장은 ‘나라의 재화의 정령을 관장하는 것(掌邦國財貨之政令)’³⁶⁾이며 그 차관인 太府丞의 직장 가운데 ‘정월 초하루와 동지에 각지에서 상공한 지역 특산물 가운데 전정에 진열해야 할 것을 받아서 올리는 것(凡元正、冬至所貢方物應陳於殿庭者, 受而進之)’라는 것이³⁷⁾ 있다. 東市와 西市의 각 市令의 직장은 ‘백성의 교역에 관한 일을 관장하는 것(掌百族交易之事)’³⁸⁾이다. 이런 직장에서

33) 최재영, 「唐後期 長安의 治安問題와 法 집행-詔勅을 중심으로」, 『歷史學報』 184, 2004. pp.203~206.

34) 『唐六典』 卷20 太府寺, p.540. 「總京·都四市·平準·左右藏·常平八署之官屬。」

35) 『唐六典』 卷30 上州 中州 下州官吏, p.750. 「市令·丞掌市廛交易, 禁斥非違之事。」(『역주 당육전 下』, 신서원, 2008, p.453 참조)

36) 『唐六典』 卷20 太府寺, p.540.(『역주 당육전 中』, 신서원, 2005, p.637 참조)

37) 『唐六典』 卷20 太府寺, p.542.(『역주 당육전 中』, 신서원, 2005, p.645 참조)

주목되는 것은 ‘邦國’, ‘方物’ 그리고 ‘百族’ 사이의 공통성이다. 즉, 모두 ‘天下’와 관련을 연상케 하는 용어이다. 太府卿-太府丞-東市와 西市의 市令으로 이어지는 위계체계를 통해 결국 太府卿의 관장 물품은 ‘천하’의 물품이며 천하의 중심인 長安에 있는 시장은 ‘천하’의 물품이 모여들어 교역되는 곳이라고 제도적으로 설정되었다고 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더구나 일반 縣의 市令과 市丞의 직장이 ‘시장의 교역에 관한 일과 비리와 위법 행위를 금하는 일을 관장하는 것(掌市塵交易, 禁斥非違之事)’이라고 단순히 기술되어 있는 것보다 비교하면 都城 長安의 시장은 일반 도시와 시장과는 달리 높은 위상으로 분식되어 있었다고 볼 수 있다.

그렇다면 실제 太府寺가 東市와 西市에 들어온 천하의 물품을 관할하여 천하 통치에 일조하였을까? 이와 관련하여 우선 상업 활동에 따른 물류의 흐름이 어떠한지를 살펴볼 필요가 있는데 상인의 생활을 다룬 시에서 그 일단을 확인할 수 있다. 그 예로 李白의 『巴女詞』의 ‘巴水の 물은 화살처럼 빠르고 배는 나는 듯 떠나는데 먼 길 떠난 지 한참 된 낭군은 언제나 돌아오려나’는³⁹⁾ 시구, 白居易의 『琵琶行』의 ‘소금장수 아내는 돈이 많아 농사나 누에를 치지 않는다. 사방을 떠돌다 보니 바람과 물이 고향이고 배가 집이다.’는⁴⁰⁾ 시구, 劉駕의 『反賈客樂』의 ‘상인의 삶이 즐겁다고 말하지 마라. 많은 상인들은 죽어도 묘가 없다. 그 예로 거센 풍랑을 만나면 물고기 밥이 되고 만다.’는⁴¹⁾ 시구, 吳融의 『商人』의 ‘많은 돈을 벌었으니 세상천지에 내 집 아닌 곳이 어디라. 북으로 衡岳을 버리고 남으로 떠나 기러기처럼 아침에는 襄陽을 떠나 저녁에는 또 다른 꽃을 구경하네.’는⁴²⁾ 시구 등을 들 수 있다. 이런 시는 상인의 삶의 애달픔과 그에 대한 연민을 표현한 것이니⁴³⁾ 그 애달픔은 오랜 기간 여러 지역을 돌아다니는 것에 비롯된 것이다. 그 지역도 단지 당의 영역만이 아니라 거센 풍랑을 넘어 세상천지이다. 즉 상인들은 천하를 돌아다니며 물품을 매매하였던 것이다. 그들 가운데에는 東市와 西市에 온 상인도 있었을 것이다. 아니면 東市와 西市의 상인 가운데 다른 지역의 물품을 끌어 모은 이도 있었을 것이다. 그 예로 鄒風熾를 들 수 있다. 懷德坊 南門의 동쪽에 살던 鄒鳳熾는 매우 부자였는데 그의 邸店과 정원이 나라 곳곳에 퍼져 있었으며 사방의 물자들이 그의 손안에 들어왔던 것이다.⁴⁴⁾

38) 『唐六典』 卷20 太府寺, p.543.(『역주 당육전 中』, 신서원, 2005, p.651 참조)

39) 『全唐詩』(北京, 中華書局, 2003) 卷184 李百24 『巴女詞』, p.1886. 『巴水急如箭, 巴船去若飛. 十月三千里, 郎行幾歲歸.』

40) 『全唐詩』 卷427 白居易4 『鹽商婦』, p.4706. 『鹽商婦多金帛, 佛事由田農與蠶績. 南北東西不失家, 風水爲鄉船作宅.』

41) 『全唐詩』 卷585 劉駕 『反賈客樂』, p.6774. 『無言賈客樂, 賈客多無墓. 行舟觸風浪, 盡入魚腹去.』

42) 『全唐詩』 卷684 吳融 『商人』, p.7852. 『百尺竿頭五兩斜, 此生何處不爲家. 北拋衡嶽南過雁, 朝發襄陽暮看花.』

43) 이화승, 『상인이야기-인의와 실리를 좇아 천하를 밟는 중국 상인사』, 행정:B앞새, 2013, pp.114~116.

그런데 東市나 西市에 물려든 물품을 唐朝가 천하 통치를 위해 어떻게 이용했는지에 대한 구체적인 자료는 아직 찾지 못했다. 하지만 隋 大業 6年(610)의 일화는 참고할 만하다. 당시 실질적인 수도였던 洛陽에 여러 외국에서 조공왔을 때 南市에 가서 교역할 것을 청하였다. 南市는 사람과 물자로 번성했고 상점들도 화려한 곳이었다. 煬帝는 그들의 요구를 수용해 주었던 것이다.⁴⁵⁾ 이는 곧 천하의 물품이 모여든 洛陽의 南市에 천하의 사람들이 와서 교역을 허락함으로써 결국 상징적으로 천하 통치를 실현한 한 예라고 할 수 있다. 隋의 통치체제가 당에 계승되었고 隋의 大興城도 당이 그대로 이어받았다는 점을 고려할 때 唐朝 역시 東市와 西市를 이런 측면에서 활용했을 것으로 추측할 수 있다. 소그드인을 비롯한, 唐 영역 밖의 상인이 長安에 와서 특히 西市에서 적극적인 활동을 할 수 있었던 것도 이와 무관하지 않을 것이다. 또한 唐朝로서는 長安城이 都城에 걸맞는 공간이 되기 위해서 그들이 東市나 西市에서 교역하는 것은 필요조건이기도 했다. 결국 長安城의 市場은 天下와 밀접한 관계를 상징하고 도성의 시설에 걸맞게 제도화되었던 것이다.

IV. 맺음말

隋唐長安城의 시장에 대해서는 매우 많은 연구가 진행되었다. 주요한 연구 경향은 唐代 市場 자체의 상업 활동 및 성격 등을 밝히고자 대표 사례로서 자료가 상대적으로 많은 장안성의 시장의 성격을 파악하고자 한 것이다. 이것은 唐代 제도상 長安이 일반 縣과 달리 높은 위상으로 취급되었다는 점을 고려할 때 都城인 長安城의 시장과 일반 縣城의 시장과의 차이를 염두하지 않은 것이다. 이 때문에 長安의 東市와 西市의 성격을 드러내지 않는다. 본 발표는 도성이란 천하의 중심에서 천하를 통치하기 위한 공간이라는 개념에서 東市와 西市의 설치를 살펴보고자 했다. 그 잠정적인 결론으로 천하의 물품이 모여든 東市와 西市는 일반 縣의 시장과는 달리 太府寺가 관할한다는 것이 도성의 시장에 맞는 제도적 장치였다는 것을 제시했다.

현재 물건을 뜻하는 중국어인 ‘東西’가 장안의 東市와 西市에서 많은 물건을 거래한 것에서 비롯되었다고⁴⁶⁾ 하는 것으로 보아 東市와 西市에 천하의 물품이 모여든 가능성은

44) 『太平廣記』(北京, 中華書局, 1995) 卷495 雜錄3 鄒鳳熾, p.4062. 「西京懷德坊南門之東, 有富商鄒鳳熾, 肩高背曲, 有似駱駝, 時人號爲鄒駱駝. 其家巨富, 金寶不可勝計. 常與朝貴遊, 邸店園宅, 遍滿海內, 四方物盡爲所收.」

45) 『兩京新記輯校』 卷5 都城, p.86. 「修善坊, 南市……大業六年, 諸夷來朝, 請入市交易, 煬帝許之. 于是修飾諸行, 葺使邸店, 皆使薨宇齊正, 卑高如一, 瑰貨充積, 人物華盛. 時諸行鋪竟崇侈麗, 至賣菜者亦以龍鬚席藉之. 夷人有就店飲噉, 皆令不取直. 胡夷驚視, 寢以爲常.」

높은 것 같다. 그러나 동시와 서시를 통해서 천하를 통치했을 것이라는 주장이 설득력을 얻기 위해서는 太府寺에서 東市와 西市을 상대로 한 구체적인 활동을 발굴하고 논증할 숙제가 남아 있다.

46) 이화승, 『상인이야기-인의와 실리를 좇아 천하를 밟는 중국 상인사』, p.105.

五代時期 都城 開封의 浮上과 國家儀禮의 거행

김 상 범(한국외대)

- I. 머리말
- II. 五代時期 都城 移轉과 開封 定都의 背景
- III. 五代時期 國家儀禮의 舉行과 그 특징
- IV. 後周 世宗時期 開封 都城建設과 儀禮空間

I. 머리말

이 논문은 오대시기를 중심으로 ‘경제수도’, ‘근세수도’ 등 새로운 형태의 도성으로 일컬어지는, 개봉형 수도의 출현 과정 중에, 전통적인 도성의 ‘의례기능’이 어떻게 기능하고 변화하는지 살펴보고, 이를 통해서 도시사 변화를 분석해보려는 취지로 작성하였다.

연구자들은 唐宋變革期의 중요한 특징 가운데 하나로 상업과 도시혁명을 지적해왔는데, 그 변화의 중심에 위치한 도시가 바로 開封이다. 10세기 이전 중국도성을 대표하는 長安이 산맥으로 둘러싸인 황토고원의 천연 險地에 위치하고 있었다면, 개봉은 동부 화북평원의 개방된 공간에 자리 잡고 있었다. 장안이 隋의 大興城을 계승한 좌우대칭의 전형적인 격자형 계획도시라면, 개봉은 汴州와 宣武軍節度使의 치소가 있던 곳에 後梁이래 연이어 都城이 들어서며 팽창을 보이다가, 後周시기에 外城이 축조되면서 宮城-內城(裏城)-外城의 三重城 구조로 자연스럽게 발전한 도시였다. 장안이 왕조의 운영자들이 기획한 폐쇄적인 정치·군사형 도시였다면, 개봉은 禁軍 重兵이 배치된 도성이면서도 주민들이 전통적인 도시구조를 변형시키고 새로운 도시의 특징을 만들어간 개방형 경제수도였다.¹⁾ 당말·오대이래로 개봉으로 새롭게 유입된 군인과 관료들은 두터운 소비층을 형성하였고, 운하와 육로를 통해 각지에서 몰려든 상인들

과 그들이 운송해온 물자는 개봉에 상업적 에너지를 불어넣었다. 이러한 기운은 또 다른 성벽으로 도성내부를 분할했던 坊牆과 특정구역에만 제한적으로 설치된 市場을 와해시켰고, 시간적으로 상업행위를 제한하던 夜禁制마저 形骸化했다. 물류의 소통과 경제적 변화가 일구어낸 새로운 추세가 결국 개봉 주민들로 하여금 과거에 도성을 운영하기 위해서 설정해 놓았던 시간적·공간적 제한을 허물어버리게 한 것이었다.

장안시대의 종결과 함께 오대이후 중국의 새로운 도성으로 부상한 개봉은 이처럼 중요한 도시사적 의미를 가지고 있기 때문에, 일찍부터 연구자들의 주목을 받아왔다. 개봉에 관하여 종합적으로 접근한 개괄적인 연구²⁾와 더불어 거시적으로 당송변혁기와 도시사적인 변화의 관계를 탐구한 논문³⁾, 개봉의 도시구조⁴⁾와 치안⁵⁾, 개봉의 도시제도와 기능 등에 관한 연구⁶⁾, 개봉의 지리적 위치에 주목하여 運河와 交通·水利 그리고 漕運 문제를 다룬 논문⁷⁾, 수도방어와 禁軍문제에 관한 연구⁸⁾, 『東京夢華錄』과 『清明上河圖』를 집중적으로 분석하여 개봉시민의 세시풍속과 일상생활을 복원한 연구⁹⁾, 각 시기별 도시의 경관변화를 섬세하게 추적한 연구 등 여러 분야에서 다양하고 심층적인 연구가 이루어져 왔다.

이 시기 도시사적으로 중요한 변화 가운데 하나가 정치적 상징성의 감소와 경제적 기능성의 강화라는 점을 고려할 때, 지금까지의 연구는 여전히 후자의 측면 즉 경제적인 특징과 제도의 운영에 편향된 느낌이다. 필자는 먼저 五代時期 都城의 移轉推移와 開封 定都의 배경을 분석해보고, 전란의 시기인 오대시기에 국가의례가 어떻게 기능하고 변화하는지 살펴보겠다. 마지막으로 후주 태조와 세종시기를 중심으로 개봉의 도성건설과정을 검토해보고, 전통적인 의례기능이 어떻게 수렴되고 변화하는지

-
- 1) 朴漢濟는 역대 수도의 유형을 장안형과 개봉형으로 나누고 개봉형 도성의 특징을 ‘경제수도’라고 요약하였다. 朴漢濟, 『中國歷代 수도의 유형과 사회변화-唐宋 變革期를 중심으로』, 동양사학회 편『역사와 도시』, 서울대학교 출판부, pp.69-89.
 - 2) 那波利貞, 『宋都汴京の繁華』, 『歴史と地理』517, 1922. 曾我部靜雄, 『開封と杭州』, 富山房, 1940. 鄭壽彭, 『宋代開封府研究』, 臺北:國立編譯館, 1980. 吳濤, 『北宋都城東京』,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4.
 - 3) 朴漢濟, 앞의 논문. 本田知生, 『宋代の都市をめぐる諸問題』, 『東洋史研究』37-2, 1978.
 - 4) 田銀生, 『走向開放的都市-宋代東京街市研究』,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1.
 - 5) 久保田和男, 『宋都開封の治安制度と都市構造』, 『史學雜誌』104-7, 1995.
 - 6) 梅原郁, 『宋代の開封と都市制度』, 『鷹陵史學』3-4, 1977. 金成奎, 『宋代 開封의 外交的 機能』, 『中國歷代都市構造와 社會變化』, 서울대학교 출판부, 2003.
 - 7) 西岡弘晃, 『中國近世の都市と水利』(福岡:中國書店, 2004), pp.39-57.
 - 8) 久保田和男, 『宋都開封の治安制度と都市構造』, 『史學雜誌』104-7, 1995.
 - 9) 관련 연구성과는 伊原弘, 『中國開封の生活と歲時-描かれた宋代の都市生活』, 山川出版社, 1991. 伊原弘編, 『清明上河圖をよむ』, 東京:勉誠出版社, 2003) 등에 실려있음.

살펴보겠다. 이를 통해서 새로운 도성의 출현과정 속에서 발생하는 도시변화의 새로운 면모에 접근해보도록 하겠다.

II. 五代時期 都城 移轉과 開封 定都의 背景

일반적으로 오대시기에 접어들면서 後唐 13년을 제외하고는, 開封이 後梁·後晉·後漢·後周 4개 왕조의 수도로 선정되면서 都城史에 있어서 開封時代가 열린 것으로 지적한다. 대략적인 맥락은 일치하지만, 좀 더 자세히 살펴보면 後梁대에도 洛陽 遷都 시기가 존재했고, 後唐은 東京興唐府(魏州)를 수도로 정했다가 다음 해에 洛陽으로 천도를 단행했으며, 後晉 역시 洛陽을 첫 수도로 삼았다가 개봉으로 수도를 이전했음을 확인 할 수 있다.¹⁰⁾ 도성사에 있어서 개봉시대의 개막은 ‘五대의 과도기’를 거치면서 점진적으로 진행되었음을 시사해주는 것이다. 다양한 군벌 세력들이 경쟁하던 전란의 시기였던 만큼, 여타 군사세력과 대비될 수 있는 도성의 역사적 권위와 전략적 가치 등 정치·군사적 요인들이 定都和 遷都를 결정짓는 중요한 요인으로 작용했음을 추정할 수 있다.

다만 개봉 도시사의 장기적인 추세를 검토해 보면, 都城 성립의 기본적 요소라 할 수 있는 정치·군사적 요건 외에, 개봉형 도성의 특징과 개봉시대 개막의 역사적 의의를 결정하는 또 다른 배경이 존재함을 확인할 수 있다.

그런 의미에서 개봉도시사의 전개과정을 개략적으로 정리해보겠다. 개봉이 처음으로 수도로 확정되는 것은 戰國時代인데, BC 364년에 魏惠王이 安邑에서 儀邑으로 國都를 옮기고 大梁으로 개명하면서, 魏國은 梁國으로도 지칭되었으며 혜왕도 양혜왕으로 불리게 되었다. 秦의 東進이 천도의 주요 원인인 만큼, 혜왕은 “湯王·武王이

10) 오대시기의 왕조별 수도를 시기별로 정리해보면 다음과 같다.

왕조명	연도	首都
後梁	907-909	開封
	909-913	洛陽
	913-923	開封
後唐	923-924	魏州(東京興唐府)
	924-936	洛陽
後晉	936-937	洛陽
	937-946	開封
後漢	947-950	開封
後周	951-960	開封

환생해도 공략하기 어렵다”는 견고한 大梁城을 축조하였고¹¹⁾, 하천이 밀집된 지형을 활용하여 水澤을 개발하고 水利시설을 확충했으며, 鴻溝를 개착하여 황하와 회하를 연결하였다. 수리사업과 水道연결을 통해 大梁城의 활로를 모색한 것인데, 지리적 입지의 활용이 開封史의 전개에 중요한 요인으로 작용할 수 있음을 시사해준다.

이러한 맥락에서 개봉의 도시발전이 있어서 새로운 轉機가 마련되는 것은 隋代이다. 隋文帝는 南朝의 마지막왕조 陳을 공격하기 위해서 汴水일대에서 水戰을 연습하고¹²⁾, 통일 후에는 근처에 비문을 남겨 기념하였다. 汴州를 화북에서 강남으로 진출하는 ‘必徑之路’로 인식한 것인데, 특히 煬帝에 의해 황하와 회하를 연결하는 通濟渠 즉 汴渠가 개착되면서, 바야흐로 汴州는 남북 물자가 정치적 중심지인 낙양과 장안으로 운송될 때 반드시 경유해야만 하는 ‘北通南運’의 교통요지로 자리 잡게 되었다.¹³⁾ 변주의 중요성은 中唐이후 더욱 제고된다. 전통적인 화북의 농업중심지인 하북·산둥일대가 藩鎮에 점령당하면서, 관중과 낙양의 강회에 대한 의존도가 점증하는데, 이에 따라 양 지역을 연결하는 변주의 인구나 물동량도 자연스레 증가하였다. 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 등 강력한 변진세력을 방어하고, 늘어난 인구나 물류를 수용하기 위해서는 새로운 도시건설이 필요했다. 덕종 건중 2년(781) 변주자사 李勣은 나성의 둘레가 20리 155보에 달하는 대형 羅城을 축조하고 汴河를 끌어들이어 내하를 이루게 했는데¹⁴⁾, 汴河를 통해 성내로 반입된 화물들은 이곳에서 集荷되어 황하에 적합한 선박으로 轉運되었다. 변주성에는 각지로 향하는 7개의 성문이 설치되었고, 貞元14년(798)에는 동서 양편에 수문까지 修繕되어 전략과 교통의 要路에 부합하는 규모를 갖추게 되었다. 이처럼 변주성의 중요성이 제고되면서 이면이 성곽축조를 완성한 3년 후에는 宣武軍節度使의 治所도 宋州[商丘]에서 변주로 옮겨졌는데, 절도사의 衙署가 새로운 성곽의 서북 편에 둘레 4리 규모로 축조되어 ‘牙城’으로 불리었다.¹⁵⁾ 바야흐로 변주는 육로와 수로가 교차할 뿐 아니라, 河朔의 군사를 통어하기 위한 중병군단이 진주하고, 淮湖의 漕運을 轉運하는 명실상부한 천하의 요지가 된 것이다.¹⁶⁾

이와 비교할 때, 10세기 이전 중국정치를 좌우했던 장안과 낙양 두 도시는 상대적으로 몰락을 하고 있었다. 이미 중당이래로 장안과 관중평야의 생산력이 저하되는

11) 『史記』권72, <穰侯列傳>.

12) 『元和郡縣志』권8, 河南道 汴州: “習舟師以伐陳”

13) 皮日休 <汴河銘>: “北通涿郡之漁商, 南運江都之轉輸”

14) 『宋會要輯稿』

15) 이 부분에 대해서는 李路珂, 『古都開封與杭州』, 清華大學出版社, pp.24-25 참조.

16) (唐)劉寬夫, <汴州糾曹廳壁記>, 『文苑英華』卷803.

추세 속에서, 당말에 접어들면서 藩鎮과의 충돌이 격화되고 반란이 확대되면서 장안의 도시 기반도 점차 붕괴되었다. 僖宗시기에만 中和원년(881)과 光啓2년(886) 두 차례에 걸쳐 황제가 장안을 비우고 피난을 떠났는데, 반란군의 약탈 속에 장안은 점차 도성의 면모를 상실했다. 낙양의 사정도 다르지 않았다. 黃巢의 난에 이어서 秦宗權, 孫儒 세력까지 도시를 휩쓸면서, 건축물 대다수가 훼손되었고 성벽만이 잔해로 남았다. 887년 張全義가 처음 낙양에 도착해 보았던, “백골이 땅을 뒤덮고 가시 밭은 넓게 펼쳐졌으며 주민은 채 100호도 넘지 못했다.”는 소회는 낙양의 당시 상황을 그대로 반영해준다.¹⁷⁾

이처럼 개봉과 장안·낙양의 浮沈이 겹쳐지는 시대적 상황 속에서, 僖宗 中和3년(883) 唐에 투항한 朱溫에게 주어진 관직이 바로 宣武軍節度使였다. 주전충은 개봉의 지리적 기반을 활용하면서 주변의 번진들을 복속시켰는데, 唐 天祐4년(907)년에는 마침내 후량을 개국하며 황제에 즉위하게 되었다. 開平元年(907) 3월, 당의 昭宣帝가 御札을 내려 황제의 자리를 선양하자, 주전충은 근거지인 汴州를 開封府로 승격시켜 東都로 정하고, 4월 3일에는 金祥殿에서 百官들의 칭신을 받아들인다.¹⁸⁾ 주전충은 당시 正亞殿을 崇元殿으로, 東殿을 玄德殿으로 內殿을 금상전으로 萬歲堂을 萬歲殿으로 바꾸었다.¹⁹⁾ 관중본위정책을 유지하던 군사적, 경제적 우위가 무너지고 장안과 낙양의 도시기반도 점차 와해되었으며, 강회지역이 朝廷의 새로운 재정명맥으로 부상하는 시대적 상황 속에서, 주전충이 도성으로 선택한 곳은 바로 자신의 군사적 거점이자 천하의 재부가 모여들던 개봉이었다.

이처럼 개봉의 경제적·전략적 우세가 분명해지는 추세 속에서도, 文武百官들은 여전히 西都 낙양을 수도로 여기고 있었다. 오대 초기까지 여러 군사세력이 무력을 기반으로 정통성을 내걸고 경쟁하는 상황 속에서, 受命을 천하에 공포할 수 있는 도성의 공간적 권위와 대당제국에 대한 계승의식은 오대국가들의 定都와 遷都를 결정하는 중요한 요소로 작용했다. 乾寧 3년(896)에 張全義에게 낙양 복구의 명령을 내리고, 張廷範을 御營使로 삼아 長安의 宮殿과 官署, 관리와 백성들의 民居까지 헐어서 고도 장안을 폐허로 만들면서도 그 목재를 운반하여 낙양 도성을 재건하고 당조의 마지막 천도를 단행²⁰⁾했던 주전충에게도 낙양은 여전히 매력적인 고도였다. 禪讓을

17) 『資治通鑑』 卷257, 唐紀73, 光啓 3년(887)

18) 『資治通鑑』 卷266 後梁紀後1 梁太祖開平元年(907).

19) 『五代會要』

20) 『資治通鑑』 卷264, 唐紀80, 昭宣帝 天佑 元年(904)

받은 후에도 낙양에서 四廟 건립을 추진하였던 주전충은 결국 낙양천도를 단행했으며, 開平3년(909) 정월에는 이곳에서 태묘의례와 남교의례를 직접 주재하였고, 912년에 병상에서 아들 朱友珪에게 시해될 때까지 西都에 머물렀다. 주우규를 제거하고 등극한 후량 말제 주우정은 낙양 천도를 주장했던 신료들에게, 개봉이 태조가 창업한 곳이자 교통의 요충지이고 동북 번진과 연계해서 李存勳을 막을 수 있다는 현실적인 근거를 내세우며 다시 개봉을 도읍으로 정했다.

그러나 후당은 낙양을 다시 도성으로 선정했다. 同光원년(923) 4월 後唐 晉王 李存勳은 자신의 근거지이자 위박절도사의 치소가 위치한 魏州의 牙城 남쪽에 원구단을 축조하고 上帝에게 告祭를 올린 뒤 황제에 즉위하였다. 國號를 大唐으로 정하고, 魏州를 ‘東京興唐府’로 승격시켜 수도로 정했는데, 국호와 수도의 명칭에서부터 당조에 대한 계승의식을 분명히 했다. 더불어 魏州의 原城은 興唐縣으로, 貴鄉은 廣晉縣으로 개명하여 府 예하에 두 현을 설치하여 수도를 정비하였다. 그런데 同光원년(923) 11월 張全義가 장종 이존욱에게 낙양천도를 건의했다. 그가 천도를 제기한 근거는 역시 郊祀문제였다. 낙양에는 梁의 均王이 南郊에서 제천의례를 거행하려고 하다가 梁 劉의 함락으로 중단되어 儀仗과 器物이 그대로 남아있다는 것이다. 황제권력의 소재를 천하에 선포할 수 있는 역사적 권위를 가진 도시에 당장 교사를 진행할 수 있는 설비까지 갖추어져 있으니, 후량의 찬탈을 힐난하며 대당제국의 복원을 선포한 이존욱에게 낙양은 국가의례를 통해서 권력의 정당성을 확보할 수 최적의 도성으로 파악되었을 것이다. 결국 이존욱은 北都를 폐지하여 성덕군으로 환원하고, 동경 개봉부를 선무군 汴州로 격하하는 조치를 발표했다. 낙양에 도착해서는 천도작업을 추진했는데, 동광2년(924)년 정월 29일 직접 태묘의례를 거행한 뒤 2월 초하루에는 남교에서 제천의례를 거행하고 大赦를 단행하였다.²¹⁾

그러나 자체적인 경제기반이 갖추지 못한 낙양을 도성으로 유지하기 위해서는, 조운문제가 관건이었다. 여기에 황제 친위군의 증가정책은 도성의 인구증가를 가져왔고 조운 문제의 중요성을 더욱 제고시켰다. 오대이후 중앙정부는 지방 번진세력의 군사력을 억제하기 위해서, 병력을 禁軍을 중심으로 재조정하게 된다. 명의상으로는 금군이지만 실제로는 전투력이 점차 수도에 집중되는 결과를 가져왔고, 군대와 가족들이 수도에 집결되고 군영이 건설되면서 금군과 그 가족에게 식량을 원활하게 제공하는 문제가 수도선정에도 영향을 미치게 된 것이다. 후당 장종은 후량과의 전쟁

21) 『五代會要』2.『資治通鑑』卷273 後唐紀2

중에 하북 각 번진의 장졸들을 牙軍에 편입시켰다. 명종도 즉위 후에 본격적으로 금군에 대한 개혁정책을 진행했는데, 금군을 강화하기 위해서 각 군의 정예병사들을 棒聖, 嚴衛 양군에 편입시키고 지휘권을 강화했다. 명종은 결국 天成2년(927)에는 개봉으로부터 급하게 100만석의 穀糧을 구해와, 금군과 가족들에게 제공하는 사태를 맞기도 했다. 後晉·後漢대에는 衛士가 더욱 늘어나 수 십만에 달하게 되는데, 도성의 기능에 있어서 조운을 포함하는 경제적인 기능이 더욱 중요한 의미를 갖게 되었다.

後晉시기의 마지막 천도 이후 개봉의 위상은 더욱 확고해지는데, 이는 도성으로서 개봉의 경제적·전략적 장점을 분명하게 인식하고 공감한 결과이기도 하다. 後晉 石敬瑭은 天福元年(936)11월, 柳林(太原)에서 황제로 즉위한 뒤 잠시 낙양을 수도로 정했다가 天福2年(937) 3월부터 개봉(大梁) 천도에 대해서 논의하였다. 당시 桑維翰은 개봉의 장점에 대해서 “大梁은 북으로는 燕과 趙를 통어할 수 있고, 남으로는 江·淮와 연결되며 水陸이 모두 모여드니 재물과 물자가 풍부하고 넉넉합니다.”라고 확실하게 제시했다.²²⁾ 개봉이 천연의 방벽을 갖춘 전통적인 요새형 도성은 아니지만, 지리적인 위치와 군사력을 잘 활용하면 동북의 번진을 통제하기가 쉽고, 육로와 수로가 사통팔달로 뻗어 있는 교통의 요지여서 강회를 위시한 전국의 재부가 집중된다는 것이다. 수도 선정에 있어서 군사문제와 더불어 교통과 물류, 財富의 중요성을 함께 강조한 것인데, 석경당은 며칠 후 조서를 내려 낙양의 漕運 문제를 지적하며 汴州로 東巡을 떠났다. 석경당이 도성의 조건으로 조운과 재정의 중요성을 인식하고, 이에 부합하는 새로운 수도로 개봉을 선택했음을 반영해주는 것이다. 석경당은 천복3년 10월 개봉천도를 공식적으로 선포한 조문에서도 “大梁은 배와 수레가 모이는 곳으로 漕運이 편리하다”고 강조했다는데, 재정과 조운의 중심에 위치한 새로운 경제형 도성의 필요성에 대한 공감이 확대되고 있음을 반영하는 것이다.²³⁾ 다음 장에서는 오대시기 도성에 대한 관념에 새로운 변화가 발생하는 가운데, 전통적인 국가의례는 어떻게 실시되었고 도성공간의 의례공간은 어떻게 변화했는지 검토해 보겠다.

Ⅲ. 五代時期 國家儀禮의 舉行과 그 특징

22) 『資治通鑑』 卷281 後晉紀2, 高祖 天福2年 p.9172: “大梁北控燕趙, 南通江淮, 水陸都會, 資用富饒……”

23) 『資治通鑑』 卷281 後晉紀2, 高祖 天福2年 p.9172: “帝以大梁舟車所會, 便以漕運, 丙辰, 建東京於汴州……”

오대시기 낙양과 개봉 등 도성을 중심으로 거행되었던 국가의례는 大·中·小 三祀 禮 가운데 주로 南郊와 太廟 등 大祀에 집중되었다. 왕조교체가 잦았던 시기였던 만큼, 위진남북조 수당이래로 황제권력을 선양하는 최상의 국가의례로 인식되었던 남교와 태묘에서 황제권력의 권위와 정당성을 강구했던 것으로 보인다. 국가권력의 도덕적 면모를 분식하고 유교이데올로기를 확산하는데 유용한 의례로 공인되어 역대 정부에 의해 장려되어 온 釋奠禮²⁴⁾를 위시한 中祀 이하의 의례 역시 거의 시행되지 못했다.²⁵⁾ 전란으로 인하여 禮典에 의거하여 방대한 국가제사체계를 그대로 운영하는 것이 근본적으로 불가능한 상황속에서, 시대적 상황에 맞추어 취사선택했던 것으로 판단된다. 이처럼 오대시기의 국가의례에는 분란과 경쟁의 시대적 상황을 그대로 반영하고 있는데 대략 다음과 같이 요약해 볼 수 있다.

우선 오대에 거행된 교사를 유형별로 살펴보면, 가장 많은 수를 차지하는 것이 ‘즉위 의례’이다. 당시 황제권력을 추구하던 세력들은 개국을 선포하면 南郊 혹은 현지에 임시로 축조한 圜丘壇에서 祭天儀禮를 거행했다. 郊祀는 天命을 받은 진명천자가 천상의 昊天上帝에게 즉위를 알리는 최상급의 의례로 널리 인식되고 있었는데, 황제를 자칭해도 교사를 거행하지 못하면 상응하는 대우를 받지 못했다. 乾化元年(911) 大燕을 개국하고 황제로 즉위한 劉守光은 쫓의 周德威가 幽州를 공격해오자, 사신을 보내 하대하는 어투로 화해를 요청했는데, 이에 주덕위는 교사도 거행하지 않은 자가 건방지게 황제행세를 한다면서 요청을 거절했다. ²⁶⁾ 朱友貞이 均王이었을 때 河陽節

24) 釋奠禮와 관련해서는 後唐 長興3년(932) 國子博士 蔡同文이 매년 春秋二月中 上丁日에 文宣王 등에 대한 석전례를 규정에 의거하여 거행할 것을 건의하는 상주문이 『五代會要』권8<釋奠>에 보이지만, 중앙과 지방차원에서 실행여부를 반영해주는 자료는 발견할 수 없었다. 다만 廣順2年(952) 6월에 後周 太祖 郭威가 兗州에서 慕容彥超의 반란군을 진압한 뒤, 曲阜 闕里를 방문해서 孔子祠와 孔子墓에서 제사를 받드는 내용이 전한다. 태조는 孔子가 陪臣에 해당되기 때문에, 天子는 拜禮하지 않는다는 신하들의 만류에도 “百世帝王之師”로 떠받들며, 祠와 墓에서 직접 배례를 올렸고, 孔子祠에 대한 修補와 공립의 樵採금지를 명령했다. [『資治通鑑』 卷290 後周紀1, 太祖 廣順2年(952), pp.9478-79.] 정기의례가 아니고 반란을 진압한 직후에 이루어졌기 때문에, 유교 鼻祖에 대한 숭배행위를 통해서 집례자인 獻官의 이미지를 개선하려는 의도가 일정 정도 반영되었을 것으로 추정된다.

25) 中祀 嶽瀆海鎮 제사와 관련해서는 乾化3년(913) 12월 19일에 晉王 李存勗이 王處直과 함께 北嶽廟를 拜謁하는 내용이 발견되는데, 이존옥이 산서 태원을 기반으로 흥기한 만큼 거병을 앞두고 지역의 대표적인 국가제사라 할 수 있는 북악묘를 拜謁하는 의례를 통해서 현지지역민들과의 유대감을 강화하려 했을 것으로 추정된다. (『資治通鑑』 卷269 後梁紀4)

26) 乾化元年(911) 燕王 劉守光은 황제에 즉위하기 위해서 신하들에게 의례를 준비하게 했는데, 먼저 唐朝로부터 받은 太尉 冊封禮를 만남하는 의례를 마련하여 그 이유를 물었는데 주상께서는 존귀하시지만 여전히 신하이기에 먼저 郊天이나 改元을 할 수 없다고 대답했다고 한다. 유수광은 결국 이들을 하옥시키고, 제천의례를 준비하게하면서 먼저 황제에 즉위하여 국호를 大燕으

度使 張歸霸의 딸을 왕비로 취하려 했는데, 張歸霸는 군왕이 아직 南郊禮를 지내지 않았다면서 간곡히 사양했다고 한다.²⁷⁾ 당시에 郊祀가 황제에 등극하기 위한 필수의례로 널리 인식되고 있었음을 시사해주는 것이다.

郊祀가 즉위례로 애용된 사례는 十國의 군주들에게서도 종종 발견된다. 특히 중원 왕조와 적대적 관계에 있거나, 중원이 혼란에 빠질 경우 십국의 군주들은 황제를 칭하곤 했는데, 開平二年(908) 正月 前蜀의 王建은 成都 南郊의 원구단에서 郊天의례를 거행하고 황제로 즉위했음을 천하에 공포했다. 왕건은 그해 10월에는 星宿山에서 步騎30만을 동원하여 講武禮 거행했는데, 軍禮 講武가 황제만이 거행할 수 있는 최상급 특권의례라는 점을 감안하면, 왕건이 의도적으로 국가의례를 통해서 전축의 위상을 과시하려 했을 가능성이 높다.²⁸⁾

오대시기의 교사 가운데 격식을 갖추어 진행된 중요한 의례들이 당대후반기의 의례절차를 준수하여 진행된 점도 중요한 의미를 갖는다. 朱全忠은 洛陽 遷都와 日南國의 첫 번째 조공을 기념하기 위해서 開平3年(909)正月과 11월에 두 차례에 걸쳐 직접 남교의례를 주재하였다.²⁹⁾ 의례는 태묘례-남교례 순으로 진행되었고 종료 후에 大赦가 선포되었는데, 기본적으로 老子廟(太微宮)-太廟-南郊 의례의 순서로 거행하던 당대후반기의 소위 ‘일련의 제사’ 방식을 답습하고 있다. 後唐 莊宗과 明宗도 同光2年(924)과 長興元年(930) 2월에 각각 한 차례씩 南郊에서 親祭를 거행했는데, 역시 당말 예제에 의거하여 太廟와 南郊의례를 동시에 거행하였다. 명종 장흥원년의 남교의례는 특히 전년(929) 5월에 客省使 李仁求를 파견하여 西川과 東川節度使에게 50萬緡과 10萬緡의 進獻을 받아서 대규모로 거행되었다. 남교례에 보이는 ‘일련의 제사’ 전통은 송대에도 계승되는데, 그런 의미에서 오대시기가 분란의 시기이긴 하지만 일정정도 예제적 전통을 계승, 전수하는 역할을 수행했음을 알 수 있다.

오대시기에, 郊祀가 勞軍錢의 지급을 통해서 군인들에게 恩賞과 위로를 베푸는 기

로 선포하고 연호를 應天으로 改元했다.『資治通鑑』卷268, 後梁紀3 太祖 乾化元年.

27) 『資治通鑑』卷268, 後梁紀4 均王 貞明元年(915), p.8797: “初, 帝爲均王聚河陽節度使張歸霸女爲妃, 卽位, 愆立爲后, 后以帝未南郊, 固辭.”

28) 『資治通鑑』卷266 後梁紀1

29) 開平3年(909) 十一月에 주전충이 낙양 원구단에서 진행한 告謝禮에 대해서 胡三省은 즉위례나 정기적인 남교의례보다는 낮은 등급의 원구단 의례라고 지적하였다. 이번 의례는 주전충이 황제에 오른 뒤 처음으로 日南國에서 조공단을 파견해오자 천하를 획득한데 대한 감사의 의미를 재차 원구단 의례를 거행하여 표현한 것으로 사료된다.『資治通鑑』卷267, 後梁紀2 太祖 開平三年(909), p.8717: “告謝者, 告天而謝得天下也. 按歐史, 是日, 日南至. 徐無黨 注曰: “不曰有事於南郊, 蓋比南郊禮差簡.”

회로 활용된 점도 주목된다. 앞서서도 언급했지만 同光원년(923) 11월 張全義는 이준육에게 낙양천도와 남교의례의 거행을 건의했는데, 장종은 이를 받아들여 동광2년 2월 남교에서 제천의례를 거행하였다. 『資治通鑑』에는 이번 南郊禮와 관련된 勞軍錢 문제가 언급되어 있는데, 재상 郭崇韜가 藩鎮에서 챙겨 私室에 보관하던 10萬緡과 이계도에게서 몰수한 金帛 수십 만에, 莊宗 스스로 晉陽에 모아두었던 私財까지 총 동원하여 勞軍錢으로 내놓았지만, 군사들이 만족스러워하지 못했다는 내용이다. 그해 5월에는 薛昭文이 상소를 올렸는데, 그렇게 오랫동안 士卒들이 황제의 정벌을 따라다녔음에도 불구하고, 賞給이 부족하여 곤고하니 四方의 貢物과 南郊의 羨餘를 덧붙여서 다시 하사해달라는 내용이다.³⁰⁾ 이렇게 보면 長興元年(930) 2월에 명종 이사원이 客省使를 파견하여 남교제사를 위해서 西川과 東川에 각각 100만민과 50만민을 요청했다가 50만민과 10만민을 받아냈던 일도 勞軍錢 지급과 긴밀한 관련이 있다고 추정해볼 수 있을 것이다. 오대시기는 전란의 시기인 만큼 황제로 등극하기 까지 지난한 정복과 경쟁의 과정이 동반될 수밖에 없었는데, 이로 인해서 昊天上帝에게 왕조의 개창과 성공을 알리는 교사의례 역시 오랫동안 수행해온 군인들에게 노군전을 지급하여 위로하고 지속적인 지지를 당부하는 의례로 관례화되었던 것이다. 後周 太祖는 廣順2年(952) 10월에 내년 정월에 남교의례가 있을 것이라고 공포했는데, 조서에서 태조는 諸道州府에서 南郊를 명목으로 進奉하는 것을 엄금한다고 밝혔다. 후주 시대에는 국가의례 역시 非常의 상황에서 벗어나 상시적 의례로 전환되고 있음을 반영해주는 것으로 보인다.

전술한 바와 같이 빈번한 왕조교체가 이루어지던 오대시기에 있어서 대부분이 군벌출신인 통치자들은 황권의 정당성을 강화하기 위해서 적극적으로 의례를 활용해왔는데, 종묘제사에 있어서는 자신의 직계조상을 同姓의 前代皇帝들과 연계시키는 방법을 즉위의 정당성을 현창하기도 했다. 後唐 莊宗 李存勳은 황제에 즉위하면서 당조의 발원지라 할 수 있는 태원부 晉陽에 高祖, 太宗, 懿種, 昭宗 등 唐廟 4실에 朱邪執宜, 李國昌, 李克用 등 親廟 3실을 더해 七室 宗廟를 건립한 바 있다.³¹⁾ 天福12년(947) 後漢황제로 즉위한 劉知遠 역시 개봉에 종묘건립을 추진하면서, 漢의 太祖高皇帝(劉邦)와 世祖光武皇帝(劉秀)를 百世不遷位로 정하고, 여기에 親廟 四室을 더해 6묘형식의 종묘를 건립하였다.³²⁾ 漢의 황제들과의 연계를 통해 황실의 권위를 강화하

30) 『資治通鑑』 卷272 後唐紀2, 莊宗同光二年, pp.8913-8918.

31) 『資治通鑑』 卷272 後唐紀1, 莊宗同光2年, pp.8883-8884.

32) 『資治通鑑』 卷287 後漢紀2, 高祖 天福12年, p.9370.

려는 노력은 향후에도 지속되는데, 隱帝 劉承祐도 乾祐3년(950)에 漢高祖의 長陵과 光武帝의 元陵에 寢殿을 건립하기도 했다.

마지막으로 논의하고자 하는 문제는 의례의 거행장소에 관한 것이다. 오대시기에는 개봉천도가 이루어진 후에도, 상당기간 태묘와 남교는 여전히 낙양에 남겨두고 운영하였다. 卽位나 遷都처럼 중요한 경우를 제외하고, 대부분의 의례는 有司攝事の 형식으로 재상이 주재했다. 전통시대의 도성이 『周禮』 <고공기> “左祖右社, 面朝後市”의 내용을 참조하여, 中軸線을 중심으로 배치된 남교원구단과 태묘, 사직 등을 근간으로 설계되었고, 도성주민의 생활도 국가의례의 상당한 영향을 받았다는 점을 감안할 때, 일정기간동안 도성과 의례시설이 분리되어 있었다는 사실은 오대시기의 특수성을 반영하는 것이라 할 수 있다. 久保田和南은 이러한 상황을 ‘聖·俗의 분리’, ‘수도의 기능적 분리’로 파악하고, 이상적인 도성형태를 왜곡시킨 특별한 현상이라고 지적하였다.

하지만 오대시기에 진행된 의례를 좀 더 폭넓게 검토해보면 이러한 현상이 반드시 낙양과 개봉에만 제한된 문제는 아님을 알 수 있다. 일부세력들은 자신들의 근거지 남쪽에 남교 원구단을 세우고 즉위의례를 거행하기도 했다. 동광원년(923)에 李存勗은 위박절도사의 치소가 위치한 魏州의 牙城 남쪽에 원구단을 축조하고는 上帝에게 告祭를 올린 뒤, 황제에 즉위하였다. 흥미로운 점은 후량의 찬탈을 견책하면서 ‘대당 제국의 회복’을 개국 목표로 삼은 왕조답게 당조의 정치적 발원지 태원에 宗廟를 건립했다는 점이다.³³⁾ 당조에 대한 계승의식을 거듭 강조했다라는 점에서 立廟의 이유는 충분히 납득이 가지만, 일정기간 남교는 東京 낙양에, 종묘는 서경 태원에 분리되어 있었다는 사실은 도성의 전통적 경관과 비교할 때는 또 다른 파격인 것이다. 물론 이런 파격은 근본적으로 왕조간의 교체가 빈번하게 발생하고, 지역정권이 일순간에 중원왕조로 등장하기도 했던 오대의 시대적 특수성에서 기인한다. 개봉천도가 이루어진 후 남교와 태묘의 의례공간이 여전히 낙양에 남게 된 것도, 기본적으로 이러한 시대적 성격과 관련이 있다. 의례를 통해 권력의 정당성을 강구하던 균벌의 시대에 古都 洛陽은 여전히 천하군신들과 백성들에게 정권의 수립과 황권의 권위를 선양할 수 있는 최적의 의례공간으로 인식되었다. 잦은 전쟁으로 인해서 도성에 의례공간을 마련할 경제적, 시간적 여건이 충분치 않았던 점도 도성의 정치공간과 의례공간이 분리되었던 직접적 요인이 되었다.

33) 『資治通鑑』 卷272 後唐紀1, 莊宗同光元年, pp.8881-8884.

다만 고려해야 할 것은 개봉이 점차 도성으로 입지를 다져가면서 의례공간의 이전을 주장하는 논의가 이미 시작된다는 점이다. 後晉 石敬瑭은 柳林(太原)과 낙양을 거쳐 천복3년에는 개봉으로 천도하게 되는데, 太常에서 처음으로 宗廟·社稷을 개봉 移置를 주장하는 상주를 올렸다.³⁴⁾ 이에 대해서 석경당은 종전대로 낙양에서 유지할 것을 명했다. 개봉천도를 단행할 때 조운문제를 강조한 점이나 거란에 대한 세폐부담³⁵⁾등을 종합적으로 고려한다면 석경당이 南郊·宗廟·社稷 등 의례시설 이전을 포기한 것은 의례적 정통성의 고수라기보다는 재정문제로 보는 것이 더욱 합당할 것이다. 이러한 인식은 시간이 지날수록 분명해지는데, 後周 太祖가 廣順3年(953)에 남교 제사를 거행하려고 할 때 담당예관은 “天子가 계신 都城이라면 百神을 제사할 수 있기에, 낙양이 아니어도 상관이 없다”는 입장을 분명하게 밝혔다.³⁶⁾ 결국 경제적 여건이 개선되고, 도성에 대한 인식도 개선되면서 개봉에 의례공간이 성립될 수 있는 계기가 조성된 것이다. 다음 장에서는 오대 후반기인 주대 개봉의 도성건설과 의례공간의 확충에 대해 살펴보도록 하겠다.

IV. 後周 世宗時期 開封 都城建設과 儀禮空間

後晉 天福2년(937) 3월, 漕運문제로 골치아파하던 후진 高祖 石敬瑭이 마침내 “水陸交通, 舟車必集”의 교통요지 개봉으로 오대시기 마지막 천도를 단행했다. 고조는 汴州 行闕을 大寧宮으로 개명하고, 변주를 東京으로 승격시키며 開封府를 설치하였다. 開運 2년(945)에는 出帝 石重貴가 개봉성을 수보했는데, 궁전을 확장하고 후궁 정원을 화려하게 장식하였다.³⁷⁾

오대시기 東京 開封府의 도성건설은 후주시기에 집중되었는데, 太祖와 世宗에 의해 수차례에 걸쳐 정비사업이 이루어진다. 우선 羅城에 대한 전면적인 補修가 이루어

34) 『資治通鑑』 卷281 後晉紀2, 高祖 天福三年, pp.9193: “今建東京, 而宗廟·社稷皆在西京, 請遷置大梁.”

35) 세폐, 경조사 등으로 인한 거란에 대한 부담에 대해서는『資治通鑑』 卷281 後晉紀2, 高祖 天福三年, pp.9188 참조.

36) 『資治通鑑』 卷291, 後周太祖聖神恭肅文武皇帝 廣順三年(953) 九月 癸亥: “帝自入秋得風痺疾, 害於食飲及步趨, 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 帝欲祀南郊, 又以自梁以來, 郊祀常在洛陽, 疑之. 執政曰: “天子所都, 則可以祀百神, 何必洛陽?” 於是, 始築圜丘·社稷壇, 作太廟於大梁. 癸亥, 遣馮道迎太廟·社稷神主於洛陽.”

37) 『資治通鑑』 卷275 後唐紀6, 齊王(下) 開運二年, p.9295.

어졌는데, 太祖 廣順2년(952) 正月,畿內 丁夫 5만 5천명을 동원하여 열흘 간에 걸쳐 나성에 대한 版築 작업을 진행하였다.³⁸⁾ 당말·오대이래로 전국의 물류중심지로 성장한 개봉이 바야흐로 都城으로 입지를 굳히면서, 새로운 정치중심지 개봉에는 禁軍과 관료 그리고 그들의 가족들이 집중되었다. 인구와 물동량이 넘쳐나면서 도시는 많은 문제를 야기했다. 정치개혁과 정복전쟁을 동시에 수행하던 세종은 동경의 도시문제를 거론하며 이를 근본적으로 해결하기 위한 도성건설의 청사진 내놓았다. 顯德2年(955)4월에 발표한 조서³⁹⁾에서, 개봉이 당면한 문제를 ①軍營과 官署의 용지부족, ②邸店의 용지부족과 이로 인한 租費인상, ③주택밀집과 가로의 협소화, ④하절기 고온다습현상과 화재빈발 등이라고 정확하게 진단했다.

이를 해결하기 위해서 다각적인 대처방안을 내놓았는데, 우선 대대적인 외성확장을 진행하였다. 현덕 3년(956)부터 공사를 시작했는데 외성의 둘레를 48리 233보 규모로 확대했다. 이는 원래 성내용지의 4배에 달하는 면적인데, 북송도성의 기반이 이때 조성되었다. 두 번째로는 街道를 정비했다. 당시 개봉은 인구팽창과 상업발전으로 住宅과 邸店의 侵街행위가 성행하면서 가도가 협소해졌다. 干道와 坊巷의 구체적인 寬狹 규정도 제시되었고, 이미 가도로 침입한 건물들은 철거하여 직선도로를 확보했다. 50보 가도에는 양변에 5보마다 가로수를 심고 鑿井을 하였다.⁴⁰⁾ 가도를 중심으로 정부계획에 따라서 軍營, 倉場, 官署등이 우선적으로 배치되었고, 나머지 용지에는 백성들이 저점과 주택을 임의로 조성하게 하였다. 정부의 계획에 따라 성곽내부를 구획한 뒤 방장을 두르고 坊과 市를 배치했던 당대 이전의 방식과는 완전히 다른 주민들의 수요를 감안한 새로운 방식이었다. 또한 세종은 성내의 변하 연변에 邸店의 신축을 장려했는데, 周景威의 十三間樓와 같은 건물들이 들어서면서 이곳에는 객상들과 교역하는 巨樓의 邸店들이 잇따라 설립되었다.⁴¹⁾

38) 『五代會要』卷26, <城郭>, p.319. 『資治通鑑』卷290, 後周紀1, p.9472.

39) 『五代會要』卷26 <城郭>:“顯德二年四月詔曰:“惟王建國, 實曰京師. 度地居民, 固有前則, 東京華夷臻湊, 水陸會通, 時向隆平, 日增繁盛, 而都城因舊, 制度未恢. 諸衛軍營, 或多窄狹及. 百司公署, 無處興修. 加以坊市之中, 邸店有限, 工商外至, 絡繹無窮, 僦賃之資, 增添不定. 貧乏之戶, 供辦實多, 而又屋宇交連, 街衢湫隘, 入夏有暑濕之苦, 居常多煙火之憂, 將便公私, 須廣都邑, 宜令所司於京城四面, 別築羅城, 先立標識(幟), 候將來冬末春初, 農務閒時, 卽量差近甸人夫, 漸次修築, 春作纔動, 便令放散, 或土功未畢, 卽次年修築. 今後凡有營葬, 及興窰竈并草市, 並須去標識七里外. 其標識內, 候官中劈畫, 定營街巷, 倉場諸司公廨院務了. 卽任百姓營造. 至三年正月, 發畿內及滑·曹·鄭之丁夫十餘萬, 築新羅城. 仍使曹州節度使韓通都, 部署夫役.”

40) 『冊府元龜』<都邑>

41) 楊寬, 『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pp.254-255.

개봉의 지리적 특색을 살려 조운루트에 대한 정비도 추진되었다. 전술한 바와 같이, 禁軍의 重兵化와 군량미의 공급문제는 이미 도성의 중대 현안이 되었지만, 당시 대운하 노선에서 宿州지역이 막혀있었을 뿐 아니라, 南唐이 남방물자의 이동을 철저히 단속하고 있어서, 중원국가의 입장에서는 일단 산동과의 운수로를 원활하게 하는 게 중요했다. 禁軍의 양식을 도성으로 운송하는 가장 중요한 조운루트는 黃河와 五丈河였다. 특히 오장하는 경동로 방면의 곡식과 吳越과 閩 등의 조공물자가 진입하는 水道로 중요한 가치를 가지고 있었기 때문에, 오장하에 대한 보수작업을 우선적으로 진행하였다.

개봉이 명실상부한 천자의 도성으로서 기능하기 위해서 의례공간의 설립도 추진되었다. 廣順三年(953) 太祖 郭威는 남교제사를 준비했는데, “天子가 소재한 都城이 바로 百神을 제사할 수 있는 곳”이라는 인식의 공유 하에 마침내 개봉부 내에 大祀에 해당하는 중요한 의례공간들을 설립했다. 太常禮院에서 洛陽의 의례시설을 참작하여 규정을 마련하였고, 이에 의거하여 圜丘壇과 太廟, 社稷壇⁴²⁾의 壇·廟가 차례로 건립되었다. 한편 馮道를 낙양으로 파견하여 太廟와 社稷의 神主도 모셔왔다.⁴³⁾ 도성의 동서남북 四郊에도 각각의 제단이 설립되어 의례시설이 도성을 감싸게 되었고, 세종 현덕 5년(958)에는 太廟가 다시 새롭게 축조되었다.⁴⁴⁾ 오대시기의 시대적 특성으로 인하여, 오랜 기간동안 국가의례의 공간이 미비 혹은 분리되었었지만, 都城의 의례적 기능의 회복되면서 개봉은 大祀 위주로 제한적이기는 하지만, 국가운영의 실제적 기능과 의례적 기능이 병존하는 명실상부한 도성으로 회복되었다. 이상의 논의에서 종전과는 완전히 대별되는 새로운 특성을 가진 도성이 출현했음에도 불구하고 새로운 의례적 변화는 찾아보기 힘들었다. 사실 변화는 북송시기 다양한 지역의례들이 국가의례의 하부제사로 흡수되는 과정 속에 나타나는데, 이렇게 편입된 의례들은 도

42) 『五代會要』 卷3 <社稷>: “周廣順三年九月, 太常禮院奏社稷制度, 社壇廣五丈, 高五尺, 五色土築之. 稷壇制度如社壇之制度. 社壇石主, 長五尺, 方二尺. 剡其上, 方其下, 半根在土中. 四垣華飾, 每神門屋三間一門. 門二十四戟, 四隅連飾罽毼, 如太廟之制. 中可樹槐, 準禮, 左宗廟, 右社稷. 在國城內, 請下所司修奉, 從之. 時太祖將行郊禮, 故遷社稷於東京, 修之.”

43) 『資治通鑑』 卷291, 後周太祖聖神恭肅文武皇帝 廣順三年(953) 九月 癸亥: “帝自入秋得風痺疾, 害於食飲及步趨, 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 帝欲祀南郊, 又以自梁以來, 郊祀常在洛陽, 疑之. 執政曰: “天子所都, 則可以祀百神, 何必洛陽?” 於是, 始築圜丘·社稷壇, 作太廟於大梁. 癸亥, 遣馮道迎太廟·社稷神主於洛陽.”

44) 도성내에 의례공간이 차례로 마련되면서, 예전과 악전도 구비되었다. 世宗 顯德4년(957)에는 『大周通禮』와 『大周正樂』 완성되었고, 다음해인 11월에는 寶儼에게 『大周通禮』와 『大周正樂』의 편집을 요청하기도 했다. 『資治通鑑』 卷294 後周紀5.

시민들의 일상생활에도 적지 않은 영향을 미치기 때문에, 향후 작업을 통해 복송시기를 보완해보도록 하겠다.

<표 1> 五代時期의 國家儀禮舉行 (★는 五代 皇帝太廟-郊祀親祭)

거행연도	장소	의례	집례자	주요내용 및 특징	근거자료
[後梁] 開平元年(907) 4월	洛陽?	天地(南郊) · 宗廟 · 社稷	有司(朱全忠)	-有司에게 天地·宗廟·社稷에 告하도록 명함. 大赦, 改元, 國號 大梁 (即位禮)	『資治通鑑』 卷266 後梁紀1
開平2年(908) 正月	成都	南郊	前蜀 王建	-正月 辛巳日 蜀主가 南郊의례를 거행. 大赦. 武成으로 개원 (即位禮)	『資治通鑑』 卷266 後梁紀1
開平2年(908)10월	星宿山	講武	前蜀 王建	-步騎30만을 동원하여 講武禮 거행 (황제강무례/軍禮)	『資治通鑑』 卷267 後梁紀2
★ 開平3年(909)正月	洛陽	太廟 南郊	朱全忠	-正月 己巳日(2일), 太廟 神主를 洛陽으로 이전. -庚寅日(23일) 饗太廟 -辛巳日(24일)祀圓丘, 大赦 (낙양천도)	『五代會要』2『資治通鑑』 卷267 後梁紀2
★ 開平3年(909)11월	洛陽	太廟 南郊	朱全忠	-10월 30일 親饗太廟 -甲午(11월 2일), 帝告謝於圓丘 (日南조공)	『五代會要』2『資治通鑑』 卷267 後梁紀2
均王 乾化3년(913) 正月	洛陽	太廟 南郊	朱友珪	-郢王 朱友珪가 사람을 시켜 주전층을 시해하고, 癸亥일(20)에 太廟에서, 甲子(21)일에는 圓丘에서 제사를 거행. 大赦를 시행하고, 鳳曆으로 개원. (즉위례)	『資治通鑑』 卷268 後梁紀3
乾化3년(913) 2월				-均王 朱友貞이 주유규를 폐하고 등극. 개봉으로 천도.(천도)	『資治通鑑』 卷268 後梁紀3
乾化3년(913)12월	定州 北嶽	北嶽廟 拜謁	晉王 李存勗	-定州 도착. 병술일(19), 晉王과 王處直이 北嶽廟를 알현(악묘배알)	『資治通鑑』 卷269 後梁紀4
乾化4년(914)정월	太原府	太廟	晉王 李存勗	진왕이 劉仁恭부자를 결박하고 병진일(19)에 태묘에 供奉한 뒤 유수광을 참수하고, 유인공은 이극용의 묘에 바침.(포로공봉)	『資治通鑑』 卷269 後梁紀4
均王 貞明원년(915) 11월	成都	太廟	前蜀 王建	蜀宮에 화재 발생. 百尺樓의 보화 때문에 성문을 열지 않다가, 다음날 잠시 문을 열어 有司에게 太廟	『資治通鑑』 卷269 後梁紀4

				神主를 거두게 함.(화제)	
貞明3년 (917)11월	成都	南郊 (園丘)	前蜀 王建	日南에서 조공단 방문. 축주가 園丘 제사 거행.(일남조공)	『資治通鑑』 卷 270 後梁紀5
貞明3년 (917)11월	洛陽	南郊 (園丘)	朱友貞	-趙巖이 남교례를 거행하지 않아 藩侯처럼 경시 당한다며, 西都 洛陽에서 郊祀禮를 거행하고 宜陵을 배알할 것을 요청 -敬翔의 諫言을 무시하고 남교례를 강행. 晉의 공격으로 중단. (남교의례 실패)	『資治通鑑』 卷 270 後梁紀5
貞明4년 (918)11월	番禺 (廣州)	南郊	南漢 劉巖	-越主 劉巖이 국호를 (南)漢으로 개명. 남교제사 거행. 大赦. (국호개명)	『資治通鑑』 卷 270 後梁紀5
貞明5년 (919) 정월	成都	南郊	前蜀 王建	-辛巳日(21) 蜀主 南郊제사 거행. 大赦.	『資治通鑑』 卷 270 後梁紀5
貞明5년 (919) 4월	揚州(江 都府)	宗廟·社稷 건립.	吳 楊隆演	-徐溫등이 吳王에게 청제를 요청. 불허. 吳國王에 즉위. 宗廟·社稷 건립. 百官설치. 궁전과 문물도 天子禮에 의거하여 시행.	『資治通鑑』 卷 270 後梁紀5
龍德元年 (921) 8월	揚州	南郊	吳 楊隆演	-徐溫의 권고대로, 南郊祭祀 거행. 太祖 配享. 大赦.	『資治通鑑』 卷 271 後梁紀6
[後唐] 莊宗同 光元年 (923) 4월	魏州 興唐府 (東京)	南郊 (魏州) 宗廟 (晉陽)	李存勗	-晉王 李存勗이 魏州 牙城 남쪽에 제단을 쌓고, 祭告上帝. 國號大唐. 大赦, 改元. -魏州興唐府(東京)·太原府(西京)·鎮州眞定府(北都) (즉위례) -태원부 晉陽에 高祖, 太宗, 懿種, 昭宗 등 唐廟 4실에 朱邪執宜, 李國昌, 李克用등 親廟 3실을 더해 七室 宗廟를 건립.	『資治通鑑』 卷 272 後唐紀1
★同光2年 (924) 2월	洛陽	太廟 南郊	李存勗	-동광1년 11월 洛陽천도 -동광2년(924) 정월29일 親饗太廟 -동광2년(924) 2월, 남교례거행(즉위 및 천도의례)	『五代會要』2 『資治通鑑』 卷 273 後唐紀2
明宗 天成元年 (926) 4월	洛陽	即位禮	李嗣源	-監國(이사원)이 興盛宮에서 西宮으로 가서 斬衰를 입고 靈柩앞에서 즉위.	『資治通鑑』 卷 275 後唐紀4

				-甲寅日에 천성으로 개원	
天成2年 (926)11월	金陵?	即位禮	楊溥	-吳王 楊溥가 황제로 즉위. 楊行密을 武皇帝, 楊渥을 景皇帝, 楊隆演을 宣皇帝로 추존. 乾貞으로 개원. 大赦.	『資治通鑑』 卷275 後唐紀5
天成2年 (926)12월	洛陽	親廟건립	李嗣源	-德明·玄元·興盛皇帝의 사례에 의거 京師에 七廟 외에, 고조를 孝恭, 증조를 孝質, 조부를 孝靖, 부친을 孝成황제로 추존하고 親廟를 건립.	『五代會要』 卷1 <追諡皇帝> 『資治通鑑』 卷275 後唐紀5
天成4年 (927) 5월	洛陽	哀帝 太廟에 入廟	李嗣源	-天成3년 11월 曹州에 哀帝 廟 건립 -哀帝 시호를 昭宣光烈孝皇帝로 고치고 묘호를 景宗으로 추존하여 太廟에 입실.(별묘 제거)	『資治通鑑』 卷276 後唐紀5
★明宗 長興元年 (930) 2월	洛陽	南郊	李嗣源	-전년(929) 5월에 客省使 李仁求를 보내 남교제사를 위해 西川과 東川에 전 100만민과 50만민을 요청. 서천에서 50만민, 동천에서 10만민을 진헌. -2월 19일, 親饗太廟 -2월 21일, 園丘에서 제천의례 거행. 長興으로 개원. 大赦.	『五代會要』2 『資治通鑑』 卷276, 後唐紀5·6
[後晉]高祖 天福元年(936)11월	柳林(太原)	即位禮	石敬瑭(耶律德光)	-耶律德光이 冊書를 작성해 석경당을 大晉皇帝로 명하고, 의관을 벗어 수여. 柳林(太原)에 제단을 쌓고 황제로 즉위. 大赦 -갑신일(29일) 洛陽으로 입궐, 大赦.	『資治通鑑』 卷276 後晉紀1
高祖 天福2年(937) 정월	金陵(江寧府)	太廟와 社稷건립	吳 徐知誥	-吳 楊璉이 徐知誥의 딸을 비로 맞음. -서지고가 金陵을 江寧府로 개명. 太廟와 社稷을 세우고 牙城을 宮城으로 삼음.	『資治通鑑』 卷281 後晉紀2
高祖 天福3年(938) 정월	開封	종묘와 사직의 移置를 상주		-10월 汴州를 東京 개봉부로 하고, 동도 낙양을 西京, 西都를 晉昌軍節度로 개명.	『資治通鑑』 卷281 後晉紀2

				-太常에서 西京 낙양에 있는 宗廟와 社稷을 新都 동경으로 이치할 것을 상주했으나, 불허.	
高祖 天福4年 (939) 정월	金陵 (江寧府)	南唐개국. 立宗廟 南郊	南唐 李昇 (徐知誥)	-天福3年 12월 吳의 讓皇이 서거. 다음해 1월 18일 서지고가 李昇으로 개명하고, 南唐을 개국. 唐의 宗廟를 건립. -남교에서 제사를 거행	『資治通鑑』 卷 281 後晉紀2
高祖 天福8年 (943) 11월	番禺 (廣州)	南郊	南漢 劉晟	漢主가 南郊에서 祭天. 大赦. 乾和로 改元.	『資治通鑑』 卷 283 後晉紀4
[後漢]天福12 년(947)	開封	開國. 宗廟· 四親廟 건 립	劉知遠	-2월, 劉知遠이 太原에서 皇帝에 즉위. 태원을 북경, 행재소로 지칭. -5월 12일 태원출발. 6월8일 변주 도착. 국호를 ‘漢’으로, 변주를 東京으로 개명 -윤7월 庚辰日 종묘건립을 명함. 太祖高皇帝(劉邦)와 世祖光武皇帝(劉秀)를 百世不遷位로 정하고, 四親廟를 더하여 총 六로 건립. 四親의 諡號를 추존.	『五代會要』 『資治通鑑』 卷 287 後漢紀2
[後周]太祖 廣順元年(951)	開封	前代 帝王墓	郭威	-後漢 太后가 監國 郭威에게 符寶(傳國璽)를 수여. 황제 즉위. -制書를 통해 後唐 莊宗·明宗과 後晉 高祖의 陵에 守陵人 10戶를 배치. 後漢 高祖陵의 職員·宮人の 四時祭祀와 守陵戶도 종전처럼 운영한다고 발표	『資治通鑑』 卷 290 後周紀1
廣順元年 (951)	開封	後漢 隱帝 喪禮	郭威	-황제가 백관을 통솔하고 隱帝 梓宮인 西宮에서 상복을 입고 애도를 포함. 天子禮에 의거함.	『資治通鑑』 卷 290 後周紀1
廣順元年 (951)	晉陽 (太原)	卽位禮	劉崇	-劉知遠을 계승하여, 晉陽에서 北漢을 개국. 황제에 즉위. -宗廟를 세우지 않고 보통 가정에서 제사를 드리듯 함	『資治通鑑』 卷 290 後周紀1
廣順2年 (952) 6월	曲阜	謁孔子祠, 拜孔子墓	郭威	-6월1일, 곡부에 가서 孔子祠와 孔子墓에서 拜禮. 孔子祠 修補와 孔	『資治通鑑』 卷 290 後周紀1

				林의 樵採금지를 명함.	
廣順3年 (953)9월 ~顯德元年 (954)正月	開封	太廟 南郊	郭威	-圓丘·太廟·社稷·四郊壇 건립. -太廟·社稷의 神主를 洛陽에서 開封으로 迎入. -廣順3年(953) 12월29일 親饗太廟 -顯德元年 正月 1일 南郊. -大赦, 改元	『五代會要』2 『資治通鑑』 卷 291 後周紀2
世宗 顯德4 年 (957) 7월	晉陽	太廟	劉均	-北漢主가 처음 七廟를 건립	『資治通鑑』 卷 293 後周紀4
世宗 顯德4 年 (957) 9월	開封	禮典 樂典	郭柴榮	-『大周通禮』·『大周正樂』완성	『資治通鑑』 卷 293 後周紀4
世宗 顯德5 年 (958) 4월	開封	新太廟 완성	郭柴榮	-새로운 태묘가 완공. 神主를 太廟 에 入廟	『資治通鑑』 卷 294 後周紀5
世宗 顯德5 年 (958) 11월	開封	禮典 樂典	郭柴榮	-竇儼에게 『大周通禮』·『大周正樂』 를 편집하게 함	『資治通鑑』 卷 294 後周紀5
世宗 顯德6 年 (958) 11월	番禺 (廣州)	南郊	劉繼興 (劉銀)	-南漢主가 圓丘에서 제사를 드리 고 大赦를 시행	『資治通鑑』 卷 294 後周紀5